

史记 ——上下五千年

第四卷

夏于全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汪保华
封面设计 饶 群

史记——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80 印张 150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 3020 套

ISBN7-5385-0404-4/K·103

定价(全 4 卷) 39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自盘古开天以来，这块古老而又富有无限生机的土地上活跃着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善良、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中华儿女，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不断地谱写着中华民族悠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中华民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 5000 多年。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则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被割断历史延续性的国家。从秦汉开始至 19 世纪前，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领先世界潮流。这一切都使中华文明倍受世人瞩目，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壮丽的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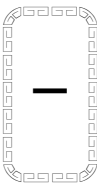
了解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可以使我们油然而生民族自豪感、增强追赶和创造世界潮流的信心和决心，而且可以从学习、领会、研究我们的历史中吸取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此，我们谨郑重推出《史记——上下五千年》一书。

《史记——上下五千年》展示历史，以再现历史本来面目为己任，它按上古、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华民国的历史顺序组织和编排内容，以大手笔、精制作、大投入为编撰基调，以全方位眼光扫描自盘古开天以来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漫历程。全书用条目形式详述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史实，气势恢宏，体系严密，经纬交织，不仅对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之背景作详细的铺陈，而且在客观描述历史事件及史实的同时，高度重视事件和史实本身所蕴含的重要历史经验和教训，并钩沉索隐将其发掘揭示出来，以满足广大读者“读史使人明智”的期望。《史记——上下五千年》展示历史，但并不等同于历史，它避免了一般通史中的那种学究气和文字上的枯燥乏味，而在保证通俗易懂的前提下，将叙述语言和文学语言有机结合，使文风更为活泼，能更有效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的编撰宗旨是要把读历史从文人学者所崇尚的雅好推广为广大普通读者的闲暇翻阅嗜好，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能真正成为广大炎黄子孙处世做人、事业进取的最宝贵精神财富。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权威专家学者执笔编写，编校质量精良。温故知新，鉴往知来。我们相信，此书的付梓对于广大收藏者和阅读者来说不啻是一个福音。

编者

2003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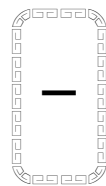
第四卷 目录

民 国	(1)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1)
国民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2)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3)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	(4)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	(5)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	(6)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8)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9)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0)
马日事变	(11)
七·一五政变	(11)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12)
第二次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13)
国民党实现全国统一	(14)
南昌起义	(15)
八七会议	(17)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8)
黄麻起义	(20)
广州起义	(21)
湘南暴动	(25)
鄂中、鄂西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	(26)
广西百色、龙州起义	(28)
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反“进剿”	(31)
红四军第二次反“进剿”	(31)
红四军第三次反“进剿”	(32)
红四军第四次反“进剿”	(33)
中共六大	(34)
古田会议	(35)
土地革命的开展	(35)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37)
“九·一八”事变	(38)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39)

“一·二八”淞沪抗战	(40)
伪满洲国的建立	(41)
“攘外必先安内”	(42)
长城抗战	(43)
福建事变	(44)
“左”倾的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方针	(4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45)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泛滥	(46)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开始	(47)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作战	(48)
红军长征的胜利	(51)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64)
华北危机	(68)
“一二·九”运动	(70)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71)
对日外交日趋强硬和抗战准备	(71)
沟通国共对话以图政治解决	(72)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公布和国民大会的筹备	(73)
《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74)
红一方面军东征	(75)
红一方面军西征	(79)
两广事变和绥远抗战	(83)
西安事变	(84)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85)
卢沟桥事变	(86)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9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91)
“八·一三”淞沪抗战	(92)
太原会战	(101)
南京保卫战	(108)
徐州会战	(111)
武汉会战	(114)
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117)
八路军出师抗日	(117)
八路军四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18)
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119)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	(123)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126)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27)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127)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	(128)
远东慕尼黑阴谋	(129)
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130)
国统区的战时财政经济措施和成就	(132)
汪精卫叛国	(133)
南昌会战和随枣会战	(134)
第一次长沙会战	(134)
桂南会战和 1939 年冬季攻势	(135)
枣宜会战	(135)
第二次长沙会战	(136)
第三次长沙会战	(137)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138)
皖南事变和第二次反共高潮	(139)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	(140)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41)
百团大战	(142)
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	(142)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抗战	(143)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44)
大生产运动	(145)
整风运动	(14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德、意宣战	(148)
《联合国共同宣言》和中国战区的成立	(149)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签定	(150)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151)
豫湘桂战役	(153)
中国战区军民的大反攻	(154)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转折	(155)
中共七大	(156)
国民党六大	(157)
雅尔塔会议与中苏谈判	(158)
美、苏对日军的沉重打击	(159)
日本投降	(159)
重庆谈判	(160)
马歇尔使华与《停战协定》	(162)
“一二·一”惨案	(163)
政治协商会议	(164)
四平保卫战	(165)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	(166)
练兵、减租、生产和土地改革运动	(166)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部署	(167)
内战的全面爆发	(168)
国民大会和《中华民国宪法》	(169)
国民政府再度改组	(170)
《中美商约》	(170)
国统区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	(171)
国民党的经济危机	(173)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174)
《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175)
十二月会议	(176)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177)
辽沈战役	(177)
淮海战役	(179)
平津战役	(180)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182)
和平阴谋和南京政权的覆灭	(18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18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86)



民国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国共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工农运动的日渐高涨。但却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及买办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为颠覆广东革命政权，他们蓄意制造了商团叛乱事件。

广东商团成立于 1912 年，本是商人的自卫组织，后来被英帝国主义所操纵，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团长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1924 年夏，陈向英商购买了一大批军火，违法私运入口，被广东政府查获没收。商团寻机发动叛乱。1924 年 10 月 10 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庆祝双十节的游行活动，商团武装竟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商团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叫嚣打倒孙政府，欲与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英国出动军舰，为商团助威。广东革命政府处于十分危机之中。中共和广东各界群众强烈要求镇压商团叛乱。10 月 14 日，孙中山调集政府军、黄埔学生军平叛。15 日，商团被缴械，商团叛乱的平定，给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商团叛乱平定后，广东革命政府仍危机四伏。各派反动军阀势力，盘踞着广东大部分地区。东江的陈炯明，粤南的邓本殷，还有与革命势力貌合神离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均拥有较强实力，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时刻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陈炯明的主力共 6 万余人，在各派军阀中实力最强，对革命政府威胁最大。1925 年 1 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称“救粤军总司令”，联合江西军阀，分三路进犯广州。15 日，广州留守政府决定组织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30 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三路进兵，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许崇智所部粤军为右路，攻淡水，桂军刘震寰为中路，攻惠州，滇军杨希闵为左路，攻河源。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右路军统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战时政治工作。2 月 1 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右路军勇猛进军，连克东莞、常平、平湖，11 日占领深圳，肃清了广（州）九（龙）路敌前哨部队，然后乘胜挺进，于 14 日克复淡水，这时，因左、中路的滇、桂军迟不进兵，右路军实际成为东征军主力。20 日，右路军占领平山，然后暂置惠州于不顾，挥师东进，在海丰农民群众支援下，先后攻克海丰、潮安、汕头等地。3 月 13 日，右路军又与叛军激战于棉湖，虽牺牲惨重，但终于大破敌军。至 23 日，又攻占五华、兴宁、梅县等地，残敌逃往闽赣边界。第一次东征击溃了陈炯明主力，胜利结束。

当东征战事方酣的时候，担负左、中路进攻任务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却心存异志，暗中勾结陈炯明和滇系唐继尧，按兵不动，陷右路军于孤军奋战。继而又

于4月间从东江撤回广州,发动叛乱,占领广州电报局、火车站和一些政府机关。6月6日,右路军奉命回师,镇压叛军。11日,在工人、农民支援下向叛军发起总攻击,仅一天半时间,全歼滇、桂军2万余人,平定了杨、刘叛乱。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是1923年3月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孙中山自任大元帅,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等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内政等部长。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曾着手组建国民政府,但考虑到粤境军阀林立,大本营制易于应策,就暂时保留了这种政制。1924年7月1日,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指挥政府处理一切政务,从而加强了国民党中央对政府及其政策的领导和监督。因而,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对内对外都采取了积极的革命政策。

孙中山逝世前后,国民党中央再次酝酿并提出改组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成立国民政府问题。第一次东征和杨、刘叛乱平定后,初步稳定了广州局势,政府改组工作得以实施。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改组大本营政府为国民政府,军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24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员及代行大元帅职权的名义,通电发布国民政府改组决议案,宣布设置国民政府掌理全国政务,以委员若干人组成,并设置军事、外交、财政各部等六项改组办法。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史称“广州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政制采用委员制,选举汪精卫等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聘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申明国民政府的职责为:“履行先大元帅之遗嘱,凡遗嘱所叮咛告语者,即国民政府所悉力以赴而期其实现者”。内外政策为:对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仿照中俄协定,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对内,继续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自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收已失之主权,而还之国民,以符主权在民之旨”,“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从而实现“国民革命的最大目的”。

国民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大力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支持民众运动,一面致力于广东的军政、民政、财政的统一。

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25年9月,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借东征军回师平定杨、刘叛乱之机,纠集残部,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对革命力量展开疯狂的反攻。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陈的旧部邓本殷也蠢蠢欲动,企图与东江叛军相呼应,围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肃清各路叛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和南征。

9月底,第二次东征军组成。蒋介石任总指挥,汪精卫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3万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左、中、右三路作战。第一纵队为中路,以何应钦为纵队长,为东征军主力;第二纵队为右路,以李济深为纵队长;第三纵队为左路,以程潜为纵队长,总预备队为朱培德的第三军。10月1日,东征军各部相继出发,开始

东征。陈炯明将其主力 1 万余人集中于惠州地区。惠州为东江门户,三面环水,城高墙坚,易守难攻,素称“南方第一坚城”。陈炯明企图先据险顽抗,再寻机反守为攻。为破惠州,东征军把部队分为攻城军和野战军两部分。10 日,东征军扫清了惠州外围之敌。13 日开始攻城。因梯短城高,数度强攻受挫,伤亡十分惨重,第二师四团团长刘尧宸壮烈牺牲,全团官兵伤亡过半。共产党员蒋先云身先士卒,虽多处受伤,仍冲锋在前。在猛烈炮火掩护下,14 日,东征军终于攻克惠州。惠州之役,是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歼灭了叛军主力,很快收复了东江地区,东江的收复,结束了陈炯明祸粤的历史,为平定南部军阀邓本殷创造了条件。

邓本殷原为陈炯明部属,1923 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后,邓在南部组建高(州)、雷(州)、罗(定)、阳(阳江、阳春)、钦(州)、廉(州)、琼(州)、崖(州)“八属联军”,并于 8 月宣布八属自治,邓本殷表面上在孙中山、陈炯明之间保持中立,独树一帜,实则与陈沆瀣一气,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共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开始时,邓本殷出兵阳江,企图进犯广州,策应东江叛军。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同时南征,任命朱培德为南征总指挥,四路进兵,先后克复阳江、肇庆、廉江、廉州等地。1926 年 2 月下旬攻克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为革命势力统一。

同时,以李宗仁、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势力,在广东革命势力支持下,于 1925 年 2 月中旬歼灭旧桂系军阀沈鸿英主力。7 月,又打败入侵的滇军,统一了广西全境。李、黄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1926 年 2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主要内容:(1) 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2) 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 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导监督。6 月 1 日,广西省政府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省政府主席。

两广的统一,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国民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后方基地。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跻身于国民党中央常委之列,他一面标榜自己是“总理的唯一信徒”,一面又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极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企图攫取更多更高的权力,开始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领袖”。

1926 年 3 月,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的谣言,蛊惑人心。18 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王柏龄、欧阳格等派人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到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速调军舰到黄埔候用。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声称并无调舰命令,蒋的爪牙则大造谣言。20 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断绝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强令他们退出第一军。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这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对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的严重挑衅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共两广区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坚决回击,但是,共产国际

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采取妥协的方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让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部分苏联顾问也被辞退回国,结果使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打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因蒋介石挤压离广州出国。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1/3;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交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这是蒋介石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提案。对此,陈独秀、张国焘继续妥协退让,要求与会的中共代表签字接受这个提案。这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蒋介石、顾孟余、甘乃光分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蒋介石等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绝对优势。不久,蒋介石又当了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开始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

1925年至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由“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又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人士,迫切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直系军阀联合起来,首先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将同情北伐的国民军赶出京津地区。而后吴佩孚又准备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孙传芳和川、贵、滇等西南各省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北洋军阀联合围攻的计划,并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决定出师北伐。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这次北伐的目的和任务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唯一之需要”,“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约10万人,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下属各军序列:第1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2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副党代表李富春;第3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4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第5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第6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7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第8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

北洋军阀的主要势力有三支:一是盘踞于湘、鄂、豫、陕、冀一带并控制着京汉铁路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20万人;二是控制着东北各省和京、津地区及津浦铁路北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兵力35万人;三是以直系军阀分化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

占据着苏、皖、浙、闽、赣5省,拥有兵力20万人。奉直军阀总计兵力75万人,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拥兵自重,不能协同作战。

北伐军根据当时双方军力的对比和军阀内部的矛盾,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挥师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及其他军阀势力。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在1926年7月12日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指出:“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7月25日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援北伐战争。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

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军第10师、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与第7军、第8军组成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第8军军长唐生智任总指挥,分路向敌人的淞水、涟水防线发起进攻,连续攻占株州、醴陵、湘潭、宁乡等地,直逼长沙城下。叶开鑫率长沙守敌弃城向平江、岳阳退却。7月11日,在工人保安队的接应下,北伐军进驻长沙。

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张作霖、吴佩孚正率部队在北京西北的南口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激烈的争夺战。长沙被攻克后,吴佩孚命令在湖南的部队依山水之险,固守平江、岳阳一线,准备待他打下南口后,再率主力南下反攻长沙。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4、第7、第8军直取武汉,第2、第3军集结醴陵、攸县,警戒江西的孙传芳部队,第6军和第1军的第1、第2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19日,第4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7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开进。22日,第8军攻克岳阳。湘军总司令叶开鑫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率残部万余人退据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泗桥。

吴佩孚接到湖南守军惨败的消息后,放弃南口,亲率其主力陆军第8师和湖北暂编第4师昼夜兼程,急速南返。8月25日,吴佩孚率部抵达武汉,急调1个混成旅和1个团驰援汀泗桥。汀泗桥是鄂南门户,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以2万兵力凭险固守,同时调集北方部队南下增援,并策动孙传芳从江西出兵袭击平江、长沙,以切断北伐军后路。因此,国民革命军必须迅速拿下汀泗桥,以免遭吴、孙两部夹击。8月26日晨6时,第4军一部向汀泗桥发起攻击。吴佩孚将司令部设在汀泗桥后翼不远的贺胜桥,并在此亲临督战。26日激战一天,汀泗桥四次易手,反复争夺,仍无进展。27日拂晓,北伐军实施全线总攻击,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汀泗桥而后乘胜追击,于27日上午又攻占咸宁城。8月30日,北伐军又向贺胜桥发起攻击,一举攻占北守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见败势已定,逃至汉口,据城固守,等待援兵。

9月1日,北伐军兵分3路,乘胜直逼武汉三镇。中路由李宗仁督率第1军、第4军、第7军主力进攻武昌;左路以第8军的3个师和夏斗寅的鄂军第1师进攻汉阳;右路军以第1军一部迂回进攻汉口。武昌城高地险,中路军在进攻战斗中,打得非常艰苦。9月3日、5日两次攻城未果。敌以高墙重炮,负隅顽抗,北伐军前仆后继,死伤官

兵千余人。遂改用封锁围困。在此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拒绝给吴佩孚制造武器。北伐军兵临汉阳城下时,守军刘佐龙师起义。6日,北伐军进占汉阳。汉口守军在吴佩孚的指挥下逃往黄陂、孝感。7日,北伐军进入汉口,并乘胜进占武胜关。吴佩孚又率部逃至河南信阳,留下刘玉春师固守武昌。武昌城被围困30天后,守城之敌弹尽粮绝,斗志已失。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内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用云梯爬城,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防守保安门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与北伐军议降,打开保安门迎接北伐军入城。北伐军俘获守城司令刘玉春,全歼守敌2万余人。至此,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除少数逃往鄂西和河南外,均被北伐军歼灭。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作战遂告结束。1927年1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

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坐收渔人之利。但是到了8月下旬,孙传芳见吴佩孚濒于崩溃,北伐军直接威胁到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时,也感到恐慌起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策动下,孙传芳和张作霖重新调整双边关系,达成相互谅解,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决定从苏、浙、皖调兵10万,会同驻赣部队2万余人,分两路向北伐军出击。一路布署在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南侧,向湘鄂边境推进,企图截断长沙至武昌的铁路;一路由瑞昌、阳新沿长江向武汉方向进攻。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武昌城外,其余兵力分为三路转攻江西。1路攻赣南,以第2军第5师和第5军第46团协同独立第1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后,沿赣江北上;2路攻赣西,以第3军和第2军的主力出击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与孙传芳部队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清江)进发。1路攻赣西北,以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9月19日,第6军军长程潜命第19师乘势攻占南昌,但友邻部队未能迅速跟进,又未能切断敌援军来路,孙传芳便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担任侧应阻击的第1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不听从命令,贪生怕死,在阻敌失败后弃部出逃,第1师几乎全军覆没。占领南昌的第6军在失去侧翼掩护,遭受孙部援军的围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24日退出南昌,退向奉新。10月上旬,由萍乡、新余东进的北伐军第2军主力攻占清江、丰城,第3军在南昌以西万寿宫地区歼灭孙军一部。由鄂东南进入赣西北的北伐第7军,在箬溪重创孙军1个师后,攻占德安,又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这里,由于孙军回师救援,北伐军各路又未能协同作战,德安得而复失。与此同时,第6军进攻永修失利,第3军也在乐行、乐化受挫。10月11日,第2军和第1军第2师再次攻打南昌,又遭重大损失,被迫于13日撤退。

此时,虽然北伐军在南昌进攻战斗中未获成果,但两湖战争结束后,北伐军第4军从湖北赶到江西,使北伐军的实力大增。这时,孙传芳的后方出现了极不稳定的局面。

浙江省省长夏超于10月16日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北伐军入闽后，孙传芳在闽部队纷纷倒戈。10月29日，北伐军攻克临川，截断赣闽通路，继续向南浔铁路沿线发起攻击。11月初，第7军再克德安，第4军攻占马回岭，两军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岭击溃孙军二个师，截断了南浔铁路。九江、永修、乐化等地孙军见势不妙，纷纷溃逃，在滁槎附近被歼1.5万人。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孙传芳此时在江西的主力部队10余万人，除少数逃往皖南和江浙外，绝大部分被歼灭，孙传芳本人从九江乘军舰逃往南京。蒋介石遂率北伐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

在福建战场上，听命于孙传芳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辖四个军共3万余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远征广东兵力薄弱时机，亲率大军南下，分三路进攻广东。10月上旬攻占蕉岭、松口、饶平地区，在永定设立行营。为了粉碎周荫人进攻广东的企图，何应钦指挥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和第14师主力袭击周部后方，一举攻占永定行营。此时，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周部占据蕉岭第2军的两个师宣布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配合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夺回松口，歼灭周部的第3军。迫使周部第4军和第2军残部退往长汀。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7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14军第2师配合下进占长汀。在此期间，独立第4师等部队一路北进相继占领漳州、泉州、莆田、永泰等市镇，逼近福州。12月初，自赣东入闽的第2军第6师进占建瓯，切断了闽、浙孙军的联系。孙传芳部驻闽海军起义，驻福州的1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不战而下福州。周荫人率残部逃往浙江，福建全省遂被国民革命军占领。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并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总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决定首先攻取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主力，然后会师南京。根据上述计划，北伐军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东路军仍以第1军为主，由何应钦为总指挥，辖6个纵队，由江西东部和福建北部进入浙江，进攻杭州、上海。中路军以第3、第6、第7军为主，由蒋介石兼总指挥，下辖江右军和江左军。程潜指挥江右军3个纵队，由赣北入皖南，策应东路军作战。李宗仁指挥江左军3个纵队，由鄂东向皖北，阻止直鲁联军南下，相机夺取苏州、合肥。西路军以第4、第8军为主，由唐生智为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部分兵力巩固武汉，以第8军主力挺进豫南，控制京汉铁路南端，牵制河南之敌。另设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指挥官，主力在南昌，一部在九江，策应全局作战。

1月上、中旬，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26、第19军先后在富阳和宁海之战中失利。东路北伐军为打破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从1月27日起，由衢州兵分3路开始东进，先后占领兰溪、金华、桐庐、诸暨等地，于2月18日占领杭州，21日占领宁波。孙传芳在浙江的残部向淞沪溃逃。浙江全境为北伐军平定后，蒋介石即任命其随员担任了浙江的军政要职。继福建之后，浙江又完全被蒋介石控制。

在安徽方面，由于孙军中王普、陈调元部起义，中路军未经战斗便顺利进驻安庆、芜湖。在江苏方面，中路军的江左军由长江北岸指向临淮、蚌埠，江右军由芜湖以东分三路直取南京。3月23日，第6军攻占南京。这时东路军也进抵上海附近，同日，上海工

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市，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至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彻底溃败，残部由扬州退往淮阴、泰州一带。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年1月1日联席会议正式办公。

1日至3日，武汉10多万市民连续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码头讲演时，英国水兵登岸干涉，竟用刺刀驱逐宣传队员和听讲群众，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几十人，制造了汉口惨案。4日在刘少奇等主持下，武汉农工商学各界200多团体500名代表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议决对英斗争八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责令英国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交出行凶水兵，撤退停泊在武汉江面的英国军舰，拆毁英租界的水袋、电网，解除租界巡捕的武装，由国民政府管理租界，否则即敦请武汉政府封锁和收回英租界。当日，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等宣布完全接受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交涉条件，表示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一定为人民“报仇雪耻”。5日，武汉各界400多团体30万民众举行反英大会，大会在李立三等主持下通过了联席会议的八项条件，会后，群众冒雨游行，冲入英租界，摧毁了租界内的沙包、电网，驱逐了英国巡捕，夺回了英租界。同日，武汉国民政府议决设立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汉口英租界。

1月6日，九江也发生英国水兵枪杀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挑衅事件，九江工人和各界民众几万人奋起占领了英租界，迫使英国水兵退回军舰。次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人到九江交涉，并于10日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武汉国民政府代表陈友仁在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在与英国驻华公使阿马利的谈判中严词拒绝了对方提出的恢复租界原状的无理要求，顶住了英国政府企图调派军队来华的武力威胁，终于迫使阿马利分别于2月19日、20日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协定上签了字，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一个壮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反帝斗争的进一步高涨。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反帝斗争高涨的同时，全国工人运动也蓬勃开展。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成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6年10月，当孙传芳的主力大部投入江西战场，上海兵力空虚和浙江省长夏超

宣布独立并率部进军上海时,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夏超部被孙传芳击败,起义遭到失败。

1927年2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上海总工会于19日组织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几天内罢工工人增加到三四十万。21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同反动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进入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在蒋介石命令下按兵不动,起义又遭失败。

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担负领导。周恩来和江浙区委领导人罗亦农、赵世炎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王寿华等进行了一系列十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建立有严密组织的5000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秘密训练,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和各级指挥部,派人详细侦察敌情,制定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起义计划。3月11日,铁路工人首先罢工,破坏了直鲁联军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20日北伐军白崇禧部进至上海西南郊龙华,上海守敌惶恐不安。周恩来等决定发动第三次起义。21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各行业80万工人立即响应,罢工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占领电厂、自来水厂、电话局、电报局、火车站等要害部门,攻占了警察署和兵营。起义开始后,上海总工会曾派代表到龙华,要求白崇禧迅速攻占上海,但白崇禧继续执行蒋介石命令按兵不动。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30多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下午占领了上海市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胜利后,召开了由全市工商学各界代表参加的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委员会”,决议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次胜利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也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冲击着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从1926年9月上旬起,英、日、美、法等国纷纷增调大批军舰来华,企图干涉中国革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在华殖民利益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英帝国主义便成为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

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便资助吴佩孚大批军火,并炮轰北伐军。9月5日,又借口川军杨森扣押撞沉中国木船的肇事英轮,炮轰万县城,造成中国军民1000余人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1927年1月,英水兵又先后在汉口、九江制造“一三”和“一六”惨案,激起中国人民反英怒涛,起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期间,英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制造“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舆论。英国政府还曾极力拉拢日、美、法等国,以图实现各国联合武力干涉。由于武汉政府采取分化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孤立、打击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日、美、法等国从各自在华利益出发,暂时没有响应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倡导,而主要采取积极拉拢蒋介石,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和平干涉”手段破坏中国革命。

1927年3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迅速进军,威胁到列强各国在苏、浙、沪地区的殖民利益。停泊南京江面的英、美、日舰队指挥官密订“联合警备计划”,准备派陆战队上岸协同“保护侨民”。23日晚至24日,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入南京城时,直鲁联军溃兵和地痞流氓乘机大肆抢掠,劫祸波及英、美、日领事馆和外侨住宅,造成6名外国人死亡。24日下午3点,停靠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悍然炮轰南京城,造成北伐军官兵及和平居民伤亡2000余人的重大损失。这就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制造的南京惨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于1927年3月26日一到上海,便立即和集中在那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买办、大地主和帮会流氓头子会面,策划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2万多军队帮助蒋介石,并通过租界为蒋介石提供一切便利;上海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蒋介石筹集了巨额资金;以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势力作出了组织大批打手的保证。同时,蒋介石将上海、南京的一部分同情革命的北伐军缴械或调离,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部队进驻上海市区。4月初,蒋介石和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以及吴稚晖、张静江等召开反共的秘密会议,由吴稚晖提出“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诬称共产党“叛逆有据”,要求蒋介石给以“非常紧急处置”。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当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赶走鲍罗廷和分党两件事情。随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制止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的成立,指使吴稚晖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起义的胜利果实,并派流氓地痞监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同时又虚伪地“担保不缴”工人纠察队的一枪一械,还给总工会送去了“共同奋斗”的横匾以麻痹群众。

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他不但没有任何应变的精神准备,反而于4月5日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要求革命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同蒋介石之流“互相尊敬”、“开诚合作”。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装。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清党”的命令。当天深夜,帝国主义军队越过租界,搜查、拘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1000多人,转交给了蒋介石。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佩带“工”字号袖章,冒充工人纠察队,袭击各工人纠察队。蒋介石布置好的反动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械;又指使流氓、党棍占据上海总工会,查封工会组织,捕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仅工人纠察队员就死伤300多人。当天,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命令。13日,上海10多万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蒋介石的反动暴行。会后,群众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到宝山路游行请愿,途中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军队的袭击,当场牺牲100余人,伤无数。时值大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

和蒋介石订有密约的广东军阀也于4月15日在广州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反动军警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宅,解除了黄埔军校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西等地也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4月18日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北方奉系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公使团的支持下,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竟派军队包围、袭击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张挹壮等35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使馆工作人员。28日又以残酷的绞刑杀害了李大钊等20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马日事变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把持下迅速右转。1927年4月底,国民党中央应汪精卫要求组织特别委员会,专门查办所谓过激言论。5月8日,武汉政府发布通告,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20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斗争地主是“扰乱”秩序,要求各级党部予以“制裁”。22日,汪精卫下令制止赤化运动,扬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领袖。

武汉政府的右倾,助长了从湘赣鄂各地逃到武汉的土豪劣绅和右派对工农运动的恶毒攻击。驻扎在两湖地区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也日益公开反共和反对工农运动。5月17日,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宜昌叛变,并乘虚进袭武汉。只是由于北伐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前往镇压,才击溃了叛军。

5月21日,在武汉政府所辖第35军军长何键的怂恿下,驻守长沙的该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也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农讲所、国民党省党部等20多处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领袖,这就是马日事变。事变后,许克祥组织“救党委员会”,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马日事变成为汪精卫、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曾计划组织长沙周围各县农军围攻长沙,但由于陈独秀反对而未能实现。

5月27日,第3军军长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也在江西开始“遣送”共产党人,封闭工会、农会,解除工农武装。

七·一五政变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作出中国问题决议案,即五月指

示,提出了挽救危局的方针、政策,主要是: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党员、5万工农组编新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等人认为指示中的各项任务都无法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对指示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甚至将这一指示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成了汪精卫集团叛变的一个“借口”。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就分共问题达成协议,即唐生智所部调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河南交国民军驻防。随即,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委员会密令严查各地共产党机关,武汉政府也于17日免去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职务。19日,冯玉祥到徐州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举行会谈。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冯玉祥还在国民军及其管辖地区开始遣送共产党人。

面对武汉政府的日益反动,陈独秀拒绝党内的正确主张,继续实行妥协退让政策。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的错误遭到党内不少同志的批评。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工作。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撤出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第二天,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们彻底决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前往苏联。在此之前,国民党另一位左派代表邓演达于6月30日化装成查电线工人离开武汉,后与苏联顾问一起到达莫斯科。他在给国民党中央的告别信中斥责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反人民行径,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

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随后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和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党务、政府及军事组织方面的议案20余项,主要内容:(1)整理党务。规定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活动,由中央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务进行考察、训练和重新登记。开除并撤销谭平山、林祖涵、邓演达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党籍和职务,停止联俄政策。(2)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改选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蒋介石、谭延闿等5人为中央常委。保留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分会。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改组国民政府。改选了国民政府委员、常委,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

选举产生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节制指挥”陆海空各军。二届四中全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在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上,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互相勾结又互相排斥。北京政府的张作霖趁南方混乱之机,在北方发动了对阎锡山、冯玉祥两部的征讨作战。1月24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讨伐阎、冯的作战方案,决定以杨宇霆为第4方面军军团长兼大元帅府参谋长;以张学良任京汉线总指挥;以张宗昌为津浦线总指挥;以孙传芳为鲁西总指挥。同时,还研究制定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方案。其要点是对京汉、津浦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一带取攻势。阎、冯为了解救北方危急,呼吁国民党军队共同讨奉。蒋、冯、阎、李4派为共同完成对奉系的北伐,取得暂时统一。二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整编了所有国民党的军队。2月9日,蒋介石视察徐州,改编了第1集团军,自兼总司令,并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19日,改编国民革命联军为第2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编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3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后又将两湖及两广各军改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共4个集团军,约27万余人。其兵力部署是:以何应钦留守南京,第1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3集团军出京绥路,会师北京,第4集团军一部留守南方,一部为北伐军预备队。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再次誓师北伐。4月7日,蒋下达北伐军总攻击命令,蒋方分由津浦路正面的海州、归德、曹州、濮阳;京汉路正面的井陉、五台、雁门等地出动,压向张作霖控制的冀、鲁、察3省腹地。战线北起晋北的偏关,东迄苏北的海州,绵亘1000多公里。4月29日,第1、第2集团军一部抵达济南近郊,第2集团军主力到达东阿、平阴以北地区,西翼占领肥城,形成三面包围济南的态势。张宗昌见济南难守,于30日晚渡过黄河向北逃跑。孙传芳也于5月1日清晨离开济南北逃。5月1日上午10时,北伐军进入济南。当日晚,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设立总部,并委派方振武兼任济南卫戍司令。

正当蒋军陶醉于胜利进入泉城的欢乐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伐,制造了闻名中外的“济南惨案”。5月3日上午,日军司令部下达了向蒋军进攻的命令。侵入济南的日军选择了驻在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的国民党第40军3师7团的2个营为攻击目标,乘该部团、营长均去师部开会之机突然发起攻击。蒋军因没有长官指挥,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其中第2营全部被日军歼灭。第7团团长江闻讯后不敢组织反击,丢下全团官兵仓皇而逃。40军的第92师因被定为济南卫戍部队,进行英勇反击,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师团长福田派员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介石下令停火。威胁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畏日如虎,立即派出由10名参谋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命令部队停止对日军还击。日军借济南事件为名,大肆残杀济南军民,据事后不

完全统计共有 3652 人被杀害。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的高潮,但蒋介石却妥协退让,下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伐。

在此期间,京汉路上,冯玉祥率第 2 集团军,除派孙良诚方面军协助第 1 集团军在山东方向攻打张宗昌、孙传芳部外,其主力于 4 月 6 日对直南奉军开战。奉军此时将晋军逼回山西后,抽出其精锐部队对豫北的冯玉祥部作战。双方你争我夺,在彰德附近激战 20 余天。至月底,由于阎锡山晋军再次出山向京汉路运动,奉军恐后路被截断,乃主动后撤。5 月 1 日,奉军全线撤退。濮阳、观城的直、鲁联军也于 2 日遁走。冯部乘胜全线追击,3 日收复邢台,5 日收复大名。

在京绥路方向,奉军于 4 月初率先对阎锡山的第 3 集团军兵分三路发动进攻。北路由灵丘进攻繁峙,中路由龙泉关进攻怀台,南路由井陉进攻娘子关。由于奉军先发制人,晋军一度被逼回山西。当冯玉祥部在彰德进攻受阻,战事危急时,曾向阎屡电求援。4 月底,阎命令第 12 军军长任右路军总指挥徐永昌率右路军部分兵力出娘子关与奉军作战。同时又命右路军副总指挥杨爱源率第 2、第 3 联军沿滹沱河东下,于 5 月 8 日攻占平山,后又连续攻占灵寿、行唐等地,威胁奉军后路,迫使攻击彰德的奉军解围北逃。阎锡山率晋军总部于 5 月 9 日占领石家庄。

5 月 16 日,冯玉祥部也到达石家庄,阎、冯会晤后决定:冯部向京汉路以东发展,以策应津浦路方向的作战。阎部兵分两路,右路由阎亲率,沿京汉路正面北进,另一路由左路总指挥商震率领沿京汉路以西地区前进。5 月 31 日,阎锡山所部晋军占领保定,打开了通往北京的门户。

这时,津浦线的孙传芳、张宗昌部已退到沧州,蒋介石、冯玉祥率第 1、第 2 集团军已渡过黄河,深入直隶腹地。京汉线上,阎锡山、白崇禧的部队已越过保定。京绥线奉军张作霖部已退至京西怀来。此时日本又借口保护在华侨民占领济南,并在南满增兵。6 月 1 日,北伐军又攻占沧州,由津浦大举向京津推进。这时,京汉、京绥方向各集团军先后占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对张作霖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张作霖见北伐军大兵压境,败势难免,为保存实力,于 6 月 1 日下令停战议和,3 日退出北京,并声言为避免牵动外交,决定将其第 3、第 4、第 5、第 7 方面军撤回关外。4 日,南京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8 日,阎令其部下商震进城接收。10 日,阎去天津接收。冀、察、绥 3 省遂落于阎锡山之手。至此,国民党南京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15 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北洋军阀政权覆灭。

国民党实现全国统一

1928 年春,南京政府的北伐部队逼近了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京、津地区,直接威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支持张作霖,并直接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破坏南京政府的“统一”战争;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提出解决“满蒙悬案”,兑现“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的条款,并威逼张作霖及其军队退回东北,承诺把东北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的要求。

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东北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

民等全部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还有所抵制。在筑路等问题上还接受英、美贷款,使英美资本势力,伸入东北,以牵制日本,这使日本大为恼火。

5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外交官黄郛、王正廷分致“觉书”声明,“战争如进展至京、津,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间……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并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移入奉天省城,部队在锦州、榆关一带加紧布防,并扬言,不许任何军队进入东北。

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5月25日,张作霖答复日本“觉书”,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决定率军退出北京,撤回东北,并向日方提出,因已不再与国民党军作战,不需补充军费,所以取消《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这更激怒了日本关东军。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派人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皇姑屯的铁桥下下面预先安放炸药,准备暗杀张作霖。

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6月3日凌晨,张作霖一行30多人乘专车离开北京。6月4日晨,当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皇姑屯时,张作霖被炸,很快毙命。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接到奉天督府“立即返奉”的电报,巧妙地避开了日军的封锁,悄然化装返回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7月1日,张学良顶着日本方面的重重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是日起,东三省及热河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抛弃代表北洋军阀统治的红、黄、兰、白、黑五色旗,而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东北改旗易帜,一方面使张学良由北洋系的旧军阀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新军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南京国民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的毅然归顺中央,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挫败日寇策划东北独立的阴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此之前,新疆的杨增新迫于形势,于6月11日通电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20日,成立了新疆省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委任杨增新为省政府主席。7月19日,热河汤玉麟也通电拥蒋,宣布易帜。

新疆、热河、东北改旗易帜,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南昌起义

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大屠杀使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变,决心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不久又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为了加强对南昌

起义的组织领导使起义获得成功，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领导机构，指定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南昌起义的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反共活动。7月24日，汪精卫、孙科等人到达庐山，召集了有第2、第5两个方面军高级军官参加的秘密会议，策划军队中的“清党”，协谋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此情况，星夜下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在此危急关头，叶挺、贺龙、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在甘棠湖的一只小船上商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第20军分别于25日和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会后，叶挺、贺龙置张发奎电令于不顾，毅然率部开进南昌，起义军完成了集结。到7月底，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毛泽覃、高语罕、廖乾吾、周逸群、方维夏、彭泽民、张曙时等中共干部相继抵达南昌，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广东北江农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和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部分学员也相继赶到南昌。

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与先期潜回的朱德会合。当日，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委对有关起义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了如下决定：因准备工作不及时，起义日期由28日推迟到30日；在其他起义领导人赶到南昌之前，由周恩来、叶挺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筹备革命政权。起义即将举行的前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的张国焘从九江接连发来两封急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张国焘是作为中央代表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复电的。共产国际的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周恩来接电后经同前委成员商议，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一切准备工作继续进行。30日上午，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即开扩大会议。前委扩大会议激烈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问题。31日晨，再开前委扩大会议。此时，因叶、贺未上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陪同汪精卫、孙科到南昌。此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表示同意起义。前委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根据前委决定，起义部队加紧了起义前的直接准备。叶、贺两军分别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前委的起义决定与命令；各团、营受领了任务，并处罚了反动军官；部队制定了战斗方案。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党、团和工人活动分子会议。是日晚9时许，第20军一个副营长到第5方面军警卫团告密，为保证起义的突然性，前委决定提前两小时发动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贺龙指挥的第20军，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以及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两个保安队，按照前委的部署和作战方案，突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打响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第一枪。

经过激烈战斗，到清晨6时，南昌城内的守军全部肃清。起义军共歼守军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子弹70多万发，山炮、平射炮和迫击炮数门。还打开监狱，救出100多名群众。

8月1日上午，前委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叶挺向会议报告了起义经过。会议议决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为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文告。如《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革命委员会决定 吴玉章任秘书长,刘伯承任军事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任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任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任政治保卫处长,姜济寰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决定南昌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 4 集团军第 2 方面军番号,任命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

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次响亮的回答,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新时期的开始。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部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8 月 1 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南昌各界群众。8 月 2 日,数万南昌群众举行庆祝南昌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多达 600 余人。

南昌起义后,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率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南进,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以发展革命力量,并接受外援,待实力充实后攻取广州。

起义军南下途中接连打败围追堵截之敌,但在广东湘、汕地区,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起义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10 月 3 日,中共前委、革命委员会率部向海陆丰撤退途中,被国民党军拦腰截为两段。起义军大部溃散,一部被国民党军张望收编,余部 1200 人在董朗、颜昌颐带领下到达海陆丰,改编为红军第 2 师,加入了东江地区的武装斗争。中共前委与革命委员会成员,辗转 to 香港。

朱德指挥第 25 师和第 9 军一部由三河坝撤出战斗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几经转战,到达湖南南部。

八七会议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彻底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决定今后中国革命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告全党党员书》草案主要内容所作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会议主要内容是:

第一,坚决地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李维汉等9人，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7人。8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委。

第二，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发动秋收起义，“夺取乡村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向反动势力进攻。

第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清算和结束了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的阶段。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中共各级组织，执行暴动政策，准备武装起义。毛泽东回到湖南筹划秋收起义事宜，湖南省委还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县暴动，起义打出共产党旗帜，由共产党独立领导起义，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师，毛泽东任师长，率该师会攻长沙，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湘中七县农民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第1师在长沙工人起义策应下，夺取长沙，由何资琛到岳州（今岳阳）发动农民起义，并负责与鄂南农民起义联络，彭公达到汉口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

9月初，毛泽东抵达湘赣边界安源、铜鼓地区后，即刻开展了起义的组织准备。按照湘中起义计划，参加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正规部队，即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警卫团（亦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共党员卢德铭任团长，该团辖四个营，约2000人，战斗力较强。另一部分为工农武装，上述两部分武装力量共约5000人。毛泽东先到安源，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的决定，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会议着重讨论、确定了起义武装的改编、番号、行动计划、部署等问题。确定任命余洒渡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涂贲民领导3个团。第1团由警卫团大部、平江工农义勇队、鄂南崇通农军编成，钟文璋任团长；第2团由永、安、莲农军和醴陵部分农军编成，王兴亚任团长；第3团由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编成，苏先骏任团长。总指挥卢德铭、党代表毛泽东。这时，国民党军和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各只驻有一个营，前委决定各团分头行动。第1团为北路，由修水攻击平江；第2团为南路，由安源攻击醴陵；第3团为中路，由铜鼓攻击浏阳。在歼灭上述3县国民党军之后，集中长沙东郊，在各县农民起义武装和长沙城内起义工人配合下，会攻长沙。各团于9月11日开始行动，18日向长沙发起攻击。

1927年9月9日，长沙市郊的部分农军开始破坏粤汉铁路，以求切断国民党军南北

联系。翌日,第1团由修水向平江方向运动。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各团按预定计划,攻击前进。第1团进至修(水)、平(江)交界的龙门厂时,随该团行动的由余洒渡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反戈叛变,突袭第1团后卫营,劫去全团辎重,驻长寿街国民党军1个营乘机发起攻击。第1团腹背受敌,损失1个营,团长钟文璋失踪。南路第2团击溃萍(乡)、醴(陵)交界的老关守军后,在醴陵四乡数千起义农民支援下一举攻占了醴陵县城,歼灭守军一部,生俘100余人,缴枪近100支,救出被反动派关押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300余人,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成立了醴陵工农兵革命政府。醴陵靠近长沙,是沟通湘赣两省株萍铁路交通的要镇。国民党第8军第1师第2团两个营迅速沿株萍路向醴陵反扑过来,第35军教导团第1大队亦由醴陵西乡向县城推进,企图围歼起义军第2团于醴陵。第2团主动放弃醴陵改取浏阳得手。但部队进城后失去警惕,未能及时发现尾追之国民党军两个营的行动。追兵突然反攻浏阳县城,第2团毫无戒备,猝不及防,全团溃散,团长王兴亚去向不明。中路第3团由铜鼓西进,直逼浏阳白沙镇,与守军激战一小时,守军一个连抵挡不住,弃镇逃向东门市。第3团首战获胜,军心大振,12日乘胜进攻东门市。守军一个营又一个连,稍经接触即向达浒逃窜,第3团乘势进占东门市。9月14日,国民党军第3军第1师两个团由省援浏,“协同驻浏周营痛剿”起义军。第3团被迫放弃东门市,北辙至上坪。在向长沙进攻的作战中,工农革命军先后受挫,受到不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前委书记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再决定下步行动。

工农革命军集中文家市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处在遭受围攻而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在此情势下,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分析形势,讨论行动计划。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否定了余洒渡“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撤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徐图发展。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撤离文家市,开始沿罗霄山脉南下。25日,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遭到赣军朱培德所部和当地保安团的阻击,部队受到损失,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工农革命军继续南进。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进抵江西永新县的三湾镇。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提出对部队进行整编的意见和设想,得到了前委的通过。首先调整了前委,由毛泽东、宛希先、何挺颖、陈皓、韩庄剑、张子清等人组成新的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接着对工农革命军的编制体制、中共党的组织、军队纪律和政治思想进行了整顿。工农革命军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直辖第1、第2营共六个连,另编特务连和卫生队,共700余人。连队建立中共党支部,营、团建立中共党的委员会;建立党的书记兼任同级党代表的制度。连以上分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的重要开端。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进抵宁冈县古城。前委在这里与永新、宁冈两县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区的具体情况,与井冈山北麓的农军首领、中共党员袁文才取得了联系。10月中旬,工农革命军进抵井冈山西麓的湖南酃县水口地区。前委了解到,此时湘南,有国民党军许克祥独立第3师,土匪武装胡璋部,衡阳地区还驻有国民党重兵。工农革命军几经辗转,严重减员,实力不足600人。师长余洒渡借口离队出走,原团长苏先骏脱队而去。如此形势下,工农革命军若贸然转

兵湘南,很难立足生根。毛泽东断然放弃原定转兵湘南求发展的计划,率部调头向江西遂川进发。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经遂川大汾、黄坳、荆竹山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黄麻起义

大革命中,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把全省划为七个武装起义区。其中鄂东地区包括黄安、麻城、黄冈、罗田、蕲春、广济、阳新、大冶、鄂城等县。

1927年9月,中共黄安县委艰难的恢复了同湖北省委的联系,决定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暴动计划,经与中共麻城县委商定,决心两县共同行动,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起来没收地主财产,“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武装镇压土豪劣绅。由于两县县委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和某些领导的右倾,没有认真贯彻省委关于成立工农政府和建立工农革命军的指示,这次行动只成为一次武装骚动,很快陷入停滞状态。但毕竟打击了反革命的势力,喊出了“武装起义”、“打倒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鲜明口号。

10月间,中共湖北省委接到黄麻报告,得悉两县尚有一定武装力量和相当的群众基础,还进行过武装骚动。同时考虑到鄂南起义已于9月下旬失败(鄂南是省委确定的重点起义区),鄂东的大冶、阳新和黄梅、蕲春两区暴动受挫,决心加强黄麻区的领导,以继续发动和领导黄麻区的武装起义。不久,符向一、王志仁和原在鄂南参加领导暴动的刘镇一、吴光浩等人到达黄安。旋即成立了由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委和由刘镇一为负责人的鄂东革命委员会,改组了黄安县委,由王志仁任书记。符、王、刘、吴等人吸取了黄麻9月行动和鄂南暴动的经验教训,深入发动农民,加紧整顿两县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赶制武器,积极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此间,黄安、麻城两县有组织的群众武装已有3万人以上,黄安有枪240支,麻城有枪100余支。与此同时,黄、麻两县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也纷纷去武汉国民政府“请兵”,策划进一步镇压革命运动。只是由于这时南京国民党蒋介石、李宗仁集团与武汉国民党汪精卫、唐生智集团,为争夺国民党“正统”和抢占长江以南地盘展开混战,武汉汪、唐集团无力顾及黄麻土豪劣绅。这在客观上给黄麻起义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中共黄麻特委决定成立由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的暴动指挥部,统一指挥和领导黄麻两县农民武装,攻打县城,举行起义。

11月13日,闻悉国民党军魏益三部1个团行将进驻黄安城。暴动总指挥部遂决定乘该团疲惫,立足未稳,围攻县城,缴其枪械。是日夜,调集黄安农民义勇队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3个排,共1000余人,动员农民群众2万余人,向黄安县进发。翌日凌晨,发起攻城作战,在城内市民配合下,全歼守城警备队,缴枪30余支,子弹90余箱,拘捕反动县长以下官吏15名。这时,魏团尚在开进途中,距黄安城约10余公里。为避敌锋芒,保存革命力量,总指挥部主动将农军和群众撤出县城,转移七里坪。魏团慑于农军声威,虽进城却“夜不敢入睡”,于15日弃城退往黄陂。

16日,中共黄麻特委和暴动总指挥部率领农军浩浩荡荡进入县城,召开胜利大会,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号召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拿起武器,开展土地革命。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规定,将参加起义的黄安农民义勇队和麻城农民自卫军及配合起义的黄陂农民共300余人,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和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中共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建立,标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建军开端。黄麻农民起义,武装进占县城,组织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工农革命军,实行土地革命的行动,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阶级联合策划军事进剿,企图扼杀黄安工农民主政权和工农革命军于摇篮之中。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转移木兰山。11月底,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主力奉命去南乡开辟工作,留守黄安县城仅有革命军第2路1个排和义勇队60余人。黄安的反动势力即刻勾结驻河口的国民党魏益三部独立旅400余人,乘虚进犯县城。守城革命军在刘镇一的指挥下奋起抗击,工人纠察队和市民积极配合作战。虽英勇抗击,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黄安县城失落。鄂东军损失很大,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和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在战斗中牺牲。接着,国民党军又进占七里坪、乘马、顺河及麻城县城。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鄂东军第2路党代表刘文蔚等先后遇难。

12月下旬,从黄安城突围出来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余部陆续转移到黄、麻、光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1928年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中共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并组成了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等人为委员的中共黄麻地区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工农红军第7军及黄安、麻城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黄安、麻城农民起义,是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影响下,在中共黄麻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爆发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地方武装起义。起义以坚决的行动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鄂东地区的屠杀和进攻。在这次起义中建立的鄂豫皖边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和第一支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对于尔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创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广州起义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工农革命后,中共广东区委预感到广东国民党军阀将步蒋氏后尘背叛革命,遂准备于5月初在广州、北江、西江、琼崖、潮梅、惠州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后因李济深旋即发动了“四·一五”政变,起义准备不及而未果。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制定了《广东农运暴动计划》,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郁、恽代英、黄平为委员的中共南方局(南昌起义军南下期间,中共中央又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负责两广等地暴动和政治、军事工作,并由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

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决议

和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工作的策略。省委会议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 3 个暴动委员会,发动上述地区农民暴动,迎接南昌起义军入粤部队一举夺取广州政权,并将此暴动计划上报中共中央,同时派人分赴上述各地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很快复信批准广东省委拟制的暴动计划,但强调暴动“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待贺、叶军队到来。”10 月初,中共中央获悉贺、叶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遂致信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认为夺取广东、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暂时已无法实现,广东省委应立即停止执行广州暴动计划。由于当时的条件,中共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广东省委。

10 月 15 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分析广东的政治形势,通过了《最后工作纲领》。《纲领》认为,广州起义是一独立的行动,“决不能因为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在广东暴动的计划,“完全是根据于广东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剧烈斗争,及广东封建资产阶级之不能稳定而自行崩溃之实际状况”拟制的;“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加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已成为鼎立之势,而互相争夺广东政权之斗争益烈,火拼之期愈近”;“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的计划应继续实现”。省委决定:“现在的暴动还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省委会议结束,张太雷于 15 日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省委工作计划。中共中央认为广东省委 10 月 15 日通过的《最后工作纲领》“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中共中央决定另为广东省委起草一个工作计划,并撤销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广东省委全面领导广东暴动。

1927 年 11 月 17 日夜,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并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总暴动,中心是夺取广州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12 月 26 日,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黄平、吴毅、陈郁、沈青和王亚强等出席,常委会一致赞成中共中央《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常委会认为,粤桂战争爆发,为广州起义提供了一个机会,“广州工人只有自己起来夺取广州政权方有出路”。会议还就起义的准备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立即暴动”夺取广州政权。为加强起义的组织领导,会后成立了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张太雷任总指挥,叶挺任起义军总指挥,叶剑英任起义军副总指挥,参加组成领导起义的还有杨殷、恽代英、徐光英、聂荣臻、诺伊曼(又译罗曼,德国人,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12 月 5 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广东省委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后致信省委,批准省委的起义计划。广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了实质筹备阶段。

11 月 28 日和 12 月 1 日,省委先后颁布《号召暴动宣言》和《紧急通告》第 2 号,号召广州及四郊的工人、农民及革命的士兵,“夺取一切武装”,“杀尽工贼、走狗,改组委员”、“杀尽绅富、地主和民团”、“变军阀的战争为工农兵革命胜利的战争”、“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12 月,共青团广东省委亦发表宣言,号召革命青年加入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打倒反动政府,把政权夺在我们手里,建立工农兵政府。”

根据省委决定,周文雍负责将原先以行业为单位分散组织的“义勇队”、“自卫队”、“剑仔队”、“自救队”、“维持队”等工人纠察武装,正式改编为“工人赤卫队”,统一编为 7 个联队。徐向前等一批军事干部受命担任联队指挥员,负责进行军事训练,还秘密建立

制弹厂赶制手榴弹、标枪、大刀,收集匕首、铁棍、木棒。在抓紧建立市区工人武装的同时,省委又指派黄谦、赵自选、张善鸣、叶季壮、赖松柏等干部分赴铁路沿线各县区,组织农军,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能调动指挥的正规武装力量有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部,省委特别重视对上述各部的组织发动工作。教导团官兵1500多人,其中有中共党员200多人。为加强对该团的领导,11月18日,省委军委干部曾干庭受命到该团工作。12月4日,省委书记张太雷亲自出席该团中共地下党的会议,讲解广州起义的意义,号召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全团官兵准备参加起义,并就该团战斗任务作了布置。稍后几天,该团又秘密吸收一批进步官兵加入中共党组织。军事训练也加紧进行。警卫团官兵1000多人,团长梁秉枢和部分指挥官均系中共党员,为提高该团无产阶级成分,省委曾利用招募新兵,选派300余名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入伍,编为第3营,又通过第4军参谋长、中共党员叶剑英的关系,把一批中共党员军事干部调入该团以加强中共对该团的领导力量。黄埔军校特务营及部分宪兵中,有一批中共党员,他们根据党的决议,积极展开兵运工作,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12月初,中共在广州准备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汪精卫速派其妻回广州与张发奎协谋消除共产党。由于教导团中的反动分子向张发奎告密和中共地下武装转运站败露,张发奎决定解散教导团,镇压共产党并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面对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果断地决定,起义提前到11日举行并报告中共中央。

1927年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叶挺、徐光英等人赶到教导团营地北校场,宣布李云鹏任教导团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分别任教导团第1、第2、第3营营长。随即按预定计划逮捕反动军官,当众枪决了参谋长朱勉芳。全团召开誓师大会,张太雷、叶挺作战斗动员,下达各营战斗任务。起义官兵撕下国民党军徽章,系上鲜艳的红领带,擎起斧头镰刀红旗,高呼革命口号,宣布武装起义,分东、中、西3路向预定攻击目标疾进。叶挺、李云鹏指挥东路奔袭沙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国民党军一个步兵团,生俘600余人。

旋即转兵燕塘,包围国民党军两个炮兵留守处,其中约一个营的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号召下宣布起义,余者1300多人被俘,起义军缴获各种炮30多门,各种枪1800多支和大批弹药,并控制了从东北方向进入广州市区的咽喉。

警卫团第3营在团长梁秉枢指挥下,处决了团参谋长等一批反动军官,宣布起义。随即向驻长堤肇庆会馆的第4军司令部、仰忠街的军械库和文德路的第12师留守处发动攻击。

工人赤卫队也按预定时间出击。此外,花县的农军百余人,市郊西村、芳村、花地、聚农村等地的农民赤卫军以及广九铁路沿线的农军,纷纷拿起武器参加起义。在黄埔军校毕业的一些越南革命者在起义中与工人赤卫队并肩战斗,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天亮前,起义军已相继攻占了市公安局、伪省府、国民党省党部、市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邮电局等地。珠江北岸市区除第4军司令部、军械库和中央银行等要点外,都被起义军占领。11日下午,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离市区约20公里的黄埔军校,王侃予

和吴展急忙率领军校特务营官兵渡过珠江赶往市区参加作战,途中遭国民党军阻击,伤亡较大,被迫撤退白云山,后折向花县。

11日6时,市公安局楼顶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绣着斧头镰刀的大红旗,大门口挂着“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横额。红旗、横额向全中国人民宣告: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在武装斗争中正式诞生了!广州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上午,张太雷主持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张太雷、叶挺、杨殷、周文雍等报告了苏维埃、军事、肃反和赤卫队各方面的情况,讨论通过了苏维埃政府政纲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主席苏兆征(未到任之前由张太雷代理),内务兼外交委员黄平,肃反委员杨殷,土地委员彭湃(未到任前由赵自选代理),劳动委员周文雍,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何来,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会议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公布了苏维埃政府政纲等重要文件。政纲提出:广州政府属于工农兵;迅速组建工农红军3个军;坚决消灭一切反革命;禁止国民党的活动;工人8小时工作制,没收资本家房产;维护失业工人的利益和特权;封闭黄色工会等等。宣言指出:红军不是军阀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红军不是为军阀奋斗的,“是为给米与工人吃,给土地与农民耕,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及给帝国主义与一切反革命的死亡而奋斗的。”

广州起义第一天取得的胜利,仅仅是局部的胜利,它没有触动张发奎在广州地区的主力部队,敌强我弱的全局形势就没有根本改变。起义前,曾有人建议武力包围张发奎等军政头目住宅,因起义军兵力不够,建议未被采纳。战斗中,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等逃往河南,调动军队迅速组织反扑。停泊在白鹅潭的英、美、法、日等国军舰也向工农红军示威。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形势相当严峻。

11日深夜,起义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军事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叶挺审时度势,指出张发奎部兵力雄厚,距广州又近,疯狂反扑过来,工农红军将陷入四面包围,偌大个广州是很难坚守的。提议在张发奎部尚未逼近广州之际,主动撤离广州,移师海陆丰,与彭湃的农军会合,坚持革命斗争。叶挺的主张得到聂荣臻等人支持,却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会议决定继续扫荡河北国民党军警残部,准备进攻河南李福林第5军,坚决固守广州,保卫苏维埃政权。

12日,军事形势急转直下,由于工农红军无力控制广三、广九、粤汉和珠江三路一水,张发奎所部得以从容机动猛扑广州。战斗在四面八方激烈展开,当日下午,张太雷在群众大会结束返回指挥部途中中弹牺牲,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失去领导核心。此时,国民党军的进攻更加疯狂,各处红军纷纷求援。在此危急关头,叶挺、聂荣臻再次建议,乘国民党军合围尚未形成,工农红军掩护苏维埃政府迅速撤离广州或往北与朱德、陈毅部会合、或进海陆丰与彭湃的农军会合,以保存革命力量。总指挥部同意了叶、聂的主张,决定13日凌晨前开始撤退,苏维埃政府成员撤往香港,非军事人员就地疏散,红军武装撤至江北地区。这时间,市内部分地区已开始巷战,战线犬牙交错,指挥部与红军指挥员失去联系,叶挺、叶剑英、李云鹏等未能收到撤退的命令。结果除部分红军武装突围转移外,大部分工人赤卫队和红军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而继续在要点或市区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

突出重围的起义军1000余人改编为工农红军第4师,下辖3个团,叶镛任师长,王侃予任党代表,途经花县、从化、龙门、河源、紫金等地,进入海陆丰,同董朗、颜昌颐率领

由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工农红军第2师会合,参加了彭湃领导的东江革命武装斗争。部分武装力量突围后转移韶关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辗转湘南,走上井冈山。突围转移到广西的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

湘南暴动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公布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规定:湘省“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并指定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为中共湘南特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由于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湘、鄂、粤、赣四省形势急骤变化,毛泽东奉命去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南暴动计划未能实行。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在湘南地区开创武装割据的设想。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转告朱德,“在不得已时向湘南发展。”11月中旬,又指示中共湖南省委发动农民起义“割据湘西、湘南”。12月再次要求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依靠军队而是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两次致信朱德,要他将部队带到湘南开创局面,并与毛泽东联络,共同造成工农武装割据。但是由于朱德、陈毅率部转辗,未能收到这两封信。这期间,中共湖南省委也制定了《湘南暴动计划》,成立了陈佑魁为书记的中共湘南特委,特委于12月在衡阳召开了会议,正在加紧准备湘南年关暴动的工作。

朱德、陈毅虽然未能收到中共中央12月的两封指示信,但闻悉湘南桂东地区农民斗争形势尚好,决心率部折向湘南。

1928年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由韶关北上,进入湘南,首战乐昌未果。部队转到乳头县的杨家寨(今属乐昌),与中共宜章县委接上了联系。当地人胡少海(湘南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出身豪门,原在程潜第6军任过营长,在当地有知名度。胡因不满国民党军叛变大革命,弃甲还乡,并秘密参与领导农民斗争。朱德、陈毅经与宜章县委研究,利用胡在当地的影响,把部队伪装成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所部,公开开进宜章县城。果然,全城官吏劣绅听到胡少海带领军队进城,都出城迎接。县长还设宴为朱德、陈毅和胡少海等“官长”接风洗尘。宴间,朱德、陈毅部把劣绅官吏全部拘捕,将守城警察、民团400余人全部缴械(获长短枪360余支),举行了宜章暴动。智取宜章城“打响了湘南暴动第一炮”。

工农革命军进入湘南,占领宜章,建立工农革命政府和独立团武装,对盘踞乐昌的许克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许克祥是“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于是,即以六个团进犯宜章,企图乘工农革命军在湘尚未站稳脚跟,予以“剿灭”。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创造战机,连打两仗,将独立第3师击溃,许克祥只身逃脱,其司令部与后方仓库亦被占领,生俘许师官兵1000余人。

工农革命军打败许克祥独立第3师的消息传遍湘南。中共湘南特委领导人迅速赶

到宜章,与朱德、陈毅协商发动湘南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各县县委亦派人与工农革命军联系,请求发兵支援农民起义。时值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重新开始,湖南的国民党军无力顾及湘南。在这种有利的时局下,朱德、陈毅将宜章独立团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陈东日任副师长,谭新任参谋长,留守宜章,监视许克祥和胡凤璋部。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北上,帮助各县农民起义。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的运动,在湘南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在农民武装起义过程中,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不断壮大,郴县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耒阳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师,永兴成立了赤色警卫团。3月中旬,湘南工农兵政府在永兴宣告成立,陈佑魁当选为政府主席,朱德、陈毅等2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湘南工农兵政府领导下,湘南形成了分配土地和苏维埃运动的大好形势。在起义中,不仅扩大了正规军,组建了地方军,还组织了规模大小不一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各种形式的梭标队、大刀队,前前后后共有几十万人,参加到了工农武装革命的行列。

1928年3月,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新军阀战争,以唐生智失败出洋而告结束。3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达了“协剿”湘南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命令。3月底,南北“协剿”军部署就绪,准备采取南北对进,两军夹击,一举“剿灭”湘南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革命运动。这时,湘南工农革命军共有四个师另两个团一个营,共约1万多人。除工农革命军第1师外,其他各师各团、营均属农军,建立时间短,缺乏正规训练,枪枝弹药少,战斗力很弱。湘南处湘粤边界,交通比较方便,利于“协剿”军机动作战,而不利于工农革命军反“协剿”作战。加上中共湘南特委一度实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政策和策略造成的不良后果此时并未彻底消除。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朱德、陈毅和王尔琢讨论决定,避开“协剿”军的进攻锋芒,实行战略退却,转兵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1928年4月1日,湘南工农革命军及一些县委机关和苏维埃政府分两路开始撤退。朱德和王尔琢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撤出耒阳,向安仁转移。4月5日,朱德部占领安仁。为防止位于攸县的国民党军第8军第1师经茶陵进入酃县切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保障工农革命军北侧的安全,朱德部迅速抢占茶陵,监视第8军第1师行动。4月13日,陈毅部到达酃县,并随之向宁冈转移。朱德部亦从茶陵撤到了酃县,并以一部控制酃(县)宁(冈)路上的沔渡,主力与毛泽东部第2团进入宁冈砦市。毛泽东率第1团也从汝城返回酃县。在此期间,湖南国民党军第7军第2师、第13师第2师,分别跟在朱德和陈毅部队之后,却始终保持2到3天的行程,不敢贸然发起进攻。至此,湘南5县农民起义武装约8000人,胜利转移井冈山。4月中旬,毛泽东返回宁冈砦市,与朱德、陈毅会面。朱、毛两军胜利会师,宣告了湘粤两省国民党军“协剿”湘南起义的失败。会师后,正式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开始了井冈山斗争的新阶段。

鄂中、鄂西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湖南、湖北省委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两湖暴

动计划,确定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中共鄂中、鄂西两特委,一边恢复遭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共产党组织和农民协会,一边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1927年9月10日夜袭戴家场,捕杀了恶大罪深的反动团防头子,于12月初攻占沔阳县城,镇压了反动县长以下反动官吏10余人,救出中共沔阳县委书记姜敏修等数十人,缴获团防武装枪枝弹药一批。旋即,农民游击队撤出沔阳城,向监利县城发动攻击,全歼守城反动团防武装80余人,缴枪60余支。监利战斗后,中共鄂中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将沔、监两县农民游击队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5军”,肖仁鹄任军长,全军200余人。下编为一个团,赵文允任团长。工农革命军第5军是中共鄂中特委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它的建立为鄂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湖南澧州邹资生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因湘军的围攻而转移到公安县境,与杨云祥领导的公安农民会合,在打“捧老二”(即打土匪)的口号下,举行农民暴动,开展打土豪劣绅、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控制了该县4个区,建立了一支30余人的公安县农民游击队。

1928年初,中共湖南、湖北两省委又组织年关暴动。此时,贺龙、周逸群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上海前往湘鄂边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途经监利,贺龙、周逸群将贺锦斋、吴仙洲、邓赤中和彭国才等分别领导的3支游击队组成“第49路工农革命军”,500余人、300多支枪,编成2个大队。经过10多天的连续作战,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多股反动团防和土匪武装,缴枪100余支,并镇压了一批土劣恶霸,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沔阳等县的年关暴动。2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强攻监利县城受挫。于是贺龙、周逸群与中共监利、石首县委在焦山河召开会议,讨论第49路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针。由于组成工农革命军的各路游击队均系各地农民骨干,他们既不同意统一“上山”(去湘鄂边),又不愿意集体“下湖”(坚持洪湖地区),而是主张分开游击,各回本县坚持斗争。在系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疯狂反扑下,游击队彼此失去联系,游击范围窄小,为躲避“清乡”,处境十分困难。

1928年5月,周逸群从湘西北转回石首,正值国民党军第18军大举“清乡”。经与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研究,将石首、公安和鄂中3支游击队共100人集中形成一支战斗力量,在洪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反“清乡”斗争。是月下旬,因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被破坏,中共湖北省委决定重建以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的鄂西特委。周逸群果断地将特委机关由沙市迁到洪湖,特委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乡村,从发动广大农民抗租抗捐抗粮抗税开始,为发展游击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群众条件。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到1929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已在监利、石首、江陵、沔阳县各县相继恢复和新辟了若干小块秘密根据地,建立了特务大队、天(门)潜(江)游击队。在游击战形势大发展的情况下,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的沙岗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会后,中共鄂西特委乘蒋、桂两派军阀在鄂东、鄂南混战的机会,积极发展鄂西、鄂中的游击战争。集中江陵、石首、监利三县武装,编为游击第1大队(辖两个中队),邹资生任大队长,段玉林、段德昌任中队长,共有长短枪260余支,游击第1大队在斗争中严

格执行中共鄂西特委规定的任务和政策,采取“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原则,消灭地主豪绅武装,帮助农民进行斗争,不急于进行反富农斗争,保护中小商人、取缔暴利和高利贷。因此,所到之处,群众拥护,情绪高涨,纷纷起来组织农会,建立赤卫队,筹建区、乡工农民主政府。开创了鄂西、鄂中地区革命的新形势。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游击第1大队得到相当的发展中共鄂西特委将游击大队改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第1、第2、第3三个大队和教导队,各大队辖三个中队,人枪各300余,共计1000余人枪。学习朱、毛红军建军经验,游击总队建立了政治部,中队(相当于连)以上设立中共党代表,并建立中共党支部、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阶级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建立了作战讲评制度,实行军事、经济民主。

1929年9月,湖北境内因为桂系军阀战败而其主力纷纷撤退,蒋介石的部队控制了湖北。随之,谭道源第50师和岳维峻第34师以大于游击总队10余倍的兵力,对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重点“清剿”。中共鄂西特委决定,由段德昌指挥第1、第3大队坚持内线作战,继续在洪湖地区游击,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2大队,跳到外线,到华容、石首、江陵一带展开积极的游击战争,内外线结合,以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第2大队依据周逸群提出的“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展开游击战,积极破坏国民党军“清剿”计划。第1、第3大队在段德昌指挥下,依靠根据地人民,声东击西,骚扰和打击“清剿”军部队,并击溃“清剿”军1个团。

在游击战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为总结斗争经验,开创鄂西革命新局面,中共鄂西特委于1929年12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西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军事、组织、工农运动、土地问题、工农民主政府组织及开展兵运工作等一系列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立了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选举了新的中共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9人组成,周逸群为书记。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鄂西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独立第1师”(有称“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下辖两个纵队,共10个中队,有枪一千数百支,人员约5000。

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将“独立第1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后为邝继勋)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许光达任参谋长,纵队以下组织不变。第六军设军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开办了教导大队。4月,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宣布成立鄂西联县政府,选举周逸群为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和鄂西联县政府的成立,标志了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广西百色、龙州起义

国民党叛变工农革命后,虽然广西的农民运动相继失败,但尚保存了一批干部和农民武装。1929年春,蒋桂新军阀战争爆发,广西的反动统治秩序混乱,这给发展革命力量造成了有利形势,广西革命开始复兴。4月,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战败出

走。6月,蒋介石委任原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省绥靖司令。俞、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倾向进步,同情工农革命,靠近中国共产党。他们深知中共在广西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为扩展自己的力量,防范蒋介石的算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动要求与中共合作,派干部到广西协商共事。中共中央抓紧机会,与俞、李建立统一战线,先后从广东省委及中央派出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等干部40余人到广西,与早期派往广西的中共干部雷经天、俞作豫(系俞作柏的胞弟)会合,开展广西革命形势,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统一领导。

7月,邓小平到达南宁后,一方面对俞、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领导中共广西特委的工作,特别是注重抓兵运工作。他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将共产党员派进军事系统任职,争取兵权。张云逸担任了广西警备队第4大队大队长,俞作豫担任了第5大队大队长,龚鹤村担任了南宁市公安局长。这两个大队共6个营18个连2000余人。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俞作柏、李明瑞开办了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兼任总队长。通过教育和改造,使警备第4、第5大队、教导总队,由军阀部队朝着革命军队的方向不断转变,面貌日趋焕新,领导权很快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里,为武装起义准备了骨干队伍。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正确领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利用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放工农运动的机会,加紧建立各地党组织,各地工会、农会组织。并以成立“护商大队”名义,经俞作柏同意,拨给韦拔群一批武器,装备东兰、凤山地区农军,推荐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由省政府委任左、右江各县县长或农运干部,进一步推进了广西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为后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随着各地农运的恢复和发展,广西农民代表大会于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雷经天、韦拔群为省农协筹备处正副主任委员。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蒋介石与俞作柏、李明瑞的矛盾尖锐化。俞、李决心与广东张发奎联合反蒋。邓小平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分析,认为俞、李执掌广西不到半年,势单力薄,仓促反蒋,必然失败,这也就打乱中共对广西工作的部署。于是在真诚劝阻俞、李权衡利弊、不盲目出兵参战的同时,作出了应变举措。与贺昌共同决定,将中共在广西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把共产党已掌握的武装力量撤退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和左江地区,与农民运动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苏维埃运动。于是中共广西特委及时派出雷经天等大批干部分赴右江和左江地区,筹建县委,加强农协,使右江和左江地区中共地方党组织得到加强,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忠告劝阻执意通电反蒋,随即出兵进攻广东。邓小平、张云逸等以教导总队、警备第4、第5大队应加紧训练和保卫后方安全为理由,向俞、李建议,将这三支部队转入战争状态留守南宁。俞、李接受了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建议,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还接管设在南宁的军火库等机关。俞、李出兵反蒋失败,蒋系军队三个师逼进南宁,广西革命形势突变。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从广西革命形势的实际出发,按照预定的应变计划,将警备队、教导总队等共2000余人和军火库的近6000支步枪及大批弹药物资,分水路和陆路,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同时,对俞作柏、李明瑞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劝留他们参加革命。李明瑞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俞作柏出走香港。10月底,中共广西省委决定,在广西成立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辖广西军事斗争与地方工作。

11月初,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左右江起义和成立红七、八军的指示传达到百色。邓小平立即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贯彻中央指示,决定加紧起义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布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

1929年12月11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正式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广西前委改为中共红七军前委,仍由邓小平任书记。同一天,右江地区11县农会代表五镇工会代表和红七军士兵委员会代表共80余人,出席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选举雷经天为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11人为政府成员。右江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广西的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百色起义和红军第七军成立,大大推进了左江地区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930年2月1日,中共左江军委正式宣布举行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建立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宛旦平任参谋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红八军以原警备第5大队为骨干扩编而成,辖2个纵队,何家荣任第1纵队司令,宛旦平兼第2纵队司令,全军2000余人。根据邓小平推荐报上级批准,李明瑞任红七、红八两军总指挥。中共左江军委改组为红八军军委。7日,邓小平由上海返桂直奔龙州,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与红八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左江地区形势,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将红八军军委改组为红八军临时前委,由邓小平兼任书记(何世昌代理)。

继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七军之后,又爆发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这对于国民党桂系军阀说来,是一个重重的打击。他们窥视到红八军主力分散,龙州空虚,于是调集第15军第11师3个团的兵力,联络左江地主武装4000多人,以突然动作,围攻革命根据中心龙州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缺乏思想准备,被迫率领军部和第2纵队守城部队和工农武装2000余人,仓促迎战。红八军损失惨重,余部在滇桂黔边不断流动,历时半年之久。1930年10月间,进入右江地区,编入红军第七军。

百色起义胜利后,广西国民党军即开始进犯右江地区。为巩固和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红七军主力展开游击战争,以一部坚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不断予来犯之敌以重,根据地得到了巩固。鼎盛时期,革命根据地达20个县,人口达100万,武装力量达1万余人。当时李宗仁曾哀叹说“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1930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了全国红军“会师武汉”的作战计划。中共红七军前委对中央赋予攻占柳州、桂林、广州等任务进行了认真讨论。邓小平和张云逸坚持认为,在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已恢复对广西统治,统治基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几千人枪的红七军去执行那样大的任务是困难的,不实际的。邓岗(邓拔奇,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陈豪人、龚鹤村等人坚持主张执行党的指令。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会议决定红七军北上作战,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

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在河池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决议和作战计划,讨论了形势和任务。会议决定接受中共中央交给的攻占柳州、桂林、广州的

指示 选举新的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全军改编为师团建制,下辖三个师。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全军共 7000 多人。

11 月 9 日,红七军第 19、第 20 两师开始由河池北上。沿途屡遭国民党军的阻击。时值冬季,部队远离根据地进入新区,粮、弹给养发生严重困难,非战斗减员增加。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前委决定攻占武岗县城,以筹措粮饷,解决冬装。武岗未克,部队即向广西全州撤退。1931 年 1 月上旬,中共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总结部队此次行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日后行动方向。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从报纸上得知朱毛红军割据江西的消息,力主放弃攻打城市的计划,拟将部队拉到湘粤边,寻机进入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会议决定采纳邓、张、李的主张。嗣后,红 7 军在邓小平(部队到达江西崇义时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李明瑞的率领下,一路征战,历经千难万险,于 1931 年 7 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参加了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斗争。自 1930 年 10 月红七军奉命开始北上作战行动,到 1931 年 7 月胜利进入江西,部队沿桂、湘、粤、赣边境,艰苦转战数千里,历时 10 个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这既展示了红军指战员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也反映了“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

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反“进剿”

1928 年 1 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 1 团在遂川一带游击,江西国民党军杨如轩第 27 师以 1 个团又 1 个营(即第 81 团和第 79 团 1 个营)的兵力由吉安开进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暴动农军和工农政权的同时,又以第 79 团的 1 个营(300 人)进占了宁冈新城,准备“进剿”井冈山红军。毛泽东得悉杨如轩部进占宁冈的消息后,决心集中力量首先拔除这个据点,消灭该营。遂于 2 月 4 日率领第 1 团由遂川返回井冈山。经多次侦察发现 杨部 1 营共三个连,营部率一个连驻宁冈新城北街县府大院;另 1 连驻南街天主教堂;又 1 连驻南门外选锋书院。城内还有靖卫团 100 余人。杨营误认为工农革命军仍在遂川,戒备松懈,每日清晨在南门外出操。经过充分的准备,工农革命军第 1、第 2 两团在赤卫队配合下,于 2 月 18 日拂晓,由南、北、东三个方向,对新城驻军发起突然进攻,经数小时激战,攻占新城,全歼该营和靖卫团,俘虏近 300 人。将杨如轩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击破于计划实施之前。战后,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规定,对俘虏采取了不杀不打,医治伤兵,愿留者欢迎,愿走者发路费释放的政策,进而形成了红军优待俘虏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红四军第二次反“进剿”

1928 年 4 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接应下,出湘南顺利地转移到井冈山。朱、毛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

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不久又缩编为二个师共四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全军共6000余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中共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军参谋长。红四军的建立,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于实行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928年4月21日,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军开始协谋对红四军进行“会剿”。也正是在此时间,红四军军委决定,以永新为中心,向临近各县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达成上述战略目的,决定在赣省国民党军杨如轩师发动新的“进剿”之前,由毛泽东率领第11师在根据地内,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工作,并以一部兵力监视永新和酃县、茶陵方向的国民党军动向;由朱德和王尔琢率领第10、第12师出击遂川,进行发动群众和筹款的工作,以扩大红军影响和根据地。

4月下旬,赣军杨如轩第27师第79、第81两团,由永新、遂川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进剿”,湖南国民党军吴尚第8军第1师进占了茶陵、酃县地区。朱德、王尔琢率部出击遂川途中,在黄坳与杨师第81团后卫遭遇,经红军猛烈冲击,该团后卫溃逃五斗江。朱、王迅速查明第81团企图后,决定放弃出击遂川的原定计划,集中第10、第12两师,攻歼杨如轩师第81团,尔后与毛泽东率领的第11师会合,攻歼杨如轩师第79团,打破杨如轩的第二次“进剿”。于是,王尔琢率领第10师第28团向溃逃五斗江的杨如轩师第81团所部追击,朱德率第10师第29团直趋拿山,寻歼第81团主力。4月底,杨如轩师第81团进犯五斗江,当即遭到红四军第10师第28团的痛击,该团大部被歼,一部败退永新。继而,朱德命令红军第28、第29两团乘势进攻永新县城,将杨如轩师第79团第3营击溃,共缴枪300余支,迫使第81团余部丢弃永新逃往吉安,红军进占永新。此时,位于龙源口的杨如轩师第79团主力慑于就歼,仓皇退兵吉安。红4军又将杨如轩第27师对井冈山的第二次“进剿”打破于“进剿”发起之前。永新战斗后,毛泽东、朱德判断赣省国民党军必将在近期再次发动“进剿”。为准备新的“进剿”作战,红四军在永新只作短期群众工作和筹款后,遂回师宁冈。

红四军第三次反“进剿”

1928年5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军杨如轩第27师和杨池生第9师的5个团(一说:系27师和第7、第9师各1个团),再度进占永新,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发动第三次“进剿”。其部署是:杨如轩第27师部率第79团和第9师第27团1个营占据永新县城,其余4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等地突进宁冈。这时,红四军第28团和第31团第1营,在朱德、王尔琢率领下活动在永新以西约70华里的小西区。在接到红四军军委关于赣军重占永新并企图以主力由龙源口等地进攻宁冈的情况通报后,朱德、王尔琢遂决定率领红四军4个主力营沿禾水河北岸大道直扑永新县城,首先袭击杨如轩的师部,打掉其指挥中心,尔后在赣军侧背寻机作战,以打乱赣军的进攻部署,达成击破其“进剿”之行动。根据朱、王的决定,红4军四个主力营由小西区出发,向永新城急进,于当日夜进至距永新城约30华里的漕田宿营。杨如轩误认为是永新赤卫队,命令第79

团于次日前往漕田“清剿”。翌日晨,第79团由永新西进,同由漕田东进的红四军主力在草市坳遭遇。在地形不利于红军作战的情况下,朱德沉着果断,命令第28团从正面对第79团发起猛烈冲击,命令第31团第1营由北侧山地向第79团侧后迂回。杨如轩师第79团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红军前后突然夹击,队伍大乱,指挥失措,不到2小时,全团被歼,团长被击毙。朱德、王尔琢决定不失战机,率领红军直奔永新,打敌措手不及。正午时分,红军扑至城下,赣军正在吃午饭。红军突然发起攻击,一举突入城内,再歼第27师师部及师直机枪连、炮兵队、工兵队、卫生队、输送队等独立分队,和第9师第27团1个营,击伤师长杨如轩。位于龙源口地区的赣军4个团得悉上述战况后,仓皇向吉安收缩。红四军胜利地击破了赣省国民党军的第三次“进剿”,并取得了歼灭赣军1个师部、1个团另1个营,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7门、各种枪300多支(挺),银元20余担以及大批弹药物资的空前胜利。

红四军第四次反“进剿”

随着红四军反“进剿”作战的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5月20日,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进而统一了湘赣边界红军和地方中共党组织的领导。针对红军部分官兵对边界武装割据缺乏信心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消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坚定了武装斗争的必胜信心。5月下旬,建立了由袁文才为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政府”。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6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又以杨池生为总指挥,率领第9师和杨如轩第27师余部共5个团前出永新,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发动新的“进剿”,同时,请求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湘南国民党军出兵,协同“会剿”。在南京政府的严令下,湘军吴尚第8军第2、第3师于6月16日后进驻攸县、茶陵,参加对红四军的“会剿”。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鉴于湘军较强、赣军较弱且经过红军三次打击有畏惧心理以及湘、赣两军貌合神离等情况,确立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作战方针,决心集中力量打击由永新地区进犯之赣军。

6月22日,进驻永新的赣军出动3个团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企图经新七溪岭或老七溪岭突击宁冈。是时,进驻攸县、茶陵的吴尚第8军第2、第3两师却无行动迹象。根据上述情况,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与四军委(已由陈毅接替毛泽东任书记)遂于22日晚确定如下决心:由朱德率领第29团和第31团1个营,控制新七溪岭要地,准备打击企图由此突入宁冈之赣军;由陈毅、王尔琢率领第28团,从老七溪岭迂回赣军侧后,打乱其进攻部署,尔后与坚守新七溪岭的部队合击赣军,求歼其一部,以打破赣军第四次“进剿”;永新、宁冈等地赤卫队、暴动队不断袭扰进犯之赣军,使其疲惫、消耗。23日上午,赣军1个团,向新七溪岭红军阵地多次冲击,都被第29团和第31团1营所击退。与此同时,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赣军2个团多次发起猛烈的攻击。战至午后,

将赣军击溃,接着转入追击,又在白口打掉赣军的前方指挥所,随即向龙源口迂回包抄。与此同时,朱德指挥的第29团和第31团1营,也在新七溪岭实施反击,将赣军1个团驱赶至龙源口,并与陈、王指挥的第28团并肩突击,将龙源口之赣军围歼。旋即,红四军主力乘胜进攻永新县城,迫使赣军总指挥杨池生率部逃向吉安,进而胜利地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是役,红四军共消灭了赣军1个团,击溃2个团,缴获步枪400余支,重机枪1挺。战后,根据地群众翘首称赞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两只羊”,系指杨池生、杨如轩及其第9师和第27师部队)。

中共六大

1927年后,中共依据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开始进入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革命形势,分析当时的革命性质,进一步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听取了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和瞿秋白所作的补充报告,周恩来、刘伯承的组织问题、军事问题等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军事工作等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首先,“六大”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据此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十大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土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其次,“六大”指出了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

再次,“六大”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尤其批评了盲动主义。

大会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瞿秋白、项英、张国焘、蔡和森7人为政治局委员。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全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总书记。

中共六大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克服了“左”倾盲动主义,放弃了立即夺取大城市、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策略方针,开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对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展白区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田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党内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红军也主要来自农民和从旧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士兵。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教育,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坏作风大量地反映到共产党和红军内部来,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妨碍着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在红四军的共产党组织内也同样存在着。

1929年9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听取了红四军领导人陈毅的汇报,审定了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支持了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策略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正确主张,对解决当时红四军党内在若干问题上的认识分歧,统一思想,增强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11月,陈毅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九月指示信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举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

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第一,强调了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个最根本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它必须服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实现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努力奋斗,这是红军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其他类型军队的根本因素。第二,重申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指出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是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红军除打仗外,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第三,着重分析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诸如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等)的表现、来源及其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第四,规定红军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实行官兵平等、军政一致、军民团结的原则,并对敌军俘虏采取正确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建设的丰富经验,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土地革命的开展

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第三党”正视这个问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乡建派则否认这个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找到了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症结所在,在各革命根据地广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1928年底,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等决议案陆续传达到各根据地,这对统一各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2月,湘赣边界特委总结

了一年来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农民获得土地的神圣权利。但是,《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就引起了一部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不满。土地法还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归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归农民个人。这也是土地私有观念很深的中国农民难以接受的。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个原则性的纠正。

1929年7月,闽西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在邓子恢主持下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有了新的发展,如规定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给地主以生活出路,酌量分配土地;对富农不过分打击,根据贫农要求只没收其自耕自食以外的多余土地,以争取其中立;对中农不没收田地,不使其受任何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不予没收;在土地分配方法上提出了“抽多补少”的原则,即不打乱平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平均分配。这些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很短的时间里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的50多个区、600多个乡解决了土地问题,80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城头村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田的右倾错误,否定了按劳动力多少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雇农的作法,决定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会后,赣西南的土地斗争迅速开展起来,30多个县分配了土地。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县南阳召开联席会议,重申了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并针对富农把持肥田、以贫瘠土地让人的做法,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

1931年2月,毛泽东针对农民不拥有土地私有权而不安心耕种的情况,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布告,明确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毛泽东指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农场的生产,这是经济条件所不许可的”。这就进一步解决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湘鄂赣、右江等根据地,共产党也领导当地军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终于制定了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的土地分配办法。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联合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劳动群众,集中力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是一条彻底的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的总结和理论上的论证,终于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许多人在从事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中,逐渐感到“工人是有势力,然而人数少了”从而提出了“怎样做中国革命”的问题,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23—1925年间,邓中夏在《农民运动》等文章中,就大声地疾呼:“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更系统地对中国农村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充分论证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为中共后来提出和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从理论和实际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增加和扩大,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也日益深入。1929年9月,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应“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已包含着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形势及主观客观各方面的条件,回答了中国小块红色政权是否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毛泽东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是: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各派系军阀间的不断战争,客观上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地域广阔,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存在的地方,是有过国民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湘、鄂、赣、粤等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社会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日益发展和激化,所以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必然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和其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发展的主观重要条件。毛泽东还进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毛泽东所阐述的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工农割据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0年1月,毛泽东又写了后来题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在这篇通信中,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汲取了其他根据

地的有益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道路。他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实际上是对“城市中心论”的否定。他认为,①“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②“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才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政策。③“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中国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与此相适应,他制定了赤卫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的三级武装体制和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地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初步制定了一套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因而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正式形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为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1927年6月,刚上任不久的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召开所谓“东方会议”,提出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并决心诉诸武力。会后,田中向天皇呈递了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着重论证了日本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狂妄叫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国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显然,东方会议后,独占“满蒙”已经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公开化了。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也濒临崩溃。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忙于内部事务、无暇东顾以及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机,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为此,日本关东军组成了以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为核心的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据以制定武力进攻方案。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方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在东北制造挑衅事件,作为增兵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7月,关东军特务在长春北郊万宝山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唆使朝鲜浪人强占农田,造成流血冲突,并在它统治下的朝鲜煽动排华风潮,借以动员日本朝野的反华舆论。8月,又利用陆军间谍中村大尉潜入黑龙江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为中国驻军处死一事,制造侵华舆论,加剧紧张局势,叫嚣必须“以武力解决”。关东军作好了随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准备,处于临战态势。战争已迫在眉睫。

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狂妄叫嚣,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

方针。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中村事件后,又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处处忍让,毫无戒备。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派遣守备队一部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小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当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向沈阳城内和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大部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撤至山海关以内。沈阳全城一夜之间陷于日军手中,不到一星期,日军占领了本溪、安东(今丹东)、辽阳、海城、营口、抚顺、四平、长春等30余座城市,控制了12条铁路线,辽宁、吉林两省除辽西外,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裁决”上,命令全国军队同日军“避免冲突”,“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但是,操纵国联的英、法、美等国为了鼓励日本进攻苏联,不但默许而且公开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日本侵略者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的绥靖政策,在侵占辽、吉两省后,10月又进犯黑龙江省,11月占领省会齐齐哈尔,随即南下进攻锦州,袭取辽西。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2月,又回头北进,夺取哈尔滨。至此,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气吞下3倍于它本土的中国领土。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山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3000万同胞从此惨遭日军蹂躏。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正义要求,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

工人阶级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具有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率先行动,9月24日,3万多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运货物;10月初,23家日资纱厂工人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酝酿同盟罢工,工人纷纷退厂。接着,上海各业80万工人组成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厂纷纷成立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枪抗日。与此同时,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与香港的日商纱厂所有中国工人,一律自动辞工;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率领北平广大爱国工人加入全国抗日救亡队伍的行列。

青年学生在反日浪潮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学生们还纷纷向各地方政府请愿,并派代表或结队赴南京请愿。9月27日,沪宁两地学生2000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在外交部,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外长王正廷,捣毁其办公处所。11月26日,上海

万余学生聚集“国府”门口,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他们“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12月初,因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各地学生乃改请愿团为示威团纷赴南京示威。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止学生集队来京请愿”,但赴南京请愿示威的学生与日俱增。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联合举行大示威,示威学生在珍珠桥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血腥屠杀,死30多人,伤100多人,被捕100多人。青年学生的热血在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在民族危机加深和工农学生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他们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反共内战政策。社会知名人士罗隆基、王造时、马相伯纷纷撰文,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抗日主张。工商业者开展了抵制日货和禁止与日本交易的运动。北平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工商业组织先后表示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和查禁封闭日货,纷纷成立专门抵制日货的机构。抵制日货运动,致使当年的日本对华输出减少63%,在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在日本的军事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不畏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高压,自发奋起还击。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首当其冲的沈阳北大营守军东北边防军第7旅,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的指挥下,奋起还击。接着,沈阳公安总队在大东区同敌寇展开巷战。日军进犯黑龙江时,马占山毅然就任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组织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在日军进攻嫩江桥的战役中,马占山亲临战场率部反击,历时16天,给敌人以重创,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一阶段,马军以300多人伤亡的代价,歼灭日伪军1400余人。全国各界纷纷函电,赞扬他们“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实为“将吏之楷模,民族之表率”。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不仅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爱国热情极为高涨,其他阶层的爱国人士也积极主张抗日,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部分人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志起来抗日。空前规模的反日运动,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向上海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刚调防淞沪不久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推动下,率领全体官兵奋起抗战。

战争初起,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狂妄叫嚣4小时结束战斗。许多外国军事观察家也认为上海的中国军队最多只能支持3天。但是,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战争演变为持久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历时30多天。2月上旬,日军不断增兵,并改派植谦吉为司令官。中国方面,张治中统率的第5军增援前线,投入战斗。2月20日植田下令总攻,日军倾巢而出。十九路军和第5军并肩作战,在庙行、蕴藻浜一带重创日军。23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以白川义则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增援

部队前来上海。此时,日本投入的总兵力达3个半师团,4.4万人;中国方面参战的兵力总共不过4.5万人。3月1日,日军开始全面总攻击,从正面突破十九路军江湾、庙行防线,又迂回到防线背后浏河一带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后援无继,当晚不得不作线战略撤退。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第5军将士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得到了全国特别是上海各界民众的广泛有力的支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号召人民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直接参战;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展开热烈的支前工作,发动了沪西54家日商纱厂六七万中国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海内外同胞纷纷捐款、募集物资,支援前线。据十九路军军部统计,1932年2—7月间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捐款达715万多元,其中来自国内的近300万元,来自海外的400多万元。海外侨胞纷纷慷慨解囊,为“一·二八”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和其他各地民众自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奔赴前线,参军参战,据统计,仅与十九路军取得直接联系投入作战的义勇军就有58支。其中有来自北平、南京以至广州、湖南、四川等地的义勇军。不少社会知名人士集资或捐款创办伤兵医院,救死扶伤。宋庆龄、何香凝在杨杏佛的帮助下在交通大学内设立了国民伤兵医院,全体中外工作人员不领分文薪水,义务救护。上海的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和社会名流黄炎培、史量才、杜月笙等组织了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在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作用。“第三党”也发表宣言,主张抗战到底,要求政府火速调兵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并派遣其成员直接参加抗战。

“一·二八”抗战说明,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尽管仍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乃至尖锐的对立,但在抗击外敌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这个根本问题上,在抗日救国这个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最重大的问题上,可以找到某种共同点。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凝聚力在“一·二八”抗战中再次得到了体现。

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东北的同时,积极拼凑由它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以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确立了“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的新政权的方针,并策动汉奸赵欣伯、臧式毅、熙洽、张景惠等成立各省伪政府。日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窜到天津,将溥仪秘密挟持到东北。1932年2月,东北四省区傀儡头目张景惠等在日军的监视、控制下,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以“大同”为年号,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9日,溥仪沐猴而冠,充任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充当“国务总理”。9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双方签署《日满议定书》,完全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确立了关东军对整个“满洲”的殖民统治。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充“皇帝”,年号改为“康德”。

溥仪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关东军牢牢控制着实际权力,成为溥仪的“太上皇”,溥

仪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日方的严密监视。伪满洲国中央各部和所属各省政,也都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担任“次长”,掌握实际大权。在“共同防卫”的名义下,日军不断增兵东北,在各地建立了庞大的警察、特务、宪兵机构,残酷推行“治安肃正”、“归屯并户”和“三光”政策,任意逮捕、杀害中国居民,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1932年9月,日军对抚顺附近平顶山村进行疯狂“讨伐”,一次就烧毁房屋800多间,杀害和平居民3000多人。

日本侵略者执行“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有权开发东北的一切矿业资源。为此,关东军积极组织“经济调查”,炮制经济掠夺计划,以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为掠夺重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为日本在东北最大的殖民垄断企业,操纵着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侵略者还疯狂推行武装移民政策,霸占大片良田,抢掠大量农产品。据统计,东北出产的近1/2的豆类及其制品、近2/3的粮食被运往日本。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严重破坏了东北的农业生产和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

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狂暴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日伪当局强令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学校教育实行日语化,宣扬“共荣亲善”、“王道政治”等奴化思想,对各级教师实行严酷的“整肃”,防范师生的抗日活动。

总之,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怪胎,东北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

“攘外必先安内”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处于中日矛盾、国共矛盾、内部派系矛盾等多种矛盾的漩涡之中。中日矛盾本属首位,国民党理应审时度势,先解决主要矛盾,团结全国人民,共御外侮。而蒋介石既心悸于人民力量壮大和各派势力的增长危及其统治,又把遏制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帝国主义身上,因而他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蒋介石就针对日本在东北制造“万宝山事件”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南方日益发展,以及汪精卫为首的广东反蒋派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尖锐对峙的形势,于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发表通电,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即不能御侮,如果不先平定广东的反叛者完成国家统一,就不能攘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无视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不久,蒋介石被迫下野。一·二八事变后,蒋汪合流,蒋介石重新上台,四届二中全会上,他把推行“安内攘外”政策提到重要日程。正如蒋介石后来所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两个战争”的威胁。1932年6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豫皖鄂赣湘5省“剿匪”会议,正式宣布了“安内攘外”政策。此后,蒋介石多次宣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并一再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

“安内攘外”政策,是蒋介石集团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为基本出发点确立

的。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空前规模的抗日反蒋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一运动也影响到国民党上层集团,反蒋派别纷纷打起抗日旗号,乘机倒蒋,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不抵抗政策已经声名狼藉,只能以推行“安内攘外”政策来掩盖其对日妥协退让,逃避人民的谴责。其次,蒋介石集团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视为“心腹之患,甚于外敌”,而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看成是“皮肤小病”。再次,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进攻上海,严重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激化了代表英、美派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上海及东南地区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赖以起家的经济支柱——江浙财阀的所在地,是其政治、经济统治中心。因而,为了维护其统治和英、美在华的经济利益,提出“安内攘外,兼顾两难”的方针,企图在确保安内的前提下,“抵御外侮”。

长城抗战

日本侵略者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就以华北为基地向我国关内扩张,对华北实行蚕食政策。

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故意在山海关制造事端,随即炮轰临榆县城,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南京政府不予支援,1月3日山海关失陷。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进犯。热河守军万福麟、汤玉麟两部望风而逃。3月3日,汤玉麟截留250辆军用汽车装载珠宝财物、妻妾卫队逃离承德。日军以128个骑兵占领承德。全国舆论大哗,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蒋介石推卸责任,逼迫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遗缺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并调中央军3个师北上,以应付舆论。

日军占领承德后,中国军队退守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一线。3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长城各口,中国驻军顽强抵抗。在喜峰口,宋哲元二十九军将士奋勇御敌,组成大刀队于夜间潜登日军阵地,砍毙大量日军,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日军多次强攻,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在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徵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进攻。冷口驻军商震部黄光师也英勇抗击,日军未达目的。

长城抗战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士气与能力。中国官兵利用夜战、近战,使日军的优势武器难以发挥效力。全国各界民众热烈支援长城抗战,平津各报纷纷发表社评,要求国民党当局趁时实行全民族抗战,收复失地。但是,蒋介石违逆民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对日妥协方针,派亲日派黄郛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

日军窥破蒋介石的态度,以加紧军事进攻来促使蒋介石的妥协。4月初,日军占领滦东后,再次向长城各口发起强攻。11日,冷口驻军弃守,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13日奉命撤退。日军随即猛攻南天门,中央军黄杰第二师等轮番上阵抵御,与日军血战七昼夜。5月13日,中国军队奉命后撤。

与此同时,黄郛、何应钦在北平与日本代表频繁接触,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条件,并屡电前方部队按日军指定之线路撤兵。30日,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

斌到塘沽与日方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正式会谈。31日,熊斌在日方早已拟定好的不容更改一字的协定上签字。《塘沽协定》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在那里驻扎,而日军却可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无形中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至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

福建事变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参加“剿共”战争后,抗日决心并未泯灭。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宣言使蔡廷锴、蒋光鼐受到很大触动。1933年夏,十九路军在蒋介石一再催逼下进攻连城,遭到红军痛歼,损失惨重。蔡廷锴等决心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变抗日“剿共”为联共抗日反蒋,9月下旬,派陈公培与彭德怀进行停战谈判;10月又派徐名鸿进入中央根据地与红军代表潘汉年进一步会谈。26日,红军和十九路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准备实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同时,陈铭枢在香港与国民党内主张抗日反蒋的李济深、陈友仁以及“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等筹划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

1933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福建事变爆发。大会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等文件,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22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李济深任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星旗为国旗。

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在文化教育上规定了“民族的、社会的与生产的”原则,对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实现关税自主等。

福建事变是“九·一八”后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是国民党内民主进步势力发动的反蒋抗日事变,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面临着新的民族危机而激起的新觉悟的表现,标志着国民党阵营的更大分裂,反映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在全国和海外华侨中引起很大反响。

蒋介石被迫变更原定的“围剿”红军计划,从江西“剿共”前线和京沪一线抽调11个师入闽“讨伐”,并在十九路军中进行频繁的利诱、收买活动。日、英、美等国的军舰也以护侨为名开抵福州、厦门,进行威胁。十九路军寡不敌众。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领导人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其领导人分海陆两路离开福州,大部分避居香港。福建事变失败。不久,蒋介石正式取消十九路军番号,十九路军这支闻名中外的抗日部队不复存在了。

“左”倾的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艰苦曲折、不屈不挠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

党军的多次“进剿”、“清剿”和“会剿”，到1930年夏，全国主力红军已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红军武装发展到3万人。同时，创建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边、赣东北、左右江等几块主要根据地。此外，还在广东、江苏、四川、陕西等省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或游击区。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各地红军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机，广泛开展攻势作战，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但是，从当时全国总的形势讲，国民党在全国占据政治、经济、军事的统治地位，其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战争潜力大大超过工农红军。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仍然在战略上处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包围之中。可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对全国总的形势却缺乏客观的分析和正确的估量，片面地夸大形势有利于革命的一面，进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反革命的力量，最终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红军“在8月以前扩大到50万”，“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目标，规定了红军的发展方向是全国主要交通要道和主要城市，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进攻歼灭国民党军较大部分。6月，又确定了举行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暴动，最终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总任务和总方针。为实现总任务和总方针，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并于6月24日批准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计划赋予各地红军的作战任务是：赣南、闽西红军第1军团，“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赣东北红军第10军，“以切断长江为主要目的”；湘鄂赣红军第3军团，“一面切断武汉铁路”、“一面帮助鄂南、鄂东南地方暴动”，“进迫武汉”；湘鄂西红军第2军团，一面“帮助鄂西、鄂西南地方暴动”，一面“进迫武汉”；鄂豫皖红军第1军，“帮助鄂中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以进迫武汉”。计划要求各路红军向武汉进攻，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其他各地红军也都分别赋予攻占当地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任务。

“左”倾冒险主义给红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此期间，各地区相继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这一切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央苏区、湘鄂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还有上海、武汉等地秘密工会的代表和红军代表共600多人。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以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由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 64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它以国家政权的姿态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

1933 年 3 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扩大到湘鄂赣粤 4 省,并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人口发展到 300 万,正规军发展到 10 万人,赤卫队发展到 20 万人。全国的工农革命力量到 1934 年初发展到 14 省 15 个地区,人口 1000 万,正规红军发展到 30 万人。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泛滥

1931 年 1 月,由于共产国际的不适当干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相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使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组织上实现了王明等人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目的。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 年 21 岁时在武汉加入共产党,同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宣传工作。他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注重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研究,只知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革命的某些经验,因而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犯了错误:(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国势力和第三派的存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乃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二)在革命形势和共产党任务问题上,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鼓吹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企图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取得全国胜利。(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无视中国革命的平衡性和长期性,无视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服从和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为了推行“左”倾纲领和政策,王明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局面。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1931 年 9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秦邦宪)为主要负责人。11 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临时中央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政策。

王明“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首先刚刚恢复的白区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惨重损失。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又继续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使共产党丧失了“九·一八”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1933 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白区党组织保存无几。

与此同时,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1932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六届四中全会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积极贯彻“左”倾政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

虽英勇奋战,终未能打破“围剿”。10月,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2月中旬到达川陕地区坚持斗争。湘鄂西的红二军团也被迫撤出洪湖,转移到湘鄂川黔边境。

在中央根据地,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于1932年10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1933年2月,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在运动中歼敌,取得了胜利。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正当这时,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开始全面推行。1933年2月,“左”倾领导者错误进行了反对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所谓“逃跑退却路线”的斗争。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指责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受到打击。“左”倾领导者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提出“经济上消灭富农、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口号,对民族工商业者课以重税,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歧视、打击知识分子等,给根据地工作造成极大的混乱。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开始

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们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作战的正确原则,在反“围剿”战争的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战争开始,他们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兵力,命令红军“全线出击”。红军屡战不胜,陷入被动挨打局面。这时,福建事变爆发,这是红军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但李德、博古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提出的将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作战的正确主张。1934年1月,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继而重新部署兵力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合围之势,4月,集中进攻根据地北大门广昌,李德、博古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调集9个师的兵力进行广昌保卫战,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红军损失惨重,广昌失守。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求得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打破敌人“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在这之前,已有三支红军部队先行突围远征。第一支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11月初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合,组成红10军团。蒋介石急调重兵围攻。12月寻淮洲在战斗中牺牲,方志敏不幸被捕,翌年8月在南昌就义。粟裕、刘英率余部坚持斗争,后来成为新四军一部。第二支是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1934年8月从湘赣和湘鄂赣区突围,10月到达黔东,与先期到达的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2军团会合。第三支是坚持鄂豫皖游击战争的红25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下于9月突围,翌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等率领的红26军会合,组成红15军团。这三支红军的远征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陈毅、邓子恢等组成中央苏区中央分局,率领

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共3万余人坚持游击斗争,掩护主力突围,保卫土地革命成果。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8.6万余人向湘西突围,开始长征。

还在反“围剿”战争中,1934年9月,周恩来、朱德利用蒋介石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矛盾,指派何长工、潘汉年为红军代表前往陈济棠辖区进行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以及可以借道等五项协议。红军进入广东后,陈济棠履行协议,命令军队撤离让道,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

长征开始后,“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11月中旬,红军冲出第四道封锁线后,兵力锐减到3万余人。蒋介石纠集40万兵力,拦截中央红军与湘鄂川黔的红2、6军团的会合。李德、博古无视战争形势的变化,继续主张死拼硬打,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央红军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若照他们的意见办,红军将与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决战,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北上作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央红军一支主力军团组成的先遣部队,奉命北上抗日,途经福建(闽)、浙江(浙)、江西(赣)、安徽(皖)等省区时的作战行动。

1934年,日本侵略军已经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并继续觊觎华北、华东地区,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仍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用重兵加紧进行对江西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央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下,反“围剿”斗争接连失利,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处境危殆。

在上述严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决定,抽调红军第7军团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沿途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和发展皖南地区人民群众正在举行的暴动,企图以此举迫使国民党军改变“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和作战部署。

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北上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红7军团时期,第二阶段为红10军团时期。

1934年7月6日,红7军团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全军团编有3个师:第19师、第20师、第21师,共计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人。部队经闽西的长汀、连城、永安进入闽中,然后攻克樟湖坂,东渡闽江。按照计划本拟从古田直接北上浙西,再去皖南。但中革军委却电令红7军团东进,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国民党当局对红军突然在闽中出现感到震惊和疑惑,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地区的第87师向福州集中,同时又急调正在湖北的第49师星夜驰援福建。福州是

福建省会,城墙高大,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城郊有飞机场,城内驻守着国民党军第87师的1个团和1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部队。8月7日,红7军团抵进福州并发起进攻,激战一昼夜,不克,遂决定撤出战斗,向北转移。福州一战暴露了抗日先遣队是红军的一支实力不大的“偏师”,自此,便不断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9日,7军团在福州东北桃源同尾追国民党军第87师的1个团激战竟日,因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赶至,再次被迫撤出战斗。桃源战斗后,7军团进入中共领导的闽东游击区,与闽东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8月14日,7军团奇袭罗源县城,全歼国民党守军1000余人。罗源战斗的胜利,大大兴奋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情绪。在闽东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部队的伤病员得到了安置,并补充了一批新兵员。8月16日,7军团离开闽东继续北上,尔后在闽浙边连续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堵截,于9月初顺利进入闽北苏区。7军团自出征以来,一路马不停蹄,日夜转战,此时已人困马乏,本想利用闽北苏区良好的根据地条件,休整部队,并寻机给尾追之国民党军第49师以有力打击,借以摆脱被动局面。但中革军委却指示7军团不要在闽北停留,而应去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继续对进攻我赣东北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地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线,进而破坏兰溪、衢县、江山、玉山间的铁路、火车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间的公路。”9月9日,7军团离开闽北,北上浙西,不久进入江山、常山、衢县之间地区,一面对付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一面沿途炸桥破路。9月17日、18日,中革军委连续来电,指示红7军团停止继续北上,要求以遂安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遂安地处新安江上游,交通便利,地瘠民贫,又是赣东北逃亡地主聚居之地,无论自然条件和政治条件,均不适宜建立根据地。此时,国民党军第49师、浙江保安第1、第2纵队和补充第1旅也从几个方向围拢过来,企图合击红7军团。在遂安建立根据地计划不可能实现,红7军团遂转向皖赣边行动。9月底,7军团抵达江西婺源县以北地区,才获知皖南地区的暴动已经失败。鉴于皖赣和皖南地区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军团领导即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以主力在这一地区积极活动,争取群众,消灭和打击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仍未获同意。10月下旬,7军团经浮梁、德兴之间,通过国民党军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会师。

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7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为红10军团,下编3个师:7军团编为第19师,红10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20师和第21师。军团领导也作了调整,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寻淮洲任第19师师长,刘英任第19师政治部主任,粟裕调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由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此时已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中央指示红10军团今后的行动归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指挥。整编以后红10军团的任务是:第19师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的国民党军,发展新苏区;第20、第21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的国民党军,保卫老苏区。

11月18日,第19师在师长寻淮洲率领下,以突然动作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国民党军之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尔后打垮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2个团的尾追,渡过新安江,逼近临安,震动了杭州。接着转向皖南,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间北上,威胁芜湖。就在第19师在浙皖赣边机动作战,并取得明显成效

的同时,根据国民党军对闽浙赣苏区“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中央军委电令红 10 军团军团部率第 20、第 21 师立即转至外线与第 19 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运动歼敌,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中央军委还决定,成立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红 10 军团和创建新苏区的活动,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随 10 军团行动,调回粟裕和刘英,粟、刘分别任 10 军团参谋长和军团政治部主任。11 月下旬,方志敏、刘畴西率红 10 军团部和第 20、第 21 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皖南,12 月 10 日与第 19 师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会合,再沿屯溪至青阳公路北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麓谭家桥地区。此时获悉,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红 10 军团围追堵截,各路追兵现距尚远,惟补充第 1 旅追击积极,已抵达汤口。该旅系蒋介石之嫡系部队,有 3 个团,装备较强,但孤立冒进,又不占地利先机。红 10 军团首长当即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灭补充第 1 旅大部,粉碎国民党军合围的企图,争取战场主动权。其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第 19、第 20、第 21 师的顺序设伏,第 19 师除以 1 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主要兵力应部署在乌泥关以北,第 21 师以 1 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追兵进入设伏地域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其退路,阻敌增援;第 20、第 21 师会同第 19 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争取将补充第 1 旅大部歼灭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12 月 14 日上午战斗打响,补充第 1 旅遭红 10 军团突然打击,队形呈混乱形势,但由于第 19 师未能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在以南,南面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补充第 1 旅随即调整部署,集中力量向第 20、第 21 师阵地进攻。第 20、第 21 师不擅长正规作战,第 19 师又来不及增援,阵地遂被突破,乌泥关制高点也被占领。在此关头,第 19 师师长寻淮洲亲自率队向乌泥关制高点猛攻,虽夺回了该点,但寻淮洲身负重伤,转移下来后牺牲。此时战场形势逆转,红 10 军团被迫撤出战斗。谭家桥之战是红 10 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斗,初战失利,使红 10 军团的处境愈加困难。

谭家桥战斗后,国民党军调集第 49 师、补充第 1 旅、补充第 21 旅及一些地方部队,约计 20 个团的兵力,加紧追堵红 10 军团。从 1934 年 12 月下旬至次年 1 月上旬,红 10 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泾县、太平、青阳、广阳、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 10 余县地区往返转移,其间进行了 10 余次战斗,给国民党军以相当的杀伤,但始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于是,军团领导决定全军经开化、婺源、德兴地区返回闽浙赣苏区。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加之军团领导在作战指挥上的迟疑失误,1 月 16 日,红 10 军团的主力部队在怀玉山陷入国民党军优势兵力重围之中,经过英勇卓绝的战斗,大部牺牲,小部突围至闽浙赣苏区和皖南山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被俘(同年 8 月,方志敏等在南昌被国民党杀害)。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队归于失败。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怀玉山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 1 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率领下,开入浙江南部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红军长征的胜利

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一次最大战役。是役自1934年11月25日起至12月1日结束,红军人人奋起作战,不顾一切牺牲,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进而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企图。

1934年10月上旬,在中央红军已经无力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形势下,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10月21日到11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组成的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湘南地区。

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是转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重开局面。遂于11月12日任命湖南国民党新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辖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中薛岳指挥的第2路、北路军中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粤军陈济棠、余汉谋部4个师北上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的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黔军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前出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全歼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11月19日,何键将“追剿”军分为5路:第1路司令刘建绪,指挥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2路司令薛岳,指挥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集结;第3路司令周浑元,指挥4个师由资兴、郴州向道县方向追击;第4路司令李云杰指挥2个师,经嘉禾向宁远方向尾追;第5路司令李韞珩指挥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向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何键的5路“追剿”军和粤、桂“防堵”军有25个正规师兵力,实力确实不小。但是,湘、粤、桂系国民党新军阀貌合神离,各有打算,口齐心不齐。红军西进湖南,对何键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何键行动积极;粤军陈济棠在第五次“围剿”时即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的5项协议;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素与蒋氏不和,只求边境防堵自保;薛岳、周浑元系国民党中央军,从来不服地方军官长的指挥。湘南地区,原为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在这里有较大的影响和较好的群众基础,此地国民党军力量不强,又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据此向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建议,乘何键各路军调动之际,组织红军力量,杀一个回马枪,寻歼“追剿”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或以红3军团进击湘(潭)、宁(乡)、益(阳)地区,以威逼长沙,并在机动中抓住战机,歼敌一部以调动何键各部,主力进占淑(浦)、辰(溪)、沅(陵)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毛、彭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使红军丧失了湘南机动作战的良机,而一味消极避战,继续向西退却,处境日趋严峻。

11月18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继续西进。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3、红8两军团为右纵队,由秀凤圩等地出发,经保和圩、青和圩,向嘉禾方向推进;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红9两军团为左纵队,由宜章、坪石地区出发,经梅田,向临武、蓝山方向推进;军委第

1、第2纵队及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16日,左纵队占领临武城。这时,桂阳守军2团已进嘉禾。右纵队主动以红6师从嘉禾南面阻击该敌南进,以保障左纵队,18日占领了蓝山城。接着,左纵队以日行100多华里的速度奔袭,于22日进占了道县县城。右纵队于24日占领了江华城(今水口)。随后,全军在道县与江华之间渡过沱水河。

中央红军渡过沱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是流徙千里,虎落平川,不难就擒。于是下令何键的“追剿”军与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防堵”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实施四面围追堵截,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其部署是:刘建绪第1路日夜兼程,进至全州沿湘江布防,与桂军切取联系,共同堵截;薛岳第2路沿湘桂公路对红军进行侧击,防止红军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周浑元第3路经道县继续尾追红军,李云杰第4路与第3路协同追击,李韫珩第5路协同粤、桂两军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李、白的5个师继续在灌阳、兴安以北至全州地域堵截红军西进。在此形势下,中央红军即以一部进攻永明,以调动桂军,寻机渡江。此举果然奏效,李、白误认为红军要西进广西进占桂林,急忙将其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调至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防堵红军入桂,同时又防止蒋系军队乘机进入广西。这样,兴安、全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便空虚了。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至全州之间地域,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

此时,中央红军必须迅速地抓住桂系主力南下,兴安到全州地域兵力较空虚的时机,突破湘江防线,冲出战略重围,才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可能危险。“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能否西渡湘江,胜负关系全局。为此,中共临时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即中央红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11月25日),要求红军“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中革军委于同日下午下达了《关于我军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作战命令》,将红1军团主力和红3、红8军团组成进攻部队,红1军团第1师和红5、红9军团组成掩护部队。具体的战役战略是:以红1军团主力为第1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前进;第1军团1个师、军委第1纵队和第5军团(欠1个师)为第2纵队,经雷口关或水安关及文市向南前进,尔后则依据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第3军团、军委第2纵队及第5军团1个师为第3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城,尔后向兴安前进;第8、第9两军团为第4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行)、三峰山向灌阳、兴安、道县前进。此间,何键已令刘建绪第1路的2个师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薛岳第2路的一部进至零陵、黄沙一线;周浑元第3路由宁远尾追;李云杰第4路和李韫珩第5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11月27日,红1军团先头第2师、红3军团第4师顺利地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并架设了湘江浮桥。红5军团于28日控制了蒋家岭、水安关、雷口关地域,正在阻击“追剿”部队。这时,军委纵队已进至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渡江点只有160多华里,由于搬家式的行军,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动缓慢,未能及时赶到渡口。29日,“追剿”军刘建绪第1路追至脚山铺并向红1军团第2师发起进攻。其他各路也分别在道县、文市等地向红军后卫部队开展攻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各路国民党军在飞机火力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红军发起

了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江点,并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于是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湘江两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是日,红军第1军团主力由石塘圩、太平圩渡过湘江,占领了界首、绍水,第2师推进到朱塘铺,一部向全州逼近。红3军团第4师过江后,首先占领了光华铺,主力向界首前进。红5军团继续在蒋家岭一带扼阻追兵。红8、红9两军团到达水车。红军总司令部、军委第2纵队一部均进至官山。30日,为掩护中共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等领导机关抢渡湘江,红1军团在湘江西岸的脚山铺与刘建绪第1路“追剿”军激战终日。红3军团第4师在光华铺及其以西顽强抗击由兴安北上的桂军,主力渡过了湘江。红5军团主力由文市渡过灌江,进至青龙山、石塘圩地域。军委第2纵队渡过湘江进至界首附近的王家。红军总司令部渡过湘江进至界首西北的大田。担任后卫的红军一部被隔滞在湘江以东,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鏖战。

12月1日,中央红军的处境更是险恶。湘江两岸的红军各部同截击的国民党军浴血奋战。被隔滞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与“追剿”军顽强拼搏,而且越来越困难。为争取扭转险恶的局势,中革军委决定以主力消灭由兴安、全州方向堵截之敌,钳制桂军及由东尾追周浑元第3路的部队,以保障隔滞湘江东岸的红军后续部队抢渡湘江并前出到西延山区。遂命令红1军团,不惜一切代价,阻击由全州方向来攻之敌,控制住红军西进的通道。红3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并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红6师暂留河东岸,占领石玉村,掩护红5、红8军团等部抢渡湘江。在万不得已时,红3军团必须死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红5军团主力向麻子渡前进,抗击桂军及周浑元第3路“追剿”军。被切断的红军部队应向麻子渡方向自动突围。是日3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致电红1、红3军团首长,强调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面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12月1日之战,“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

中央红军的广大官兵,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指挥员沉着指挥,身先士卒,战斗员不怕牺牲,拼命战斗,经过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地浴血鏖战,终于阻住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掩护了中共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17时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山地区。红5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为掩护主力被隔阻于湘江东岸,虽经殊死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遵义会议及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虽经英勇奋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突过湘江后的中央红军已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了。中央红军艰难转战,1935年1月,进占贵州省的遵义地区。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陈云,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各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

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解。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分析了“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朱德、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刘伯承、彭德怀等都在发言中对博古的报告进行了批评,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着重分析了“左”倾错误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战略战术上的基本错误,明确指出这是红军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3 人指挥小组(以中革军委名义)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会议期间,红军第 1 军团集结于桐梓、松坎地区,第 3、第 5、第 9 军团等部分别集结于滥板凳、猪场、湄潭地区。各军团以一部兵力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主力部队休整。部队边整顿边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吸收新战士 4000 余人)。部队甩掉从苏区带出的笨重物品,实行轻装和精简机关,进而恢复了体力,增强了机动力和战斗力。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同红 2、红 6 军团会合,除以湘鄂两省军队一部围攻红 2、红 6 军团,以川陕两省军队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调集了薛岳兵团和贵州国民党军全部,四川、湖南、云南国民党军主力和广西国民党军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1 月中旬,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共 8 个师,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控制了贵阳、息烽、清镇等地以后,前锋已进抵乌江南岸。黔军王家烈以 2 个师向刀靶水、滥板凳,以 1 个师向湄潭发动进攻;川军刘湘调集了 10 多个旅 40 多个团的兵力,组成“四川南岸剿共军”,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 2 个旅已进抵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 4 个师位于川湘黔边界的酉阳、秀山、松桃、铜山一线筑碉设防,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滇军 4 个旅 12 个团进抵贵州毕节地区。桂军 3 个师已抵贵州独山、都匀一线。此外,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正由河南向四川万县、重庆开进。

根据以上军事形势,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目前基本作战方针为:“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实行上述基本方针,中央红军第一步任务是,“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

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和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革军委要求红2、红6军团向秀山、黔江、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来凤、咸丰、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活动。红四方面军以一部向营山,主力从苍溪、阆中之线向嘉陵江以西发动进攻。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当晚,黔军第1师、第2师进占遵义,另一部进占湄潭。川军以模范师第1旅、边防第4路(2个团)分别防守宜宾、泸州,其主力8个旅分别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合江等地推进。24日,中央红军右纵队红1军团一举击溃黔军侯汉佑教导师的抵抗,攻占土城,至26日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纵队红9军团攻占习水,红5军团进抵三元场。左纵队红3军团进抵土城东南的回龙场地区。是时,川军教导师第1旅和第5师第13旅先进赤水城并对红1军团发起猛烈反扑。教导师第3旅和独立第4旅由东胜场进至温水,先头进至土城以东的木栏坝,尾击红军,另有4个旅作为第2梯队跟进。第1师第3旅主力正向叙永推进,并重占习水。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根据中央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决定乘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主力尚在乌江以南,黔军被击溃的有利时机,以红1、红9两军团各一部运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下之川军,集中红军主力歼川军教导师先头4个团于土城东北之风材坝、万羔咀、表岗坡地区,以保障红军顺利北渡长江入川。28日,红3军团、红5军团、干部团,于拂晓向表岗坡地区川军教导师发起突然猛攻,激战1天,重创川军,但未能全歼。此时,川军第2梯队2个旅迅速增援并从红军背后发起攻击。中央红军腹背受敌,再战更为不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运动至古蔺、兴文、长宁西南地区集结,尔后视情况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当晚,红军以少数兵力阻击川军,主力撤出战斗。

1月29日,中央红军在预先架好浮桥情况下,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这时,川军以12个旅分路向红军追截,并沿长江西岸布防;薛岳兵团所部和黔军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疾进,企图截击红军。2月2日,红军右纵队红1军团先头第2师猛攻叙永而未克,后卫第1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3日至6日红1军团又先后在永宁、毛坝、大坝等地遭截击。红军左纵队第3军团在天堂坝与追击之川军1个旅展开激战。在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分路围追堵截,并加强了长江西岸沿线防御的情况下,中央红军从宜宾上游北渡长江入川的原定计划已无可能。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于2月7日决定,暂缓实施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边境地区机动作战,争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为此,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军,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中央红军进入川滇边地区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红军的“追剿”,将第1兵团编为第1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刘建绪为前线总指挥,除一部在湘西“围剿”红2、红6两军团外,以一部策应第2路军作战;以薛岳兵团和滇黔西省军队为“追剿军”第2路,龙云为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4个纵队,即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2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4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专司“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阀矛盾重重,何键见红军主力远

离湘境,不愿再让湘军西进“跟踪穷追”王家烈急于恢复其对贵州的统治,对“追剿”红军的兴趣不浓。桂军滞留在独山、都匀地区,徐图自保。只有川军刘湘和滇军龙云害怕红军进入他们的领土而对防堵红军颇为卖力。2月7日,龙云下令孙渡第3纵队由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吴奇伟、周浑元的第1、第2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王家烈第4纵队防守赤水河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川军潘文华(指挥约15个旅)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蔺、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上,其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妄图合力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此时,蒋介石调集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多达150多个团,约40余万人。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各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进行了休整与缩编。全军加上干部团共编为17个团,共3.6万人左右。红1军团为2个师6个团,红3军团为4个团,红5、红9两军团各为3个团。11日,孙渡纵队和潘文华所部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吴奇伟纵队一部已进至黔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东南方向扑向扎西。为避强击弱,脱离川军与滇军的合击,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即迅速东渡赤水河,向黔军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展战局,寻歼王家烈部主力。按上述行动方针,中央红军于2月11日由扎西地区突然掉头东进,分3个纵队,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锅厂坝,于18日至21日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以红5团一部向温水佯动吸引追兵,主力向桐梓地区疾进。

中央红军突然由扎西地区掉头向东,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使蒋介石的“追剿军”措手不及。于是川军3个旅急忙由扎西附近地域向东尾追,却已落在红军后面三到四天的路程,红军则赢得了东出桐梓、娄山关的宝贵时间。黔军王家烈慌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地区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纵队第59师、第93师由黔西向遵义开进,妄图阻止红军并与王家烈部合击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月24日,中央红军左纵队第1军团先敌进占桐梓,援桐之黔军1个团退守娄山关。翌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决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为达成上述目的,以红5、红9两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运动防御,阻击川军;以红1军团主力和红3军团一部从娄山关东西两翼向守关黔军侧后迂回,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26日攻占了娄山关,并乘胜追击,击溃黔军3个团的阻击,于28日晨重占遵义城。天亮后,吴奇伟纵队第59师主力和第93师一部即向遵义猛扑过来。第59师主力向红1军团阵地红花岗连续发起冲击,当即遭到红军英勇反击,将其1个团击溃。于是该师又转向红3军团阵地老鸦山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予敌以大量杀伤后,撤离老鸦山阵地。协同吴奇伟部进攻的王家烈部,因屡遭红军重创,此时则观望不前。红1军团主力乘机展开猛烈反击,迅速突破第93师和王家烈部的抵抗,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忠庄铺。吴奇伟仓皇率领第93师残部约1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穷追狠打,配合红3军团夺回老鸦山阵地,歼灭第59师大部。王家烈亦率残部逃向打鼓新场。

遵义之战,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正确指挥下,在3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约3000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

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仗,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胜利信心,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使得其“追剿军”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是“奇耻大辱”。同时,中央红军获得了作战物资的补充和短期休整的机会。

中央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万分焦虑,于3月2日飞往重庆,再度策划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妄图采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北夹击的战法,夺回遵义并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他下令川军郭勋祺部2个旅由桐梓向遵义进攻;上官云相部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克复遵义;周浑元纵队4个师进抵仁怀、鲁班扬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孙渡纵队4个旅进抵大定、黔西北地区防堵;王家烈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吴奇伟纵队4个师(其中第59、第93两师已受重创)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各路作战。同时,命令李韫珩第53师由镇远向石碑推进,何键部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碉防堵红军东进。3月5日至10日近一周时间内,中央红军准备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郭勋祺部向东运动,集中主力由遵义西进白腊坎、长干山地区,寻歼周浑元纵队。周纵队各部始终惧歼不前,只守不攻,红军多次寻战,终未得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在遵义西南机动作战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此举是“徘徊于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今后可能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因此命令各路“追剿军”按原定部署加快推进。至11日,川军郭勋祺部进占遵义,吴奇伟纵队一部已北渡乌江后向鸭溪、遵义方向推进。

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两军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歼其一部”。依据这个战略方针,中央红军于15日集中主力对鲁班场之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由于周4个师猥集一团,不便于分割各个击破,且吴奇伟部增援部队已进抵枫香坝,为避免前后夹击,陷入被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放弃进攻鲁班场,迅速撤出战斗,转兵西进,再创战机。3月16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途中击溃川军1个团的阻截,于19日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旋即调整军事部署,令其所有“追剿军”各部以川南为目标全力追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地区。具体布置是:周浑元纵队主力经鄯家渡向古蔺方向追截;吴奇伟纵队2个师归周浑元指挥,尾红军追击;孙渡纵队主力进抵毕节附近堵击;王家烈纵队以一部兵力运动于新场以北地区,寻找红军截击;川军郭勋祺由两河口向仁怀、古蔺追击,第一师第3旅赶赴土城防堵;李韫珩第53师由石碑向遵义推进。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依据敌情变化,于3月20日决定中央红军“以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蒋介石,加深其错觉,红军以1个团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方向前进,主力则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途中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并随即从“追剿军”右翼分路向南疾进,进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尾追之敌一部。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直飞贵阳,亲自督军,妄图寻中央红军主力决战。鉴于“追剿军”重兵猬集,不易分割歼灭。27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9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以积极行动向长干山、枫香坝之敌佯攻,以吸引“追剿军”向北,主力则乘敌还没有搞清红军意图之际,继续分路向

南急进。翌日,中央红军主力在鸭溪、白腊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狗场地区,并于31日南渡乌江,从而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布下的合击圈,把国民党军几十万“追剿”部队甩在了乌江以北。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动息烽,主力进占狗场、扎佐,前锋逼近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分。这是因为,此时贵阳及其周围只有黔军第99师4个团,如此单薄的兵力,何以挡住红军中央主力的进攻?蒋介石慌忙下令“追剿军”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保驾”。同时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于是“追剿军”各路又纷纷转向贵阳急进。4月3日,中央红军在息烽至扎佐之间东进,5日进至清水河西岸的高寨、羊场、白果坪地区。为了迷惑蒋介石,中央红军即以少量兵力东渡清水河,向平越方向积极动作,并在清水河上架设浮桥,作出全军东渡的姿态。此举果然使蒋介石又一次发生错觉,认为中央红军欲东进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于是又急令湘军何键部3个师向余庆、石碑推进堵截;令桂军白崇禧部1个师进至清水河以东的平越、中场一线防堵;急令已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孙渡、吴奇伟两纵队和李韞珩第53师,分3路掉头向东追击;令周浑元纵队位于息烽以北的乌江北岸筑碉设防,防止中央红军北渡乌江。

滇军孙渡纵队由滇黔边开往黔东后,云南境内兵力空虚,这就为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在部署这次行动时就讲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于是,中央红军乘“追剿军”各路驰援贵阳“保驾”之际,于4月8日在运动中急转南下,以每天60公里的强行军,突破“追剿军”贵阳至龙黑之间的防线,经青岩、惠水、广顺、鸡场、老凹坪等地,向云南疾进。蒋介石又一次失措,气急败坏,急忙又命令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李韞珩第53师在东进中调头向西,在中央红军右侧沿滇黔公路向云南追击;令孙渡纵队尾随中央红军追击。“追剿军”各路往返奔波,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士气更加低落,内部矛盾加重。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先后进占贞丰、安龙、兴仁等地。原暂留乌江以北马鬃岭地区牵制敌军的红9军团,完成掩护主力南进任务后,也转战到达黔西的水城地区。此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必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会合红9军团,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入川。于是决定集中龙云、薛岳指挥的第2路“追剿军”主力向宣威、威宁地区逼进,将中央红军围歼在该地区。据此,吴奇伟、周浑元、王家烈三个纵队和李韞珩第53师分路向宣(威)、威(宁)地区转进,孙渡尾追红军不舍,川军郭勋祺集结毕节。

为了进一步调动“追剿军”各路,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命令红9军团继续单独进行,以吸引敌军,掩护主力行动。红9军团迅速由水城向滇东北前进,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相继攻占马龙、寻甸、嵩明,于4月27日进抵杨林,前锋已逼近昆明市。这时的昆明,守军力薄势小,滇军主力孙渡纵队尚在几百里以外的曲靖以东地区;另一个旅虽正向昆明进发,因遭红军打击,伤亡惨重,战斗力甚小;其它“追剿军”距昆明都有3天以上里程。龙云为保老巢安全,一面电催孙渡纵队取捷径回援昆明,一面调集各县团防武装防守城垣。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堵力量,为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4月29日决定:“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实现原定的“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并号召全军将士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果敢地去实现这一艰苦任

务。当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滇西北前进。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珩、海龙塘、石板河进攻至皎平渡。5月3日,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赶到皎平渡,当晚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守军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边防大队一部,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又以一部分兵力北上,途中击溃增援敌人,至会理城下。在此期间,红1军团抢占了龙街渡,洪门渡等渡口的水流太急或江面太宽,一时无法架桥,且渡船又小,大部队难以过江。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3军团第13团由洪门渡过江外,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主力全都改由皎平渡过江。中央红军渡江过程中,“追剿军”先头已进到团街,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乘敌立足未稳,先机攻击,掩护主力顺利渡江。9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在滇东北单独行动以吸引“追剿军”的红9军团,于5月2日攻占了东川(今会泽)并顺利渡过金沙江。这时,尾追中央红军的“追剿军”各路人马,全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会理地区则只有川康边防军1个旅。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3军团、干部团围攻会理守军,以红9军团在蒙姑、巧家之间扼阻东岸追兵,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短期休整。四渡赤水作战胜利结束。仅就其中大小近40次战斗的统计,中央红军歼灭国民党“追剿军”1.8万人左右,击落敌机1架,缴枪数千支。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3月28日至4月3日,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歼灭川军7个多团,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4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约200公里的地区,打破了川军依靠嘉陵江设防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的计划。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的范例。

1934年9月,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失败后,蒋介石即开始布置“川陕会剿”,除组织参谋团入川、准备监督川军“剿共”外,并调其嫡系部队向四川开进。1935年1月,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接替了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准备参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

红四方面军在打破川军六路围攻后,即确定向川甘边发展,以扩大根据地。1935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先是乘国民党军“川陕会剿”尚未部署就绪,进行了广昭战役。1月下旬接中共中央电示,要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发展,以配合中央红军从泸州以西的渡江行动。为调动嘉陵江西岸防守之陕军,又进行了陕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7个团,占领了宁羌(今宁强)、沔县(今勉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防守广元、昭化之胡宗南部仓皇北上增援。

当红军主力在陕南作战时,其他各线川军即乘隙向根据地进攻。东线第21军于2月3日占领万源,8日占巴中,9日占通江。西线罗泽洲部2月5日占仪陇,田颂尧部占苍溪。为制止川军进攻,扫清渡江作战的障碍,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侵占仪陇、苍溪之川军。2月中旬,红军主力回师川北,于3月初向仪陇、苍溪地区的川军发起进攻,歼田颂尧、罗泽洲部4个多团,俘官兵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嘉陵江东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城一段,除阆中外,悉数红军控制。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转到川黔边地

区,红四方面军为继续贯彻向川甘边发展的计划,和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决定在苍溪、阆中地区强度嘉陵江,发起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川军沿江筑有坚固工事,由田颂尧和邓锡侯两部防守,邓锡侯统一指挥,妄图凭此天险堵截红军向西发展。川军的布防情况是:

邓锡侯第28军17个团防守广元以北陈家坝、朝天驿至江口沿江地段。其中10个团守备江防,第3师第7旅和宪兵第2团防守江口至广元地区,第4师第12旅和第2师2个团防守广元县城及乌龙堡地区,第5师第14旅和第15旅1个团防守上西坝至朝天驿地区。警卫第3团担任广元兵站勤务。第3师第8旅配置于三磊坝,宪兵第3团配置于下西坝,第1师第3旅主力第2旅一个团、特科第4团作预备队。

田颂尧第29军35个团防守昭化以南江口至新政坝一线。其中以23个团守备江防,第1师第1、第2旅和第5师第13旅共6个团防守江口至青牛庙,独立师防守青牛庙至小站河,第3路防守小站河至百里坝,第3师、第5路、第2师第5旅共10个团防守百里坝至河溪关,第4师第12旅和独立旅、警卫第3旅、第1路共10个团防守河溪关至新政坝地段。以1个旅作预备队。

这样,川军在北起朝天驿,南至新政坝约300公里的嘉陵江以西地区,共配置了52个团。但其防线绵长,有不少薄弱环节。如小站河至百里坝近50公里的江岸,只有3个团防守,其前沿又只有4个营。同时,田颂尧、邓锡侯两部都遭受过红军的沉重打击,士气十分低落,不少部队建制残缺,兵员不足。

红四方面军根据川军宽大正面的防御特点和兵力部署,决定集中主力,选择川军防御薄弱部分实施重点突破,同时在宽大正面上进行多路强渡。渡江成功后,首先歼灭沿江设防守军,夺取要点,并向两翼扩展,然后向纵深发展,以占领嘉陵江、涪江间的广大地区,为下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红军渡江作战部署如下:红30军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消灭江防守军后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红31军消灭剑门关守军。红31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军,并迅速向昭化、广元发展进攻,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位于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翼侧安全。红9军于阆中以北涧溪口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红30军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川军,以保障左翼侧安全。红4军为方面军第2梯队,于第1梯队渡江成功后在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红9军消灭南部守军,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团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红30军强渡。红军大学在苍溪西关佯动,配合主力渡江。总指挥徐向前亲率有关人员,沿江勘察地形,收集水文资料,为红军顺利强渡作了准备。

红四方面军利用各种机会,号召所有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都要以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完成渡江作战前的各项准备:一、政治动员。反复阐明渡江作战的意义,解除各种顾虑,增强胜利信心,树立坚决、勇敢、顽强和突得破、守得住的决心。二、渡江侦察。各部队在指定的渡江地段内,以化装侦察和泅渡夜摸等手段查明守军兵力和火力配备情况。同时,嘉陵江西岸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武装也给渡江部队提供了守军内部的一些资料及江防部署情况。三、渡江训练。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红军,利用嘉陵江东侧支流的东河,开展水上练兵。对于一般人员进行江河水性知识的教育。在战术上着重训练偷渡和强渡的突击动作,以及登陆作战、巩固扩大登陆场、火力支援、保障后

续部队投入战斗等。四、物资器材的准备。要强渡江河,中心问题是造船。群众闻讯后运来造船用的大批木材,筹集了大量的废铁,很多老船工由各地跋山涉水,昼夜兼程,赶赴苍溪。军民同心协力,在短时间内造出了大批木船和3座竹扎便桥构件。这样,保证了红军的第1梯队与后续部队均能迅速投入战斗。

为了保证渡江作战的突然性,红四方面军在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中,做到严密封锁消息,隐蔽船只,部队行动不吹号,做饭不冒烟等,使川军始终未能识破红军的作战意图。

3月下旬,红军渡江准备工作完成。28日,指挥部发出渡江命令。当夜,各部队开始强渡嘉陵江作战。红30军2个营和方面军直属教导营为突击队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以神速动作秘密渡江,直至迫近对岸才被川军发觉。但川军火力尚未展开,塔子山的红军炮兵即向其前沿猛烈轰击,压制川军火力,掩护突击部队胜利登岸。突击队登岸后,全歼守军1个营,控制要点,击退了南北两翼川军的反击,巩固了登陆场。29日拂晓,红88师第2梯队2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川军仓猝反击,妄图消灭红军于滩头阵地。红军占据有利地形,先以密集火力予以杀伤,然后集中主力实施突击,川军狼狈回窜。红军乘胜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退从阆中后撤的川军第2师第5旅。

红31军第9师于29日拂晓前在苍溪以北之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克守军险要阵地火烧寺,击退刘汉雄师1个旅,巩固了登陆场。与此同时,红9军于阆中以北渡江成功。

第1梯队强渡成功后,迅即向纵深和两翼扩展。红4军也于苍溪加设的浮桥上过江,投入战斗。

3月31日,红30军及红9军一部经福兴场攻占剑阁,守军向江油方向逃窜。接着,红30军以红88师向东北疾进,协同红31军进攻剑门关。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昭化之间剑门山上的隘口,扼川陕孔道,地势险要。两旁均为数丈高的峭壁,山间仅有一条小路相通,用火封锁即难通过。经川军长期驻守设防,地堡、堑壕密布,是江防纵深的重要支撑点。邓锡侯调宪兵司令刁文俊率3个团到该地防守。4月2日拂晓,红30军第88师、红31军第93师和第91师1个团,先后到达剑门关附近,对川军形成三面包围。但守军凭险顽抗,力图固守,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乃决定集中迫击炮及机枪火力掩护突击队对守军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红31军向隘口东侧守军阵地进攻,红30军向隘口西侧守军阵地进攻。川军在红军的猛攻下据险死守并拼命反扑,红军同守军展开多次肉搏,经半日激战,将东西两侧高地全部占领,并乘胜夺取了隘口的北山主峰,切断了守军向北逃跑的道路。不久,剑门关守军被全部歼灭。

红军占领了“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川军沿江防线即土崩瓦解,溃兵纷纷向西逃窜。红30军和红31军各一部星夜直奔昭化,3日占领昭化城,歼守军1个团。红31军主力继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南下,并以一部包围广元城。

在红30军与红31军北向剑阁、昭化方向发展的同时,红四军主力即西向梓潼方向发展,一部配合红9军主力,南向阆中、南部城方向发展。阆中守军仓皇弃城向盐亭逃窜,红9军即于3月31日占领阆中。4月2日,又攻克南部城,全歼守军李炜如部3个团。红军强渡嘉陵江作战至此胜利结束。被击溃的第29军江防部队,纷纷逃向射洪、

盐亭、三台地区。田颂尧被蒋介石撤职，邓锡侯第28军主力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一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地区。

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1师第1团和第2师第4团在西康省（今四川省）泸定县抢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打击国民党川军的进攻作战。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又有天险大渡河。彝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军阀欺压，对汉人抱有很深的成见。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易守难攻。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曾在这里因北渡未成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企图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声称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为此，他命令薛岳率其主力迅速北渡金沙江，向西昌追击，并以第3纵队向盐边、盐源推进，沿雅砻江两岸布防，阻止红军西进；同时，以川军第24军主力由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筑堡，阻止红军北进，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红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训令强调指出：“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必须以极迅速、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止红军前进的川军各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并组织彝民游击队，以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迅速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军进行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红军在北进途中，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区。5月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守军2个连，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后续部队及时跟进，一举击溃防守北岸之川军第5旅第7团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从而在守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红1军团一部虽在安顺场抢渡成功，但这里水深流急，不能架桥，红军只有4只小船，在几天内渡过河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尾追之薛岳部已过德昌，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击而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

这时，川军以2个旅在大渡河左岸向泸定桥增援。红军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第4团，于27日由安顺场出发后，为了抢在川军增援部队到达前夺取泸定桥，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的口号下，沿着崎岖山路，边打边走，先后在猛虎岗、摩西（今攀西面）等地击破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的阻击，于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的西桥头。

泸定桥是我国著名的铁索桥，扼川康要道，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天险大渡

河之上,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守军为国民党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守军在红军到达的前一天,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经过紧张的准备,红军第4团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统一号令下,全团火器一起开火,由第2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对岸冲去,在穿过守军于东桥头燃起的火墙后,胜利占领大桥,冲进城内,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后续部队紧跟入城,歼灭守军一部,攻占泸定城。红军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第1师和干部团,也日夜兼程赶进,在击破川军1个团的拦阻后,胜利到达泸定城。接着,中央红军主力由泸定桥顺利通过大渡河。这样,蒋介石处心积虑地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终成泡影。

红军长征的胜利

6月中旬,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先期到达的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3月开始长征的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为确定下一步进军方向,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等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但张国焘却对此持反对态度。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8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穿越川西大草地。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经过极其艰苦的行军分别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这时,率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向右路军靠拢,擅自率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后,红军自俄界北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随后,红军又连续突破敌人在会宁、固原设置的两道封锁线,击溃尾追的敌人骑兵部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了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率领下,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经艰苦转战,1936年6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甘孜会师后,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积极力争下,张国焘同意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的成功,保存了革命火种和民族精华。红军转移到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人民参加抗日战争提供了立足点和出发点。

长征还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诚意,驳斥了国民党关于红军

“捣乱后方”、“牵制抗日”的诬蔑之词。

长征还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给我党我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战士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长征精神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 年秋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相继退出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并进行长征后,留下了 1.6 万人的红军和地方部队,分散在 8 省: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含今海南省),15 个地区: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海南岛琼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并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原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开展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扰乱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并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实施反攻。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长驱直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进攻,11 月下旬,占领了根据地的全部县城、交通要道和大部乡村。然后,采取分区“绥靖”、限期“清剿”的方针,企图一举全歼红军。在此期间,红 24 师等部队,实施了阵地防御作战,不断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但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在防御作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5 年 2 月,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所作的新的指示精神,决定将红 24 师和地方武装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在分散转移途中,红军的领导机关和部队大部损失,部分辗转到达赣粤边和闽西地区,会同当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继续坚持斗争。由于中央分局的电台在突围时失去了与中共中央和各地区的联系,从此,在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中,各地的中共党组织独立地领导了游击战争,在南方 8 省内逐步形成了 15 块游击区。

东北抗日联军 1936 年秋冬 反“讨伐”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族人民群众,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意旨,自发地组成抗日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名义的武装进行抗日。这些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其全盛时约 30 万人。他们在反侵略斗争中,

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但由于这支庞大的队伍派系不一,无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加之其领导人有的缺乏全局观念,纪律松弛,故在日伪军的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的威逼利诱下,或被消灭,或遭惨重损失,或瓦解降敌,到1936年初已所剩不多了。

此时,由中共满洲省委组建的几支弱小游击队,在其统一领导下,经过几年的英勇奋战,迅速发展为4支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两支反日联合军。他们依照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关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精神,递次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第1至第6军。(第7军由第4军第2师在1936年冬扩建组成)同年秋,谢文东、汪雅臣、李华堂、祁明山(又名祁致中)等部,分编为抗联第8、第9、第10军及独立师。抗联各部,在日伪军从1936年3月至9月进行的第1期“治安肃正”中,其第2军军部率主力由安图地区西进南满,留下第2师在宁安、东宁地区与第5军协同作战。5月,第2军第3师于抚松县境与第1军第2师会合。7月,中共东满特委、南满特委,抗联第1、第2军党委领导人在金川县河里地区的密营举行了联席会。会议决定两军合编为抗联第1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统辖6个师。第2军3个师,改称第1路第4、第5、第6师。东、南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2人为委员。会议研究确定第1路军的作战方针为:冲破东边道山林地区,扩大游击区域。决定以第1军军部率第1、第3师西征辽西、热河、内蒙古,求得同关内红军部队,特别是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第2军军部率第2、第4、第6师在原地坚持战斗,以牵制敌人,策应西征行动;第5师仍在宁安等地配合第5军行动。

在吉东地区之抗联第5军,早在1936年春,即按为打破敌人“讨伐”,扩大游击活动范围的军事行动方针,和以宁安为中心,分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必要时向北挺进的行动计划,其第1、第2师主力,于同年夏,进至中东铁路东段南北地区,与活动在该区的第3、第4、第6军的部队会合。9月,周保中率军部、军属直队向中东铁路东段转移,留下该军第3、第6团等部和第2军第5师组成道南留守处,继续坚持绥宁游击区斗争。

北满珠河游击区的第3军主力,在赵尚志军长率领下于1936年1月进至汤原县境,下旬,同汤原游击总队领导人夏云杰、第4军军长李延禄及其他抗日友军的领导人谢文东、李华堂、冯志刚会合并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称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公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华堂任副总司令,张寿鏊任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第3、第6军(由汤原游击总队组成)决定各留部分兵力组成以张寿鏊为主任的留守处,建立在汤旺河一带的后方根据地,以第3军大部组织西征,开辟通河、东兴、巴彦、木兰、铁力、庆城、海伦游击区。3月,赵尚志率第3军之第5、第6团等部开始西征,先后进行了舒乐河镇、八浪河等多次作战,威震松花江西岸。至夏初,到达木兰县境,尔后又在巴彦、木兰、通河一带活动,开辟了巴木通新游击区。半年时间,第3军由6个团发展成6个师,活跃在北满的20多个县,打破了敌人的多次“讨伐”,使松花江南北两岸的游击区连成了一片。

1936年9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开始实施第2期“治安肃正计划”,将东、南、北满及吉东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以日军4个师5个独立守备队及各特种兵部队和伪军担任

“讨伐”任务,9月日伪军正式开始向上述各区实施“讨伐”。

1936年7月,抗联第1路军根据“金川县河里会议”制定的军事行动方针和计划,其第1师由本溪县境出发,西征辽西、热河,当进至辽阳地区时,遇强敌追堵,西进不能,遂行东返,途中在摩天岭与尾追之日军激战竟日,毙日军中队长以下官兵80余名,但自身亦伤亡很大,只得返回宽甸地区之密营休整。为配合第1师西征和反对日伪军的秋季“讨伐”,杨靖宇、王德泰分别率部在南满各地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相继进行了通化县四道江、大拐弯子伏击战,袭击抚松县城,化装袭击了鸭绿江畔之大荒沟,以及错草沟伏击战,大、小德水、半截沟、二道岗等多次战斗,给进行“讨伐”之日伪军以重创。

10月,日军关东军司令部决定,以伪满第1军区之伪军为主力,调集第2、第3、第5军管区部分兵力和伪靖安军及警宪计1.5万余人,由佐佐木到一任指导部长,伪满洲国军部大臣于芷江任司令,对通化、辑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辉南、金川、柳河九县地区,进行所谓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抗联第1路军根据上述敌情,决定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进行反“讨伐”作战。同时还决定以第3师再次西征。第1路军总部组织部队在深山密林修造密营,储备物资,以供部队反“讨伐”作战之需和休整之用。11月,在杨靖宇主持下,第3师组成了400余人的骑兵西征部队,下旬,西征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治委员周建华率领下,由兴京县出发,过清原,翻铁岭,越南满铁路,一路冲杀,于12月下旬进抵辽河东岸。然而始料未及,当年冬季气温偏高,辽河此时并未封冻,又因难觅渡船,部队无法渡河,再因行进急速、频繁战斗,人员骤减至100余人,且过度疲劳,日伪军大量逼来,在此紧急之际,西征部队只得放弃西征,绕道返回兴京密营进行休整。

在第3师西征期间,第1路军之第2、第4、第6师,在长白、安图、临江、蒙江等县境内广泛展开游击战。10月,在长白县境内毙日守备队80余名,在安图县东青沟毙日军石川上校、河村中校及伪混成第7旅官兵数十人,使敌人之“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一开始即遭重创。11月,抗联第1路军部队,拔除了临江县大阳沟据点,伪军2个连被迫投降,接着又在长白县八道沟毙伤伪军40人。同月下旬,王德泰率第4及第6师一部于蒙江县小汤河活动,是时,遭伪骑兵第7团和教导队的突然夜袭。王德泰临危不乱,镇定从容,指挥部队夹击进攻之敌,毙伤伪军团长以下官兵40余人,迫敌仓皇南逃。王德泰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战后,魏拯民继续率部战斗在长白、临江等县境。12月,在十三道沟重创伪军“讨伐”队,在五道沟毙伤伪军50余名。留守长白县黑瞎子沟密营的第6师20余人,利用有利地势,巧设疑阵,伏击了前去“讨伐”的500余人的日军守备队,毙伤日军近100名。日伪军在长白、临江境内连遭打击后,遂调集重兵,以图围歼活动于该区的抗联部队。魏拯民得悉敌方企图后,随即率第2、第4、第6师主力向抚松转移,跳出了敌人包围圈,留下的部分部队在内线继续坚持斗争。1937年1月间,第1路军第4师在蒙江县小夹皮沟伏击战中毙俘伪靖安军30名,在抚松县漫江沟歼伪军100名,接着袭击了南岗木场,随又与第6师在鲤明水沟设伏,歼伪军2个连大部。此外,第6师还先后进行了抚松县城南战斗、红山头 and 桃泉里等战斗。至此,抗联第1路军彻底打破了日伪军对之进行的秋冬季大“讨伐”。为此,伪满洲国军政部日本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哀鸣抗联第1路军是“满洲治安之癌”。

1936年秋,抗联除第1路军外,已大部云集于松花江下游地区,广泛展开游击战,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队伍获得迅猛发展,使日伪当局十分惊恐,把他们称之为伪满

洲国的“北部国防上的心腹之患”。于是在1936年10月决定,以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为司令官,调集了大批日伪军开始对以汤原、宾县、木兰、通河、依兰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欲聚歼该地区之抗日武装。

为打破日伪军“讨伐”,贯彻同年9月18日召开的中共珠河、汤原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确定的“向新区发展,向日伪统治环节薄弱的缝隙中突击”的精神,和避免部队为敌聚歼,分散就食以减轻民众负担,抗联遂以第3军大部及第4、第5军部分部队组成远征队向小兴安远征,其余部队就地开展游击战,配合远征队行动。第3军之第2、第3、第5、第6、第9等师为远征先遣队,分由方正、延寿、五常、宾县、庆城、东兴地区出发,11月先后会合于铁力县境,随即展开游击活动,在孙灵阁山附近与装备精良的500余日军激战一昼夜,毙日军80余人。同月,赵尚志军长率500余名骑兵队由汤原老钱柜出发,12月到达铁力县境,他向先遣队部署工作,随即又率领200余人的队伍北进。不久进至海伦、通北地区。此时,日军侦悉到抗联之远征意图,即在北黑线及黑龙江流域部署重兵,对远征队进行堵击、尾追和进攻。当赵尚志率队到达通北县冰锥子第5师之密营时,得群众密报,有日伪军800人进山“讨伐”。赵尚志根据当时虽敌我兵力悬殊,但所处之地谷深林密,时值隆冬,谷底已形成冰川,是难得的伏击战场。于是当即将主要部队分布在深谷两侧矮树丛中,形成袋形阵势待敌,以1个班兵力前出诱敌。是日午后,日伪军“讨伐”队被诱入伏击阵地内即遭密集炽热火力射击,被压伏在无处藏身的冰川上,死伤狼藉,然仍作困兽犹斗,连续组织了10次进攻,但均未得逞。当晚,日伪军被困于零下40℃的奇寒中,伏击部队却利用密营木屋交替取暖,轮番出击敌人。次日,“讨伐”队方在援军的接应下仓皇撤退。此次战役,共毙伤日伪300余人。同日,第3军第9师与第4军第2团歼灭了海伦县六井子伪警察署全部伪警。冰锥子战斗后,赵尚志率队向龙门一带挺进,途中击破了日伪军的堵击,克服了茫茫林海雪原和粮断水绝的困难。当其到达龙门附近之炭窑时,获悉日军乘坐30多张爬犁前来“讨伐”。于是赵尚志将部队设伏在日军来路两侧。是日13时许,日军进入伏击阵地,突遭伏击部队猛烈射击,丘井大尉以下官兵被歼。战后,赵尚志率队前进。连续的作战和艰苦行军,部队大量减员。待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已十分疲劳的部队突遭日军偷袭,数十名战士英勇牺牲,战骑全部丧失。余部70余人在赵尚志率领下以惊人的毅力和对敌的仇恨与必胜的信念,克服了重重险阻,于1937年春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留在中东铁路南北、松花江下游活动的抗联第3至第11军各部,为配合远征队行动,他们有时独立活动,有时联合作战,或袭击、或攻城、或略寨,积极展开游击战,予日伪军以重大打击。他们先后进行了袭击林口城、小道沟附近的延寿伪警察大队,攻占军事重镇佛山(今嘉荫)城,刁翎大盘道伏击战,夜袭刁翎和攻打依兰县城等大小战斗上千次,彻底打破了日伪军对该区的大“讨伐”计划,保存了老的游击区,同时与远征队一起开辟了铁力、庆城、海伦、富锦、宝兴等新的游击区,建造了后方基地和密营,并以此开办学校、医院、军需工厂,部队在战斗中得到成长、壮大和重大发展。

东北抗联在1936年中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近3000次,歼日军上千名,伪军数千名,彻底粉碎了日本关东军欲于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第一年度的计划,取得了反“讨伐”作战的重大胜利,扩大了抗联的声威,鼓舞了东北人民和其他抗日友军的抗战热忱,部队由不到万人发展到2.2万余人的10个军另1个

独立师,组建了汤原、刁翎、长白山游击基地,建造了很多密营,保持了老的游击区,开辟了铁力、庆城、海伦、富锦、宝清等新的游击区,为尔后的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华北危机

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方针是既定的。1933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不承认国际联盟讨论通过的《李顿调查报告书》,宣告退出国联。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声明,狂妄表示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日本对“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有单独责任,无须他国干涉,试图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实现独占中国的目的。蒋介石、汪精卫实行媚日外交,希望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演说,提出“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蒋介石、汪精卫立即表示赞许。5月,中日公使同时升级为大使。南京政府发布《敦睦友邦令》,明令禁止一切排日、反日言行。

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进一步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5月,日本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在山海关、古北口、锦州一带集结重兵,准备随时入侵华北。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国民党北平当局提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下野、省政府移至保定,更换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等要求。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完全接受日方要求,并在几天内即一一照办。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又向何应钦提交“觉书”及附带事项,要求国民党政府撤出在河北的一切党政机关和所有中央军、东北军,禁止一切抗日排日活动。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在此前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借口察哈尔张北地方中国军队拘留日本特务,派土肥原贤二向国民党当局进行要挟。6月29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国民党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等。“何梅”、“秦土”两协定,使中国政府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在华北五省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任意出入的“真空地带”。

接着,日本侵略者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防共自治运动”。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实现“华北经济圈独立”以及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提出了全面实现“华北自治”的狂妄要求。10月,土肥原到华北加紧实施华北“分离”、“自治”计划,唆使汉奸、流氓在冀东香河县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临时维持会”。11月又策动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拼凑“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防共自治政府”),宣称“脱离中央”,“独立”“自治”。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冀东22个县实际上沦于日本之手。南京政府却适应日本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明令裁撤军委会北平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12月初又指派宋哲元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天

津两省两市。这是一个既同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侵略者有特殊关系的半自治政权。

在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在“日中经济提携”的幌子下,在华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控制华北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垄断华北的铁、煤、石油、盐等资源的开发。日本侵略者还公然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甚至殴打中国海关关员,逼迫中国缉私人员解除武装。据美国太平洋联合会最保守的估计,1935年中国走私进口的货物总值达2.5亿美元(包括各种毒品),其中大部分是由日本通过华北各口走私运进的。

日本对中国的加紧侵略,直接威胁着英、美在华的利益。英、美的对日态度由原来的袒护、纵容变为公开的谴责和反对。英、美报刊指责日本是“黠武的国家”、“国际的强盗”,揭露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英、美政府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扶植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以与日本的扩张相抗衡。1935年4月,美国派遣“经济考察团”来华。9月,英国派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帮助实行币制改革,中国宣布加入英镑集团。12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华北“正在进行着一项性质不寻常而可能有远大影响的政治斗争”,表示“中国任何部分的非常发展”“为所有在华有利益的国家所关心”,“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次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中国以白银换取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用以维持法币的汇价。南京政府进一步依赖英、美。币制改革和白银协定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与英、美的矛盾日趋尖锐。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和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分化。日本一手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使整个华北面临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的危险,而且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经济上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开始向亲日派发起攻击。宋子文、孔祥熙等对禁止排斥日货运动和颁发“敦睦邦交令”提出异议。1935年8月,国民政府监察院提出不信任外交部长案(时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任)。汪精卫只得请辞本兼各职。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举行,汪精卫被击伤。会议通过了冯玉祥等二十人联名提出的《救亡大计案》。随即,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19日所作的对外关系报告中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大会通过的宣言也宣称“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12月,蒋介石亲自接替汪精卫行政院长职务,并一度主持中日谈判,开始采取拖延态度。行政院各部部长亦代之以蒋的亲信。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势力严重削弱。

以国民党五大为契机,国民党内亲日派和英美派的力量出现明显消长,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亲日投降的外交路线受挫。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无理要求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提出了“绝对不能容许”破坏行政统一的自治制度等条件。诚然,国民党的这种变化是初步的,不彻底的。华北在名义上没有分裂出去,实际上却已在日本控制之下。华北危机空前严重。

“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后，一度低落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涨。在中共河北省委、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几千人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爱国学生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搏斗，充分体现了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当天，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翌日，全市各校实行总罢课，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北平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先后汇集在天桥和正阳门前举行大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收复失地。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游行群众再次遭到镇压。

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英勇斗争，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和广泛同情。宋庆龄和北平各大学进步教授杨秀峰、张申府等以及外国友人斯诺夫妇等各方面人士都对学生的斗争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从12月11日起，南京、上海、天津、武汉、杭州、济南、广州、西安、太原、重庆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必须使学生深入工农群众，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工农群众的武装自卫斗争，为青年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1935年底，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学联的具体组织与领导下，近500名大中学生组成四个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接着，上海、广州、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进行救亡宣传。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的活动，使青年学生走出书斋，受到了实际斗争的锻炼。进步学生开始找到自己扎根的土壤，正确认识了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后来，为保存骨干，坚持长期斗争，扩大抗日救亡阵线，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总部设在北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实际取代了共青团，成为共产党在宣传团结抗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方面可靠、得力的助手。到七七抗战前夕，民先队员发展到2万多人，甚至在巴黎和南洋的华侨青年中也有民先队员。民先队团结了广大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和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冲破了国民党统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从而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成为中国革命由低潮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它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其次，“一二·九”运动为知识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为青年学生运动开辟了一条崭

新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广大工农大众相结合,投身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洪流,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华北扩大侵略和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经两度延期,于1935年11月在南京举行。

蒋介石在会上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他在阐述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国民党就是要“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是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蒋介石的讲演,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深,也反映了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种变化。

大会闭幕不久,12月2日至7日,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1936年5月5日颁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将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推举张人杰等2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介石。会议又推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向会议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接任。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的决定。改组后的行政院各部门的主要官员中,亲英、美派势力占了上风。

对日外交日趋强硬和抗战准备

从1935年11月开始,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外交部长张群接任谈判后,在与日驻华大使有田的首次谈判中,明确表示,“国民政府不赞成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外交的基础”,“不能抛开东北、华北问题,孤立地空谈中日关系调整”。张群的强硬态度使谈判陷入僵局。在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央对外交所报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后,张群在与日新任驻华大使川越的谈判中,面对日方的无理要求,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关于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停止不法飞行,消灭察绥伪军等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双方各持己见,使谈判毫无进展。12月中旬,因西安事变爆发,谈判终止。

南京当局一面以强硬态度和拖延办法应付对日谈判,一面进行抗战的准备。国民

政府在 1936 年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决策：“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以此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战略路线的主体，有关具体部署是：以四川为中心建立大西南总根据地，以华中重镇武汉为“国防作战中心”，以国民党统治心脏宁、沪地区为国防战略重点，修筑上海至杭州、吴江至福山、无锡至澄江三道国防线，同时将全国划为抗战、警备、绥靖、预备四大区域。除上述内容外，国民政府还就重要的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内迁等提出了积极的设想，对于保护国家经济、教育、科研命脉，坚持抗战及维持大后方物质的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增强了国防实力，在日后的民族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些方面的准备工作进展缓慢，收效甚微。又因中国工业生产落后，尤其在化学、钢铁、机械、光学仪器等方面更为薄弱，没有独立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等重武器的能力，未能形成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

沟通国共对话以图政治解决

与转变对日政策相同步，国民党当局从 1935 年 11 月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和中共取得联系，谋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中日矛盾的激化，华北事变刺激了蒋介石，使他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其次，红军已损失大半，对国民党的统治构不成大的威胁。第三，在国际上为了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的支持。而同苏联改善关系，而首先必须同中共改善关系。第四，中共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新形势下业已做出了反响，“八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第五，在中共的号召和影响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促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整其对中共、红军的策略，在不放弃军事进剿的同时，主动寻求政治解决，以收编、招抚红军，如果谈判不成，再行进剿。

1935 年底，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同宋庆龄商议打通与中共的关系。宋氏姐弟委托董健吾去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信息。1936 年 2 月，董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名义，经西安到达陕北瓦窑堡，转达了国民党当局的意图。3 月 4 日，正在东征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及时提出了两党谈判的 5 项条件。董健吾回上海复命，至此，中断 10 年之久的国共两党中枢之间的联系得到恢复。

蒋介石还指派陈立夫从其他途径打通国共关系，陈立夫委派 CC 重要成员、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曾养甫具体负责。1935 年 11 月底，曾委托部属谌小岑联络此事。谌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联系。随后，吕振羽受命以北平左派教授的身分到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会晤，担任中共北方局与南京方面之间的联系人。1936 年 6 月，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以中共代表的身分到南京与曾养甫会谈，此为 1927 年国共分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与此同时，谌小岑还通过左恭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35 年 12 月，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1936 年 2 月，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到达陕北根据地，先后单独向博

古、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了谈判情况。此后,张子华多次往返于陕北、西安、南京之间,为两党谈判做联络工作。1936年1月,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明进行接触,表达了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接触谈判的意向,王明建议这项谈判在国内进行,并指派潘汉年为联系人。1936年7月潘汉年回国,11月,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在上海会晤,潘向陈递交了中共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协定草案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两党现状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联合抗日的具体建议。国民党方面在开始接触时,态度是积极的,但后来,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以政治方式解决”的旨意,提出以取消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作为两党联合的先决条件,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尽管如此,国共双方的初步接触,增强了彼此了解,减少了对立情绪,为两党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公布和国民大会的筹备

国民党当局在有条件地谋求对中共政治解决的同时,准备实施宪政,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着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

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应于最近期间积极遵行建国大纲所规定之地方自治工作,以积极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拟于民国24年3月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立法院速起草宪法草案,并发表之,以备国民之研讨”。1933年1月,立法院成立了孙科为首的40人宪法起草委员会,2月,“制宪”工作正式开始。6月,完成宪法草案初稿。1934年3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公布,由立法院进行审查。10月16日,立法院全体会议对宪法草案三读通过,送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审核。国民党中央的审查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初,经过四届五中全会、四届六中全会、五大、五届一中全会共4次会议。1936年5月1日,宪法草案通过,5月5日正式公布,史称《五五宪草》。

宪草分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国民经济、教育、宪法之实施及修正共8章,148条。宪草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大会由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立法、监察院正副院长和立法、监察委员,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等政权。宪草规定总统副总统任期6年,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有统率全国海陆空军,依法对外行使宣战、媾和、缔约,对内宣布戒严解严、大赦、特赦、发布紧急命令,任免行政、司法、考试院长及其他文武官员之治权。宪草规定了人民有人身、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通讯、信仰宗教、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依法律请愿、诉愿、诉讼、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应试之权利,有纳税、服兵役、工役及公务的义务。但同时又规定:凡限制人民自由或权利之法律,以保障国家安全、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需者为限。宪草规定中华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公用事业及独占性企业以国家公营为原则,但必要时允许国民私营,“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其经人民以

法律取得所有权者，其所有权受法律之保障及限制”。

《五五宪草》是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的一部力图粉饰民主的宪法草案，规定了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体，本质则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总统个人独裁。《五五宪草》是国民党法统的基础，为 1947 年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之蓝本。

《五五宪草》公布后，召开国民大会的其他准备工作主要是制定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并实施选举。

1936 年 5 月 14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7 月 1 日，又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依照上述法规，国民大会代表分为两种，一为当选代表，即依选举法规定所选出的代表；二为当然代表，依《国民大会组织法》第 3 条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为当然代表。此外，规定以下五种人列席国民大会：(1) 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候补监察委员；(2) 国民政府主席；(3) 国民政府委员；(4) 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之长官；(5) 国民大会主席团特许之人员。

《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几经修改，于 1937 年 5 月 21 日由国民政府公布。修改后的代表名额为 1440 名，分配方法为：依区域选举方法选出者 665 名，依职业选举方法选出者 380 名，依特种选举法选出者 155 名。除调整了代表名额外，还对两法的其他内容做了修改，如将国民大会的职权缩小，限制在“制宪”范围，取消国民政府对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初选当选者的圈定权。国民大会的筹备工作虽有初步成果，并原定 1936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但因故拖延长达 10 年之久。

《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1935 年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高涨。以民族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高举民族抗日的光辉旗帜。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 月 1 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并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 11 月 13 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

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于是,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又于11月28日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

几个月间,中共连续发表三个抗日宣言,反映了形势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早在“八一宣言”发表的当天,蒋介石就从电台获悉。对于中共政策变化的新动向,极为关切。“八一宣言”是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发表伊始,便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直接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状况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对“左”倾关门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同时,他也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提醒全党要注意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

瓦窑堡会议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红一方面军东征

1936年2月中旬至5月初,红一方面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东渡黄河,出师山西的东征战役。此役,历时75天,红军转战晋中、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歼晋绥军约7个团,俘其4000余人,粉碎了晋绥军苦心经营的黄河封锁堡垒线,予山西军阀阎锡山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同蒲路沿线20余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平津、太原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支援作用,为后来红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

1935年冬季,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使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是中共与红军开展新局面的关键。当时中

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当时的兵力仅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比较困难，扩军不容易。苏区周围的形势比较严重，在南面、西南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 10 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 84、第 86 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 5 个旅。他们正加紧对苏区和红军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妄图将红一方面军困死、饿死，最终“剿灭”陕甘边地区。

参加对陕甘苏区围困并准备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军，主要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据守宣川、韩城、白水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部据守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等县城和附近一些乡镇，阻止红军向西南发展，并隔断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井岳第 86 师从榆林、靖边、安边、定边向南袭扰，企图夺占瓦窑堡、安塞、安定等地；高桂滋第 84 师据守绥德、米脂和清涧地区；阎锡山的正太护路军司令兼陕北“剿共”总指挥孙楚率领晋绥军 4 个步兵旅，布防于吴堡、义和镇及其南北地区，并指挥晋绥军骑兵第 4 旅及井、高部队各一部“清剿”神木、府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在黄河东岸，阎锡山以 3 个旅另 1 个团的兵力，沿黑峪口至禹门口 300 多公里的地段筑堡守备，阻止红军东渡入晋。其中第 71 师第 216 旅 2 个团担任包括黑峪口、罗峪口等渡口在内的兴县、临县、离石三县河防，第 207 旅 2 个团担任包括沟口、河口等渡口在内的石楼、中阳两县河防，第 72 师第 209 旅 1 个团担任永和及其以西河防，第 69 师第 203 旅担任包括禹门口等渡口在内的大宁、吉县河防；另有第 101 师第 3 旅两个团在柳林机动。此外，以 6 个旅另 1 个团的兵力，在太原、汾阳、临汾等地区防守，另有 14 个旅驻守在长治、应县、大同等地及绥远境内。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黄河东征的方针，中央军委于 1935 年 12 月 24 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随后，陕甘苏区的党政军民进行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主要有：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晋绥军，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扩大红军，充实部队实力；调集大批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工作；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了造船民工，并组建了工兵连，进行造船、划船、架桥等技术训练；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和政治思想动员；各部队指挥员现地勘察了渡河地点，拟制了渡河作战计划，还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保密规定，以保证渡河作战的突然性。

1936 年 2 月 18 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其具体部署是：第 1 军团以第 2 师第 5 团为先头，第 2 师主力，第 4 师、第 1 师、第 15 军团第 81 师随后，从沟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福乐坪、马花坪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留誉镇地区，并向南发展，同第 15 军团打通联系。第 15 军团（欠第 81 师）以第 75 师第 223 团为先头，第 75 师主力、第 78 师随后，从河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舍峪里、辛关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

20 日 20 时，渡河战斗开始。各军团突击队和先头团在预定的渡河点突破晋绥军

黄河防线,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大渡河场,掩护主力部队渡河。至23日,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纵深35公里、横宽50余公里的地区。之后,红15军团第75师第224团开始转攻石楼城,方面军主力集结于留誉镇及其以南地区作短暂的休整,准备新的战斗。此间,山西游击队500余人从河口渡河,进至义牒镇为中心的地区,担任维护交通、巩固占领区的任务。

为了阻止红军的进攻,进而驱逐红军至黄河以西,阎锡山急调入陕之晋绥军4个步兵旅撤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原在该地区的第71师等部,阻止红军北进,牵制红军东进。调驻长治、晋城的第66师到介休,驻太原的第72师主力1个旅另1个团和第68师1个旅前出汾阳,驻汾阳之独立第2旅向关上村推进,阻止红军东进。调驻临汾、襄陵的第69师主力及驻防大宁、吉县的另1个旅分路北进,均向隰县前进,阻止红军南进,牵制红军东进。另调驻浑源、大同之第68师2个旅向岢岚集结,调驻大同、丰镇之骑兵2个旅到崞县至忻县间,随时增援太原。调驻应县的独立第3旅至文水、交城地区,以防卫太原的西南方。

为打破晋绥军的封锁,建立临时根据地,红一方面军首长彭德怀、毛泽东于24日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绥军一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依据上述决心,红1、红15军团分别开始了行动。红15军团于2月25日1时先在石楼南端歼灭从黄河边溃退之晋绥军约1个营,继以3个团向隰县急进,在预期的遭遇战中,歼晋绥军第69师先头部队1个营,击溃1个营。随后,军团主力转向东进,于27日占领水头镇。红1军团于26日下午从南北两面进攻关上村,歼晋绥军独立第2旅第4团。该旅旅部率第3团由石板上向汾阳溃逃,红军乘胜追击,于27日将该敌歼灭。军团主力随即推进到兑九峪、三泉镇地区。

面对红军凌厉的攻势,阎锡山以救援石楼为目的,一面电告蒋介石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编为4个纵队,于3月4日开始,分路向红军实施反击:第69师3个旅为第1纵队,由隰县向北反击;第66师3个旅为第2纵队,由介休向西反击;第72师1个旅另1个团和第68师1个旅为第3纵队,由汾阳向西反击;第101师和第71、第72师各1个旅共3个旅为第4纵队,由中阳向南反击。

鉴于上述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迅速定下粉碎阎锡山反击的决心:第1军团第2师一部在关上村钳制阎部第4纵队,第15军团1个营在石口镇钳制阎部第1纵队的先头旅,集中两军团的主力,歼击兑九峪附近阎部第2、第3纵队。10日7时,红1、红15军团主力向兑九峪守军发起攻击,击溃阎部第一线部队。接着,阎部第3纵队在第2纵队的配合下,向红1军团攻击,红军两军团主力奋起还击,将其2个纵队击溃。这样,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即被粉碎。

第一次反击被粉碎后,晋绥军第2、第3纵队退至孝义、汾阳及其附近地区整顿;第1纵队一部退隰县,一部调回临汾;第4纵队主力仍在柳林、离石、中阳和关上村附近。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从3月上旬起陆续入晋,其第25师已进至灵石,第32军第141、第142师已经从正太路向平遥、介休间开进,第13军正准备从晋东南和风陵渡分路向侯马开进。这些部队初到山西,开始行动比较谨慎。

为打乱阎蒋两军的进攻部署,扩大占领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力量,彭德怀、毛泽东决定分兵南下北上作战,扩大和发展战役胜利,其决心和部署是:以第1军团指挥第81师(欠1个营)组成东征先锋军(后称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首先向霍县出击,尔后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第15军团第78、第75师主力和军团直属队为一路(后称左路军),进至灵石以西地区,掩护第1军团南下;以第15军团第75师第224团、第81师1个营和新组建的第30军等部为一路(后称中路军),由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继续包围石楼和在石口镇、关上村附近地区牵制晋绥军第1、第4两纵队,并保障黄河渡口及后方联络线畅通。

3月16日,红军右路军从大麦郊及其以北地区出发,于17日突破晋绥军汾河防线,包围了霍县县城,并占领了城北的道美、南关西村。左路军于16日由双池镇以西地区出发,于17日进抵灵石以西,并佯攻姚家山和灵石县城。这时,阎锡山为解救石楼并夺回被红军所占地区,又集中了4个纵队,于3月17日开始向石楼方向组织第二次反击。这样,太原、晋南、晋西北地区的防守力量便减弱了。彭德怀、毛泽东决心分兵南北作战:以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继续南下,相机进占赵城、洪洞,并向曲沃、闻喜、运城攻击;以左路军乘虚北上,首先占领文水、交城,威胁太原,尔后继续北进,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等县,创建晋西北游击根据地,力争与陕北的神府苏区打通联系。叶剑英参谋长指挥的中路军,继续包围石楼,反击晋绥军的反扑,控制黄河渡口。这样,红军便形成了左、右两路南下北上发展进攻,中路钳制晋绥军主力的有利态势。

按照上述部署,右路军于3月19日由霍县地区南进,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乡村,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集资材,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左路军于3月18日从灵石以西地区北上,进到岔口镇作短暂休整,并开展地方工作。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广大地区钳制了晋绥军4个纵队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在南北两线的作战。同时,继续控制着黄河渡口,保障了后方交通运输,并开展地方工作,扩大部队,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游击队,建立了地方党和政权机构,为下一步的作战准备了战场。红28军在神府苏区,协同当地武装,积极打击晋绥军,有力地策应了红15军团主力的行动。

3月下旬,蒋介石委任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直接指挥由进入山西的国民党中央军编成的第5、第6、第7三个纵队,企图封锁黄河,分别围歼各路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强令在山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进击,以造成红军后顾之忧。根据这种情况,方面军首长于4月初决定,逐步收缩兵力,准备集中歼敌。为此,右路红1军团和第81师,即由古城、汾城(今襄汾)等地北上,攻占吉县,进至大宁、蒲县、隰县地区,并逐一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的晋军黄河沿岸堡垒;左路红15军团,经白文镇、圪洞镇、金罗镇,于4月12日在师庄地区歼晋军第66师1个团另1个炮营,击溃其3个团,俘团长以下600余人,尔后转至大麦郊镇休整。红28军经金罗镇攻占三交镇后,经石楼到达康城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在围攻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时,山西境内各路晋军纷纷向红军围拢,同时,蒋介石又命令陕甘宁各省国民党中央军,向红军陕甘根据地进攻。为避免与优势晋军决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4月下旬,方面军首长决定回师河西,遂于5月2日下达了渡河命令。自5月2日晚开始到5日,各参战部队分别经清水关、铁罗关渡

过黄河,全部返回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平地区。同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敦促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至此,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西征

1936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时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继东征战役胜利后进行了西征战役,给宁夏国民党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很大打击,创建了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的倡议。但是,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共的倡议,继续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仍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共,并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调集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等部共16个师另3个旅,对陕甘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其部署是:蒋系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辖第4师、第89师)和晋绥军李生达第72师和1个炮兵团,渡黄河入陕,协同原在陕的高桂滋第84师、高双成第86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以中央军李仙洲第21师、关麟征第25师和晋绥军的2个旅为预备队,集结在山西境内待命机动作战。另以东北军王以哲第67军(辖3个师)、刘多荃第105师主力(2个旅)和西北军冯钦哉第7军第42师、孙蔚如第38军第17师,由延安、甘泉、鄜县、洛川、韩城、宜川向北,进攻陕甘苏区南部;以东北军董英斌第57军的3个师,由合水、西峰一带向东北,进攻陕甘苏区中部;宁夏马鸿逵第15路军(1个师5个旅)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胜(今下马关)等地;马鸿宾第35师驻守环县、曲子、庆阳、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还以晋绥军4个多师,在黄河东岸的晋西、晋西北地区,防备红军再次东进。

是时,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已同中共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其广大官兵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倾向抗日救亡,不愿同红军打仗。蒋介石、阎锡山素有矛盾、貌合神离,阎只求自保不愿再以大量兵力投入“剿共”。所以,蒋介石进攻陕甘苏区和红军的主力,实际上只有中央军第13军汤恩伯所部。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虽然反共坚决、积极,但防区广大,兵力有限,第15路军总指挥兼所编第7师师长马鸿逵仅有步(骑)兵12个团,马鸿宾仅有第35师共步(骑)兵8个团。这是一个较薄弱的战略方向。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立了中共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红军力量,努力争取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在军事战略上,避免与当面敌人决战。据此,赋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陕甘苏区党的战略任务是:向西面进攻,造成广大的陕甘宁

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四方面军和红 2、红 6 军团北上,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坚持东面的游击战争。确定上述三项战略任务之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空间和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进而发动全国抗战创造条件。

中共中央军委依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战区形势,决定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 1、第 15 军团和第 81 师、骑兵团等部,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起西征战役,向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进攻,开创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策应红四方面军与红 2、红 6 军团北上。同时以红 29 军主力、红 30 军、陕北地方红军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牵制蒋系中央军和晋绥军,保卫陕甘苏区;以红 28 军准备出击陕南,协同陕南红 74 师,巩固与扩大鄂豫陕苏区,并吸引蒋军南下,策应西方野战军作战(后因情况变化参加西征作战)。

1936 年 5 月 18 日,中央军委下达西征战役行动命令。规定西方野战军的第一阶段任务是:夺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地区。20 日前后,参战各部由现地出发,分 2 路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 1 军团(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经蟠龙、安塞进抵吴起镇(今吴旗);右路军红 15 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经永坪、蟠龙之间进抵新城堡。红 81 师、骑兵团及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跟进。是时,彭德怀的决心是:以红 15 军团兵分两路首先袭占宁条梁(今梁镇)和安边,尔后向定边、盐池攻击,再视情况袭击灵武、金积或豫旺县城,佯攻宁夏,以调动驻守庆阳至洪德城一带的马鸿宾第 35 师回援宁夏。红 1 军团则在运动中寻机歼灭第 35 师,并迅速夺占曲子、环县、洪德城等要点。

5 月 28 日,红 15 军团右翼队第 73 师袭占了宁条梁,左翼队第 75 师强攻安边未果。随后,红 15 军团以第 78 师围困安边,主力转向定边以南地区前进,并派一部兵力(骑兵团)前出到盐池、灵武地区侦察。红 1 军团则由吴起镇向元城镇、曲子镇方向攻击前进。宁夏系“两马”的老巢,红军进攻宁夏,顿使“两马”惊慌。马鸿宾第 35 师一部急速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其遗防由东北军接替。毛泽东一面致电东北军领导人,请其“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不要阻碍红军的进攻;一面电示彭德怀,要红 1 军团立即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兵力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上,相机攻占曲子及其南北一线,并指出,执行上述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

6 月 1 日,红 1 军团第 1 师进至曲子以北,向木钵方向警戒,第 2 师向进抵曲子的马鸿宾第 35 师第 105 旅旅长所率的特务连发动攻击,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下,该旅长冶成章率 150 余人投降。第 4 师于马岭附近击溃第 35 师 1 个营,进占阜城。2 日,马鸿宾集中 8 个步(骑)兵营,向阜城反扑。3 日拂晓,红 1 军团主力突然向马部发起猛攻,战斗 3 小时,马部 8 个步(骑)兵营大部就歼,1100 余名官兵被俘虏。阜城战斗后,红 1 军团第 4 师控制曲子、阜城,并派 1 个团进占曲子西南的三岔。第 1、第 2 两师继续北上,于 4 日攻占环县,5 日攻占洪德城。红 15 军团第 73、第 75 师,于 4 日攻占定边西南的洪柳沟,并准备打击马鸿逵的出援部队。为协调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请令其部队不要超过庆阳、镇原一线,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东北军部队按中共的要求停止于庆阳、镇原一线,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

6月5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心继续兵分两路向西攻击,“消灭两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部署是:左路军红1军团以第4师控制阜城至洪德城一线,开展群众工作,并准备在红29军一部接防后,向三岔以南发展进攻,扩大占领区域;主力继续西征,攻占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并在上述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征集资材。右路军红15军团主力继续向西推进,攻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兵力进占同心城;第78师准备撤回安边,西进红柳沟地区,向定边、盐池、金积方向游击,准备打击马鸿逵部出扰部队。第81师和骑兵团暂留宁条梁、安边地区游击和做群众工作。西方野战军司令部率直属队进至洪德城附近。6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之间地区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与苏联联系的战略枢纽,也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应在7月半以前完成初步赤化。据此,彭德怀于10日下令由红军第28军、第81师和骑兵团组成北路军(又称中路军),由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统一指挥,由陕南转兵北上,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要点,在东与老根据地连接,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边境的广大地区进行赤化工作,并准备以有力一部,消灭马部出援部队。

6月7日,西方野战军各路开始行动。至11日,右路军红15军团先头部队第73师第219团进占了同心城,其主力进抵王家团庄附近;左路军红1军团主力于13日进抵七营、上新堡地区,第4师继续控制三岔地区。至此,西方野战军终于切断了马鸿宾第35师余部经七营、同心城大路撤退中宁、石空堡的退路,打破了“两马”收缩兵力加强宁夏腹地防守力量的企图。在此期间,宋时轮、宋任穷指挥的北路军已进抵宁条梁、安边附近地区;红29军一部亦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合水之间地区活动,以配合红1军团的行动。这样,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境广大地区,并开展了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西征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6月14日,彭德怀确定西征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部署是:左路军红1军团主力控制七营、上新堡地区,开展赤化工作,打击马鸿宾出扰部队;第4师控制曲子、阜城、三岔等要地。右路军红15军团主力攻占豫旺县城,尔后攻占韦州城,以一部兵力控制同心城、高崖子一线,并向海原、中宁方向游击侦察;第78师进占惠安堡,并向金积、灵武方向游击侦察,打击马鸿逵部的出扰部队,以掩护军团主力夺取豫旺县城。北路军主力夺占安边,以一部兵力置于定边以南,向盐池、灵武方向游击;另以1个小团在宁条梁、横山之间地区开展赤化工作。各路军根据上述部署,旋即开始行动。

6月16日,北路军第28军、第81师和骑兵团完成了对安边的包围。是日2时许,暂归宋时轮、宋任穷指挥的第15军团第78师乘定边守军不备,一举袭占了定边城,全歼城内守军。17日,北路军首长留第28军一部与第81师继续围攻安边,率主力西进定边,准备进占盐池。21日3时,第78师和骑兵团攻占盐池,歼灭马鸿逵骑兵2个连和民团200余人,缴枪200余支、战马200余匹。此后,北路军以定边城为中心,展开工作,一边肃清残匪,一边扩大红军和征集资材;第78师和第81师夺占安边并准备打击马鸿逵部出扰部队。左路军红1军团第2师于20日进占七营,主力位于七宫、八百户之间地区,防堵马鸿宾部北窜;同时在防区两侧地区展开群众工作。此后,马鸿宾部向西转移

到海原、黑城一带,东北军一部接替七营以南的阵地防务。21日黄昏,右路军红15军团第73师一部攻占同心城以南的王家团庄,全歼守寨民团,缴枪数十支,战马100余匹。27日2时,军团直属手枪团夜袭豫旺县城成功,歼灭守军2个连,俘守军营长以下280余人,缴长短枪180余支、战马150匹。尔后,红15军团主力向韦州城攻击前进。韦州城是宁夏黄河以东地区的战略重镇,马鸿逵接韦州告急讯后,立刻派兵3个团(其中骑兵2个团)前往增援。7月5日,马鸿逵部第20旅旅长马全良率3个步(骑)兵团另2个营的兵力由韦州城进犯豫旺县城,企图夺回该地。当马全良部进至红城水一带时,遭到红15军第75师有计划的抗击,马部死伤300余人,狼狈退回韦州城。战斗后,右路军主力即在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红城水、大水坑、甜水堡、豫旺县城这一大片地区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在北线,防守横山的国民党军高双成第86师,以1个团(骑兵1个营、步兵3个连)的兵力,于6月24日向安边推进,企图解安边之围。红军北路军首长当即决定:留一部兵力防守定边、盐池,主力回安边,准备打击高双成第86师援兵。7月13日晨,由横山西援的第86师所部进至安边附近,被围城红军击溃,退回堆子梁。在此前后,北路军曾再次攻击安边,均未奏效。根据彭德怀的决定,红28军停止围攻安边,撤至安边以南休整,并准备打击出扰之马、高部队。第78师集中于盐池,担任赤化工作;第81师集中于定边,担任赤化工作。至7月下旬,第78师调至豫旺县城,归属红15军团建制;第81师调至甜水堡附近待命,盐池、定边西北防务由第28军接替。

在南线,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指挥骑兵第3、第6、第7、第10师),在张学良赴南京期间,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第106、第108、第120师与骑兵第3、第6、第7、第10师及马鸿宾第35师余部,自固原至安庆一线北犯。6月中旬至7月初,攻占了红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并继续向曲子推进。随后,何柱国直接指挥步(骑)兵4个师和第35师余部,集结于固原、七营之间,准备兵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

本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已同中共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红军西征以来,为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一直采取忍让和避免与其决战的姿态,但何柱国却认为红军的克制态度是软弱,继续向北推进。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7月14日电示彭德怀,指出:“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以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于是,彭德怀决心集中红1、红15两军团主力,给予何柱国以有力打击。部署是:以红1军团第4师及第1师第13团于曲子地区,阻击东北军第106、第108师北进;第1师主力和第2师集结于七营、双井子东北地区待机出击,并以一部兵力保持同七营以南之东北军的接触;红15军团集结于豫旺县城附近,待机出击。

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兵第6师向红军进行试探性攻击,被红2师一举击溃。何柱国鉴于红军已有充分的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东北军遂暂时停止了进攻。

在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游击战争同进攻的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西征行动。7月底,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行动胜利结束。

两广事变和绥远抗战

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素有矛盾。1936年5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常会主席胡汉民病故,使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决意利用此机会解决两广问题,派居正、孙科等人赴粤以祭胡为名,要求西南与中央精诚团结,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于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联络广西李宗仁等,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进行反蒋。6月1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抗日。2日将抗日主张通电全国,同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接着出兵湖南,南京政府也调集部队进入防御状态,内战一触即发。

两广事变的发生,引起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要求南京政府接受西南当局的抗日要求,同时要求西南当局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抗日诚意,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则对事变采取打拉并用的两手策略,一面派出大军准备进袭两广,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部下,用分化利诱手段瓦解了这次反蒋行动。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西南问题的决议》,撤销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陈济棠被迫通电下野,旋即赴港。蒋介石认为分化桂粤目的已达到,便电令白崇禧、李宗仁离桂任职。遭拒绝后,蒋又调集大军,准备用武力解决,广西方面也严阵以待。对此,全国人民一致要求蒋介石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冯玉祥居中调停,双方举行和谈,蒋介石被迫收回成命,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因为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并起作用的结果。

南方两广事件刚刚平息,北方绥远再燃抗战烽火。1936年10月,在日军直接配合下,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进攻绥远。对此国民政府严正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亲赴平地泉指挥,蒋介石也飞太原与阎锡山商议战事,并令汤恩伯十三军驰绥增援。

保卫红格尔图的战斗是绥远抗战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战役,11月中旬,双方激战数日,终将伪蒙军彻底击溃。此后,日伪军以百灵庙为依托进犯绥北。百灵庙位于归绥西北300余里,为西通河套,南达归绥、包头之交通要道。为确保绥远,红格尔图胜利后,傅作义即针对日伪军之行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收复百灵庙。11月23日伪蒙军数千人在日本指挥官率领下,由百灵庙向武川、固阳方面出动。绥军奋起应战,迅速将敌击退,并乘胜追击至百灵庙附近。双方在百灵庙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至24日拂晓,敌势衰不支,全线溃退。为挽回败局,日军又指挥大量伪蒙军集结于百灵庙东北160余里的大庙地区,企图以此为根据地,向百灵庙反扑。10月2日,伪蒙军由大庙出发,向百灵庙发起攻击。严阵以待的绥军,当即予以迎头痛击。9日夜,傅作义下达总攻大庙令,10日上午,绥军收复大庙。

绥远抗战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声援,上海各界派出以黄炎培为首的慰问团携款10万赴绥慰问抗敌将士,北平学生成立了救护队、慰劳队、义勇队等组织,亲赴绥远抗日前线。绥远抗日获胜,举国为之振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西安事变

驻在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都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把这两支部队放在陕西,作为进攻红军的主要力量。张、杨所部在“剿共”战争中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不但不予支援,反而趁机削弱张、杨的力量。张、杨十分不满,又感到和红军作战没有出路,现实逼着他们寻求新的出路。东北军、西北军的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更是厌倦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日趋高涨。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在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的同时,开展了对这两支部队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还在瓦窑堡会议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就分别给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和陕西地方实力派写信,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了争取张、杨两部合作抗日的工作。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红军将领名义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阐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并希望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兼主任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释放了在“围剿”战争中被俘的东北军军官,并派李克农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本人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当时东北军驻防的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重要协议。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遣不少共产党员,如刘澜波、刘鼎、宋黎等到东北军做中、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杨虎城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人有过合作关系,以后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1935年11月,共产党员南汉宸派人向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转达了中共《八一宣言》精神,杨虎城当即表示赞同。12月,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并派汪峰携信件到西安与杨会见。杨虎城联共抗日决心日坚。1936年2月,共产党又派王世英与杨虎城继续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十七路军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双方同时着手抗日准备等协议。不久,国民革命时期就在杨虎城部担任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国,奉命到杨虎城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共产党还联合张、杨内部的进步人士高崇民、王菊人、申伯纯等,帮助张、杨消除某些隔阂,使两军关系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基础上逐步得到改善。1936年上半年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实际停止了敌对状态,西北地区各派武装力量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实现了大联合。

1936年8月,日本卵翼下的内蒙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王英等伪军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动和配合下向绥远发起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部抵抗。11月,傅作义部在红格尔图痛歼日伪军,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大庙等失

地,取得了局部抗战的胜利。全国人民展开了空前热烈的援绥运动。

绥远抗战,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傅作义。但他仍然顽固坚持“剿共”方针。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立即集结重兵于陕甘根据地周围,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奉命云集西安,紧张部署“剿共”军事。10月31日,蒋介石颁布对红军的总攻击令。红军多次退让后被迫应战,11月21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78师2个团,这是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的最后一仗。12月1日,毛泽东、朱德致函蒋介石,再次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增援绥远抗战,并给红军以抗日出路,开赴晋绥前线。蒋介石不但拒绝共产党的正义要求,而且在河南洛阳再次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策划调集30个师的嫡系部队开往西北,图谋一举消灭红军。12月4日,蒋介石亲飞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命令,否则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张、杨决心既不再参加内战,又不离开西北。张学良慷慨陈词,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杨虎城也据理力争,拒不服从“剿共”命令。蒋介石毫无悔悟之意,表示誓不改变“剿共”计划。9日,西安地区1万多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爱国请愿游行,国民党特务开枪镇压,愤怒的学生冲出城门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派兵武力制止。张学良为学生激情所感动,10、11日两天又接连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张学良为情势所迫,与杨虎城商议,决心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卫队包围了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部队控制了西安全城,扣押了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随即通电全国,陈述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必定“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张、杨还电告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和处理捉蒋后事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际上,日本企图乘机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公开威胁南京政府,暗中支持“讨伐”张、杨。英、美为遏制日本的扩张,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能维持统治,就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共同对付日本。苏联和共产国际一方面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投机”,是“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另一方面主张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国内,国民党内出现了所谓“讨伐派”与“主和派”的对立,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何应钦被推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派”一度占了上风。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讨伐”张、杨。国民党内冯玉祥等抗日民主势力也积极主张和平解决,反对内战再起。地方实力派中多数呼吁“政治解决”,少数主张付诸武力。东北军、西北军多数官兵要求杀掉蒋介石。红军将士和根据地人民中的多数也主张严惩蒋介石,但又忧虑内战再起。

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经过多次慎重研究,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及其前途,指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

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个前途:或是由此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欢迎的;或是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而结束“剿共”内战,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更迅速建立起来,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这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爱国分子所希望的。

中共中央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一)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日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道路;(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政治上、军事上的积极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共同抗日主张,并切实做好防御准备,随时迎击亲日派和日军的武装进攻。

根据这个方针,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一)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将领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重申国共合作、团结救国的一贯主张,力主和平解决事变。19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发表通电,向全国各界表明共产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立场。(二)应张、杨的请求,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随时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迎击亲日派的进攻。(三)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和平谈判。

12月16日,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向张、杨阐明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可释放他回南京,这将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张、杨对中共的抗日救国诚意十分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22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一行到达西安。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开诚布公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六项和平协定,即:(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尖锐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业已达成的六项和平协议。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飞离西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迫使蒋介石下令撤离了包围陕甘宁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实际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基本结束了反共的十年内战,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卢沟桥事变

日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不断向南进逼,于1933年先后攻占山海关、承德及长城

各口,并逐步蚕食,大举进关。至1935年,日军侵占了河北、察哈尔省大部地区,策动汉奸进行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古还策动成立了所谓“蒙汉国自治政府”。1936年4月,日本军部制定了《华北指导方案》8月7日,召开了“五相”会议,以军部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讨论通过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结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提携,……作为对大陆政策的基准。”企图将整个中国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具体目标是首先攻占华北,与东北、内蒙联成一片,作为其在华的后方基地,进而侵占华中,达到吞并全中国的战略目的。

日本政府在侵略方针指导下,疯狂扩军备战,不断增加军费预算和军队数量,大力改善武器装备。同时,日本军部制定了具体的侵华作战计划,并规定了对华作战初期的目的是占领华北和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压制长江水域。随后,日军不断从国内和东北抽调大批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华北力量,在古北口修筑炮兵阵地,在北宁路屯驻重兵,随时准备入关支援作战。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也按作战要求配备,将其精锐第4混成旅团主力驻屯天津以及北平至榆关铁路沿线,并进行军事演习,不断向中国驻军挑衅。1936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丰台事件”,以1个大队的兵力占领了丰台这个北平西南的咽喉要地。1937年5、6月,日军先后在承德、天津和大连召开军事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叫嚣3个月内解决中国。之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建议:“从准备对苏作战考虑,必须立即给中国政府以打击,并认为‘进攻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至此,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如弦上之箭,进入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

此时,驻守平、津一带的是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为宋哲元,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5个独立旅,总兵力约10万人。友邻第53军驻保定、石家庄地区,第37军驻邢台、邯郸地区。面对日军随时可能发动战争的紧急局面,第29军自6月起加强了对北平市、郊的巡逻和防卫,在卢沟桥一带既设阵地也增加了兵力并实行了夜间警戒。6月26日起,对北平实行了夜间特别警戒,并指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卢沟桥和宛平县城是第29军特别重视的守备地区,由第37师第219团第3营驻守(自1936年春起一直驻防该地),营长为金振中。该营为加强步兵营,辖4个步兵连,配属重机枪连和轻、重迫击炮连各1个,计1400余人。金振中向冯治安表示:“本着师长的训示,以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则维护目前局势。但若日军强攻时,必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以维护本军名誉和报答全国同胞。”针对日军的嚣张气焰,金振中不断加强对官兵的爱国主义教育,并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战的决心和斗志。

此时,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西南的宛平城与卢沟桥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日军虎视眈眈,志在必夺。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冒雨在卢沟桥东北侧龙王庙一带组织演习,并紧张地构筑工事,还到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守军拒绝。日军异常恼火,相持10余小时后退回丰台。针对如此紧张气氛,第110旅旅长何基沣要求第219团:“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金振中营全体官兵早已愤慨万分,一致表示日军若要采取行动,一定誓死抵抗。金振中随即召开军事会议,

命令各连作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日军进入阵地前 100 米内即准射击。

7月7日上午,丰台日军又来到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演习,蓄意挑衅。下午,第8中队近600人,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下进至龙王庙附近,声称要进行夜间演习,并加紧抢修工事。日军的种种迹象,引起守军和宛平县政府的密切注意。天黑前,宛平警察局即将东门关闭,不准人员出入。暮色降临后,清水节郎指挥日军开始夜间演习。22时40分,宛平城东北日军演习地区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伪称1名士兵失踪,硬要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军严正拒绝。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和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当即与冀察当局交涉,声称:“仿佛听到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使演习部队失踪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搜索失兵。”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答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经我方同意即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们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心怀鬼胎的日军极为不满,公开威胁:如不同意,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随即通知冯治安和第219团团长吉星文,要求严密戒备,准备应战。

此后,日军又说失踪士兵已归队,要求双方一起调查失踪原因。正当中日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时,丰台增援的日军第3大队主力赶到,又无理要求守军撤出宛平城西门外,让日军进入东门,遭到吉星文的严辞拒绝。

8日2时,日军副联队长森田彻前往加强指挥。金振中在得知日军增援时,即抽调第10连申仲明排到铁路桥头协助李毅岑排防守。4时50分,大队长一木清直率第3大队主力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铁路桥扑来。申仲明站在桥头,阻止日军继续前进,日军突然开枪射击,申仲明不幸中弹牺牲。申仲明是地下共产党员,长期在士兵中宣传抗日主张,为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申仲明的鲜血激怒了守桥官兵,在李毅岑指挥下,为捍卫民族尊严和祖国领土,打响了保卫卢沟桥的战斗。守军2个排的兵力,面对数百名日军的进攻,毫不畏惧,挺身而出,6挺机枪和60余支步枪一齐射出了仇恨的子弹。当日军冲入阵地后,勇士们抡起大刀,与日军展开了肉搏。经15分钟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陷入了日军重围,官兵们奋勇搏杀,除4人外均战死在桥头阵地上。日军虽占领了龙王庙和铁路桥东侧,但在东河堤上丢下了100余具尸体,大队长一木清直也被击毙。

与此同时,日军一部兵力向宛平东门发起了进攻,并以炮火轰击城墙。

卢沟桥畔的枪声响起后,秦德纯、冯治安和第38师师长张自忠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向守军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在山东休假的宋哲元也及时致电:“扑灭当面之敌。”全军将士复仇火焰更加高涨。英勇的守军官兵冒着炮火,奋起抗击日军的进攻。广大官兵含垢忍辱已非一日,郁积胸中的怒火无缘发泄,战斗中个个奋勇当先。宛平城内军民沉着应战,待日军接近时,各种枪支急速齐射,日军伤亡惨重,多次进攻被击退。战斗持续1个多小时,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7时30分,日军华北驻屯军对天津各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动支援的命令,并令在秦皇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马上返回北平,决心扩大战事。9时30分,森田再度下令攻打宛平城。守军官兵严阵以待,日军枪声一起,当即以猛烈射击予以回击。13时,牟田赶到前线亲自指挥。15时50分,河边也赶到丰台督战。

进攻之日军遭守军顽强抗击,多次进攻未能得逞,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遂不断玩弄花招。16时,送信提出谈判;17时,又向宛平县政府发出通牒。牟田见威吓不

成,遂准备再次诉诸武力。18时05分,日军集中炮兵对宛平城实施火力突击,持续3个小时,将城内大部房屋摧毁,无辜居民惨遭祸殃。守军官兵抱定至死不退让一寸土地的决心,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日军集中兵力在9辆坦克引导下向宛平发起了冲击。守军不惧危险,用步枪、手榴弹近战歼敌,将日军的进攻击退。这时,何基沣率西苑驻军迅速开进八宝山附近,准备向大井村等地疾进,以截断日军的后路。日军顿感形势不妙(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天津援军在通州被阻),遂停止进攻,退缩待援。

当夜,吉星文亲率突击队,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在青纱帐掩护下,沿永定河两岸向铁路桥接近。近24时,突击队秘密逼近铁路桥,出其不意地冲入日军阵地,实施两面夹击。战士们的大刀带着复仇的寒光,在日军中闪烁开花。日军猝不及防,有的成了刀下之鬼,有的跪地求饶,“皇军”昔日的威风,被勇士们闪亮的大刀一扫而光。一名年仅19岁的突击队员,挥舞着大刀,连续砍杀日军13人,生擒1人,直至壮烈牺牲。突击队用原始的大刀,以伤亡大部的代价,将日军1个中队几乎全歼在铁路桥附近。这罕见的悲壮场面,连日军指挥官也吓得咋舌。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仍率部冲锋在前,吉星文死拉硬拖才将他劝住,后送到后方医院治疗。共产党代表专程到医院慰问,并赠送了“抗日先锋”银盾一枚。

9日凌晨,守军收复了失地,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消除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日军被迫撤回丰台。守军变被动为主动,军心为之大振。宛平军民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准备给日军以更大的打击。第29军官兵为抗日救国作出了榜样,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激动和振奋。一位作家当即赋诗赞颂第29军:

“怒吼吧,卢沟桥!
我们抗战的日子已经来到。
忍辱负重已非一日,
祈望和平亦非一朝,
……
如今已有廿九军的崛起,
用铁血回答着敌人的横暴!
……
让我们大家持着枪和刀,
……
把数十年来的仇恨一齐报。
……”

第29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颂和传唱。在之后的各个抗日战场上,扬起了《大刀进行曲》的雄壮歌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到来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卢沟桥的枪声，使中华民族如愤怒的雄狮般猛醒过来，咆哮着投入了抗击日军的斗争。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秦德纯：“誓为贵军后盾。”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当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团体开展救亡工作，全力援助第29军抗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乃至海外侨胞，纷纷投入了抗日御侮的斗争洪流。

7月9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守土应具备必死决战之决心，以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狡诈之惯伎，务以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南京政府着手筹划全面抗战事宜。

9日晨，收复失地的胜利振奋着第29军官兵，他们准备直捣丰台，尔后一鼓作气歼灭平津地区之日军。但就在凌晨3时，冀察当局本着南京政府“应战不求战”的指示，为防止事态扩大，竟同意与日方谈判，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日军在缓兵之计掩护下，做好了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冀察当局则屡受欺骗，仍做着和平之梦，使卢沟桥战事逐渐陷入被动局面。

11日，日军决定从东北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中抽调2个师团入关。16日，又增派4个师团、2个旅团到华北。17日，日本军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同时，日本政府已在国内动员40万军队，决心以武力灭亡中国。至16日，日军在华北地区已集中5个师团，兵力超过10万人。

面对日军步步进逼的态势，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呼声中，召集各界人士举行了庐山会议。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对卢沟桥事变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表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毛泽东曾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18日，日军在丰台设立最高司令部，香月清司任司令官，积极筹划发动新的进攻。19日，日军劫持塘沽码头设备。20日，日军炮轰宛平、长辛店，在炮火掩护下，步骑兵及坦克、铁甲战车两度向宛平城猛冲，企图夺占该地。守城官兵在吉星文指挥下，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将其击退，胜利地保卫了宛平城和卢沟桥。此时，增援日军6000余人到达天津。22日，日军飞机50余架飞抵天津。23日，除关东军增援部队外，另有8个师团计16万人正在来华途中。25日，日军对平、津等地达成了包围态势。

19日，宋哲元回到北平，由于其对日军抱有幻想，竟不顾日军屡次挑起事端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示和平诚意，既不肯完全对日妥协，又没有决心抵抗日军，处于十分矛盾的心理。他制定了“以守为守”的作战方针，又一次贻误了平津地区的有利

战机。同样,蒋介石在准备抗战的同时,也对日本抱有幻想,电令驻日使节晤见日本外相,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决之愿望”,平息中日争端。但答复却是:“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在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归于失败之后,平津局势加快趋向恶化,战火迅速蔓延开来。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紧急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通电政府请缨开赴华北前线抗日。全国其他党派团体纷纷紧急呼吁政府组织全国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最低限度的条件:第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第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第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蒋介石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变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庐山谈话,表明国民政府确立了准备抗战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将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险境。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面前由武装对抗逐步走向了合作抗日。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加快了两党合作的步代。七·七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在通电中明确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三项政治纲领和四项政治诺言。三项政治纲领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四项政治诺言是:“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9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蒋介石的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宣布两党不计前嫌,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及蒋介石对宣言发表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此,全国出现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抗战初期,团结抗战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释放了一批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政治犯,如救国会七君子等,同意八路军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如西安、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设立办事处,发行报刊。1938年春,新四军在相关城市也设立了十多个办事处。1937年8月、9日,国民政府先后颁布《战时军律》、《惩治汉奸条例》等,作出一些有利抗战的规定。人民群众抗日的政治热情日益高涨。

“八·一三”淞沪抗战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其繁荣的经济、林立集中的金融企业和发达的海陆交通,使之成为世界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利益的集中地。优良的港口和京沪、沪杭铁路贯通其间,又使上海成为通往内地的枢纽和首都南京的门户。

早在“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租界一带驻有重兵,并设立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且有大批军舰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游弋。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日本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码头等处,均暗中构筑了永备工事,在公大纱厂等地还修建了机场和军用仓库。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扩大侵略战争的同时,日本政府于7月11日决定动员15个师团的兵力,筹集55亿日元的经费,策划准备挑起上海战事,企图通过南北两面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南京政府屈服,以达到其3个月内灭亡中国之野心。此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包括陆军、海军陆战队、日侨“义勇队”等,共约1.5万人;海军第3舰队军舰约30艘,泊于吴淞口外和浏河口附近及黄浦江内;另有2艘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艇一部泊于舟山群岛附近海面;海军陆战队另有飞机200余架。

7月24日,日海军陆战队谎称1名士兵失踪,借口制造摩擦。8月6日,日军下令撤退在上海的日侨;7日,将长江下游的军舰调集上海附近;9日17时30分,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要藏驾车强行闯入守军虹桥机场,保安队哨兵喝令停车,日军开枪将哨兵打死;保安队被迫还击,日军官兵被击毙。随后,日军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撤走驻上海的部队和拆除工事,遭严正拒绝。之后,日军动员驻沪部队,并集中30余艘军舰汇集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动进攻。

因受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此时上海仅驻有保安总团和警察总队等。眼看上海战端将起,南京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8月11日,蒋介石密令驻防京沪线的京沪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立即率第5军开赴上海布防,并令在西安的该军第36师火速南进,准备保卫上海。当夜,张治中作了紧急部署:上海现有部队主力固守真如、闸北、江湾、市区中心及吴淞各要点,一部在南市、龙华、沪西等地警戒;第87师主力铁路输送后在大场、江湾以北地区展开,准备对杨树浦地区之日军发起进攻,一部协同保安总团固守吴淞,并控制罗店、浏河;第88师铁路输送后,在真如、大场地区展开,准备向闸北地区之日军发起进攻;独立第20旅主力进至南翔附近待命;第87师第527团为总预备队,配

置在南翔附近，军指挥所于 12 日上午由苏州进至南翔。12 日 16 时，张治中指示第 39 军军长刘和鼎，指挥第 56 师、江苏保安第 2、第 4 团，负责浏河至江阴的江防。

淞沪会战，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闸北、杨树浦争夺战

8 月 13 日拂晓前，张治中完成了上海地区的作战部署，随即请示蒋介石，准备向日军发起进攻。蒋复电：“希等待命令，并避免小部队之冲突。”⁹ 时，日军数千人由第 3 舰队司令官谷川清指挥，在舰炮火力支援下，率先发起了进攻，主力指向通衢车站至八字桥一线，企图切断大场与闸北的联系，包围守军于北站，当即遭第 88、第 87 师抗击，遂退据原地，固守待援。当夜，蒋介石决定组织反击，令京沪警备司令部改为第 9 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准备于 14 日拂晓发起进攻，令张发奎为第 8 集团军总司令，担任杭州湾北岸地区守备，第 18 军迅速向吴县输送，空军准备出动协同作战，海军即刻封锁江阴江面。

张治中受命后，迅速进行作战准备。尚未行动，蒋介石又改变决心，于 15、16 日接连下令：“仅作进攻准备，不得妄动！”因而，各部队仅有零星小战斗。

15 日，日本政府从国内派遣 2 个师团的兵力到上海，并任命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统一指挥进攻上海。17 日，张治中令所部发起进攻，由于日军工事坚固，在炮兵和舰炮火力支援下顽强抵抗，张部进攻未奏效。18 日，蒋介石又令：“暂停进攻。”19 日起，张治中指挥所部再度发起进攻，并以刚到的第 36 师加入战斗，重点指向汇山码头，直插黄浦江边，企图将日军割裂，尔后席卷歼灭之。20 日 24 时，第 36 师第 216 团向汇山码头发起进攻，分两路齐头并进，团长胡家骥在第一线指挥，全团官兵以英勇无畏的气概，沿途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胡家骥身先士卒，冲在队伍最前面，多处负伤仍坚持指挥，突破日军多次阻击，直逼汇山码头。日军一部争先恐后向外白渡桥逃窜，并向桥南英租界的英军投降。第 216 团乘胜追击，向汇山码头发起猛攻。因火力较弱，无法摧毁码头坚固的大铁门，情急之中，胡家骥率先爬上铁门，官兵们相继跟上，遭日军据点内猛烈火力的扫射，官兵多人壮烈牺牲，进攻受挫。第 216 团苦战无援，且联络中断，被迫退守唐山路附近地区。至 22 日，又撤回引翔乡，双方形成对峙。战斗中，第 216 团官兵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以劣势装备歼灭日军 400 余人，自身伤亡 570 余人。第 9 集团军由于进攻面过宽、兵力分散，而日军工事坚固、防守顽强、火力猛烈，至 22 日，进展甚微，与日军形成对峙。23 日，日军分别在张华浜、吴淞、川沙口等地登陆，致使第 9 集团军腹背受击。24 日夜，第 9 集团军全线转入防御。

中华战鹰

淞沪会战前，国民党空军共有 9 个大队，飞机 250 余架，主力集中在江西南昌青云谱。8 月 4 日，第 5 大队调往扬州、句容。13 日夜，蒋介石与第 5 大队直通电话下令：“在长江中的日本 50 艘军舰和轮船，正向东逃跑。你们大队立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出动追击，加以歼灭。若已停在黄浦江里的，则不准轰炸。”飞行员们听到出击命令，个个

情绪激昂。大队长丁纪徐当即令中队长刘粹刚率机 18 架各带一枚 500 磅炸弹执行任务。由于国民党行政院内汉奸告密,日军得到情报后匆忙将长江内的舰船乘夜撤离。当第 5 大队飞机超过江阴要塞沿江向东搜索前进时,一直没有发现目标。失望之际,发现吴淞口东之白龙港口有日舰 1 艘,刘粹刚立即下令成战斗队形,接着连续俯冲投弹。副中队长梁鸿云所投炸弹首先命中日舰尾部,之后,各机陆续投弹,日舰顷刻间被炸得无影无踪。

14 日,第 4 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与日机在杭州上空进行了激烈空战,大长了中国空军的志气。该大队原驻河南周家口,会战一开始,高志航即单独驾机飞往南京请缨杀敌。空军总指挥周至柔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令第 4 大队转杭州笕桥机场待命。高志航以“十万火急”电报将命令转达属下第 21 中队中队长李桂丹,第 4 大队立即起飞赴杭州。此时,日海军“空中王牌”木更津航空队 100 余架飞机连续在江、浙两省频繁实施轰炸。高志航只身先到杭州笕桥,刚下飞机即听到空袭警报,从台湾出发的木更津航空队即将到来。日机来袭前几分钟,正当高志航心急如焚之际,第 21、第 23 中队相继着陆。当时,南京航委会的命令是不抵抗,待命。高志航则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家仇国恨,更待何时!即令再次起飞,迎击来袭日机。此时,日机 8 架进入了杭州上空,准备实施轰炸。高志航率先截击,首先开炮,正是冤家路窄,正好将日军带队长机击落。接着,李桂丹又击落 1 架日机。各中队、分队四面出击,经 10 分钟激战,击落日机 6 架,2 架受伤后逃窜。第 4 大队旗开得胜,首战告捷,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木更津航空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事后得知,木更津航空队队长因此次失利而自杀身亡。辉煌战果,轰动全国 30 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战后,蒋介石下令嘉奖,并决定 8 月 14 日定为国民党空军空军节。

15 日,木更津航空队集中兵力再次袭击杭州,第 4 大队当即起飞迎战。高志航等在仅休息一两个小时、体力消耗极大的困难情况下,顽强拼搏,英勇杀敌,又一次大获全胜,创造了参战飞行员都有击落日机的纪录,其中分队长乐以琴击落日机 4 架。战后,杭州市长周象贤率政府官员和大批群众前往祝贺,并赠送了大批慰问品。南京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通令嘉奖,并宣布凡参战的飞行员 8 月份薪水一律发双饷。空中英雄高志航及第 4 大队成了举国上下人人皆知的抗日楷模。

当时,国民党空军有“四大金钢”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而日本空军则有号称“四大天王”的 4 名骄子。在淞沪会战中,“四大金钢”先后将“四大天王”击落,其中 3 名击毙,1 名被俘。被俘“天王”原系杭州笕桥航校的日籍教官,中国飞行员中不少是他的学生,被俘后,飞行员们都以师生之礼相待,使他十分感动。他对中国空军很佩服,曾说:“日飞行员发誓时都说,我要做了亏心事,出门就碰上高志航!”他还主动帮助出谋献策。他说:“你们可以炸‘出云号’航空母舰,但必须牺牲一人一机,把中国飞机涂改国徽,我把信号交待与你们,发出信号,航空网即开放,人机即向烟筒窜进,与舰同归于尽,才能完成任务。哪一位愿去,请举手!”老学员们都举起手来,争相愿意前去炸舰。他触景生情,无限感慨,认为中国必胜,日本必亡。他说:“好吧,你们把证章都交给我,摸到谁,谁去。”结果“四大金钢”之一的乐以琴的证章被摸中,毅然担当了此项有去无回的重任。乐以琴驾起带满炸弹的飞机,临近“出云号”时即发出了信号,日舰果然丝毫没有怀疑。乐以琴瞬间即以人机直入母舰尾部烟筒,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出云号”受重伤

后狼狈逃窜,空军英雄乐以琴大义凛然,为国捐躯。

杭州空战后,日军又调来佐世保航空队参战。国民党空军频频出击,与日机殊死搏斗。第2大队第11中队分队长沈崇海,是清华大学毕业后报考空军的,在第3期轰炸科毕业时考核成绩名列第一。接受任务后率机6架出击,飞临长江口时发现日舰,正待突击,突然座机发生故障,当即决定驾机撞毁日舰,并令后座任云阁跳伞。但任坚决表示要与沈同生死,于是沈崇海加大马力推下机头,穿过日军高炮火网,带着1枚800磅炸弹俯冲而下,与日舰同归于尽,谱写了一曲视死如归、英勇抗日的壮歌。

8月中旬,第24中队受命出动6架飞机,各带1枚500磅炸弹,轰炸天通庵日军司令部。该中队立即进行战斗准备,见习官闫海文尚未被列入出动名单,他含泪请战,分队长王倬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作为2号僚机随队出击。到达目标上空时,飞行员们冒着日军密集的高炮火力沉着应战,炸弹大部分命中目标。正准备返航,闫海文的座机突然被日军高炮火力击中,机翼被打掉一个,闫被迫跳伞,却落在了日军阵地天通庵公墓内。日军发现目标并从四面包围过来,闫海文着陆后就地卧倒,伪装已死。待日军将到身边时,突然翻身而起,迅速抽出2支自卫手枪,左右开弓连续射击,当场击毙日军7人,尔后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太阳穴。

沈崇海、乐以琴、闫海文的壮烈牺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无比崇敬,就是日军也倍加敬仰。闫海文牺牲后的第2天,日军向川大将在汇山码头向海军陆战队训话时说:“过去在日俄战争时,大和民族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安在?现在已被中国的沈崇海、闫海文夺去了,这值得我们钦佩。对这个英雄,我现在命令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海军军礼进行礼葬!”随即指派1艘军舰,在闫海文的遗体上覆盖中、日两国国旗,驶往黄海礼葬。

8月下旬,日军登陆兵力不断增加。国民党空军多次袭击了登陆日军及日舰。第5大队18架飞机从扬州起飞,各挂延期引信炸弹12枚及配备轻、重机枪各1挺,于拂晓时飞临上海。日军正在登陆,各机降低高度,乘日军立足未稳,发起突然袭击,毙伤其1000余人,第5大队无一伤亡。24日,第4大队20架飞机从杭州起飞,在张华浜、蕴藻浜上空实施轰炸、扫射,进攻日军遭重大伤亡。

张华浜、吴淞、川沙口反击战

8月23日,日军第3、第11师团和重藤支队分别在张华浜、川沙口附近实施登陆,尔后并肩向西南方向突进,企图包围歼灭上海西北地区的守军主力,进而攻占上海。

张治中与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商讨后,决定巩固阵地,以一部兵力抗击进攻之敌,主力控制为预备队,另以一部兵力乘登陆之日军立足未稳实施反击。

张华浜地区 23日3时,日军第3师团先遣部队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在张华浜车站东侧江岸登陆。守军警察大队一部兵力虽经抗击,未能阻止日军扩张。天亮后,登陆日军已达3000余人,并不断扩张和攻击前进。17时,第87师第261旅率1个团增援,据守北泗塘河西岸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25日1时,第87师指挥第108旅发起反击,将日军压缩在陈家宅、丁家巷、华家巷一线,双方呈胶着状态。29日,日军在虹口、杨树浦地区又增兵5000余人,并于20时发起了进攻。激战至9月5日,守军退守狄家港、横浜、虬江桥地区。当夜,日军第3师团1个支队在虬江码头登陆。第61师1个团阻击

登陆日军的发展进攻,连续战斗至9日,因遭日军海、空火力猛烈突击,伤亡较大,22时转移至沈家行、徐家宅东侧一线。11日,张治中得知左邻第15集团军当面之日军已进至杨家行西侧及罗店地区,使第9集团军成了孤立突出态势,遂决定当晚开始向蕴藻浜南岸阵地撤退,至13时转移完毕。至此,张华浜地区和上海公共租界地区均被日军占领。

吴淞地区 8月23日,日军为配合第3师团先遣部队登陆,以一部兵力在吴淞镇南侧实施了登陆。第87师1个团经激战后,一部固守吴淞镇,一部退守同济大学。24日,第98师向吴淞、宝山实施反击,傍晚将日军压缩到江边,歼其300余人,解了吴淞镇之围;另一部向宝山城立足未稳之日军实施反击,激战1小时,收复宝山,将日军300余人大部歼灭。27日19时,第6师第17旅发起反击,并以第18旅占领北泗塘河西岸阵地阻击日军渡河。第17旅激战至9月1日18时,伤亡大部,被迫撤退。2日晨,日军攻占吴淞炮台。3日,日军第11师团天谷支队在吴淞北侧、沙龙口登陆。5日拂晓,日军在30余辆坦克配合下,沿军工路向第6师阵地猛攻;7时20分,日军第11师团浅间支队向第17旅左翼实施突击。第6师腹背受击,于17时撤至煤油浜及其以南阵地继续坚守。6日,日军第9师团及第3师团后续部队先后在吴淞炮台附近登陆,该地区已有近2个师团的兵力。

宝山、月浦、罗店方向 8月23日拂晓,日军第11师团先遣部队在川沙口登陆。该处仅有第27师的少量骑兵负责警戒,日军未遇抵抗即顺利登岸。午后,日军3000余人在石洞口登陆,随后向宝山、月浦方向攻击前进;川沙口登陆之日军则向浏河进犯,并占领了罗店。张治中、陈诚当即指挥部队实施反击。第11师进至罗店西南,不顾日机轰炸,立即向罗店发起攻击,歼灭日军100余人,收复罗店。26日晨,第98师经英勇奋战,收复了狮子林。27、28日,双方在罗店地区反复争夺,守军遭日军航空兵、炮兵猛烈火力突击,损失较大。9月1日9时,日军第11师团浅间支队在火力支援下,向狮子林阵地发起猛攻,于14时重占狮子林。3至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不断发展进攻。此时,宝山县城守军为第98师第583团第3营,在营长姚子青指挥下,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该营孤军奋战,陷入了日军的重围。日军飞机、舰炮连续向宝山城实施了猛烈突击,并以战车掩护步兵发起了多次冲击。守城军民在姚子青指挥下,同仇敌忾,顽强抗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5日晚,姚子青致电师部:“誓本与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日军久攻不克,6日向城内发射了大量硫磺弹,顿时烟火四起,全城房屋尽被大火烧毁,姚子青营身处危城仍拼力奋战。之后,日军用重炮轰毁城墙,冲入城内,姚子青率部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巷战,直至全营壮烈殉国,宝山城失陷。

10日7时,月浦东北地区日军兵力又增加2000余人。第98师顽强奋战,将日军击退,但自身伤亡严重。至12日,日军各登陆场连成一片,正面已达40公里,纵深9公里。守军的顽强抗击和积极反击,使日军2个师团的兵力陷于苦战,伤亡达4000余人,进展十分迟缓,不得不向东京求援,请求继续增加兵力。

北站、江湾、罗店阵地战

9月12日,登陆之日军已进至江湾、庙行、颜家角一线。在此之前,第3战区根据蒋

介石的指示,于9月6日制定了第2期战役计划,决心为保卫上海,巩固南京,达到多个围歼登陆之敌的目的,不能达成时,则依情况逐次在后方占领阵地,乘敌陆、海军不能协同之际,一举而歼灭之;万不得已时,则退守后方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求决战。

北站、江湾方向 11日,第9、第15集团军在与日军直接接触下,乘夜暗撤至北站、江湾、新镇地区既设阵地。12日,日军第9师团及第3师团主力在地、空火力掩护下,沿宝浏公路发起了进攻。守军顽强坚守,与日军死打硬拼,阻止了其发展。第36师第212团坚守江湾地区,其中复旦大学是阵地的突出部,群众和学生奋力支援,官兵热血沸腾,信心倍增,誓死与阵地共存亡。日军多次向复旦大学图书馆阵地进攻,均被击退。一次,日军在炮火准备后,以3辆坦克掩护步兵发起了冲击。恰逢该处的战防炮损坏送后方抢修,紧急之际,只见一名高个子战士挺身而出,并对近旁的几名战士说:“赶快把手榴弹都集中起来,捆在我的腰上。”高个子将绑腿布拆下,把所有的手榴弹都捆在了自己腰间,尔后爬出堑壕,越过铁丝网,向日军先头坦克滚爬而去。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日军坦克在火光浓烟中当即斜瘫着横在了路边,随后的坦克见势不妙,调头就跑,日军步兵也紧接着纷纷逃窜,日军进攻又一次被打退。由于战斗中伤亡很大,这位高个子战士已无人知道姓名,只知是位副班长,成了中华民族奋勇抗日的无名英雄。

14日,第3战区调整了部署,第1、第4、第66、第73军及第32师编成第19集团军,薛岳任总司令,归左翼军指挥,部署在蕴藻浜北岸至罗店、月浦地区。15日,日军突进至杨木桥附近,守军第1军损失严重,第66军教导旅和第159师先后参战,顽强抗击日军进攻。至17日,经反复争夺,将日军击退。20日,蒋介石亲自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21日,张治中调任,朱绍良接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27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增援的第101师团在吴淞附近登陆后也加入了战斗。至10月1日,日军突入太平桥、殷家角守军阵地,一部进至中心阁、南金六房地区,威胁了刘家行、罗店的侧后安全。双方在陆家桥、刘家行附近苦战。2日,日军发起全线进攻,左翼军顽强抗击,虽遏止了日军的攻势,但自身伤亡颇大。

罗店、浏河方向 9月13日起,日军第11师团主力沿宝罗公路及其两侧发起连续进攻。守军第14师、第66军教导旅、第18军等部顽强苦战,伤亡较大,至18日,第66军主力接防梅宅以南阵地;19、20日,新到的第4军接替了部分防守阵地。第66、第4军虽系新锐援军,但由于是正面填补漏洞,接连遭重大伤亡仍无济于战局。22日,第4军遭日军猛攻,被迫退守樊家桥、金家宅地区。26至30日,日军第11师团连续发起进攻,企图策应刘家行方向向南突进,均被守军击退。10月1日,守军撤至蕴藻浜南岸及广福、施相公庙一带阵地。3日起,双方形成对峙。

6日,日军第13师团在宝山附近登陆;13日,主力在江家宅、陈家行正面实施了强渡。与此同时,守军也不断增援兵力,第19、第26师及第20、第48军、第7军1个师先后到达战区。第20军第133、第134师在10月初到达上海后,在蕴藻浜地区与日军连续激战7昼8夜,尸如山积,来不及掩埋,只好堆在前面充当胸墙据枪射击,抗击日军的进攻。各团都有共产党员,除英勇作战外,还积极宣传,动员民众,慰劳伤病员等。

14日,鉴于蕴藻浜地区兵力增多,第1、第48、第70军及第171师编为第21集团军,廖磊为总司令,隶属中央军,担负蕴藻浜南岸防御任务。经连日激战,至18日,第21集团军全力死守,与日军相持于陈宅、西塘桥、陈家行地区。其间,增援的第16、第52、

第53师到达战区。

20日,陈诚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准备组织实施反突击,企图击破渡过蕴藻浜之日军,并进而恢复刘家行、罗店原阵地。陈诚迅速进行了部署,建立了多路攻击军。21日19时,炮兵开始火力急袭;20时,各路攻击军实施反击。由于均采取正面硬顶的战术,加之各部准备仓猝,缺乏夜战经验及防毒、渡河等器材,且新到的部队不熟悉地形,因而反突击中有些部队迷失方向,引起混乱,有的甚至自相冲突,一夜反突击仅前进1公里,即被日军阻止。22日,日军在昼间发起攻击,并施放烟幕;第1路攻击军误以为是毒气,顿时混乱不堪,日军乘势猛冲,夺回阵地,进而又攻占了北侯宅、赵宅等地。23日,陈诚眼见部队伤亡严重,且陷于混乱,遂令各部撤回庙行、大场等地,继续防守,反突击失利。

25日,日军集中火力对守军阵地实施猛烈突击,随后发起冲击,攻占了洛河桥宅、小石桥、朗公庙等地。当夜,第3战区组织中央军和左翼军各一部实施反击,也未成功。26日4时,日军突破大场以北中央军防守阵地,并以炮火向大场西南守军阵地实施突击;尔后,步兵在30余辆坦克引导下发起冲击。守军不支,大场失守。午后,日军分三路向南突进。入夜,中央军退守苏州河南岸阵地,左翼军退守江桥镇、唐家桥一线阵地。28日,日军前进至苏州河北岸。31日拂晓,日军在强大火力和烟幕掩护下强渡苏州河,并在陈家渡、吴家渡南岸抢占了渡场。守军虽组织了反冲击,但进展甚微。11月1日,广福当面之日军第13师团也发起了强渡进攻。当晚,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奉命兼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赴青浦指挥苏州河南岸防御作战。2日,蒋介石再次调整了部署,取消了中央军,统归右翼军指挥。4日,日军一部在周家桥强渡苏州河,被第3师击退。

根据情报,日军1个师团准备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但蒋介石为保住上海,3日仍命令抽调部队构筑徐家汇、虹桥机场、翟诸镇至纪王庙间预备阵地。5日起,日军飞机频繁对苏州河南岸守军阵地实施轰炸,双方还进行了激烈的炮战。7日,日军一部突破守军部分阵地,进至八字桥、施家衙一线。至8日,双方形成对峙。

八百壮士

10月26日大场失守后,江湾、闸北守军陷于日军的两面包围。第3战区令第88师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留部分兵力在闸北牵制日军。第524团团副谢晋元自告奋勇担当重任,当即被委任为团长,指挥1个加强营(第1营为主,辖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迫击炮排,计410余人),对外仍用团的番号,于当晚转移至“四行”仓库(大陆、金城、盐业和中南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坚守。谢晋元对官兵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四行仓库,是苏州河北侧的一幢6层楼的坚固高大建筑,长120米,宽15米。谢晋元率部占领仓库后,迅速部署了兵力、火力,大门用仓库内成堆满袋的小麦、大豆等堵死,所有的窗户都用麻袋装土堵住并留有射击孔,于27日黎明前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

27日5时,日军由东向西蜂拥而来,如入无人之境,接近四行仓库时,尚不知该处还有守军。谢晋元一声令下,全楼火器突然射击,日军尚未搞清方向,即被毙伤200余

人。待后续部队到达后,日军集中兵力、火力向四行仓库发起了进攻。谢部沉着应战,以密集火力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击退。10时,日军发起第二次猛攻,以火力封锁大楼东南角,以重兵包围西北角。谢晋元令停止射击,待日军前进至墙跟时,楼内集束手榴弹纷纷投出,落地开花,日军死伤惨重,激战至12时,再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13时,日军在大楼的西北角纵火,将附近民房烧着,并发起了第三次进攻。在滚滚浓烟之中,谢晋元指挥官兵一面阻击日军,一面利用仓库内的灭火器材扑灭烟火。至17时,大火被扑灭,日军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停止了进攻。经整日激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谢部仅阵亡2人,伤4人。当晚,1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驻军送进一张纸条,问及四行仓库守军实力,谢晋元不假思索地答复300人。之后,“八百壮士”的英名传遍了整个中国和全世界。

28日7时,日军飞机在四行仓库上空盘旋侦察并企图投弹。大楼顶部守军的高射机枪一阵猛打,日机未敢低飞和俯冲,狼狈逃窜。8时,日军发起了第四次进攻。谢部为节省弹药,待日军接近时才掷手榴弹,打退了日军的进攻。17时,日军第五次进攻也被击退。谢部坚守两昼夜而粒米未进。上海救亡团体通过英租界驻军协助,将食品装进布袋,用绳子抛向大楼墙跟,守军在楼底层挖墙洞抢运食品,虽阵亡3人,但全体官兵倍受鼓舞。当晚,谢晋元和第1营营长杨瑞符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号召:“爱国军人要抱定必死之决心,血战到底!不成功便成仁!并要求大家留下简短遗书通知家中,写好后集中起来设法送出去,以表示不惜牺牲之决心。”

29日,日军已将苏州河以北地区全部占领,但位于苏州河北侧的四行仓库仍巍然屹立,谢晋元还率部粉碎了日军的第六次进攻。22时,女童子军队员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冲过苏州河,将一面国旗献给守军。谢晋元激动不已,含泪对她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止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并下令立即升旗。30日4时,人们看到了庄严的国旗已在四行仓库楼顶上迎风飘扬。日军一发现,即疯狂地发起了第七次进攻,并以机枪火力向中国国旗猛烈扫射。谢晋元边指挥战斗边大声喊道:“兄弟们!我们要和国旗共存亡,誓死不投降,狠狠消灭敌人!”此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及中外人士在苏州河南岸的许多大楼上观战,并挥动帽子、手巾,向守军呼喊、致意,有的还把观察到的日军集结地点、行动情况等用大黑板写上,向守军报告敌情。谢部官兵更感使命之重大,楼顶上的官兵激动万分之际,向隔河群众振臂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万岁!万万岁!”

日军进攻持续至14时,抛尸数百,却寸步难进,日机多批终日在空中盘旋,被守军高射机枪的猛烈火力击退5次,始终未敢俯冲投弹。日海军还派出2艘小艇,满载陆战队士兵,由黄浦江驶入狭窄的苏州河,企图封锁守军与英租界间的交通线。租界内群众及时给英驻军报信,后在英军交涉下,日海军陆战队不得不快快而退。战斗结束后,许多中外记者到四行仓库采访,“八百壮士”众志成城、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引起了极大轰动,受到国内、国际的普遍关注和尊敬。当时,有人编了一首《八百壮士之歌》,守军与群众隔河高歌、同声合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战东战场,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飘扬!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我们的行动有力,我们的志气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赶

上那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根据蒋介石命令,谢晋元率部于30日24时开始撤离四行仓库,向英租界转移。日军发觉谢部企图后,以探照灯和机枪火力封锁守军必经的西藏路,并全力对四行仓库实施火力压制。谢部仅遭微弱伤亡,于31日2时全部安全突围,撤到苏州河以南。

“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达四昼夜,全体官兵同仇敌忾、顽强奋战,粉碎了日军优势兵力火力的连续七次围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击毙日军200余人,伤数百人,击毁装甲战车2辆;谢部仅伤亡37人,胜利地完成了使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忠勇无畏、不屈不挠、英勇抗日的举世称颂的壮歌。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不幸被日伪收买的暴徒刺杀殒命。28日,蒋介石发出通电:“谢晋元同志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并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抗战胜利后,为纪念民族英雄谢晋元的不朽功勋,上海胶州路被命名为“晋元路”。

上海沦陷

11月初,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及第3战区长官部对日军在杭州湾北岸可能登陆的企图,未能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并适时谋求对策,而将作战重心放在了苏州河南岸的防御。杭州湾北岸之独山、全公亭、金山卫、漕泾镇至柘林80余公里地段的海岸防御,原部署兵力为右翼军的第62、第63师和独立第45旅,却在11月3日前将主力调进了上海附近,该处仅留第63师第373团防守。日军为迅速解决淞沪战事,并进而攻占南京,遂由国内和华北急调部队,准备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企图迂回松江、青浦,截断京、沪、杭间联系,配合正面部队包围、歼灭淞沪地区守军,迅速攻占上海,尔后向南京发展进攻。

4日夜,日军第6、第18师团及国崎支队海运接近杭州湾。5日拂晓,以浓雾作掩护,用小汽艇、橡皮船等秘密进至全公亭、金山卫、金山咀、漕泾镇等处沙滩;天明雾散后,日机数十架轮番向上述地区守军岸滩阵地实施了火力突击,舰炮火力也不断泻向海岸阵地。守军兵力薄弱,日军仅遭小规模零星抗击,乘隙顺利登陆。第3战区得知日军侧后登陆的情况后,急令第62师、第186旅折返柘林,独立第45旅也向南桥急进,并令第79、第107、第11师等部增援,但为时已晚。援军在开进途中,遭日军空、地火力拦击,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赶到,已难以挽回危局。5日黄昏,登陆日军先头部队到达米市渡,守军未抵抗即撤退,日军迅速在米市渡、得胜港等处顺利渡过了黄浦江。至8日,登陆日军进逼松江城郊;一部兵力在20架飞机支援下,向枫泾镇发起了猛攻,切断了苏嘉路。9日,松江城失陷,直接威胁上海守军的侧后安全。至此,日军已达成了迂回包围上海守军的企图。

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成功后,上海正面部队同时发起了强大攻势。守军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地位,军心十分动摇。8日21时,第3战区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下达了撤退命令,规定当夜开始行动。各部队毫无准备时间,以至集团军以下各级司令部连命令、计划都来不及拟定和下达,又是在与日军直接接触的情况之下,于9日开始仓猝向西撤退。9日1时,苏州河南岸的右翼军左翼部队(原中央军)首先向青浦、白鹤港之线

撤退 右翼军也随之西撤。日军当即在优势航空兵支援下,以第 9、第 11、第 13 师团沿京沪铁、公路跟踪追击,并以海军沿长江实施超越追击。

南翔经昆山、吴县至无锡一带系水网稻田地区,河流纵横交错,除公路外,部队运动十分困难。西撤的国民党军均沿京沪公路争先恐后抢道开进,公路上拥挤不堪,车辆堵塞,加上日军航空兵的不断袭击,各级指挥官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控制。此时,日军又编组了几个小规模挺进部队,渗透至南翔至昆山公路附近袭扰,致使西撤的国民党军更趋混乱,溃退中死伤、逃亡不计其数。12 日,上海失陷,更使尔后的正面战场抗战呈现了危机严重的不利局面。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初期投入兵力较多,也是伤亡较大的一次战役。日军先后增兵,共动用了 10 个师团,战车 300 余辆,舰艇 130 余艘(其中航空母舰 3 艘,占其总数的一半),飞机 200 余架,总兵力达 22 万余人,作战中伤亡 6 万余人。国民党军先后动用 56 个师、7 个旅,海军 2 个舰队,飞机 200 余架,总兵力达 60 余万人,作战中伤亡达 25 万余人。

太原会战

内长城一线关隘狙击战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四面环山,东有恒山、太行山为屏障,北有大同、雁门关及内长城各关隘,地势险要,是华北天然堡垒。东进可控制河北,南下则可逐鹿中原。省会太原,位于汾河东岸,是正太、同蒲线之交会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战略重镇。固守山西这个北战场之战略要地,可利用其居高临下之势,对侵入华北平原的日军侧后造成严重威胁。日军为确保平津地区的稳定,解除侧后之威胁,图谋进一步南侵,准备首先控制山西太原地区。

日军占领张家口等地后,一面向绥远、包头方向进攻,一面为控制整个华北,将进攻锋芒指向太原,企图首先夺占太原及整个山西,尔后席卷中原,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1937 年 9 月,日军先后占领大同、石家庄后,以第 20 师团主力和第 14 师团,分由井陉及横口车站指向娘子关;以第 5 师团及第 9、第 21、第 32 旅团共约 5 万余人,由灵邱、平型关分别指向原平,采取分进合击的手段进攻太原,企图击破国民党守军,控制整个华北战场。此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大同后,以独立混成第 1 旅团进占威远堡,经左云北上进攻绥远;混成第 15 旅团沿同蒲线南下,指向太原。华北方面军第 5 师团由宣化、涿鹿南下,占领了察南要地阳原、蔚县,准备向广灵攻击前进。

国民党军为确保太原及山西省,以第 2 战区(阎锡山部)主力第 2、第 6、第 7 集团军等部,防守娘子关及内长城一线各要点,采取纵深疏散配置,多线设防,节节抗击日军的进攻,以争取时间和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同时,调第 14 集团军(卫立煌部),星夜向太原以北地区集中,准备在忻口附近地区歼灭南犯之日军;由汤恩伯指挥第 17 军及第 73 师,部署在晋察交界的广灵地区,阻击日军西进;军委会为确保山西天然堡垒,令陈栖霞

率空军 4 个中队北上支援作战,并确定朱德的第 18 集团军(八路军)归第 2 战区指挥。

9 月 12 日,蔚县日军第 9 旅团向广灵正面之安头山、洗马庄守军第 73 师防御阵地发起了进攻,并以一部兵力进袭涞源。阳原日军第 21 旅团向广灵西之火烧岭守军第 84 师阵地发起进攻;另以第 41 联队向广灵侧翼之尹家店实施迂回,企图切断守军退路。第 73、第 84、第 21 师在汤恩伯指挥下,奋力迎战进攻之日军,因守军伤亡过大,上述阵地于 13 日先后被日军突破;14 日,广灵失守,守军退至广灵西南松树山、乱岭山及内长城各关隘一线继续防守。15 日,汤恩伯奉命调往第 1 战区,阎锡山令第 6 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接替广灵方向作战指挥,并及时调整了部署。右翼为第 33、第 17 军,由第 6 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指挥;左翼为第 61、第 34、第 35、第 19 军,由第 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第 71、第 72 师为预备队。各防守部队在灵丘南之方山地、恒山、汶云口、北楼口、狼山谷、茹越口、广武、阳方口、利民堡一线占领阵地,预备队位于繁峙、代县地区。

日军占领广灵后,迅速派出部队向灵丘、浑源实施追击。第 73 师在广灵以南地区与日军激战数日,节节抵抗,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自身伤亡惨重。涞源日军向西增援,协同广灵以南日军夹击守军,守军腹背受击,处境艰难。20 日,灵丘失守,守军向平型关一带转移。与此同时,日军第 21 联队于 17 日占领浑源。

平型关为内长城南端之重要关隘,灵丘至大营公路从此通过,日军由灵丘向雁门关进攻,此处是必经之路,守军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日军的进攻。21 日,第 73 师占领了平型关南马跑泉至东跑池南侧一线,第 17 军占领了东跑池至西河口西北高地一线,第 15 军占领了大坪村至北楼口一线。22 日,日军第 5 师团第 20 旅团主力 3 个大队及炮兵部队共 5000 余人,沿灵丘至大营公路西进,其先头部队到达平型关时,守军奋起抗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23 日拂晓,日军主力到达,向公路两侧守军阵地发起猛攻,并以战车数十辆沿公路实施进攻。此时,公路两侧守军仅有独立第 8 旅的 2 个连,经一夜苦战,因后援不继而全部牺牲。日军继续攻击前进,遭接防部队第 17 军、第 73 师等部阻击,于 24 日午后将日军击退,并恢复了东、西跑池及附近高地,守军伤亡也很严重。与此同时,阎锡山令傅作义率预备队增援,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地区作战。

日军第 21 联队为配合主力进攻,于 21 日从浑源南下,企图由龙嘴村、大坪村直捣大营,切断平型关守军之退路。该部日军在龙嘴村附近遭第 15 军阻击,经两日激战,未能得逞,遂增援正面作战。24 日,傅作义率 2 个旅到达平型关。日军增兵 5000 余人,分别向东、西跑池、1886.4 高地、团城口、讲堂村等地发起猛攻,激战终日,守军屡挫日军攻势,因伤亡过大,1886.4 高地及东、西跑池被日军占领。傅作义计划由第 71 师、独立第 8 旅于 25 日拂晓发起反击,但日军在团城口方向攻势甚猛,将守军第 17 军击退,且攻占了团城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要点,准备反击的部队被迫组织防御,激战至中午,将日军右翼部队击退,并夺回部分阵地,第 61 军军长陈长捷率第 72 师乘机进入交战,守军发起反击,夺回鹞子涧一带阵地,并将日军包围在东、西跑池之深沟内。

此时,第 18 集团军第 115 师奉命向平型关日军侧后之东河南、蔡家峪发起进攻,于 25 日在平型关以东小寨村伏击日军第 5 师团后续梯队及辎重队,全歼其 1000 余人,摧毁其汽车 80 余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切断了平型关地区日军与后方的联系,使该部日军陷入了被包围的困境。

同蒲线上日军第15旅团攻占怀仁后,为协同第5师团作战,经应县向内长城一线发起了攻击。由于雁门关地势险要,守军戒备较严,遂转兵向茹越口攻击。茹越口位于交通要冲,但守军兵力薄弱,一旦失守,则平型关守军之后路将被切断。第2战区急令:第6、第18集团军及预备队迅速击破进攻平型关之日军;第7集团军第34军抗击茹越口地区日军;其余各部坚守阵地,待主力转移后实施反攻。

27日,平型关地区日军以增援的飞机、重炮和坦克向公路两侧实施了猛烈突击,随后,步兵向迷回村一带发起进攻。察哈尔派遣兵团南下部队也派出1个支队经浑源向守军左翼实施迂回攻击,双方展开了全线激战。28日,守军正面反击部队歼灭日军1000余人,并夺回数个高地。但第71师1个团因孤军深入,反被日军包围,除数十人突围外,团长程继贤以下均壮烈牺牲。29日,日军兵分两路发起攻击,战斗进入前所未有的白炽化程度。守军坚守阵地,奋勇拼搏,日军虽多次增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守军也损失惨重,难以将被包围在东、西跑池地区之日军全歼。

茹越口方向日军于27日发起猛攻,守军独立第203旅1个团伤亡惨重。第34军于当晚出击,企图歼灭该部日军,未获成功。28日,日军以猛烈炮火配合步兵强攻,守军顽强抵抗,大部伤亡,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余部退守繁峙以西铁角岭。日军跟踪追击,第34军奋力与日军展开血战。阎锡山又令预备队3个团投入作战,仍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29日,铁角岭失守,繁峙也于当夜被日军占领。平型关地区守军后路被日军切断,形势十分危急。30日拂晓,第2战区下令放弃平型关,守军向五台山区之神堂堡、车厂、楼圪梁、峪口、代县、雁门关至阳方口一线转移。

日军第5师团与第15旅团在繁峙会合,尔后于10月1日猛攻代县;守军立足未稳,再次南撤,代县失守。

绥远当面之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于9月25日南下,先后击退平鲁、井坪镇守军;28日攻占朔县;30日越过阳方口,尔后指向晋北交通要地宁武。至此,第2战区内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

娘子关血战

1937年10月中旬,日军因第5师团等部在忻口地区遭守军顽强抗击,进展迟缓且死伤惨重,华北方面军遂令第20师团及第108、第109师团各一部渡过滹沱河,沿正太线向太原实施进攻。此时,国民党军自放弃石家庄后,晋东防务空虚,第2战区主力在忻口地区作战,也难以顾及晋东方向。蒋介石遂令第1战区第14集团军、第3军入晋,沿正太线之井陉至娘子关一线设防,扼守晋东地区,并指定由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统一指挥。

10月11日,日军进至井陉以东地区。12日,日军2000余人乘守军立足未稳,向井陉及其以北贾庄发起了进攻;另一部900余人向守军第17师阵地实施正面进攻。战至傍晚,日军相继攻占长生口、大小龙窝,指向阳关。井陉也被日军占领。阎锡山急令原定增援晋北的第1军团(孙连仲部)回援娘子关。13日晨,日军一部抵达核桃园;另一部日军1000余人向阳关发起猛攻,守军仅有第14军团的1个营,在优势日军进攻下,阳

关于午后失守。第17师坚守娘子关以东要点雪花山,并以一部兵力向长生口方向反击,迟滞日军的进攻,先后收复刘家沟、长生口等地,后遭日军反攻,雪花山守军疏忽大意、失职麻痹,日军很快占领了雪花山。第17师主力组织反击,遭重大伤亡,被迫退守乏驴岭。14日,第1军团到达娘子关附近,并立即向阳关方向发起反击。第27师以一部兵力指向核桃园,另一部向旧关发起进攻,歼灭日军400余人。当晚,日军600余人向关沟守军第30师发起进攻,守军以2个团出击,经3小时激战,歼灭日军200余人,余部仓皇溃逃。与此同时,阎锡山令第129师主力赶赴阳泉,配合娘子关地区作战。15日,阎又下令由孙连仲指挥娘子关方向作战,并限16日解决旧关附近之日军。当晚,第3军、第27师组成敢死队,发起突然勇猛的冲杀,将由旧关进至关沟的日军1500余人大部歼灭;入夜后,向旧关增援之日军600余人,又被歼灭大部。孙连仲决定16日拂晓发起全线攻击,以第3军为主攻,向旧关方向实施突击;第27师主力向大小龙窝出击,切断日军退路,一部兵力肃清关沟日军残部,配合第3军作战。16日拂晓,守军发起进攻时,恰遇日军组织反击,双方经激战,守军肃清了关沟残余日军,旧关地区日军虽被包围,但利用有利地形顽抗,并得到了空中猛烈火力的支援,第3军进攻受挫。傍晚,日军发起反攻,阳关西南高地第27师阵地被突破,增援的第14军团教导团伤亡惨重。17日,守军继续发起进攻,日军也大举反攻,经多次近战肉搏,双方伤亡均严重。守军一部在进攻中切断了核桃园至旧关的通路。19日,向乏驴岭进攻之日军不断增加兵力,第17师虽经顽强抵抗,阵地终于失守。旧关至核桃园一带日军遭守军连日猛攻,伤亡惨重,残部1000余人退守旧关附近高地。

与此同时,日军第20师团奉命“攻占阳泉平定”,决定兵分两路,右路沿井陉、新关、石门口大道及其以北地区攻击前进,左路沿测鱼镇、石门口大道迂回娘子关守军侧后。此时,增援晋东的第18集团军第129师已到达阳泉,进至马山村、七亘村一带,掩护娘子关守军的侧后安全。

21、22日,从正面进攻娘子关的日军得到增援后,在地空火力支援下发起了猛烈攻击,守军阵地多处被突破。此时,第1军团在娘子关地区已苦战8昼夜,兵力仅有6000余人。孙连仲请求增援,阎锡山即令川军第122、第124师增援,战至26日,双方在娘子关地区形成对峙。

23日,日军第20师团左路到达南障城,尔后大部南下测鱼镇方向,一部300余人进至刘家栅、固栏村附近。24日,测鱼镇方向日军3000余人在七亘村附近遭第129师第386旅一部阻击;日军一部向马山村进攻,刚到该处的川军一部被迫撤退。守军令第3军由固栏村后撤,日军进至该地区的300余人乘机窜入十家路、乱安村,向固驿镇守军翼侧发起了进攻。第3军及第122师一部当即实施夹击,歼其一部。25日,日军左路到达固驿镇附近。26日,日军向平定方向发起进攻,该处守军为第122师。因守军兵力薄弱,为防退路被切断,孙连仲决定以一部兵力坚守娘子关,主力转移至巨城镇、移穰镇地区,并以第122师一部推进至石门口,准备发起反击。由于娘子关守军兵力过少,当日即被日军攻占。

27日,日军左路继续西进,先头进抵桥头村,右路于当夜向第17师发起攻击,并占

领巨城镇,另一部日军进逼移穰镇,并迅速攻占该镇。28日,日军向乱柳村、上庄等地发起猛攻,守军多处阵地被突破;另一部日军向石门口进攻,守军伤亡惨重,退守西郊。蒋介石为解晋东之危,令第1战区立即向石家庄、娘子关方向实施迂回攻击。但日军攻势猛烈,继续西进。29日,孙连仲奉蒋介石命令,率部在寿阳以东组织防御,因失去联络,第1军团所部的5000余人陷入了独立苦战。日军接连发起猛攻,当日占领平定。30日,日军在阳泉以南向第14军团发起围攻,守军伤亡惨重,向西撤退,日军很快攻占阳泉。31日,蒋介石急调汤恩伯率部参加晋东作战。汤恩伯率第13军由涉县、昔阳向平定前进。11月1日,晋东守军在寿阳以东地区继续组织防守。阎锡山眼看战局处于不利地位,日军的步步逼进已威胁了晋北守军的侧后安全,遂令卫立煌率忻口地区部队向太原以北青龙镇地区转移,协助傅作义部固守太原。2日,日军攻占寿阳,第31旅也进入昔阳,向榆次急进。4日,日军攻占榆次县城,直接威胁了太原的安全。

忻口战役

太原会战初期,日军在攻占山西地区内长城一线关隘后,准备向太原发展进攻。1937年10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当夜,华北方面军即令第5师团担任攻占太原的任务,并令在保定地区的第9旅团2个大队铁运至大同归建,为统一晋北作战行动,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多旅团统归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此时,日军在晋北的兵力计有3个师团7万余人及火炮250门和战车150辆。

国民党统帅部“为挽回危机,着眼于山西要地之确保,决定转用平汉线兵力”。于10月2日命令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4个师1个旅,由石家庄经正太线运往太原,增援晋北。第2战区决定在忻口地区与日军决战,“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崞县、原平、蔡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卫家庄、1482高地迄阳方口既设阵地,两翼依托五台山及宁武各山脉,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侵入之敌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击灭之。”其兵力部署:以第18集团军(欠第120师)、第73、第101师及新编第2师为右翼集团军,由朱德总司令指挥,在五台山之线占领阵地;以第14集团军(欠第47师)、第9、第15、第17、第19、第34军及第196旅为中央集团军,由卫立煌总司令指挥,在蔡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之线组织防御,以一部兵力占领中解村、阳明堡之线;以第68、第71、第120师及独立第7旅为左翼集团军,由杨爱源总司令指挥,在黑峪村至阳方口之线组织防守;以第34军(欠第196旅)、第35、第61军、第66师及独立第2、第3旅为预备集团军,由傅作义总司令指挥,配置于定襄、忻县一带,以策应各方向作战。

10月1日,日军混成第2旅团1000余人,由繁峙向阳明堡发起了进攻,经与守军第19军一部激战后,突入阳明堡。2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崞县发起进攻。4日,日军混成第15旅团由崞县以西向原平镇实施迂回攻击。此时,从五台山向忻口转移的晋绥军尚未到达,由平汉线抽调的卫立煌部也尚未赶到,形势十分危急。第2战区为达成主力有充裕时间集结忻口以与日军决战之目的,遂下令:“死守崞县、原平,以待后援部队到达。”

5、6日,日军集中炮火对崞县实施了猛烈突击,守军大部阵地被摧毁,第19军第407团伤亡惨重。7日,围攻崞县之日军已达5000余人,并有飞机20余架、重炮30余门支援作战,其地空火力经6小时狂轰滥炸后,北城墙被毁,守军伤亡极为惨重,第410团伤亡殆尽,日军乘机突入城内。东、西城守军奋勇夹击,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和巷战。当夜,守军官兵仍全力拼杀,第19军军长王靖国亲临第一线率部阻击,但日军增援部队却越来越多。8日凌晨,眼看局势已无法挽回,王靖国遂率部突围撤离,崞县被日军攻占。

原平镇也遭日军猛攻,守军为第196旅,虽兵力薄弱,但全体官兵士气旺盛,协同奋战,誓与阵地共存亡。6日,日军以飞机、战车掩护,以优势兵力向原平镇猛扑,守军拼死抵抗,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双方伤亡均严重,战斗极为惨烈。连续血战至11日下午,守军官兵仅剩300余人,仍据守镇东北角,旅长姜玉贞亲自督战,经2小时巷战和近战肉搏,直至全旅官兵伤亡殆尽,原平方失守。姜玉贞在突围时,被日军炮火击中左腿,因流血过多,不幸以身殉国。

与此同时,由阳方口南下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向宁武守军独立第7旅发起了进攻。激战数日,最后独立第7旅旅长马延守亲率卫兵加入战斗,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宁武于6日失守,守军退守轩岗一带。

崞县、原平的相继失守,使忻口面临了日军的直接攻击。忻口位于同蒲线要点忻县之北,东靠五台山,西依宁武山脉,是太原的北大门。12日,第2战区一线三路集团军已到达忻口附近并占领了阵地,阎锡山又令傅作义率预备集团军之第35、第61军及独立第2、第3旅等部开赴忻口,加入中央集团军,并调整了作战部署,将中央集团军分为3个兵团,第15、第17、第33军等部为右翼兵团,由第15军军长刘茂恩指挥,第9、第19、第35、第61军等部为中央兵团,由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第14军及第66、第71、第85师等部为左翼兵团,由第14军军长李默庵指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统一指挥忻口地区作战。

13日晨,日军5000余人在30余架飞机和大批火炮、战车掩护下,向忻口地区发起了猛烈进攻,以中央突破方式,猛攻南怀化防御阵地。至中午,守军中央兵团南怀化地区大部工事被摧毁,守军伤亡惨重,阵地被日军突破。卫立煌急令第21、第10、第72师各一部协同夹击进攻之日军,激战至当夜,将突入南怀化之日军全部包围并歼灭。同时,决定次日以第14、第7集团军分别由大白水、忻口附近实施反击。14日,日军增援3000余人后,再次向南怀化发起进攻,同时以部分兵力向侧翼实施迂回攻击。经激战,南怀化阵地再次被日军突破。右翼第15军与日军激战至傍晚,将日军2000余人压迫至灵山脚下。左翼第10师收复旧练庄,日军则攻占了翼侧之大白水,双方形成对峙。因南怀化阵地是防线的关键,卫立煌令第21师及独立第5、第2旅于15日再次向该地发起反击;并以1个旅的兵力由方家庄向该处侧后实施攻击;另以第54师一部兵力协同作战。反击中,中央兵团指挥官郝梦龄率7个旅的兵力从正面发起攻击,连克几个高地。16日5时,郝梦龄和第54师师长刘家麟急往独立第5旅阵地,在穿越日军火力封锁地段时,不幸中弹,双双壮烈殉国。在反击进入关键阶段时,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率部发起冲

击,与日军展开激战,也不幸中弹阵亡。由于指挥中断,攻势当即受挫。且右翼日军增兵至 4000 余人,并向灵山主峰发起了攻击,激战至傍晚,被守军击退。左翼方向也激战终日,双方对峙,均无进展。

与此同时,守军左、右翼集团军在五台山、宁武山区利用有利地形,不断袭击日军后方。第 18 集团军根据“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的命令,以一部兵力进出于繁峙、代县,另以一部兵力及骑兵出没于崞县、朔县一带。14 日,第 120 师与独立第 7 旅协同作战,收复宁武;15 日,第 18 集团军一部在广灵、灵丘间击溃日军步骑兵 200 余人,击毁其汽车 30 余辆,并收复广灵。第 18 集团军的敌后游击作战,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忻口正面守军主力的作战,给日军造成了重大威胁。因兵力有限,且日军援兵不断增加,而中央兵团经连日血战,损失惨重,已感兵力不足,遂于 17 日起转为守势。卫立煌请求增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潼关的第 22 集团军驰援晋北,阎锡山也令龙泉关之第 94 师第 59 旅归卫立煌指挥。

19 日,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守军左翼。中央兵团与日军争夺官村以南高地,激战中双方伤亡均很大。当夜,第 120 师乘夜暗袭击了日军阳明堡前进机场,摧毁其飞机 20 架,使日军在其后的数日内失去了空中火力支援。20、21 日,日军继续向官村一带进攻,其猛烈炮火将守军工事大部摧毁,一部兵力突入官村,形势十分严重。守军调兵增援,经奋勇拼杀,于 21 日午后将日军击退。22 日,守军实施局部反击,但进展不大。当日,阎锡山令杨爱源返回太原,筹划晋南防务,左翼集团军也归卫立煌指挥。

24 日拂晓,守军左、中、右阵地各以一部兵力出击,此时,日军又得到 1 个支队增援,也向守军发起了攻击,双方激战后均无进展。26 日,日军一部向守军左翼猛攻,午后突破了第 83 师盟膳村阵地;另一部日军向守军右翼灵山、南郭阵地发起攻击,夺占了东、西荣华阵地。27 日,正面攻击之日军增兵至 2000 余人,采用坑道作业法向守军中央兵团阵地逼近,守军各部队也以对壕作业法及小部队出击不断打击日军。28 日晨,日军向中央兵团第 215 旅阵地实施强攻,守军奋勇抗击,击毙日军 200 余人。29 日,日军发起全线进攻,第 83 师顽强拼搏,歼灭日军 2000 余人,自身伤亡也极为严重,经连日激战,该师兵力已不足 1 个团。之后,双方形成对峙。11 月 1 日,因晋东方向战局不利,晋北守军侧后受到威胁,第 2 战区遂令忻口地区部队向太原以北之菜水塬、青龙镇、天门关地区撤退。2 日晚,卫立煌率部向指定地区转移。

忻口战役,历时 1 月有余,计毙伤日军 2 万余人,大挫日军士气,达到了争取时间和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之目的。

太原保卫战

太原城防由傅作义负责指挥,其部署:第 35 军和第 73 师一部分别防守东、西城,并以一部兵力配置在外围;新编第 3 团防守北城;独立第 1 旅配置在西城,第 213 旅配置在南城;新编第 8、第 9 团为预备队。1937 年 11 月 2 日,阎锡山致电卫立煌,令其指挥孙连仲部和汤恩伯部,利用太原附近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夹击并歼灭进攻太原之日军。此时,晋东守军因接连败退,仅孙连仲部等少部人员到达太原,而晋北部队撤退时,又遭

日军追击及空中火力打击,仓猝行动,未能占领青龙镇、天门关一线阵地,4日已退至太原城北郊。战场情况对守军大为不利。

5日,日军第5师团攻占阳曲城。6日,日军先头已抵达太原北郊,主力随后即在城东、北两面展开并发起攻击,开始与配置在城外的守军接火,其地空火力也开始向城内实施突击。由于忻口守军连日作战,损失惨重,战斗力大减,急需休整待补,第2战区为保存实力,遂令其向晋南撤退。7日,日军第20师团也抵达太原附近地区,与第5师团会合,且此时城西汾河上各外桥梁已被日军占领,太原城已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

8日,日军集中2个师团的主力,从东、北两个方向向太原城发起了猛攻;旧机30余架也实施了轮番轰炸,北城楼很快被毁,全城烟火遮天。9时许,东北、西北城角被日军猛烈炮火轰塌,东、北两面城墙也被轰开10余处缺口,日军步兵随后向城内猛冲。守军扼守阵地,誓死抗击,以密集火力封锁各缺口,并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战斗异常惨烈,经反复争夺和激烈巷战,歼灭突入城内之日军大部,守军伤亡也极为惨重。入夜后,日军向城内实施了空降增援,并迅速将西城和南城守军击溃。傅作义鉴于战局已无法挽回,遂下令突围退却。守军各部由大南门突破日军包围,向晋南撤退。太原遂告失守。

南京保卫战

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是中国南北交通枢纽。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直接威胁上海守军的侧后安全。8日,上海守军在日军夹击下,开始全线撤退。日军为迫使南京政府投降,决定乘机发起追击,分兵两路向南京方向实施进攻。

11月13日,北路日军发起了进攻。15日起,双方激战于常熟、兴隆镇、福山及沿江一带地区。19日,日军以猛烈炮火和频繁轰炸突击守军,守军不敌,遂向无锡、江阴一线撤退。27日,日军进占无锡。国民党左翼军除一部退往常州外,主力向浙、赣、皖边区撤退。日军兵分三路继续攻击前进。其右路为第11、第13师团,向江阴方向实施进攻。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地处上海、南京之间,与北岸之靖江相望。此处江面狭窄,仅宽2公里,南岸山陵起伏,地势险要,是长江的“大门”。江阴要塞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组成了东山、西山、黄山、肖山、鹅山等8个炮台,计部署各种火炮37门,其中有当时最先进的88毫米高平两用半自动火炮和150毫米加农炮,另有2个守备营和工兵、通信各1个连。守军斗志旺盛,严阵以待,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日军。卫戍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江防军总司令刘兴坐镇江阴,统一指挥作战。

11月27日,日军第13师团向江阴地区发起了进攻,以炮火向黄山炮台实施了猛烈突击。黄山炮台即行还击,东山、西山炮台也同时射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激战中,日军还使用了瓦斯弹,由于守军炮台均在狭小的高地上,加上江风吹送,未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第103、第112师防守部队以火力杀伤地面进攻之日军,并展开了近战

肉搏,经反复争夺,将进攻日军击退;入夜后,双方形成对峙。深夜,第103师组成敢死队主动出击,利用夜暗和有利地形,秘密接近日军,以集束手榴弹炸毁其战车7辆。在以后的几天里,日军继续以猛烈的炮火发起攻击,守军坚决予以还击,双方死伤惨重。29日夜,122师根据上级命令,决定夜间组织突围。22时,第112师开始向西突围,绕过江阴城北,沿公路向西行进,在南闸镇以西地区遭日军火力封锁后被打散,之后大部西撤,一部撤到江北。

12月1日,日军陆、海、空三军联合向江阴地区猛扑,日机80余架向守军阵地实施了轮番连续轰炸,一时炸弹倾泻,火光连天,守军大部阵地和工事被摧毁,而要塞部分国防工程和地下工事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有的已找不到钥匙,有的则长期锈蚀而打不开锁,以至未能利用。加上双方对峙,多为近战,使要塞重炮无以发挥优势,而日军水陆并进,攻击愈烈。情急之中,第103师师长何知重将全师兵力悉数投入激战,先后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官兵伤亡已极为严重。入夜后,第103师奉命突围,向镇江方向转移。行至江阴城边,方知第112师早已撤离,致使第103师腹背受击,更增大了伤亡。22时,第103师撤至江阴城西钱家村附近时,遭少部日军伏击,第613团团长罗熠斌及许多官兵不幸阵亡。第103师当即以一部兵力绕至日军翼侧,爬上屋顶,以手榴弹实施突袭,将日军数处火力点消灭,主力遂迅速向西急进。

江阴阻击战,历时5昼夜,第103、第112师及要塞守备部队顽强抗击了优势日军的进攻,虽自身伤亡惨重,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并给其以重大杀伤。战斗中,江阴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前,主动组成了运输队、担架队,冒着日军猛烈的空地火力,抢运粮食、弹药,抢救、输送伤员,更激发了守军官兵的斗志和为民族奋勇献身的精神。

南路日军第10军于11月13日攻占了平湖,19日占领嘉兴,尔后以一部兵力在沪杭线上对杭州展开了进攻态势,主力则沿太湖南侧向西急进。国民党军为巩固吴兴(今湖州),急令第21集团军第7军先头部队占领升仙镇、大钱镇一线阵地,抗击日军的进攻。

24日,日军突破第7军防守阵地,进而攻占吴兴、长兴等地。尔后,日军第18师团主力分兵向泗安、广德攻击前进。双方在泗安发生激战,阵地数次易手,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伤亡。

28日凌晨,第23集团军除以部分兵力扼守阵地外,主力向中、下泗安地区实施了反击。日军在睡梦中惊醒,仓猝应战,作困兽之斗;飞机20余架也迅速临空实施轮番扫射和轰炸,企图掩护该地区日军冲出重围。激战至中午,日军第18师团增派兵力解围;至16时,日军冲破包围,分三路向东南溃逃。中、下泗安即为守军收复。

29日拂晓,日军第18师团在飞机和坦克、火炮掩护下,集中主力再次向泗安方向发起了进攻。第145师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至14时,上、中、下泗安相继失守,师长饶国华指挥所部退至界牌一线继续坚守。

30日黎明,日军第18师团发起全线进攻,主要方向指向了界牌。饶国华沉着指挥,并写下遗嘱,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日军主力沿公路向广德方向攻击前进,守军伤亡

越来越大。饶国华率部坚守广德东门外地区,眼看日军攻势凶猛,潮涌般冲来,遂大呼:“小小日本,将来必灭亡!”怒目而视,拔出手枪自戕成仁。守军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纷纷向西退却。日军随即攻占了广德。

至12月6日,进攻南京的各路日军,已进抵栖霞山、汤山、淳化镇、秣陵镇附近,对南京守军构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12月6日晚,蒋介石召集少将以上将领训话: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地,如今首都已是一座围城,保卫首都的重任交给唐生智将军,大家服从唐将军,正像服从我一样。我走后,也会调动部队前来策应。万一有什么不幸,大家也将成为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唐生智也表示:愿与诸将共负守城之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

从9日拂晓开始,日军从三个方向向南京发起了全线攻击。

10日,日军主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之线同时发起猛攻。日军第9师团工兵分队在火力掩护下,以炸药爆破开路,先后两次突破光华门,100余日军敢死队一举冲入了城内。守军适时发起反击,将日军敢死队全部歼灭,迅速恢复了阵地。通济门守军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争夺,顽强抗击了优势日军的进攻,后在第156师增援下,将进攻之日军击退。入夜后,第156师挑选敢死队员数十名,由城墙上用绳索悬吊下去,用汽油和手榴弹将潜伏在城门洞内的少部日军悉数焚毙,并乘胜袭击了占领通光营房的一部日军,将其驱逐,后在追击作战中,敢死队的勇士们全部壮烈牺牲。

另一部日军分两路在坦克引导下,向教导总队防守阵地发起了攻击。守军首先以防坦克炮连奋勇迎击,击毁日军坦克2辆,迟滞了日军的攻势。午后,日军一部在3辆坦克引导下,向光华门猛冲。教导总队第2团、军士营和防坦克炮1个连发起了反击,在正面抗击的第87师掩护下,将进攻之日军击退,并俘其3人。15时,日军敢死队在密集炮火掩护下推进至护城河一线。22时,日军10余人冲入光华门城门洞内。半夜,光华门守军将大量汽油撒向城门洞附近,并当即投下火种,将城门洞内日军全部烧毙。

11日,日军集中精锐猛攻中华门地区。日军300余人一并抢入城内。罗卓英亲临第一线指挥,在中华门一带展开了激烈巷战,终将入城日军全部击毙。此时,东线日军向紫金山发起了猛攻,教导总队奋勇抗击,浴血苦战,使日军难以前进。另一部日军迂回大胜关、江心洲地区,袭击第74军翼侧,战斗异常激烈。14时,第88师主力防守的雨花台右翼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顽强抗击,固守主阵地。

11日中午,唐生智接到顾祝同打来的电话,转达了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并要唐迅速赶到浦口,以接其撤离。唐生智表示:不能马上离开南京,撤退问题必须部署。22时,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接到蒋介石命令:“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

12日拂晓起,日军以地空密集火力向各城门实施突击,多处被毁,坚固城墙也被炸得砖石乱飞,有的地方被炸得城墙洞开,城内外已能通视。另有30余架日机在南京上空盘旋,炸弹和传单同时抛下来,敦促守军将领投降。12时后,日军第9师团攻占了雨花台主阵地,第88师伤亡惨重。与此同时,日海军舰队已驶抵乌龙山江面,并清除了水雷及其他障碍物。在当涂渡江的国崎支队已攻下和县,正向浦口急进。

17时,在极度危急中,唐生智召集罗卓英、刘兴及师长以上将领开会,宣布了蒋介

石的撤退命令,并对突围计划以及集结地点作了指示。同时,令第36师负责掩护卫戍司令长官部渡江北撤。将领们默不作声,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唐又说:“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

入夜后,紫金山满山都在燃烧,雨花台、中华门、通济门一带也都是火光冲天,南京城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守军乘夜暗组织撤退,除第83军按指定路线绕栖霞山经句容向皖南突围外,其余各部除部分兵力誓不撤离、坚持巷战外,均拥向下关,觅船过江,争渡逃命。因江边船只少,有的取门板制木筏,行至江中即被急流倾覆吞没;有的船只因超载而沉没;有的甚至为争渡鸣枪,自相残杀,造成了江边更为混乱的局面。

13日晚,日军攻占南京。尔后,日军大肆烧杀淫掠,开始了持续3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被俘的国民党守军和无辜居民被屠杀达35万人,全市房屋1/3被化为灰烬。这种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无比愤怒和仇恨。

徐州会战

徐州位于淮北平原,是津浦线和陇海线的枢纽和苏、鲁、豫、皖四省之要冲,大运河穿经市郊,公路四通八达,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控制徐州,北可威胁济南,南可进逼南京,沿陇海线西进则可利用中州平坦地形直扑平汉线,进而夺取郑州、武汉等地。日军攻占了南京之后,为打通津浦线,使南北联成一片,实现迅速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先后集中华中、华北等地日军主力8个师团、5个旅团,约24万人,以南京、济南为据点,准备实施南北对进,夹击华东战略要地徐州。同时,继续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和谈”,斡旋“和平”,诱压蒋介石投降。

国民党军一面调集部队控制武汉及豫皖边区,一面抽调兵力至鲁中及淮南地区,企图牵制日军主力于津浦线,以迟滞日军西进向武汉发展进攻。为确保徐州,以一部兵力在津浦线南段和北段抗击日军进攻;一部兵力在徐州东北临沂地区担任牵制任务。集中主力于徐州附近和淮北平原实施机动作战,以粉碎日军的进攻。徐州地区为国民党军第5战区,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辖12个集团军,约65万人(会战中得到大量增援,总兵力约70个师100万人)。

1938年1月8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明光,进至池河东岸。守军第11集团军(第31军)在池河西岸组织防御。25日起,日军在地空火力掩护下,冒雪强渡池河,向西攻击前进,第11集团军退守临淮关和凤阳以西地区。2月1日,日军攻占临淮关。第5战区急调第51军驰援,与日军在淮河两岸展开了激战,双方均出动了飞机支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日军以优势的地空火力向51军阵地发起猛攻,守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日军渡过淮河,继续在北岸攻击前进。13日,张自忠率第27军团(第59军)增援抵达淮河流域,守军迅速调整了部署,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向日军发起反击,不断予敌重创。日军因腹背受击,无力进攻,遂全线退回淮河南岸;第27军团将淮河以北原阵地全部收复。双方在淮河两岸形成对峙局面。至此,南路日军进攻受挫,其南北夹击的计划被粉碎。

北路日军占领济南后,第10师团沿津浦线南下,左翼第5师团沿胶济线东进,攻占潍县、青岛后,转而南下,企图夺取鲁南重镇临沂,从东路包抄徐州。2月21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向临沂突进,沿途遭守军第3军团(第40军)和青岛撤退之海军陆战队及保安队、游击队等节节抗击。在日军优势火力突击下,伤亡惨重。第5战区急令第27军团驰援,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亲赴临沂指挥作战。12日,张自忠率第27军团抵达临沂北郊沂河西岸;14日拂晓以主力强渡沂河,向白塔、沙岭、徐太平、亭子头方向攻击前进。面对日军地空火力的优势,第27军团所部180师和38师英勇奋战粉碎了日军一次次疯狂进攻,日军伤亡惨重。在随后10多天的战斗中,第27军团将士们前仆后继,英勇作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日军虽有优势地空火力的支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双方形成对峙。

临沂保卫战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第5师团与津浦线北段的第10师团会合于台儿庄的预定计划,使冒险突进至台儿庄的濑谷旅团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1月上旬,由济南南下的日军第10师团占领兖州、济宁、邹县一线后,沿津浦线骄横疯狂地继续向南突进。2月7日,李宗仁为迟滞日军南下速度,等待援军并争取时间在徐州附近完成防御部署,令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桐萱代行总司令职权(时前因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已伏法),率部向济宁、汶上地区实施反击。

第3集团军此次反击作战,计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其装甲战车5辆,缴获战车3辆、火炮4门,自身虽伤亡近4000人,但一雪前耻,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和斗志,咬住了日军第10师团1个旅团的大部兵力,有效地支援和配合了津浦线正面的作战。

日军在济宁作战结束后,向邹县方向实施了增援,先后调动第106师团1个旅团,配合濑谷旅团沿津浦线继续南下。3月16日晨,日军5000余人逼近滕县东郊,随后以8门重炮向滕县东关实施了猛烈射击,日机也临空向城内投弹;接着,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滕县发起了进攻,守军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日军,奋勇抵抗,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但自身伤亡严重。17日凌晨,日军增加坦克数十辆和重炮8门,从滕县城东、城南同时发起攻击,东城墙被摧毁数处,南城墙也被打开一个约5米宽的缺口;守军在堵塞缺口时,遭到重大伤亡。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异常惨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8日凌晨,滕县被日军攻占,除第124师副师长税梯青率数百人由北门突围撤离外,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参谋长赵渭滨,124师师长邹绍孟团长王麟及守军2000余人均为国捐躯。滕县虽失守,但王铭章率部坚守2昼夜,不但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更为重要的是为第20军团和第2集团军两部在台儿庄一线部署作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台儿庄是山东省南部的一个重镇,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和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线,南接陇海线,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徐州会战中期,日军为实现南北夹击、夺占徐州的战略目的,以北路日军一部向台儿庄地区发起了进攻。日军如控制台儿庄,则既可南下赵墩沿铁路线西进,尔后向徐州发展进攻;又可北上策应北路主力的作战行动,并可切断国民党军第27、第3军团等部的退路。因此,日军视台儿庄为“钉子”,志在必夺。

3月下旬,日军第10师团沿台枣线大举进犯台儿庄,企图一举而下徐州。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命第2集团军司令吴孙连仲率部沿运河布防,固守台儿庄。又命汤恩伯率20军团让开津浦线正面,诱敌深入,等日军主力被吸引在台儿庄时,再潜进南下,拊敌之臂,协同孙连仲部将日军包围歼灭。日军第10师团主力濑谷旅团长驱直入,直扑台儿庄,军守第31师及27师一部坚守阵地,顽强抗击,与敌展开激战,将其牢牢地吸引在台儿庄。

27日,第5战区命令汤恩伯率第20军团主力南下,首先歼灭台儿庄附近之日军。

经过几番激烈战斗,至3月31日,日军濑谷旅团已陷入第5战区部队的包围之中。

当第20军团、第2集团军准备发动攻势围歼日军濑谷旅团时,由临沂增援的第5师团主力于4月1日进至兰陵镇,并从东面侧击第52军。第52军遂以一部兵力阻击日援军,主力则迂回攻击坂本旅团翼侧。坂本急于解濑谷之危,除以1000余人在洪山镇附近组织防御外,主力向台儿庄突进,也陷入了包围圈。

李宗仁决定迅速围歼日军濑谷、坂本2个旅团,并于2日下达了总攻命令。日军在腹背受击的情况下,顿时乱了阵脚。此时,在台儿庄内的第31师乘机全线出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官兵们奋力冲击、砍杀,濑谷旅团伤亡惨重,残部乘夜暗向峄县溃逃。7日,坂本旅团继续在台儿庄内顽抗,在围攻部队夹击下,伤亡惨重,眼看退路被切断,无力应战,当夜烧毁弹药,尔后拼死突出台儿庄向北溃逃。此时,第55军已在临城、枣庄北侧地区切断了津浦线,溃退之日军撤至峄县、郭里集、枣庄附近地区后,被迫占领有利地形固守待援。8日起,双方形成对峙,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次战役共计毙伤日军1万余人,俘其1万余人,击毁其战车、重炮各10余门,缴获坦克和战车120余辆、火炮70余门、汽车100余辆、枪支1万余支和大批作战物资,国民党军伤亡也达2万余人。

日军在台儿庄地区惨遭失败,同时也查明了国民党军在徐州附近集结了重兵集团。为迅速消灭第5战区主力,日军统帅部于4月7日下达了新的作战计划,令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协同作战,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徐州,并指派以作战部长桥本群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赴济南督导和协调作战行动。

从4月下旬开始,守军在广阔的战线上与南下北上的日军及坂本、濑谷旅团残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由于守军长期疲劳作战,武器装备低劣,渐渐不战,接连失利,许多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徐州局势日益危殆。

5月15日,国民党军统帅部决定放弃徐州。16日,第5战区命令徐州附近部队由日军兵力薄弱的西南方向分五路向豫、鄂、皖地区突围,并令张自忠指挥第59军和第21、第27、第139师,分别占领徐州附近之郝寨、夹河寨、肖县、凤凰山、霸王山等地,依托有利地形阻击日军进攻,掩护主力撤退。至18日,日军先后攻占上述守军阵地,守军在不断给日军以杀伤后主动撤离。徐州守军第68军经顽强抵抗后,也于19日撤出,日军乘机攻占徐州。尔后,日军立即挥兵西进,跟踪追击。26日,日军占领归德;6月1日占睢宁;3日占杞县;4日占兰封;6日占开封。9日,国民党军河南守军奉蒋介石命令,在

郑州东北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坝,形成泛滥区;日军被迫退至开封、杞县、永城以东地区。徐州会战遂告结束。

武汉会战

武汉位于江汉平原的中心,居长江与汉水之交,扼平汉线与粤汉线的交接点,是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虽已迁都重庆,但武汉曾是短期的临时首都,军事统帅部也仍在武汉,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

1938年初,日军制定了以攻占武汉为目标的作战计划。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占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

进攻武汉之日军为华中派遣军第2、第11军,由总司令筱俊六统一指挥,计9个师团、3个旅团、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3个团及炮兵、海军陆战队各一部,飞机300余架,舰艇120余艘,共约25万人(作战过程中,经多次补充和增援,总兵力达12个师团40万人)。

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以重兵保卫武汉,并拟定了庞大的作战计划。决心以武汉三镇为核心,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和湘、赣地区为广阔的外围战场,利用长江两岸有利地形和鄱阳湖、幕阜山、大别山等天然屏障,持久作战,节节抗击日军的进攻,不断歼灭和消耗其有生力量。计划会战初期使用5个集团军约30个师,尔后随战役发展逐步增加至14个集团军129个师,总兵力达100万余人,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预期可与敌人的主力作战4-5个月,予敌以最大的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

5月29日,日军大本营发布了进攻武汉命令,随后第6师团分途向合肥集中,驻台湾的波田支队由舰艇输送溯江西进,计划两军在皖西南要地安庆(时为安徽省会)会合。6月2日,日军第6师团坂井支队自合肥南下,于8日占领舒城。10日,波田支队逼近安庆。日军攻占安庆后,迅速组建了补给基地,为进攻武汉建立了桥头堡。

日军第6师团于13日占领桐城,得悉波田支队已攻占安庆,遂以坂井支队向大别山右翼要地潜山、太湖方向进击。15日,进攻之日军遭潜山地区守军第26、第27集团军抗击,经3日激战,由于守军装备、素质均较差,且防御正面过宽,兵力分散,作战消极,日军于18日攻占潜山,使长江下游南京至武汉间第一道屏障——马当封锁线告急。

26日,日军攻占了马当。日军占领马当后,即分兵向彭泽等地发展进攻,于29日攻占了彭泽,致使湖口也紧接着告急。经2昼夜激战,守军官兵伤亡大部,湖口终于5日失守。由于马当、湖口接连失守,九江即成了日军攻击的目标。

25日夜,日军突入九江城内,经激烈巷战,守军败退,日军于26日晚攻占九江。与此同时,长江对岸之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失守。至此,日军已打开了国民党守军主阵地的大门。

7月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华中派遣军作战序列,并调整了部署,以第11军担任主攻,第2军实施助攻,第3舰队和航空兵团支援地面作战;沿长江流域和大别山东麓

西进,企图对武汉构成南北夹击之势。

8月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攻占宿松,与第3师团北进之一部会合后,进逼黄梅。刘汝明率第68军与日军激战3日后退出黄梅。第5战区急令第7、第26、第86军等部立即向广济一带集中。日军在受守军的钳制及江湖湖沼的迟滞,逐渐陷于困境。

3日,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在第4兵团指挥部召集了师以上将领会议,决定向黄梅地区实施反击,并侧击太湖、潜山等地日军。各部于6日开始行动,但战至17日仍无大的进展。军委会遂决定再次发起反攻,顿挫日军锐势,28、29日,第68、第84军猛攻黄梅附近之日军,并一度逼近黄梅。日军据险死守,并于30日以主力实施了反突击,经反复争夺,第68、第84军久战不支,当晚向广济及其西北山地转移。日军尾随发起追击,至9月6日,先后突破守军田家寨、笔架山阵地。李品仙因预备队兵力薄弱,仅能抽出2个团的兵力增援,已无法挽回败局,当晚,各部奉命退出广济。

广济的失守,严重威胁了田家镇要塞。田家镇是武汉的又一重要门户,是外围沿江最大也是最坚固的要塞,另有富池口要塞与其夹江对峙,共同扼制长江航道。

16日,日军攻占武穴。18日,第6师团及第3师团一部共1.5万余人从广济一带南下,准备对田家镇实施迂回攻击。28日,由武穴西进之日军4000余人乘田家镇守军主力2个师北上阻击南下日军主力之际,一举突入要塞阵地,并得到70余架飞机和100余门火炮的支援,于29日晚攻占了田家镇要塞。

27日,日军第10、第13师团由合肥出发,进攻目标首先指向潢川、商城,企图一举切断平汉线,取捷径直逼武汉东北方向。富金山守军阵地正好卡住了日军的去路。9月1日,第13师团先头进至石门口、富金山一线,与守军第71军接火。

日军第10、第13、第16师团在富金山被阻10天,被击毙4000余人,第71军等部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计阵亡2618人,伤1.2万余人。

尔后,日军主力西犯潢川,张自忠指挥第59军全力抵抗,在潢川及其附近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日军以密集炮火向城内实施突击并施放了毒气,守城官兵不少中毒后仍拼死苦战。第59军坚守潢川11昼夜,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于18日自行撤离。潢川遂被日军占领,20日,光山也失守。此战,连日军也承认:“我军在潢川方向遭到中国军队坚强抵抗,致蒙受巨大之损失。”

27日起,日军第16师团与增援的第13师团先后沿商城、麻城间公路南下,接应广济一带的第6师团,并准备向武汉方向发展进攻。第2集团军及第71军等部分别在打船店和小果岭等地,顽强抗击了日军的频繁进攻;日军进展迟缓,月余之久仅前进200公里,且死伤达1.5万余人。第2集团军和第71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

日军第10师团占领潢川后继续西犯,11月12日放弃信阳,平汉线被日军切断。

信阳为平汉线重镇,北为河南平原,南为丘陵地带,其南侧42公里处即为著名的“三关”险地,武胜关居中,东为九里关,西为平靖关,三关成犄角之势;由于胡宗南部已退往信阳西北地区,平汉线正面已很空虚。罗卓英、刘汝明等部在“三关”一线与日军展开了反复争夺,有效地迟滞了日军南下的速度,掩护了平汉线以东部队的撤退。28日,日军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给来不及西撤的守军造成了混乱和部分损失。由于日军

兵力不足且分散,第5战区主力终于分散西撤,进入了桐柏山和大洪山区,大别山区则由第21集团军等部继续开展游击作战。

日军于7月26日攻占九江后,第106师团即沿南浔路南下,向狮子山、张家山守军阵地猛扑而来。8月1日,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受命指挥南浔路作战,率第4、第8、第70军迎战南下日军。6日,日军第106师团遭第70军沉重打击,在金官桥地区首次进攻受挫,其中1名联队长被击毙。8日,又遭第8军第3师顽强抗击,进攻再次受挫,第145联队大部被歼,其中2名大队长被击毙。第106师团屡遭挫折,至8月中旬,中、小队长伤亡过半,士气大挫,战斗力锐减。

日军第11军眼看南浔路作战进展迟缓,于20日令第106师团除留一部兵力在马回岭负责警戒外,以主力实施迂回作战,企图突破五分岭,迅速突进至德安西南地区,从侧后攻击德安地区守军,以扭转战局。日军第106师团悄然行动,于29日进至河家山;10月2日抵达万家岭时,遭第4军、第91师两部东、西夹击,其后方补给线也被切断。薛岳决心以全力歼灭日军第106师团主力,遂又抽调第51、第66、第142军驰援。6日晚,援军先后到达后发起了总攻。

万家岭地区血战,一举歼灭日军4个联队,计击毙日军3000余人,伤其5000余人,但未将该敌悉数歼灭。

与此同时,日军第101师团为牵制万家岭地区围攻部队,7日起也以全力向第29军阵地发起了多次猛攻。守军经月余激战,伤亡甚重,于9日放弃了隘口。28日,日军攻占德安。

在南浔战役发起的同时,日军第9、第106师团各部及波田支队向瑞昌及其以西地区发起了进攻。24日攻占瑞昌。

9月7日起,日军第9师团经稍作整补后,沿江向西北方向进犯,企图北上码头镇,夺占富池口要塞。守军坚守阵地,在瑞昌至码头镇、瑞昌至武宁和瑞昌至阳新三条公路附近与日军展开了激战。24日,日军攻占了富池口要塞。由于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的失守,江面封锁力量已极大削弱,日舰长驱直入,陆战队随处登陆,使守军防不胜防。

日军攻占阳新后,遂分路攻击前进,一路指向武昌方向,于20日控制了大冶,22日进占鄂城,24日占领葛店,26日黎明,波田支队突入武昌。另一路为主力,指向咸宁、贺胜桥、通山方向,企图切断粤汉线,包围武汉附近之守军。

在此之前的7月29日,当田家镇要塞失守后,蒋介石即放弃了死守武汉的计划。10月中旬开始部署撤退事宜,21日广州失陷后,即加速了撤退的部署。24日,守军开始全线撤退。在此之前,武汉市区的群众已提前疏散,党政机关、大学及许多重要的工业设施等也已迁往四川等地,仅留1个旅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第9战区主力向湘北、鄂西等地转移,撤至岳阳、通城以南之新墙河南岸及修水一线。至27日,日军相继进占武汉三镇,武汉会战遂告结束。

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在两地建立伪政权,1937年12月14日,在华北日军操纵下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临时政府设议政、行政、司法3个委员会及行政、治安、文教、法制、灾区救济等部,汉奸汤尔和、王克敏、董康、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参加政府。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的沦陷区及平津两市。在华北北部和内蒙古地区,日军于1937年9月在张家口建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于品卿任主席;10月中,在大同建立伪晋北自治政府,夏恭任主席;10月底,在归绥(当时改名厚和)建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蒙好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政务院长;11月下旬,建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统辖3个伪政权。1939年9月,联合委员会改组为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穆楚克栋鲁普任主席,李守信、夏恭、于品卿任副主席。在华中地区,1938年3月28日,由日军操纵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温宗尧等参与政府。辖苏、皖、浙三省的沦陷区及上海、南京两市。对伪政权,中国政府绝不承认。当华北伪政权出现时,国民政府就于1937年12月20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伪政权的傀儡性质,郑重宣布否认任何伪组织。

八路军出师抗日

1937年9月初,八路军115师和120师先后出动到山西抗日前线。此时正值平绥、晋北前线国民党军溃退之际,9月25日,115师在晋北平型关首战告捷,歼灭日军1000多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10月初,八路军129师出动到晋东南。以该师之第358旅(不包括第769团)为骨干组成留守兵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10月,八路军120师主力为配合国民党军太原保卫战,于10月16日向忻口西北出击,挺进至雁门关、崞县地区、截断日军后方交通线,先后收复了宁武、阳方口、平鲁、井坪等城镇,并曾几度占领雁门关。切断了日军通往大同的运输线,给南下进攻忻口的日军后方运输造成了很大困难。八路军129师一部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毁敌机24架,取得闻名全国的战斗胜利。

在晋东,为挫败正太线上日军进攻的锋芒,10月中旬,八路军115师由五台山区驰援正太线,129师亦向娘子关东南挺进。自10月20日至26日,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率一个团,在娘子关东南袭击日军的辎重部队,又将国民党军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日军的包围中解救出来。11月初,陈赓旅在黄崖底又打了大伏击战,歼灭日军700余人。

在保卫太原的忻口战役中,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在晋北、晋东共歼灭日军数千人,使日军遭到很大打击。但由于国民党军队执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日军进攻面前处处被动挨打,迅速溃败。国民党军继丢失娘子关后,又于11月2日放弃忻口,11月9

日太原失陷。晋中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南、向西溃退。

日军占领太原后,在华北一面分兵控制已占城市和交通干线,积极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巩固其已占地区,一面调集兵力沿津浦路向山东进犯。从此,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即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日军与国民党军的正规战争移向津浦路方向和长江流域。

八路军四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在太原失守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预计到华北战场将发生急剧的变化,为了迅速发展华北游击战争,于10月10日对八路军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指示:115师一部留在以五台山脉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师主力进入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120师进入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八路军总部率129师主力进入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以实行战略展开并随即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坚持持久的游击战争。

115师一部留五台山区,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23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领该师独立团、骑兵营等共约2000人,留五台山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团配合保卫太原的作战,挺进察南,收复涞源等六座县城,开辟了以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四县为中心的察南地区。骑兵营挺进冀西活动,占领曲阳、唐县、满城,开辟了冀西地区。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11月下旬开始,日军2万余人向晋察冀边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晋察冀军民开展游击战,经20余天奋战,粉碎敌人“扫荡”,并收复了晋北、冀西、察南许多县城,建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1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120师进入管涔山区,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20师在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治委员关向应领导下,到晋西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关向应率领由师政治机关大部及教导团共700余人组成的工作团,分赴岢岚、兴县、静乐、五寨、保德等县组织游击队和自卫军,发展了人民抗日武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20师以宋(时轮)支队活动于朔县以北,大同、怀仁以西地区,第三五九旅活动于雁门关、崞县、忻县以西地区,第358旅活动于忻县至太原以西、交城以北地区,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随着根据地的建立,120师各部也迅速发展,由出师时的两旅三个团8200余人,扩大到六个团2.5万余人,各县亦成立了1000至3000人的游击队或自卫军,这就为晋西北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38年2月,120师以三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对太原、忻县间铁路、公路实行破击战,在崞县、忻口、宁武间袭扰日军,经10天激战,共歼灭日军500余人,破坏铁路五、六十里,桥梁19座,使日军一个月不能通车。3月,侵占大同之日军万余人进犯晋西北根据地,120师各部经20余天作战,把日军赶回大同,收复了广大地区。

129 师主力进入太行山区,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29 师主力在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张浩(后为邓小平)领导下,1937 年 11 月中旬开赴晋东南地区。在同蒲路东侧、正太路南侧和平汉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地区发动群众,开辟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2 月,打退日伪军在寿阳以南发动的六路进攻。次年 2 月,截断石太路,消灭日军两个中队。3 月,在神头岭、响堂铺附近伏击歼灭日军 1500 余人,焚毁日军汽车 180 多辆。4 月,在武乡东面长乐村和高平附近的战斗中,又歼灭日军 4000 余人,收复县城 18 座,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把日军赶出了晋东南。从此,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基本上为我军控制。1938 年 4 月下旬,正式成立晋冀豫军区,为向平原地区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15 师主力进入吕梁山区,建立晋西抗日根据地。太原失陷后,晋中的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向西、向南溃退,日军于 11 月先后占领平遥、交城、文水。115 师主力于 1938 年 2 月进入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3 月上旬,林彪负伤后被送回延安,此后 115 师一直由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同年春,日军占领临汾后,一路沿同蒲路继续南下,占领风陵渡,另一路西犯大宁,妄图强占黄河渡口,进犯我陕甘宁边区。115 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保卫河防、保卫陕甘宁的指示,与日军展开英勇作战,在大宁附近激战五昼夜,毙伤日军千余人,打退了日军的进攻。3 月,第 685、686 团在午城、井沟战斗中歼灭日军 800 余人。9 月,又粉碎了日军向吕梁山的进攻,毙敌 1000 余人。这些作战,巩固了黄河防线,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为建立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至此,八路军根据地——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四大战略根据地得到巩固。

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太原失陷后,为了发展华北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为了配合和支援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的作战,1938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刘少奇等发出《对平原游击战指示》,要求我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同年 10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评了那种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思想和轻视游击战争的观点。全会确定了大力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并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根据上述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各部在留出部队坚持和发展已创建的四大战略根据地的同时,各师主力分别挺进冀、鲁、豫平原地区,协同当地军民广泛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我军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挺进平西、冀东和平北

为开辟平西地区,取得向冀东发展的基地,1938 年 3 月,115 师邓华支队挺进平西。

同年5月,120师宋时轮支队由雁北进入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7月,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纵队经平北向冀东地区挺进,连克昌平、延庆、兴隆等县城,并相继攻占平谷、宝坻、蓟县、丰润等城。同年底,第四纵队由冀东向平西转移,冀东地区由李运昌率领游击队坚持斗争。

1939年1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以第四纵队为基础,在平西成立了冀察热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平西、冀东和平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挺进军粉碎了日军对平西地区的五路进攻,开辟了涞水、房山、涿县三县平原地区的工作,加强了武装建设,至11月,主力军与游击队已扩大到3.2万余人。11月,挺进军确定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方针。翌年3月,粉碎了日军对平西地区的“扫荡”,歼灭日军800余人,使平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4月,挺进军一部进入平北,建立了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县的政权,平北地区的工作得到发展。

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原国民党东北军第53军第691团,在中共第53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回师冀中,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同年底,人民自卫军调赴晋察冀区整训,次年1月返回冀中。4月,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设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7月程子华接任)。

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日军对冀中区发动了两次“扫荡”,冀中区的大部分县城为敌伪所占,形势日趋严重。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主力一部,由晋西北开赴冀中,于1939年1月到达河间县惠伯口与冀中军区会合。2月,120师与冀中党政军共同组成冀中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统一指挥冀中的党政军民工作。随后又成立了冀中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吕正操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120师和冀中军区部队。3月,八路军部队消灭了公开叛变的原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柴思波部。3月和4月,歼灭了日军吉田大队800余人,取得了平原歼灭战的胜利。6月,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进占我冀中深县地区,八路军部队采取分割包围战法,共毙伤顽军500余人,俘顽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将反共专家张荫梧赶出了冀中。至8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120师由冀中向北岳区转移,参加巩固北岳区的斗争。9月,120师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消灭侵占陈庄之日军1200余人,击毙日军旅团长水原。10月,又在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余人,击毙了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日军哀鸣:“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开辟冀南根据地

1938年1月,129师第386旅副旅长陈再道率八路军东进纵队,进到隆平地区。3月,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到达南官,加强了冀南的军事力量。五月初,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该师主力一部到达冀南地区。至6月上旬,先后占领了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永年、成安、肥乡等县城,开辟了卫河东西和漳河以北广大地区,消灭敌

伪军 2000 余人。与此同时,129 师第 386 旅政治委员王新亭率第 771 团由太行进永年、肥乡、成安一带。至此进入冀南之 129 师部队完全展开。

1938 年 7 月,129 师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政治委员邓小平领导下,将先后进入冀南地区的部队和在冀南收编、组建的部队进行了整编。8 月下旬,为牵制日军向潼关、洛阳进攻,八路军总部令 129 师乘势开辟漳河以南地区。该师以陈再道、王新亭率青年纵队、东进纵队等部,进行了漳南战役,连克大名西南回隆镇等重要据点,消灭伪军 4000 余人。随后,组成漳河兵团,由王新亭、杨得志指挥,继续南进,解放了滑县及道口镇。至 9 月下旬,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 3 个县的抗日政权。

1938 年 12 月,刘伯承、邓小平奉八路军总部指示,率 129 师主力一部进入平汉路东,直接领导冀南和鲁西北的斗争。翌年 1 月,日军以 30000 余人的兵力,分数路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军主力分成几个集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同时,我冀南党组织动员群众,协助八路军作战,挖掘了总长数万里的道沟,改造了平原地形,限制了日军快速部队的行动,有利于我军民的隐蔽作战,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有利条件。这次反“扫荡”作战,从 1939 年 1 月 3 日,进行较大战斗 100 余次,毙伤日伪军 3000 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日军在冀南进行大“扫荡”的同时,又向我晋冀豫边区进行“扫荡”。为加强晋冀豫山地的斗争,刘伯承、邓小平率 129 师主力一部从冀南返回太行地区,至 1939 年 7 月,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11 月,115 师第 344 旅第 688 团和独立团进入冀南、豫北、鲁西南地区活动。翌年 2 月,八路军总部为加强冀鲁豫地区的武装斗争,以 115 师第 344 旅代旅长杨得志率旅直进入冀南。四月初将独立团、黄河支队等部合编为冀鲁豫支队,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援下,连续取得了打击日伪军和反“扫荡”作战的胜利。至 1940 年春,在冀南豫北地区新建了濮阳、长垣等 7 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冀南专员公署和冀鲁豫区党委。

1940 年 2 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太南地区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344 旅、独立游击支队、决死第三纵队、民军第四团等部。4 月,为加强冀鲁豫地区的斗争力量,八路军总部决定第二纵队主力东进冀鲁豫地区。4 月底,该纵队主力由黄克诚率领进入冀南地区,随即与冀鲁边部队统一整编为第 344 旅、新 2 旅、新 3 旅,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军区由黄克诚兼任司令员。至此,包括豫北、冀南和鲁西南地区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它东接山东抗日根据地,南至陇海路,西面和北面与晋冀豫根据地相接。

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省党组织从 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1 月,利用日军入

侵、国民党逃跑、人民要求抗日的时机,领导各地人民先后举行武装起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7 年底,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组织平津流亡学生和当地农民,在徂徕山举行起义,成立山东人民自卫队第四支队,在鲁中开展游击战争。同年 12 月,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组织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创建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在鲁西北聊城,当地中共组织帮助国民党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开辟鲁西北抗日局面。

1938 年 5 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 115 师第五支队及 129 师津浦支队挺进冀鲁边地区。7 月上旬,该两支队由冀南进抵乐陵、宁津地区,并与冀鲁边地区人民武装联合,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进攻,打开了冀鲁边地区的抗战局面。为了统一和加强冀鲁边的领导,115 师第 343 旅政治委员萧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率旅直机关一部,由山西经冀南于 9 月下旬到达乐陵,将当地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津浦支队、第五、六支队。整编后,部队即分散开辟宁津、乐陵、沧县、庆云、盐山、东光、南皮等县的抗日斗争。同年 12 月至翌年 3 月,连续粉碎日军的 3 次“扫荡”,歼灭日伪军 1500 余人。至此,冀鲁边游击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8 年年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山东地区各游击支队。翌年 2 月至 5 月,山东纵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整军计划,先后将部队编为第一、二、三、四、五、六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形成了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对山东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以便联结华北与华中,1938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令 115 师师部率第 343 旅迅速进入山东、淮北,开展山东地区的游击战争,增强山东抗战的骨干力量。115 师根据上述指示,除将第 343 旅补充团与晋西 3 个游击大队合组为 115 师独立支队留晋西地区坚持斗争外,由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及第 343 旅,于 1939 年 3 月进入鲁西平原。115 师入鲁极大地增强了山东的抗战力量,对于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8 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在山东地区正式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冀鲁边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10 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机关合并。翌年 5 月徐向前赴延安,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撤销,仍由山东纵队指挥所属各部队。9 月,山东纵队主力已发展到 5 个旅、2 个支队,连同地方武装,总计 5 万余人。至 1940 年底,八路军在山东地区创建和发展了冀鲁边、湖西、鲁西、鲁南、鲁中、胶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的组建与挺进华北敌后,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华北贯彻的一个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高举民族解放、团结抗日的旗帜,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向敌后发展,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为争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地。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

南方各地游击队在统一改编为新四军以后,即奔赴大江南北的敌后战场,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然后继续向东、向北发展。4月下旬,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队(由第一、二、三支队抽调的干部和分队组成)向苏南敌后出动,6月17日首战卫岗获胜。第一、二支队分别在陈毅、张鼎丞率领下,先后进入苏南地区,从6月至8月,取得了新丰、新塘、句容、江宁、当涂等百余次战斗的胜利,牵制了向华中内地侵犯之日军,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在第一、二支队活动地区分别成立了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和江、当、溧三县抗敌自卫会。至12月,初步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第三支队在张云逸、谭震林领导下,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进抵皖南长江沿线的芜湖、宣城、青阳、大通镇一带对日军作战。

第四支队于五月间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至十月,攻克庐江、无为两城,歼灭反动保安团队3000余人,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豫东游击队东进豫皖苏,于1938年7月,在睢(县)杞(县)太(康)地区配合河南省委派出的先遣大队,开展游击战争。10月,由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队由竹沟出发,挺进到豫东,在西华县杜岗与豫东游击队一部及先遣大队会合,合编为新四军豫东游击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大队。10月下旬,部队东渡黄泛区,进入鹿邑地区。11月,深入睢、杞、太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初步打开了豫东抗战局面。

但在这一期间,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军分委书记项英受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影响,“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地妨碍了华中敌后工作的发展。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方针。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兼任书记,统一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南地区党的工作。这就结束了王明的错误领导。会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华中地区逐步得到贯彻执行”。

为实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和具体部署,新四军各部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在华中敌后迅速地实行战略展开,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了新四军。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和 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率新四军一部抵达江北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区的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开展皖中地区的斗争。翌年5月初,叶挺军长根据东南局的指示精神,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同时成立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此时,新四军军部和江北指挥部命令第四支队立即东进皖东。但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拒不执行,公然与上级命令相对抗。在他的影响下,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变。随后,江北指挥部前委对第四支队及江北部队进行整编,由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路东、路西根据地发展成为皖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队一部在皖中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保持与皖南的交通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开辟皖中抗日根据地。

豫鄂挺进纵队和鄂豫边抗日 根据地的建立

1938年3月,由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东进后,中共河南省和豫南特委以确山竹沟镇为开展河南抗日战争的战略支点。武汉失守后,豫南特委以竹沟留守处分队与信阳、泌阳等地游击队合编为信阳挺进队,12月进入四望山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冬,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率一部分干部由延安赴豫鄂边,领导当地游击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翌年6月,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会合,将部队统一编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1939年11月,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将豫南、鄂东、鄂中地区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挺进支队。翌年1月,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下辖五个团队、三个总队,进入大、小悟山地区。至1940年底,鄂豫边区扩大为十几个县的范围,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的游击兵团,建立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的建立和 苏皖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指挥部成立后,陈毅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派由叶飞、管文蔚领导的挺进纵队和由陶勇领导的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向仪征、扬州、天长、六合、泰州地区发展,并控制了扬州、大桥一带长江渡口,开辟苏皖抗日根据地。不

久,苏皖支队与皖东根据地的第五支队打通了联系。至此,新四军已造成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准备北进的有利态势。翌年5月,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部署第一、二支队主力渡江。6月,江南指挥部渡江后,改成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二、三纵队(均由挺进纵队、苏南增援之第二团、新六团及苏皖支队改编)。7月挥戈东进,占领泰兴的黄桥、蒋垛、古溪等地。随后转兵南进,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挺进以黄桥为中心的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根据地。

此时,正是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之际。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加紧反共磨擦,逼我退出黄桥。9月底,韩顽纠集3万余人,分路南下,10月4日进犯黄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等领导下,坚持自卫立场,在政治上彻底揭露韩顽反共投降阴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采取诱敌深入,断其归路,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首歼顽独六旅,再歼顽第三十三师,最后歼顽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等部。至10月5日,新四军歼灭韩顽主力1.1万余人。韩德勤率残部向兴化逃窜,新四军乘胜进入海安、东台。黄桥战役的胜利,为发展苏北抗战奠定了基础。

在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后,坚持苏南斗争的新四军一部,于1940年7月,在茅山地区重新组织了江南指挥部,坚持茅山抗日阵地。为加强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和统一党政军领导,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于1940年5月进入该区。6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坚持苏南抗日游击战争。

建立豫皖苏、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南下与新四军一部会合,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由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豫东游击支队,由河南鹿邑地区东进,进入商丘、亳县、永城地区。5月,进军淮河以北。至年底,游击支队发展到九个团,1.2万余人,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翌年2月,第六支队进入商丘、亳县、睢宁、夏邑、砀山游击区,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6月,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第三四旅(欠第六八七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辖三个旅九个团,共1.7万余人,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留在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任务。

1939年5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主力南越陇海路,进入肖(县)、永(城)、夏(邑)地区,同年5月,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进入皖东北泗县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一部会合,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不久,张爱萍率豫皖省委进入皖东北,设立八路军、新四军联络机构,加强皖东北的斗争力量。1940年5月,顽军韩德勤向我苏皖边之金锁镇、界头集等地进犯。刘少奇指挥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一团等部进行自卫反击,经过13天战斗,将顽军逐回泗阳、宿迁县境。至此,皖东北的形势趋于稳定。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不仅隔断了苏、皖顽军的联系,使韩顽更加孤立,而且为新四军东进苏北开创了新的前进阵地。

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五个团1.2万余人,由冀鲁豫南下,6月到达豫东北永城南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这支部队的南下,为发展华中抗战增加了突击力量。6月底,以八路军新二旅及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九个团,近2万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东进苏北任务。8月东渡运河,进入沐阳、淮阴、宿迁、东海地区,建立了淮海抗日根据地。

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和重建新四军军部

为适应抗战斗争形势需要,1940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华中总指挥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在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不仅统一了整个苏皖地区新四军、八路军的指挥,而且对于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和坚持华中抗战有重大意义。

新四军的组建和挺进华中敌后,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南方贯彻执行的一个重大成果。新四军成立后,在大江南北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这对于坚持华中抗战,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1937年至1938年11月,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报告、演说、著作,对有关抗战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探讨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和战术原则,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及持久战的战略阶段划分,持久战的战术原则和必然结局,并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中国抗战必胜。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在抗战中得到充分印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初期工作,确立新阶段的方针政策。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

治报告和会议总结 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通过了几个党内组织建设法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六中全会阐明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维护和确立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健全了民主集中制,取得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为推动抗战的全面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举行了四次会议,先后听取了叶楚伦、汪精卫、王宠惠、何应钦、孔祥熙分别作的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方面的报告。大会宣言表达了抗战的决心,指出:“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大会通过了党务、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决议案。大会决定国民党设立总裁制度,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训练全国青年“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决定组织成立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大会制定和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概括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基本政治主张的重要文件。纲领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七个部分。规定以三民主义及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的准绳,全国抗战力量要在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外交上,主张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联合一切反日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和取消一切伪组织以及其对内外之行动。军事上,加紧军队政治训练,援助、指导各地抗日民众武装,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政治上,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组织国民参政会,在三民主义及法令范围之内,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的许多条文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共同之处,与战前相比表明国民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均有较大的变化和进步,成为抗战初期各党派基本赞同和认可的政治基础,因而,它有利于人民进行抗战和争取民主,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它与中共的全面抗战纲领又有原则区别,它通篇贯穿着一党专政的精神,企图把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纳入国民党设置的轨道,剥夺人民抗日的自由,后来,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愈益严重,纲领中许多条款成为一纸空文。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1938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6日,国民参政会

正式成立。7月6日至8月15日,首届首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200名参政员中出席者136名,加上出席的政府官员和中外记者共达千余人,是一次空前之盛会。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社会民主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均有代表参加。蒋介石、汪精卫出席大会并致词,政府五院及行政院各部委负责人作了工作报告,这次大会推举汪精卫、张伯苓为正、副参议长。通过的提案中比较重要的有:《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实行民主政治案》、《设立省县参议会案》等。大会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向世界宣布,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拥护政府抗战,争取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和首次大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日寇侵略之势正猛,首都南京已经沦陷,武汉会战正在进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既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一个表现,又是民族精神凝聚的一个象征,同时也给全国各党派人民提供一个发表政见,争取民主活动的重要场所。9月26日,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及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公布。以后还颁布了《县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省市县临时参议会陆续成立。

武汉、广州失守后,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国民参政会首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低谷阶段,日军侵略之势达到顶峰。坚持团结与持久抗战,惩办汉奸、反对妥协投降,争取民主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持久抗战案》、《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严惩汉奸傀儡案》、《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等提案。大会还专门通过一个决议,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持久抗战建国的既定方针,旨在防止妥协投降逆流的泛滥。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政治咨询机构,是战时政治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对政府之施政方针具有建议权、讨论权、询问权。其职能最终受国防最高会议制约。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有听取施政报告及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前项决议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布命令行之”,但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紧急命令权”除外。国民参政员的产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由国民党推举或选任。各党派团体之参政员不由各党派自推,而由国防最高会议选任。并且是以“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名义而不是党派的名义出席。

国民参政会是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抗战建国纲领》规定设立的,它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许诺改善政治机构,建立民意机构的具体措施。它是自清末资政院、各省之咨议局废置以来中国民意机构的重现,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有一定地位和作用,是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独裁政治仅有的一点举动。在抗战初期,它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它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实质。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

战争初期,日本自诩自身武力的强大,对中国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

辅的“速战速决”的策略,妄想一举摧毁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方针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日趋壮大,使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改变了战争初期的侵华策略,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将过去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提出了“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的意见。1938年11月3日,首相近卫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所谓“合作”、“提携”等幌子下对中国进行政治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立,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主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近卫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侵华策略已发生转变,表明日本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前提,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与日妥协,达到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客观上助长了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性和动摇性,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

远东慕尼黑阴谋

武汉失陷后,随着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性。此时,英、美等西方国家,为维护自己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谋求与日本的妥协,促使日本北攻苏联,也积极进行对国民党的劝降活动,多次酝酿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8年9月,英、法统治集团为唆使德、意法西斯进攻苏联,在德国的慕尼黑与德、意签订了出卖捷克的协定,即为慕尼黑协定。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英美等国认为此时是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其军政要员纷纷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游说,利用各种形式大造中日两国可以议和的妥协舆论。他们在日本的压力下,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来寻求与日本的妥协。

1939年4月,日本利用中国志士在天津英租界刺杀一名汉奸的事件,于同年6月封锁了天津英租界。7月15日,英、日两国就此事在日本东京开始谈判,并于24日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和姑息日本侵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法等国无暇东顾,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远东慕尼

黑阴谋’的主要策划者。1940年4月,美、英、法三国驻华大使一齐约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政府及时对日媾和,否则,中国“将来万一无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

1940年6月,德军入侵法国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线,对华实行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锁了滇越铁路;7月15日,在日本的压力下,英国也同意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战时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被切断。

综上所述,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在欧洲战争危机日益加深的影响下,英、美等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殖民利益,而奉行了牺牲中国、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实际上是慕尼黑阴谋在远东地区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困难。对此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而自己则“借收渔人之利”,揭露了国内外投降派的阴谋活动,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念。

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1938年武汉陷落后,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域日益扩大,包括东北三省在内,面积已达250万平方公里,大于其本土面积的9倍。为巩固被占领地域,日军从各方面强化了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它强调:总体战发展到顶点,就要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运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四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具体来说,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确定“以华制华”的方针,建立各级伪政权。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所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是1932年3月在东北地区成立的伪“满洲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虽然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广大地区,然而却无法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征服中国迫其投降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对此,国小、兵少、资源贫乏的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为其战争服务,“冀图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因而制定了“以华制华”的战略方针。随着这一方针的推行,日军在其军事势力所及之处,加紧了各级殖民统治机构的建立。先后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炮制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拼凑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到1940年3月更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与此同时,各地方政权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从而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

军事上,组建伪军组织,实行“治安强化”政策。七七事变后,随着日军作战区域的日益扩大,兵力不敷的矛盾日渐突出,于是大力拼凑伪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发展,组建和收编伪军的工作也加紧进行。战争中后期,国民党部队以“曲线救国”的旗号大量投降,使伪军的数量大增。据《解放日报》1943年公布的数字,该年伪军总数已达62万人之多。名目繁多的伪军组建后,在日军的驱使下参与扫荡、清乡等“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抗日力量,维护殖民统治。

经济上,实施“以战养战”,强化殖民掠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陷于中国人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中而无力自拔。长期战争极大地消耗了资源贫乏的日本。因此,为维持长期而稳定的军需供应,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因而强化了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这种掠夺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矿业。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地区除原有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外,又设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这两个经济组织,完全垄断了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到日、伪投降时,其资本在东北的工业中高达99.15%。

日本对中国关内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和控制,采取了“军管理”、“委托经营”、“租赁”和“收买”等多种形式。其中,1938年以前日本侵略者掠夺的方式,在华北是采用“军管理”,在华中是采用“委托经营”。后几种形式,则主要是日本侵略者通过强制加以实行的。1938年11月,日本在北平和上海同时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与“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负责对华北和华中地区的经济掠夺。前者垄断了华北的煤、铁、电力、交通等主要部门,到1941年已发展到64个附属公司。后者控制了华中地区的铁、煤、盐、水、电等企业的生产与销售,到1944年,也已拥有了16个附属公司。以上两大国策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了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殖民掠夺的巨大而复杂的吸血管道,极大地强化了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农业。土地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首要目标。在东北,为适应日本国策的需要,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共向东北移民达到23万,掠夺的土地超过22万公顷。在关内,七七事变前,有日侨8万余人,至1941年秋已激增至67万余人。大批移民尤其是农业移民涌入中国,掠夺了中国农民的大片土地,使无数的中国农民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了严格的“统制”政策,以后发展成为强制购销,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出售。在关内,对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的掠夺和征收更是嚣张。如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700吨,造成众多地区粮荒不断。沦陷区的劳动力也成为日本掠夺的重要对象之一。据资料显示,截至1944年,东北地区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至死的占总数的20%。1942年以前,华北地区被劫去的壮丁劳动力接近600万人。致使中国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金融业。日本在金融方面对中国掠夺和控制的罪行同样是罄竹难书。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在东北设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大量伪钞。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关内先后新设20余家银行。其中较大的有设于张家口的“蒙疆银行”、北平的“中国准备联合银行”、南京的“中央储备银行”、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日本通过这些银行发行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钞票,一方面掠夺沦陷区的物资,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同时欲取代法币在沦陷区的信誉,夺得金融垄断地位。

思想文化上,摧残中华民族文化,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控制思想文化,作为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摧残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正如日军所言:“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动派势力展开积极

的斗争,有效地对敌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按此要求,日军在东北曾下令关闭所有的学校,收缴并焚烧一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书籍,迫害各级教员。在关内,七七事变后,在中国的 18 所高等学校中,遭受日军破坏者即达 9 所,至于迫害、屠杀师生的案例更多。日军在摧残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同时,通过日、伪政权,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王道主义”、“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建设东亚共荣圈”等反动谬论,删去中小学教材中一切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内容,极力宣传封建主义的奴隶道德以及所谓以尊孔读经为主要内容的“东方文化”此外,还规定日语为必修课、改组大学、设立新民学校等等,系统地进行奴化教育,达到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目的。日本在沦陷区所实行的种种殖民统治政策,激起沦陷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反抗与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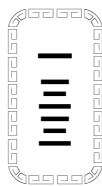
国统区的战时财政经济措施和成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 年 3 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作为战时财政经济的方针政策共有 8 条。这 8 条的核心是:其一、以军事为中心;其二、实行计划经济。按此方针政策,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建国”的财政经济措施。

在工矿业方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实力,以利长期持久的抗战,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的内迁。到 1940 年底,共内迁工厂 639 家,其中民营厂家 452 家。这些企业主要有机械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电器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等。从而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二是鼓励与扶植大后方工矿业的发展,尤其是建立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重工业基地。中国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云、贵、川等省,工业基础十分落后。战前重庆的机器工业只有 10 余家,到 1940 年已发展到 133 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在大后方也新建了一批厂矿。到 1943 年底,共建电力厂 159 个、炼钢厂 8 个、机器厂 5 个、电器制造厂 10 余个、煤矿 10 余家。这一时期,国统区民营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到 1941 年,大后方新建的民营工厂已达 1300 余家。这些国营和民营厂矿的建立,促进了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与壮大的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持久抗战准备了物质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战前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的格局。

在农业方面。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农业问题提出了一项《战时土地政策法》,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大纲”。据此,1938 年国民党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了农业促进委员会,并在各省、县设立农业推广站,以改良农作物和防治病虫害,维持军粮民食之供应。1940 年又在农村部下设垦务总局,在西南、西北成立垦区管理局 13 处。到 1945 年,共迁徙屯垦军民 7 万余人,开荒 44 万多亩。此外,在畜牧、棉花、蚕丝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良与发展。

在交通运输方面。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



运,增筑铁路公路,开辟航运”任务,国民政府专门组建了交通部。从 1937 年至 1945 年,新建了湘桂、黔桂、宝天等长短 7 条铁路线,总长 1000 多公里。公路主要完成了 3 条线路,即重庆至兰州、重庆至昆明、泸州至昆明,总长 2800 余公里。同时,打通了滇缅国际公路全线,以后又打通了中印公路。到 1943 年,西南 5 省的通车里程达到 17000 多公里。水运路线主要是扩展长江、嘉陵江等航线,到 1943 年,航线超过 12000 多公里。

在财政金融方面。主要采取了增税、举债、增发纸币以及经济统制等措施,这对增强国民政府的经济力量,增加财政收入,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很大作用。

汪精卫叛国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调整,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党内的汪精卫集团,是亲日投降派。抗战开始后,汪精卫就患“恐日病”,极力散布民族失败主义,认为中国处于“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之中”,根本没有力量抵抗日本的进攻,只有对日本“和平”(即妥协投降)。随后,以他为中心,包括周佛海(国民党中央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陶希圣(国民党参政员、艺文研究会研究总干事)、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积极开展所谓“和平运动”,鼓吹对日妥协投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发表后,汪精卫认为“和平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派其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大学教授)等人到上海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影佐祯昭会谈,达成《日华协议记录》。主要内容是: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驻扎中国;承认“满洲国”;承认日侨在中国境内杂居、经营自由;承认日本对中国经济有优先权,并提供“特殊方便”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中国应补偿日侨的损失等。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汪精卫的卖身契。此外,还制定了汪精卫叛逃的计划。

12月19日,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及其主要同伙周佛海、陈璧君(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汪妻)、陶希圣、曾仲鸣(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等离重庆叛逃河内。2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也追随汪由成都逃往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并宣称愿和中国“具有卓识人士合作”。12月29日,汪精卫从河内发出一封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长电,公开拥护近卫声明的“三原则”,并声称:“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叛国的“艳电”。1939年4月中旬,汪精卫等人在日本保护下,离开河内到上海,5月底,汪精卫等人赴东京,与日本首相会谈,就以汪精卫为首建立新的中央政府达成了谅解。8月底,汪精卫等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宣布修改国民党总纲废除总裁制,成立伪中央领导机关,汪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2月30日汪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导演下,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在南京粉墨登场,正式成立伪南京国民政府。

南昌会战和随枣会战

为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作战经验,确定中日相持阶段的军事方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作了辩解,对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和军事上的失误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整军的重要任务,并根据战场态势重新调整了战区。会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挥方针》,按此方针,国民党正面战场继续抗击日军。从1939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正面战场同日军进行了十几次较大规模的作战。

南昌会战 1939年3月17日,日军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确保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安全,而向南昌、武宁等地发动了进攻。23日,日军强渡修水,24日猛攻南昌,27日南昌陷落。为此,中国守军调整战略,殊死抵抗,从4月21日起反攻南昌,收复了南昌外围的一些地区,并一度攻克南昌车站和飞机场。但日军在空军和炮火支援下固守南昌,并不断反扑。中国军队伤亡很大,第三十二集团军所属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中将殉国。5月19日中国军队奉命停止攻击。

随枣会战 1939年5月初,日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20余天的会战。5月7日,日军攻陷随县、枣阳,12日攻占桐柏。15日中国军队发动反攻,16日收复桐柏,19日收复枣阳,23日攻克随县。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000余人,恢复了已失阵地,达到了牵制和消耗日军的目的。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中国国民党军在长沙以及湘北、赣北、鄂南广大地区组织了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军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把战争中心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准备加紧“扫荡”。同时,拟定了攻占长沙、衡阳、宜昌、西安等重要城镇的作战计划,企图压迫蒋介石投降,促成汪精卫登台,以求早日结束战争。驻武汉地区的第11军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9月初即制定了湘赣作战计划,加紧调集兵力,准备由湘北、赣北、鄂南地区发起攻势,兵分三路进攻长沙,企图首先夺占长沙,尔后向西南发展进攻以夺占衡阳,并规定9月底占领长沙。9月13日,第11军指挥所转移至咸宁,并集中了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上村、奈良支队,以及飞机100余架。

湖南及江西、湖北部分地区守军为国民党军第9战区,辖52个师,兵力雄厚,为各战区之首。会战中,会战兵力达35个师,24万人,由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统一指挥。

9月14日,日军为隐蔽主攻方向的行动企图,以第106师团及第101师团一部,首

先向会埠守军第 184 师阵地发起了进攻,第一次长沙会战遂正式开始。

双方以争夺长沙为核心在湘北,赣北和鄂南的广阔战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彼此都付出了重大代价,至 10 月 14 日,双方恢复了战前态势,第 1 次长沙会战遂告结束。此次会战,历时 1 个月,国民党军有效地粉碎了日军作战企图,计毙伤日军 3 万余人,自身伤亡 4 万余人。

桂南会战和 1939 年冬季攻势

桂南会战 日军为切断中国西南中越国际交通线,于 1939 年 11 月 15 日在钦州湾强行登陆,24 日占领南宁,不久又攻占了龙州、镇南关,切断了中越国际交通大动脉。12 月 4 日,日军又攻占了军事要地——昆仑关,西南震动。对此,中国军队集中了第四战区的原有部队和其它战区的驰援部队,以昆仑关为攻取目标,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昆仑关几度易手。1940 年 2 月 24 日,中国军队再度夺回昆仑关。攻取昆仑关,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诸兵种协同作战,对日军攻坚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它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此后,中国军队继续在桂南发动攻击,10 月 28 日收复了龙州,30 日攻克南宁,11 月 30 日,终将日军逐出桂南。

1939 年冬季攻势 1939 年 10 月,中国军队第二期整训完成,部队的作战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为消耗日军,检验斗志,国民党各战区对日军发起了冬季攻势。12 月 1 日,第一战区在豫中向陇海路及其附近实施战略攻击,曾切断这一带的铁路、公路交通,并一度攻入开封、沁阳。第二战区发动晋南攻势,克复黎城、涉县、潞城。12 月 16 日,第三战区向日军盘踞的长江下游发动攻击,并一度攻入杭州、余杭城内。1940 年 1 月 1 日,第四战区对进犯粤北之敌实施打击,连克众多县城,取得粤北大捷。12 月 12 日,第五战区部队在鄂北向平汉路南段之敌发起进攻。第六战区也发动了湘西攻势,并一度占领岳阳车站。12 月 18 日,第八战区在绥西发动攻势,破坏了平绥铁路,收复了五原,并一度攻入包头,第九战区发动了鄂南、赣北攻势。与此同时,冀察战区、苏鲁战区也就近对日军发动了攻击。“冬季攻势”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也是唯一一次积极的带有进攻性的作战。

枣宜会战

日军自 1938 年 10 月底占领武汉后,其第 11 军即配置于九江、岳州、钟祥、信阳地区,以拱卫武汉。1939 年 3 月,日军攻占了南昌,构成了武汉中心地区的东南屏障。4 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势作战,尤其是第 5 战区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平汉线南段频频出击和袭扰,并以第 21 集团军在鄂豫皖边区实施游击作战。同时,第 31 集团军主力由湘北移驻枣阳,加强了第 5 战区的实力,使武汉地区日军侧后受到威胁,牵制了其南下长沙和北上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行动。而在国民党军发起的“冬季攻势”作战中,

日军又遭到了沉重打击。鉴于国民党军主力仍在其周围,战略形势对其形成了不利态势,为激励士气,消除国民党军对武汉的威胁,第11军于1940年4月中旬起,集中第3、第13、第39师团及第6、第40师团各1个支队,计10万余人,在钟祥、随州、信阳地区集结,另从关东军抽调第4师团向武汉地区增援,准备发动进攻,企图首先歼灭襄河以东地区国民党军第5战区主力,尔后渡过襄河,向宜昌发展进攻,叩击重庆的大门,以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配合其他地区的进攻行动,达成诱使蒋介石接受丧国和平条件之目的。

第5战区在4月初获悉了日军军舰在上海与汉口间频繁往返,武汉地区日军明显增多的情报。4月13日至14日,第5战区召开了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商讨对策。随后,战区集中主力,准备以38个师的兵力,由司令长官李宗仁统一指挥,在北起豫南,经樊城、宜城、荆门至当阳一线东侧地区抗击日军的进攻。具体部署:襄樊防线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配置于第一线,右集团军由总司令张自忠指挥,左集团军由总司令孙连仲指挥,中央集团军由总司令黄琪翔指挥。

此次地战于1940年5月1日打响,战况异常激烈,国民党军英勇奋战,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战斗中,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壮烈殉国。日军占领了枣阳,6月24日再次占领,宜昌。其后,日军主力集结于当阳及襄河一带,国民党军则据守江陵、宜昌、当阳、钟祥、随州、信阳一线之以北地区,双方形成对峙,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国民党军毙伤日军2.5万余人,俘其53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国民党军第9战区部队与日军第11军始终在新墙河一线对峙。1941年春,日军企图利用上高战役牵制赣北国民党军主力,尔后乘机西进,突进至长沙翼侧,配合湘北日军南下攻占长沙。但由于日军在上高战役中失利,致使上述企图未能实现。此时,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在夏秋之际发起攻势。新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参加了上述“计划”的拟定,到任后即积极筹划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由于6月苏德战争爆发的影响,日军在“南进”还是“北进”问题上犹豫不决,第11军的作战计划被暂时搁置。之后,日军大本营一方面加强了对苏作战的准备,增兵中国东北;一方面加强了对国民党军的军事压力,企图促蒋投降,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遂批准了第11军的作战计划,并明确“要‘摧毁敌抗战企图,予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要求在长沙以北地区歼灭第9战区主力,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一周年(9月27日)时攻占长沙。8月21日,第11军令各部秘密向岳阳以南地区集结。集中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早渊、荒木、江藤、平野4个支队,以及飞机180余架、舰艇30余艘、汽艇200余艘和海军陆战队1个大队,共近15万人。阿南惟畿吸取了上次会战分散兵力的教训,决定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并准备在正面进攻之前首先对大云山进行“扫荡”,既可解除后顾之忧,又可掩护主力集中。

根据日军动向,第9战区于3月份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明确如“敌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福临铺古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攻,则诱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此时,第9战区在新墙河南岸配置了第4、第20、第58、第72军计4个军的兵力,总兵力12个军33个师,共17万余人。

日军第6师团主力,于9月7日在飞机支援下,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向大云山地区发起了进攻,第二次长沙会战拉开序幕。由于战争进程中日军破译了第九战区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遭受了惨重伤亡。

26日,薛岳令各部组织“督战队”,收容整顿溃散的部队。白崇禧也曾前往衡阳督战,但战局未能改观。29日,日军攻占长沙。

日军经连续作战,认为打击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上人员伤亡和粮弹消耗极大,且输送补充粮弹的50余辆装甲车被守军悉数击毁,已无力继续发展进攻,遂于10月1日黄昏开始,在飞机掩护下实施退却。

9日,日军第11军各部撤回新墙河以北,转取守势,与第9战区再次形成了对峙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遂告结束。此次会战,历时月余,日军计伤亡2万余人,第9战区伤亡(包括被俘、失踪)达7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23日至1942年1月16日,中国国民党军在长沙及其以北地区抗击日军进攻,尔后实施大规模追击的反击战役——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军太平洋舰队主要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在此前后,日军同时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发动了进攻。8日,广州地区日军第23军又向英军占领的香港发起了进攻。由于日军作战范围不断扩大,战线拉长,兵力愈感不足,国内经济更加困难。据此,日军积极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其侵华日军一方面疯狂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继续对蒋介石政府进行诱降,并不断施加军事压力,企图尽快促蒋投降,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转用兵力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9日,国民党军为策应英军在香港的作战,令第4战区部队向广州发起进攻,以牵制日军的兵力和行动,第9战区第4军和暂编第2军也从长沙附近南下。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使日军深感忧虑。为此,日军秘密调集兵力,准备第三次进攻长沙,并计划于1942年元旦前攻占长沙,尔后直取衡阳,打通粤汉线,衔接广州、香港,进而沟通与东南亚的联系,以中国的中南地区作为其进攻东南亚的“后方基地”。

13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下达了再次进攻长沙的命令,并迅速集中了第3、第6、第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共12万余人的兵力。

11月17日,第9战区在长沙召开了作战会议,总结了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薛岳要求各部队加紧备战,并制定了代名为“天天炉战”的作战计划,提出了号称“天炉法”的后退决战战略方针,即在新墙河、汨罗河之间设伏击地带,以浏阳河、捞刀河之间作为决战地区,动员群众翻地蓄水,在战区内破坏道路,严密乡镇保甲制度和组织民团武装,配

合主力作战,通过诱敌深入,在湘北地区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将日军围而歼之。其作战原则:“以少数兵力守阵,控制主力,机动运用”;“固守新墙河、汨罗江两岸既设阵地,迎头痛击南犯之敌。予敌以重创后,相机放开正面,向右侧翼转进,占领翼侧阵地,形成长沙核心之外围。诱敌南进,俟长沙核心猛力迎击,在敌攻势顿挫之际,即向敌侧后发动攻势,与长沙核心互相呼应,夹击南犯之敌,聚而歼之。”薛岳强调:“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20日,军委会将第4、第73、第74、第79军划归第9战区指挥,并令各军迅速奔赴湘北地区。薛岳及时召开会议,根据原定的作战方针和计划,进一步调整了部署,集中了13个军33个师的兵力,计17万余人。

此次会战,历时25天,日军以惨败而告终,计伤亡近5.7万人,其中10名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毙命,被俘139人。第9战区将士英勇作战,大获全胜,伤亡不足3万人。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做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讲话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报告,确立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动摇开始表面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转变的标志。从此,国民党就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扰共,制造了多次反共磨擦事件和反共惨案。从1939年3月至1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各地先后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惨案,杀害共产党军政人员1600余人。到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局部磨擦发展到几个地区同时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正义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陕甘宁边区。12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陇东、关中等分区的5座县城,并集中力量妄图进攻延安。二是山西。12月,国民党军分别向晋西、晋东南的抗敌决死队进攻,摧毁阳城、长治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制造了“晋西十二月事变”。三是在冀南,九十七军朱怀冰、石友三等受蒋介石指使,率部进攻八路军部所在地——太行山区。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各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击,给予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并驱逐了绥德分区5个县的国民党官僚,使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联成一片。在山西,八路军在给晋军以严重打击后,与阎锡山划定了分区防御的协议。在太行山区,八路军坚决消灭了执迷不悟的朱怀冰部3个师。到1940年4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均被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皖南事变和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磨擦的重心移到华中地区,把矛头对准新四军,不断对新四军的皖南、苏南、苏北、皖东、皖中等地区的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顽固派于1940年7月16日提出《中央提示案》,无理要求在华中地区坚持抗日战争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电到后1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11月9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佳电》,驳斥《皓电》。《佳电》陈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3年的团结抗战中,抗御众多日军,收复广大失地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严辞拒绝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北移的无理要求,并声明,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挽救民族危亡,愿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但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政策为怯弱可欺,于11月14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订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确定第一步以第3战区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5战区兵力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和新四军。11月30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要求积极准备,给敢于大举进犯者以迎头痛击。1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规定新四军北移路线和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呈文。蒋介石批准了该呈文。8日,何应钦、白崇禧给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齐电》,坚持《皓电》立场和无理要求。9日,蒋介石下达所谓《限期新四军北移手令》,命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中共中央一方面电令新四军皖南部队迅速北移,一方面要求华中及山东的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坚决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由泾县云岭分3路出发,开始经苏南向江北转移。结果,在崇山环绕的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顽军8万余人的包围。新四军奋勇自卫,冲杀血战,仅2000余人突出重围,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顽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遭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殉职。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命令和谈话,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使国共合作面临全面破裂的危险。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中共中央一方面准备在军事上进行自卫,一方面在政治

上发动反击。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进攻新四军,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停止反共内战。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由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分任1-7师师长。全军共计9万余人。此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日,开展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一致反对,他们纷纷通电对国民党蒋介石提出严正谴责。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国际舆论也对国民党提出责难,主张国共应继续合作抗日,从而使国民党蒋介石陷入了内外孤立的境地。为摆脱窘境,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国民政府宣布于1941年3月1日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

皖南事变使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不同程度上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促使他们为团结救国,为争取自身生存和民主权利而日益开展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成为抗日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1941年3月,在原“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由张澜、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曾琦、张君勱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10月在香港正式发布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强调加强团结,抗战到底,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有“第三党”(即后来的农工民主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后来还有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工商业者等个人盟员)。自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顽固派由比较积极抗日、注重团结转向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排斥异己,经济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肆意侵吞,疯狂掠夺,越来越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层及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民盟的成立,正是反映了这一部分社会力量的要求。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主张抗战到底。它的成立,反映了皖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日益孤立。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民盟是“中国民主运动之生力军”,对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在批驳顽固派反共谬论的同时,丰富和完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向全国人民阐明了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路线的纲领政策。

第一,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在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及两大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即:从革命的阵线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不再是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革命的领导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已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这种历史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从革命的前途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在条件具备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第二,全面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个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但同时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三,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

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丰富和完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体系,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百团大战

1940年夏秋,德国法西斯军队席卷西、北欧。德国的战争疯狂对日本军阀是一个强刺激,使日本军阀的战争狂热到了极高的程度。因此,日本军阀急欲结束对华侵略战争,以拔出脚,跨进世界战争的行列,实行南进政策。然而,此时日本国内经济情况不断恶化,黄金储备严重不足,要在国力、军力不足的情况下,迅速解决已经持续3年,并且越陷越深的对华侵略战争,是十分困难的。为此,日本军阀对国民党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先是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进行诱降,继而,采取以战迫降的方针。蒋介石在日本军阀的诱迫下,答应于1940年8月与日方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举行会谈。中国抗战面临着中途妥协的严重危机。在此形势下,日本军阀还加紧在华北推行“肃正建设计划”,把进攻矛头全面指向八路军。为了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日军在华北共修筑据点3000余个,碉堡1万以上,占领铁路5000余公里,公路3万余公里。日军用铁路、公路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把抗日军民紧缠起来。这就是日军的“囚笼”政策。刘伯承曾形象地对“囚笼”政策进行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粉碎日军对八路军的全面进攻,争取华北战局的有利发展,阻止蒋介石的投降活动,八路军总部毅然决定发动百团大战。

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军区100多个团,在5000里漫长战线上,向各交通沿线大小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击,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整个战役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总计进行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消灭敌伪据点2993个,缴获长短枪54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以及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里,桥梁、车站、隧洞等260处。八路军指战员光荣负伤、不幸中毒及捐躯沙场者,亦有1.7万余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加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的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从敌人的招供中也可看出,国民党正面战场这时已经降到次要地位,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了。

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于1941年10月至12月,在山东省沂蒙山区发起了反击日军大规模围攻的一次作战。这次作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破

了日军摧毁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取得了歼灭日伪军 2000 余人的胜利。

1941 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将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在继续对国民党当局实行诱降、劝降的同时,集中主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推行“捕捉奇袭、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清剿、反转电击、长途奔袭”等一套新的战术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山东沂蒙山地区属鲁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 115 师和山东纵队兼山东军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为领导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这一地区,群众经过初步发动,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和民兵自卫队,特别是 1941 年以后,山东分局根据上级指示,建立了统一的山东军政委员会,规定了山东分局管辖区内的一切武装力量,统归第 115 师指挥,并在进一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军区和民兵建设,从而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根据地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日军“扫荡”的兵力非常强大,抗日根据地北部还有国民党顽军的威胁,而抗日根据地内的群众发动还不够普遍深入,地方军区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还不够坚强,党政军统一领导刚建立不久,因而要粉碎日军即将实行的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日伪军把对沂蒙山地区的“扫荡”看成为在山东推行第 3 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大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采取铁壁合围、辗转电击、分割封锁、“抉剔”、“清剿”等作战手段和“三光”政策,一举歼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10 月上旬,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根据当前敌情,发出了备战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实行空室清野,动员群众积极参战与支援战争,建立与健全各级军区组织,加强民兵和地方武装,紧缩机关和后方,并确定反“扫荡”的作战方针是: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消耗、牵制、迷惑日军,保证主力机动作战;以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的游击战争,主力部队适时跳出日军之合围圈,转到外线,寻机打击日军之一路,或乘虚袭击日军后方,相机攻克一些据点;当日军“扫荡”某一地区时,其他各区应积极对当面之日军进行破袭,或挺进日军侧后,打击和牵制日军,断敌交通和补给。在这场历时 50 余天的“合围与反合围、清剿与反清剿、撤退与反击的较量中,八路军 115 师和山东纵队灵活机动的战术,顽强作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破了日军摧毁山东党政军抗日领导机关、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取得了歼灭日伪军 2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抗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后方,牵制了日军的入关作战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从 1938 年起,日军为消灭东北抗日武装,解除后顾之忧,而大量增兵东北,从而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东北抗联的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寇展开了艰苦卓

绝的战斗。

1938年至1940年,抗联各路军仍以分散奇袭的游击战争,继续抗击日军。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率领下,转战于长白山区。1938年8月,在辑安长岗彻底消灭了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景清旅。1939年初,在吉敦铁路哈尔巴岭歼灭日军400余人。据日伪统计,仅1939年6月至12月,抗联第一路军就与日伪作战276次。因此,1939年10月以后,日寇加紧了对抗联第一路军的全面“讨伐和围剿”。为保存实力,冲破“讨伐”,一路军各部决定化整为零,转入山区,继续斗争。1940年2月23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濛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陷入敌人重围之中,被俘壮烈牺牲。残暴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剖开腹部,发现他的肠胃里只有树皮、草和棉絮。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在副司令魏拯民的率领下,在长白山区继续坚持艰苦的斗争。抗联第二路军在周保中率领下,活动于松花江以南地区,打击敌人。1938年10月上旬,抗联女战士冷云等8人,为掩护部队转移,在子弹打光、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宁死不屈,跳入江中,这就是著名的“八女投江”。此后,第二路军在青虎山、苏家店、老窝等战斗中都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抗联第三路军在李兆麟统率下,奋战于黑龙江、嫩江平原。1939年春,袭德都县田家船口,俘日本县长及伪满警察20余人。此后又攻取河县、克山县、肇源县,对日伪统治的中心哈尔滨造成很大威胁。1940年以后,东北抗联各部在反击日伪“大讨伐”的战斗中,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总人数由3万人锐减至2000人。1940年1月24日,中共确定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决定抗联各部编为10个支队,继续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调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为持久抗战奠定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大力开展了经济建设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发展农业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制订了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等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停止使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之政策,而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方针。此后,中共中央一再发布文件,继续强调这一政策。减租减息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削弱了封建经济,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面积扩大,农田水利的兴修和实行科学种田。

发展商业 发展商业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商贸“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

根据地贯彻并执行了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的政策。前者措施打击了日伪和奸商的破坏和扰乱,保证了军需民用的物资供应。后者实行贸易自由,鼓励私人商业,繁荣了各根据地的贸易,有利于长期抗战。

发展合作事业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非常落后,合作事业成为吸收小股资金,组织群众发展经济的纽带。根据地合作事业的宗旨是 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定物价、改善民生。1939 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合作社暂行规程》,活跃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创办银行 为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解决抗战财政困难,各根据地都相继建立了银行。在华北,先后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在华中,先后成立了淮南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南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基本任务是发行货币,扶持生产。这对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进贸易,巩固政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大生产运动

1941 年和 1942 年,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和困难的时期。1941 年后,日军集中侵华总兵力的 75% 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对其已占领地区,实施“清乡”,加强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对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实行“蚕食”,大肆修筑封锁沟、墙,集村并户,制造无人区;对解放区,则不断进行疯狂“扫荡”,妄图以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扼杀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重庆国民政府为扼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也调派 70 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等各敌后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同时,1940 年到 1942 年,华北地区又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农业严重歉收。天灾人祸相加,敌后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由 1 亿降至 5000 万以下,八路军由 40 万减少到 30 万人。军队供应不足,群众生活十分艰苦,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在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战胜困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从 1938 年 7 月起,八路军留守延安的部队就开始尝试进行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自救活动,取得一定成效。1939 年初,中共中央依据根据地留守兵团生产自救的经验,提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口号,并在边区政府成立总生产委员会领导生产运动。但是,1939 年到 1940 年,生产运动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局限在陕甘宁边区,尚不足以缓解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 年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

规模生产运动’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都积极加入开荒、种田、纺纱、织布等生产活动，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经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在军民大生产运动高潮中，第 120 师的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在南泥湾实行“军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的模范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蓬勃展开，农工商业得到全面发展，克服了经济困难，保障了供给，并储备了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解放区军民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密切了党政军民及官兵关系，使共产党深得民众的拥护。

共产党巩固和加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

为渡过困难时期，赢得抗战胜利，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以巩固和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

首先是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0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 1/3。“三三制”本为组成抗日政权的人员分配原则，后来逐渐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代称。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共产党按照这一原则普遍建立或改造了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1940 年 7 月，共产党向全国明确宣告推行“三三制”。1941 年，陕甘宁边区着手进行“三三制”政权的普选。全边区 80% 的人参加了选举。按“三三制”比例，选出了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又选出政府委员会。11 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选举林伯渠等 18 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华北、华中各敌后根据地政权也先后贯彻“三三制”原则，吸收各抗日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到各级政府。

“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力量，扩大和巩固了敌后抗日政权的基础，加强了对汉奸和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其次，进一步贯彻实施减租减息政策。早在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会议即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39 年到 1940 年，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展开，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左”的和右的偏向。如有的地方仅把减租减息作为宣传口号，未予实施或明减暗不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地主夺田索债的现象等。1942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了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

三条原则 ①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要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②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③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在适当地改善雇工生活条件之下,对其封建性质剥削的租息也须照减。在这些具体政策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照顾了地主利益,争取和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总之,减租减息缓解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使各阶层人民在抗日基础上加强了团结。

第三,实施精兵减政。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精兵减政。精简后,各根据地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仅占全区人口的3%以下。从而大大减少了军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也使部队、机关更为精干灵活,提高了对敌斗争的效能。

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这两个报告同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明确地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

毛泽东首先从认识论的高度,揭露了主观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个别词句,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他们照搬别国的革命经验或革命公式,轻视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知道也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而经验主义则轻视理论的作用,把他们自己个别的、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所以,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表现形式虽不同,但本质都一样,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其根本特征的。他们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其次,毛泽东从政策实践上揭露了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他指出,主观主义是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当着主观主义者的认识超越客观实际时,在实践上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左”倾、盲目冒进;而当他们的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时,在实践上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右”倾。这种主观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许多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而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中,教条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教条主义装腔作势,容易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吓唬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此外,毛泽东还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关系。他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宗派主义拉山头,闹分裂,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所以反对主观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宗派主义。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在宣传工作上、在文风上的表现,它是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公式主义。党八股的产生,同主观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息息相关。毛泽东历数党八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八罪状,号召全党起来反对党八股,清除主观主义藏污纳垢之所。

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和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就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这一方针的提出,吸取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的团结,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全党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历时十一个月之久,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并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解决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系统的说明,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出了基本的结论。《决议》的通过,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实际上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了最重要的准备。《决议》的通过,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它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全党面貌有了很大改变,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懂得了要把握住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巩固和团结,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整风运动中创造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形式,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形式,是思想建党原则的新发展,也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德、意宣战

1941-1942年法西斯德国迅速地攻占了十几个国家之后,使得欧洲大片领土包括法国在内,都被置于法西斯德国的控制之下。1941年6月22日,德国挟持着半个欧洲的财力与人力,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疯狂的袭击,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对欧洲而且给远东的局势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加速了日本在南进与北进问题上的最终抉择。7月初,在经过了激烈争吵、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局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国为指针,帝国依然向处理中国事变前进,并以确立自存自

卫为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为达到此项目的,不辞对英美一战。’这次御前会议最终确立了日本的南进国策,迈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英直接交锋的第一步。

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周密的布署,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7日),日本联合舰队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海军基地及交通枢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日军共击沉美军战列舰4艘,重创1艘,炸伤3艘,炸沉炸伤其它舰艇10多艘,击毁飞机260余架。美军官兵伤亡4000多人,而日军仅损失了29架飞机及特种潜艇6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成功,使得美国太平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南进扩张的野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日本又在西南太平洋、东南亚向美、英属地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全面攻击。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美英正式向日本宣战。接着,英联邦国家、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以及在伦敦的一些流亡政府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11日,美国向德意宣战,欧亚战争连为一体。

美国的参战不仅壮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进程,而且也改变了中国抗战局势。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同时向美、英、苏等国建议迅速组建在美国领导下的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正式军事同盟,美英对德意、苏联对日同时宣战,同盟各国订立不单独与日媾和的有关条约。苏联政府基于对德战争的实际考虑,不希望同时陷入两面作战,因而没有立时对日宣战,但中国政府的建议却得到了美英等国的回应。美日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的利益与中国对日抗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军事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过去4年半来的单独抗战由此转变为与各盟国的协同作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

《联合国共同宣言》和中国战区的成立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使得欧亚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而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后形成。英国基于自身的考虑,担心美国由于来自日本的重创,其战略方针有可能由原先的“先欧后亚”而转变为“先亚后欧”。因此,英国政府迫切建议美国就今后的整个战争政策与规划,举行一次必要的会议。于是,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了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着重讨论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联合国宣言》,旨在阐明联合国家的政治目标及共同遵守的合作原则。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也列席参与了有关讨论。会议在商讨签字国名单的排列时,由于美国的极力支持,中国得以继美、英、苏三国之后而跻入领衔签字国的行列。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邱吉尔、李维诺夫及宋子文分别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在《联合国宣言》上正式签字。宣言赞同大西洋宪章所确立的宗旨与原则,同时宣告:(i)各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全部军事与经济资源,以对抗与之作战的三国同盟成

盟国及其仆从国家。(2)各签字国政府保证互相合作,不与敌国缔结单独的停战协定或和约。(3)欢迎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它国家加入上述宣言。其后又有 21 个国家相继签名加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

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逐级提升,美国也不得不给予这一地区以足够的关注,来确保该地区处于守势的防御体系不致崩溃,于是决定成立以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为统率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协同指挥美、英、荷、澳军队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同时成立了以蒋介石为盟军统帅,包括中国本土、越南、泰国及缅甸等地区在内的中国战区。鉴于英、法在战争中的势力衰落及苏联将于战后的崛起,美国认为“培植和支持一个与美国有着共同政治目标的强大的中国,不仅可以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而且还将阻止或缓和苏联对英法退出后在远东出现的真空地带的渗透。”由此,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同英国放弃了自中国抗战以来所推行的两面政策,开始走上了支持中国抗战的道路。政治上极力促成中国的大国地位 经济上美国宣布贷款 5 亿美元,英国也贷款 5000 万英镑,以帮助中国进行抗战及稳定货币;军事上美国政府还决定把陈纳德的美国航空志愿队,正式扩充改编为美国驻中国第 14 航空队,划归中国战区,并陆续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帮助训练军队。总之,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像美国国务卿赫尔所总结的:“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为从事战争而进行有效的合作;第二是承认并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之在战时和战后有资格与苏、英、美三个西方盟国平起平坐,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建立东方的稳定与繁荣。”

《联合国共同宣言》的领衔签署和中国战区的成立,表明中国政府的国际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以及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开始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签定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屡遭侵犯,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为捍卫民族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而进行不懈的抗争。

当太平洋战争临近之时,美英为了利用中国抗战消耗日军,以减缓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决定取消在华特权,增强中国的抗战效能。1941 年 4 月,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缔结平等新约。5 月下旬,美国政府表示:“希望在和平状态恢复的时候,能和中国政府以有步骤谈判和订立协定的程序,迅速地做到取消一切有特殊性质的权利。”中国政府基于战时实际情况考虑,基本认同了美国这一“战后解决”的方案。

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为减轻两面作战的压力,更加倚重中国战场。中国战场战略地位的提高,进而为中国政府改变原先“战后解决”的方案提供了契机。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共同宣言》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其地位与实际状况

大相径庭。且自缅甸沦陷,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也因之切断,徒增中国抗战的难度。倘若英美政府在对华的问题上,继续因循苟且,中国的抗战必将难以为继。同时,中国政府向英美示意,如继续此种状况,中国政府很难保证排斥对日单独媾和的可能性。由此,美英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42年10月,美英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就废约一事,希望即刻与中国政府谈判,订立一立即放弃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其他有关问题的平等条约。其后,美英与中国政府就废除旧约、订立新约问题,进行了多轮次的外交谈判。

1943年1月9日,日本先声夺人,与汪伪国民政府签订了不包括香港、九龙在内的《关于交还租界及撤销和废除治外法权之协定》。日本的这一举措旨在加强汪伪政权的欺骗作用,在政治上亦使得美英与重庆方面大为被动,于是,美英与中国政府就废约一事,迅即达成了协议。

1943年1月11日,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取消美英两国人民或团体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以后其在中国的活动当依照国际公法原则及现行国际惯例,接受中国政府的法律管辖。(2)取消《辛丑条约》所规定的两国在北平使馆区内的一切特权及北宁路驻兵权。(3)两国在中国的租界包括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天津、广州英租界一律撤销,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取消租界内所设置的特别法庭。(4)取消两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领水特权。(5)取消英国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特权。(6)取消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特权。(7)取消两国军舰自由出入中国领水特权,以后中国与美英军舰互访,均依国际惯例进行。(8)缔约双方予对方人民在本国领土内以旅行、居住、经商各权,并在履行法律手续、司法事件处理及税收等方面应给以不低于本国人民及公司的待遇。(9)在新约中尚未涉及的影响中国主权诸问题,均应依照国际公法与近代国际惯例解决。(10)美英两国应在战争结束后至迟6个月内,与中国进行正式谈判,以商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5月20日,条约文本经三国立法机关讨论批准后,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始正式生效。其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五国也相继与中国政府订立了新约。中英、中美“平等新约”的签定,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抗战,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

但是,“平等新约”签定后,中国的平等地位并未真正实现。英国方面拒绝交还香港和九龙,并插手西藏,干涉中国内政。且1943年5月在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仍然规定美军人员在中国触犯刑律时,应由美国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单独裁决。由此可见,“平等新约”虽然订立,但要求得真正的平等独立,尚须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斗争。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立即向日本宣战。23日,由蒋介石主

持在重庆召开了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英国代表提出要求中国派军队入缅协助英军保卫缅甸，蒋介石表示同意。26日，双方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共同对轴心国作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月2日，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陆空联军总司令。3月8日，美国的史迪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遂与盟军开始协同对日作战。

1941年12月23日，日军轰炸机首次空袭了缅甸首都仰光。国民政府向英国提议，迅速派军队入缅。英国政府先是表示同意，后又表示暂勿入缅。直至1942年1月20日，日军已从泰国向缅甸发动了攻势，英国为利用中国军队阻滞日军，掩护在缅英军向印度撤退，才同意中国军队进入缅甸。1月下旬至2月上旬，国民党军第6军（张轸部）陆续进入缅甸境内。2月16日，仰光告急，英国再次要求中国军队入缅。军委会遂令在滇缅路待命的第5军、第66军（甘丽初部）迅速入缅，连同先期入缅的第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卫未到任前由杜聿明代理，实际卫一直未到任，后改为罗卓英），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计9个师的兵力10万余人，统归史迪威指挥。中英双方商定，以仰光、曼德勒铁路以东至泰、越边境地区为中国军队防区。

根据日军情况，中国远征军决定，以第5军第200师在同古及其以南地区组织防御，阻击日军北犯，掩护主力开进和集结，尔后在英军协同下，实施会战，击破当面之敌后，收复南缅甸。此时，西路为英缅军第1军团，辖英缅军第1师、英印军第17师、英装甲第7旅，担负伊洛瓦底江沿岸地区的作战任务。

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遣部队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率领下，于1942年3月8日抵达缅甸重镇同古，接替了英军的防务并掩护其撤退。18日，日军向同古发起攻击，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拉开战幕。第200师将士面对4倍于己的日军的猖狂进攻，在强敌压境兵援不至的艰难情况下，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毙伤日军近4000人，自身伤亡2500余人。日军对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感到无比震惊，并承认这是南进以来的第一次受挫。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

1942年4月中旬，驻守普罗美的英缅军第1师及战车营一部共7000人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17日，中国远征军第66军38师奉命前往救援，驰援部队英勇作战，大量杀伤日军有生力量，并将其击退，收复了仁安羌油田，为被围之英军7000余人解了围，另救出被俘英军、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还将战利品100余辆汽车和1000余匹战马如数交给了英军。此战，中国远征军以少胜多，一举击毙日军1200余人。如此辉煌的战果和英勇壮举，轰动了世界，受到了盟军的高度赞扬。这就是享誉中外的“仁安羌大捷”。战后新编第38师师长、团长等都获得了英国授予的勋章。

中国远征军虽然取得了仁安羌大捷，但整个缅北战场却日趋被动。为抗击日军戟，远征军计划在平满纳一带与日军决战，但关键时刻英军无心恋战，全线溃退，远征军不得不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此后远征军决定向曼德勒集结，准备联合英军发动曼德勒

会战。可是英军竟于5月1日放弃曼德勒,远征军被迫退守密支那地区,从此进入困境。中国远征军缅北作战宣告失败,不得不分两路向印度和云南退却,途中多次与日军发生遭遇战,远征军损失惨重,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壮烈殉国,年仅38岁。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不仅未能完成作战任务,反而损兵折将,使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并进而侵入中国云南境内。远征军10万大军遭受重大损失,最后仅剩4万余人。退回云南的远征军主力被改编为第11和第20集团军。退入印度的一部则被改编为中国驻印军。这两部分军队仍是第二次反攻入缅作战的主力。

豫湘桂战役

1942年下半年起,由于日军在中途岛、爪哇岛等战役和所罗门海战中的接连失利,使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军优势逐步削弱并趋于消失。1943年,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地转入反攻,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近,并切断了海上交通线,使日军在南洋地区的近50万兵力逐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中国战场,美空军第14航空队为争夺制空权,与日空军展开了激烈空战,并于11月25日从江西境内起飞对台湾的日空军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东海上的日军舰船也多次遭到美机的袭击和轰炸。另外,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虽然屡屡受挫,国民党当局的抗战积极性也逐渐降低,但日本的诱降政策及其活动也始终未能奏效。根据上述诸方面的情况,日军大本营为挽救其在中国战场的“南方军”,贯通中国南北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遂决定集中其在华主力,在豫、湘、桂广大地区发动攻势。

1943年11月下旬起,日军大本营开始加紧研究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作战计划。1944年1月底,日军大本营研究确定的被称之为“一号作战”的计划,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正式批准。尔后,日军大本营迅速下达了作战命令和作战纲要,规定日军在中国从黄河至信阳间约400公里、从湖南岳阳至越南谅山间约1400公里以及从衡阳至广州间约600公里的广阔战场上,投入51万兵力、250架飞机及1500门火炮,用9至10个月时间,实现其预定的战略企图。要求“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空袭帝国本土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并明确“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先后将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2月起,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一号作战”计划,开始调整部署,进行作战准备。

豫、湘、桂地区为国民党军第1、第9、第4战区部队驻守,总兵力达100万余人,并有美空军支援作战。

4月18日,日军在豫东中牟强渡黄泛区,进攻河南,拉开了豫湘桂战役的战幕,守军坚决抵抗,但由于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再加战略战术的失策,守军浴血奋战,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未能阻止日军前进的步伐,日军从北到南,大打攻势战,5月攻陷郑州、洛阳,8月攻陷长沙、衡阳,11月连攻桂林、柳州、南宁。12月10日进犯南宁的日军与从越南

北侵的日军会合于绥淦(今扶绥),从而打通了中国南北之陆上交通线。

与此同时,日军第3、第13师团在向黔东南地区攻击前进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12月2日进至丹寨、独山地区。日军深入贵州大后方,极大地震动了重庆国民政府。此时,国民党军主力远在缅北和滇西等地区作战,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第1、第8、第6战区共8个军调至黔东南以东及黄平、镇远地区,“一举击破北犯黔南之敌,以确保贵阳。”美空军也及时帮助空运了一部精锐部队,准备实施反击,夹击入黔之日军。

日军一部突入黔东南地区后,实际上也已成强弩之末了。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上连续作战已遭到极大的消耗和伤亡,并时时受到美空军袭击和轰炸的威胁,已无力发展进攻,遂被迫实施退却。国民党军则尾随追击,先后收复独山、八寨、三合、荔浦、南丹等地区。双方在明伦、河池地区形成对峙,战役遂告结束。

此战历时8个月,国民党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失陷城池100余座。另一方面,日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由于战线延长,分散了兵力,被迫开始在中国战场采取战略守势,从而加速了自身失败的进程。

中国战区军民的大反攻

从1944年春起,各解放区战场都先后转入对日伪的局部反攻。在1944年一年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日伪军3.4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投诚3000余人,收复县城11座,光复国土26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00多万;晋察冀解放区攻克据点1500多个,一度攻入的县城24座,曾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等城。经过连续的攻势作战,华北解放区不仅恢复了1940年的局面,而且大为发展。山东解放区在1944年内,共毙伤日伪军3.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1万多人,收复县城8座,光复大片国土,解放人口740多万。华中解放区在1944年也展开了积极反攻。全华中新四军共作战6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人口160余万,大大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华南解放区也得到扩大。东江纵队威胁着广州和香港。琼崖纵队坚持游击战争,控制着广大的乡村。

1944年,国民党军在河南弃地败逃后,中共中央为开展河南抗战局面,从战略上将陕北、华北、华中三区联接起来,于7月25日作出了向河南进军的部署。它标志着解放区战场开始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解放区派一部分兵力南下,建立了豫东根据地,控制了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的广大豫东地区。8月15日,彭雪枫率新四军第4师主力西进,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9月至10月,太行、太岳解放区先后派出部队,渡过黄河,建立了豫西根据地。11月,八路军120师359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2月,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提出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

总之,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局部反攻中,共作战1万多次,毙伤日伪军近20万人。至1945年春,人民军队已发展到91万,民兵200万以上,建立了

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的 19 个解放区,解放区面积达 95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9950 万。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已经成为中国整个战场实行战略反攻的主力,并为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 年冬,为了配合盟军对日本的大反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总司令由参谋长何应钦兼任,下属四个方面军:卢汉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滇越铁路;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桂西、桂南、粤西地区;汤恩伯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黔桂铁路;王耀武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湘西地区。

1945 年春,日本得知轰炸日本本土的中美空军基地在湘西芷江,便集结日伪军 10 余万人,兵分三路实行钳形攻势,企图攻占芷江。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雷峰山,第 10 集团军王敬久阻敌于宁乡、益阳一带,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攻敌侧背。5 月初,在中美空军轰击下,国民党军队全线反攻,将敌分割包围,经过 20 天激战,毙伤日伪军 2 万余人,击退了敌人进攻。日军湘西战役失败后,开始收缩防线,放弃次要据点。国民党军乘敌兵力空虚之际,实行反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于 5 月 27 日收复南宁,追击北逃日军。汤恩伯第三方面军,5 月 19 日攻克河湓,6 月 14 日克复宜山。第二、第三方面军协同作战,6 月 29 日攻克柳州,7 月 28 日收复桂林,进展 700 余里。第 9 战区薛岳部收复湖南的永兴、新宁,江西的信丰、大庾、南康、于州、宜丰、上高。第 3 战区顾祝同部收复福建的长汀、连江,浙江的永嘉。第 7 战区余汉谋部收复广东的化县、南雄。第 1 战区胡宗南部收复河南的内乡。第 10 战区李品仙部收复内蒙古的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地。此外,1944 年冬,卫立煌率领“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进入缅北,配合中国驻印军作战。1945 年 1 月,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会师畹町,歼灭了驻缅北日军主力,打通了中印、中缅公路,取得了缅北战役的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 的根本转折

1943 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欧洲战场上,1943 年 2 月苏联红军经过半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得德军元气大伤,丧失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而苏军则由全面防御开始转为局部进攻。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又与德军于 7 月在库尔斯克展开了激烈的会战。是役,德军惨遭重创,苏军则取得了重大胜利。库尔斯克大会战彻底粉碎了德军企图夺回战争主动权的迷梦,从根本上完成了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标志着苏军最终从战略防御阶段全面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与此同时在北非战场上,英美盟军东西夹击,在 1943 年 5 月,终于迫使北非的德意军队投降,英美盟军也由此从防御转为进攻。接着,英美军队乘胜前进,7 月在西西里岛进行了登陆作战,9 月,意大利政府向盟军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继中途岛战役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

争夺,经过长达半年的激烈交锋,美军最终于 1943 年 2 月占据了瓜岛,控制了海上主动权。太平洋战场的局势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转变。

随着世界各主要反法西斯战场相继转入反攻作战,法西斯各国开始陷入全线崩溃。意大利的投降,轴心国的解体,使得德日法西斯国家更加孤立。1944 年苏军对德国法西斯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到年底,把德军彻底驱逐出了苏联国土,最终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且帮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获得了解放。1944 年 6 月,盟军胜利登上诺曼底半岛,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在盟军登陆作战的节节推进下,法国光复,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等相继解放。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得欧洲战场的胜利进程大为缩短。与此同时,美军在太平洋上展开了对日军的逐岛进剿。1944 年 2 月,占领了马绍尔群岛。7 月攻占了塞班岛。8 月控制了整个马里亚纳群岛。美军可以该群岛为基地,直接对日本本土实施空中打击,因此,它的丧失,使得日本国内军事、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德日已是穷途末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即将来临。

中共七大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面临着两大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 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朱德作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周恩来作《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次大会最主要的成就是：

首先,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二十四年曲折发展的历史,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经验,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积累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丰富经验。正是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使党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制定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主要就是论述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化。它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奋斗目标,中心思想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民族战争引向人民胜利的结局,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为中心环节,而以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保持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这条路线,是争取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的指南。

其次,七大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全党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这是自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经过 1942 年至 1945 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所形成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最巩固的团结。七次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各种问题交代表们认真讨论,广泛听取代表们的意见,使党内意见达到空前一致。代表们在讨论中,联系党的实际工作,从团结的目标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新的团结。七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更体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一致。

第三,七次大会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6 月 19 日,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坚强核心。

七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六大

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的同时,1945 年 5 月 5 日至 12 日,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由蒋介石致开幕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作党务报告,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作政治报告,代理参谋总长程潜作军事报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续军事报告,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部队整编与湘西会战经过的报告等。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纲领和决议,发表了宣言,推选蒋介石连任总裁,同时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国民党六大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通过的《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在 1945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以期通过宪法,实施宪政。事实上,国民党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的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国民党中央指定和由国民党包办“选举”出来的,所要通过的宪法,则是以抗战前 1936 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五五宪草”为依据的。显然,国民党实施的这种宪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欺骗,其目的在于使国民党政府披上合法外衣,借以抵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继续坚持独裁统治。

国民党六大另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动员国民党力量,准备发动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在当时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大会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发动反共内战,但却通过了两个反共文件。在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中,虽然声称“在不妨碍抗战、无害国家之范围内”,实行“政治解决”的方针。而实际上,国民党可以随时宣布共产党“妨碍抗战,有害国家”,从而发动内战,“武力解决”。在对内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中,恶毒攻击共产党“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提出要“肃军肃政,加强力量”,准备进行反共内战。蒋介石在5月18日的大会讲话中更露骨地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完全相反,是代表着另一种中国之命运,即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六大的路线,是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路线。这个路线不仅违反世界潮流和全国人民的公意,而且也违反多数国民党员的意见。因此,这条路线及其支持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雅尔塔会议与中苏谈判

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局已定,为了解决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了会晤。会议除讨论欧洲事务外,还就远东问题进行了磋商。美国鉴于在向日本本土推进的逐岛作战中,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代价太大,预计即使在欧洲战场结束之后,美国也需经过18个月的时间准备以及至少付出伤亡50万人员的重大代价,才能最后击败日本。因此,美国迫切希望苏联能够参加对日作战,以减少美方损失。斯大林有条件地同意了美国的请求。

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协定》上签字。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争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苏联与盟国一道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2)1904年俄国在东北等地的权益应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必须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恢复,连接旅大之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同时,苏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雅尔塔协定,对加速法西斯势力的最后崩溃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在完全背着中国政府的情况下所签定的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直至6月15日,美国国务院才电令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根据协定,中国政府与苏联从6月30日至8月14日就两国商订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由于两国政府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分歧太大,谈判收效甚微,时断时续。中苏谈判之初,美国尽力促成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但是,到了7月16日,原子弹在美试爆成功,这一威力无比的核武器严重降低了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美国一改以往对苏联的迁就态

度,转而支持中国对苏联的过分要求坚决抵制。最终,中苏双方经过多次磋商,于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和《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条约及协定规定:(1)中苏两国协同其它联合国对日作战,直至最后胜利。战时及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2)中国长春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之中东铁路及哈尔滨至旅大之南满铁路)由中苏共有,共同经营。(3)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经该港出入口之货物,均免除关税。(4)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苏联负责防护。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旅顺市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5)苏军进入东北作战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军总司令。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属于苏联军队之人员,均归苏军总司令部管辖。苏联保证给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同时表示对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中国政府也声明,外蒙古问题任其自决。

美、苏对日军的沉重打击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会议就德国及战后欧洲其它国家的处置和盟国对日作战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7月26日,波茨坦会议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由美国起草、中国参加、英国同意的《美中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坚决拒绝波茨坦公告,准备进行最后的本土决战。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7日,美国又出动400架大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日夜轮番的轰炸。8月9日,日本长崎又遭到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的摧毁。

与此同时,苏联对日的作战部署也已完成。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8月9日,苏联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统一指挥下,从东、西、北三面长达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日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日军在中国东北的防线,在苏军的锐利攻势下,很快崩溃。8月19日,苏军攻占长春。20日,占领沈阳、哈尔滨。至8月底,日军完全停止抵抗。苏军共击毙日军8万多人,俘获日军59万多人,解放了中国东北,结束了日本对其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日本投降

中、美、苏的协同作战,最终粉碎了日本法西斯垂死挣扎、欲图本土决战的迷梦。特别是苏联的参战,给日本政府以迎头痛击。因为即便在原子弹出现以后,日本最高战争

指导部的既定方针并没有任何变更。所以,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日本外相重光葵亲访苏联驻日大使,表示日本已准备无条件投降。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裕仁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英苏四国政府同时宣告,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盟国方面的麦克阿瑟和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战胜国的代表也分别签了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中国战区,9月3日,驻华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草签了投降书。9月9日,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正式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国民政府接受了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的降书。9月3日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纪念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对外御侮的历史上一次空前而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未有的盛事,这是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中日整整半个世纪交锋中的首次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雪洗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振奋了中华民族自强与自信的精神。中国抗战的辉煌胜利,向全世界昭示:中华民族是不可轻侮的。

八年抗战中,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解放区遍及19个省区,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由150万发展到1亿,解放军发展到13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多人。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地发展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独立自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一切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而且,为最后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新中国,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战开始最早、持续最久、牺牲最大。军民伤亡达到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约600多亿美元。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经常牵制着日本陆军兵力70%左右。中国抗战不仅捆住了日本“北进”的手脚,使得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而且能够从远东抽出兵力加强西线作战,集中力量打击希特勒法西斯。中国抗战也有力地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时间,挫败了德意日法西斯的进一步勾结,使日本与德意之间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配合,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在世界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虽然洞悉蒋介石的邀请有虚假的一面,但是鉴于战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休养生息;又估计到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

谈判后,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某些改革,而如果这种状况出现,也会有利于人民。因此,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8月28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使整个山城为之沸腾,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

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国共谈判正式进行。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曾多次会谈。由于蒋介石事先对谈判并无认真准备,在谈判中极其被动,毛泽东则从历史到现实,批评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阐明了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双方的具体商谈主要是在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中共代表在谈判中,既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又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问题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共产党代表严正驳斥,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使谈判能取得成果,也作出了重大让步。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同意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并愿将所领导的军队,按照五比一或七比一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同意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和皖北解放区。但是,蒋介石仍顽固拒绝,以致无法达成协议。

为了促使谈判达成协议,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同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们会见了当时国民党进步人士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等。此外,毛泽东还会见了民盟中央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和妇女界、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及外国友好人士,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和真诚愿望,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谈判桌上的斗争和战场上的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在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密令大量印发反动的《剿匪手册》。9月初,蒋介石命令绥远的国民党傅作义部沿平绥路进攻察哈尔解放区,迫近张家口。贺龙、聂荣臻指挥晋绥、晋察冀部队奋起自卫,将其击退。9月下旬,阎锡山奉蒋介石的命令,先后派遣13个师3.8万兵力,进攻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奋起反攻,歼灭3.5万余人,俘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多人,占当时阎锡山总兵力的1/3。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既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又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在重庆的谈判斗争。从而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0月10日与中国共产党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这次国共谈判,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从而延缓了全面内战的爆发。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在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议召开的党派会议,是战后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原则,维持人民根本利益,挫败了国民党

当局妄图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政治图谋，又作出了合理的让步，取得了国内外舆论和中间阶层的广泛同情，这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重大胜利。当然，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地拒不承认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军队问题也未真正解决，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和内战留下了伏笔。

马歇尔使华与《停战协定》

国民党在军事进攻受挫、全国人民反内战运动高涨、国际进步舆论也一再呼吁中国实行和平民主的情况下，深感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作进一步的准备。美国政府也深感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得人心，于是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由公开援蒋反共变为以中间人的姿态调解国共冲突。1945年11月27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国共冲突。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声明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如果将“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并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

1945年12月16日，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等抵渝。中共代表团坚持以停止军事冲突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12月27日，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战的三项办法。31日国民政府复文表示同意停战，并派出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具体商谈。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规定：(1) 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2) 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3) 由国民参政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在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为实行停战协定，1月7日正式成立了由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或称三人军事小组）。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和《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同日，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向所属部队颁布了停战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上述停止军事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1月10日同时公布。

根据停战协定，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三委员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名代表担任，分别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下设由三方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军调部于1月

14 日起在北平正式办公。

“一二·一”惨案

《双十协定》签字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定，将江南新四军部队撤往江北，向全国人民表示了自己的诚意。但是，蒋介石却在 1945 年 10 月 13 日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内战密令，大举进攻解放区。10 月下旬，国民党军孙连仲部三个军侵占了解放区磁县和马头镇，并向邯郸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部队展开反击，将敌包围。30 日，国民党第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 8 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举行起义。31 日，由第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领的其余 2 个军官兵数万人被迫放下武器。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 4 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对冀南解放区的进攻。但 11 月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有魏德迈参加的军事会议，制定了对解放区的全盘作战计划。仅 11 月至 12 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即达 120 万人，内战遍及 11 个省。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内战的呼声更加高涨。从 10 月起，民盟等民主党派、团体纷纷发表言论，呼吁制止内战，撤退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 月 19 日，重庆文化界、工商界代表 500 人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国统区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1 月 25 日，昆明学生 6000 余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骚扰破坏，各校学生次日起联合罢课。12 月 1 日，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武装镇压罢课师生，死 4 人，伤 20 余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昆明学生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全国各地工农市民群众、工商银行界人士以至某些地方上层人物，纷纷以捐款、签名、慰问、吊唁等方式，对学生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在昆明，从 12 月 2 日起，至 20 日止，群众到灵堂公祭四烈士的达 15 万人次，而当时昆明全市人口还不到 30 万人。延安各界青年曾举行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函电，表示声援。12 月 9 日，重庆各界人士公祭三日，沈钧儒代表救国会主祭，致祭群众一致要求惩办肇事祸首。1946 年 1 月 13 日，上海召开万人追悼四烈士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民主大游行。在全国各界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让关麟征“自请处分”，将李宗黄调离云南。

从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成立到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国统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以及广大青年学生迅速觉醒，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在国统区蓬勃展开。

政治协商会议

与停战令发布的同一天,1946年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盟代表9人,无党派社会贤达9人。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致开幕词,宣称: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第二,“要大公无我,顾全国家利益”;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并宣布了决定实施的事项。会议主要讨论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

关于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及其说明。主张国府委员须由国府主席提名,选任党外人士充任国府委员时,要由主席提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委员名额分配不作明文规定,但国民党人在国府委员会中必具“特定程度多数”,以保证能“履行领导的责任”。国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其职权中无用人权。国府主席在紧急情势发生时,有紧急处置之权。针对国民党的方案与说明,中共代表表示,(一)现政府应在共同纲领基础上进行改组;(二)国府委员会应是最高决策机关,必须有用人权;(三)我们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和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但国民党在府委中的席位最好不要超过1/3;(四)要防止手令制,主席的命令应由会议通过,还应有人副署;(五)政府改组应包括各院部会的改组。民盟代表则认为,第一,政府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希望蒋先生成为民主的领袖;第二,各党派都能参加政府;第三,使目前政府的行政效率提高和现代化。经过讨论和协商,达成了体现了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基本要求的《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中共首先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讨论中多数人主张应有共同纲领并同意称之为和平建国纲领。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了以中共的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

军事问题是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青年党提出了《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主张“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民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主张两大原则:一是全国所有军队应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是大量裁减常备军额。中共坚持,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政治民主化,必须二者同时并进。最后勉强达成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项原则规定,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主张:(一)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二)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三)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合理增加”名额。这一方案遭到中共、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的强烈反对。最后达成《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规定国大代表共2050名,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1200名照旧,新增台湾、东北地区的代表150名,新增党派及

社会贤达代表 700 名。通过宪法,须经出席代表 3/4 同意方能有效。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国大的企图。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代表们就宪草修改原则和防止个人独裁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规定了组织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采纳。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突出的、成功的合法形式的斗争,虽然这些协议后来并未付诸实行,但其显示的民主精神对中国社会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平保卫战

1946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拒不承认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东北的地位,企图以武力独占东北。于是向东北大举增兵,抢占战略要地,于 3 月上、中旬,乘苏联军队撤兵之际,占领沈阳、抚顺、辽阳等城,至 3、4 月间,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部队有第 13、第 52、第 60、第 71 军和新编第 1、第 6 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 31 万人。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系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交叉点,是东北的重要战略枢纽之一。苏军撤兵时,国民党收编的伪、匪军进占了四平。民主联军于 3 月 18 日攻占该城。随即,四平便成为国共双方争夺东北斗争的焦点。

3 月下旬由沈阳北进的国民党军遭民主联军的阻击,进展迟缓,至 4 月初进至开原、法库一线,未能实现其 4 月 2 日前进占四平的计划。4 月 5 日,新编第 1 军和第 71 军主力分两路向四平进攻,民主联军采取诱敌深入,趁敌立足未稳发起突然攻击的战术,将 71 军先头部队第 87 师大部歼灭,共毙伤俘 4000 余人。残部向新编第 1 军靠拢。并继续向四平逼近。鉴于暂无在运动中歼敌机会,民主联军主力遂转移至四平以西之八面城和西北之梨树附近地区待机。

与此同时,南满第 3、第 4 纵队等部在保卫本溪作战中,两度击退新编第 6 军、第 52 军等部的进攻,并歼其 4000 余人。担任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第 7 师、第 359 旅和第 3 师一部,在东满、北满和西满地方武装配合下,于 4 月 18 日至 28 日相继解放上述三市,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匪武装 2.6 万余人。清除了北满腹地之敌,解除了四平前线部队作战的后顾之忧。

兴隆泉、大洼和本溪作战的胜利和长、哈、齐三市的迅速解放,暂时改善了民主联军在东北的地位,顿挫了国民党军进攻东北的锐气。

4 月 18 日,新编第 1 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对民主联军扼守的鸭湖泡、泊罗林子、三道林子北山等四平外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为保障四平翼侧安全,民主联军逐步向四平东西两侧延长防线,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部署了 6 个师(旅),挫败了国民党军迂回四平的企图。至 26 日,新编第 1 军等部在遭受重大打击后,不得不改取守势,等待后援。民主联军也因机动兵力不足,难以组织有效的反击,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4月底,奉命北上的南满第3纵队第7、第8旅和保安第3旅到达四平以东之哈福、平岗地区。为配合四平前线部队作战,民主联军首长决心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以断敌交通运输,歼其有生力量。至5月10日,第3纵队前出至昌图以东之清杨堡、开原以东之马市堡地区。独立旅攻占开原、昌图间马千总台车站。保安第3旅攻占开原以南之中国车站。迫使国民党军从四平前线和南满地区抽兵来援,给进攻四平和南满的国民党军后方造成极大威胁。

为加强进攻四平的力量,尽速夺取四平,国民党军决心迅速占领本溪,以便从南满地区抽兵北上。从4月28日起,南满国民党军乘民主联军第3纵队等部北调之机,再次向本溪发起进攻。鉴于再战不利,加之民主联军作战月余,伤亡较大,为摆脱被动,保持战力,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地区撤退。19日,国民党军进占四平。

四平保卫战,历时月余。东北民主联军以800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配合了停战谈判。民主联军以劣势抗击优势的国民党军进攻,持续1月以上,体现了人民军队英勇顽强精神,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东北斗争的坚强意志。中共中央在评价这一战役时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

早在1945年9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就指示进入东北的部属,“不要首先将主力部署在东北门口抵住蒋介石,”而应“有重点地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础”。随着11月下旬东北局势的恶化,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方针。刘少奇在多次指示中强调:“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一次强调“把东北的工作长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道,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号召和带领广大干部离开城市奔赴农村,在清剿土匪、粉碎敌伪残余势力和发动群众实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支援自卫战争的斗争中,逐步建立了东满、北满、西满、南满根据地,在各根据地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1946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了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为尔后统一的东北人民政府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练兵、减租、生产和土地改革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同时,在全国各解放区广泛开展了练兵、减租、生产和土改运动。

为了战胜在装备和数量上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各解放区开展了以提高军事素

质和政治素质为中心的大练兵运动。以练攻城、守城、夜战三大军事战术和政治上提高战胜敌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和信心为主要内容。练兵的方法为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运动。通过练兵运动,不但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而且调整了后勤与军需工作,加强了军工生产,使军队建设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1946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整军会议,整军轻武,有计划地调整和加强各战略区的领导,扩大和整编部分,新建了野战军体制。到6月,中共中央军委共组建24个野战纵队(包括相当于纵队的师)以及14个野战旅(师),共计约61万人,可在各大战略区之间进行机动作战。另有60余万地方军,分属各军区,担负地方性作战任务。为实现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调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各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的生产运动,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为此,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及时地把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五四指示》颁布后,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开展。到1947年2月,解放区已有2/3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踊跃参军参战,纷纷投入支前斗争。到1946年10月,新入伍的农民已达30余万,并有300万至400万农民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保障了军队的供给。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部署

国民党在和平谈判的烟幕下,加紧进行内战军事部署,在东北,国民党拒绝中共和民盟一再提出的接收主权与内政建设分开的建议,以“接收主权”为借口,坚持“武力接收”政策,肆意扩大内战。1945年10月18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11月上旬,杜聿明率国民党第12、52两个军由秦皇岛登陆,当即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11月16日侵占山海关,12月26日侵占锦州。此后,转攻辽西、热河各地,直指承德,北进辽中地区。1946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进驻沈阳后,在美国的帮助下,陆续将新一、新六、六十、七十一、九十三等五个军运进东北,投入内战。5月22日,中共主动撤出长春。5月下旬,蒋介石亲临沈阳、长春督战,国民党军大举向东向北进攻,直抵松花江南岸,达到其在东北进攻的顶点。

在关内,蒋介石更是调兵遣将,加紧了内战部署。仅1946年1月至5月,就调动了40多个军130余万人,向各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达3675次,强占解放区村镇达2077个,县城26座。先后使用兵力达258万余人。对地处鄂豫边界战略要地的中原解放区,蒋介石命令武汉行营程潜部队30万人予以重重包围。5月中旬至6月下旬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中原解放区6万余指战员被压缩在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为中心、东西不过100公里、南北只有20多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国民党军已经做好了最后

“围歼”的一切准备。

在此期间,国民党进行了军队整编及军事机构改组。5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6月1日国防部正式成立。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陈诚兼海军总司令,周至柔为空军总司令。

国民党的内战部署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马歇尔“调处”过程中完成的。美军不但帮助国民党将军队运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进驻中国的大城市。1945年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塘沽登陆。此后,美军陆续进驻青岛、北平等城市。至11月底,驻华美军达11.3万余人。在马歇尔“调处”期间,美国政府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54万余人运到内战前线。1946年1月至6月,美国用美式武器装备了国民党军25个师,为蒋介石训练军队、特务、军医、军需等15万人。提供给国民政府价值13亿美元的物资援助。1946年3月19日,正式成立了为蒋介石策划内战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加从军事和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6月28日,美国国会决定延长对中国租借法案的期限。根据租借法案,美国移让给国民政府的物资总值达7.81亿美元。7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授权总统以总数不超过271艘的舰艇及船坞器材赠给国民政府。8月31日,美国把它在西太平洋的价值8.25亿美元的战时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低价售予国民政府。这批物资的实际价值在20亿美元以上。美国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物质实力。

内战的全面爆发

1946年6月底,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重兵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中原解放区地处鄂豫边界、平汉路两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5年底,王震、王首道率南征湘粤的三五九旅支队北返此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汇合,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共约6万多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把他们视为心腹之患,认为中原解放区是它出川进驻华东、控制华北的严重障碍。因此,国民党调集重兵进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并于6月26日,以刘峙、程潜、胡宗南等部所属约12个整编师(整编前的军)20余万人的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创造“惊人的胜利与奇迹”。

接着,国民党军队陆续发动了对其他解放区的进攻。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以徐州绥靖公署薛岳所属58个旅46万余人进攻山东及苏皖解放区。以郑州绥靖公署刘峙所属及徐州绥靖公署一部28个旅24万余人进攻冀鲁豫解放区。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及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所属18个旅16万余人进攻晋察冀解放区。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所属19个旅15万余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后改为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所属20个旅9万余人及傅作义、胡宗南军各一部进攻晋绥解放区。以9个旅7万余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琼崖解放

区。10月,杜聿明所属16个旅16万余人发动对东北解放区新的进攻。总计,蒋介石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达193个旅160余万人,约占其正规军总兵力的80%。7月至10月的头四个月国民党军队连续侵占了解放区的菏泽、淮安等城镇153座。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达到其进攻的最高峰。蒋介石被胜利冲昏头脑,当日下午宣布如期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吹嘘“同共军作战‘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气焰极为嚣张。

国民大会和《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党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又导演了伪国民大会的丑剧,炮制了蒋记《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被暂时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完全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则,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反对,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假借“民意”,达到改组国民政府,收买拉拢中间党派,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据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拒绝参加。

11月15日至12月2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600余名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占有85%,其余来自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以张君勱为首的民社党、以及王云五、傅斯年等“社会贤达”。这次国民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因此又称“制宪国大”。提交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它继承了《训政时期约法》的精神,摘抄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的华丽词句,实际上是《五五宪草》的翻版。其主要内容是:总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需向任何机关负责;总统六年选举一次,可连选连任;总统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有权颁布紧急法令,也有权否决立法院的任何决议;省不得制定省宪,省、县自治法不得与中央法律抵触,否则无效;取消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立法院的同意权和否决权等等。总之,这是一部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的宪法。其实质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对于这样的宪法,连当时的《大公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集权力于一人,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国民大会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遭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中国人民决不承认蒋记宪法。23日,民盟中央常委决定:对民盟内的民社党成员参加国大者,一律开除盟籍。31日,民盟中央发表声明,对“国大”通过的“宪法”保留批判的权利。同日,在上海的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民主建国会、工商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等11个团体,一致决议坚决不承认“国大”通过的“宪法”。社会各阶层人民也行动起来,纷纷通电痛斥国民大会的欺骗性,要求解散国民大会。所以,国民党执意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不仅

没有起到巩固其法西斯统治的作用,反而愈来愈孤立了自己,深深地陷入了政治危机的泥坑之中。

国民政府再度改组

国民大会之后,美国政府撕下了其“公正”的假面具。1947年1月8日马歇尔奉召回国,1月29日美方宣布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处执行部。而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分裂、内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月21日,国民党政府迫令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人撤回延安,27日和28日,又分别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谈判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人须在3月5日前全部撤离,并查封了重庆的《新华日报》。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宪法准备实施案》,蒋介石在会上宣称“政治解决”已经“绝望”,从而关闭和谈大门,公开宣布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蒋介石又上演了“改组政府”的闹剧。4月17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决定了政府人选。18日公开名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副主席孙科,行政院长张群,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在29名委员中,国民党占17人,青年党4人,民社党4人,社会贤达4人。4月23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国民党当局大肆吹嘘这个政府是“自由主义政府”,是“多党政府”,是“介乎训政与宪政之间的政府”,声称还政于民已经实现。

事实上,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一登场,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4月22日,新华社在《评蒋政府改组》的社论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是美帝国主义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4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以及国民党左派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纷纷发表声明或宣言,揭露国民党改组政府的骗局,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政府原来想通过召开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来孤立共产党、打击民主革命力量,但结果却使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中美商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换取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支持,准备内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与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即《中美商约》),共30条,77款,它名义上是一个通商航海条约,实际上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权利,可以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有进行勘探、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可

为此而取得购置、保有、建造、租赁房屋、土地和产业,美国在中国活动的法人及团体可享受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同样的待遇。(2)美国商品输入中国的关税按最惠国征收,其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和使用,享受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由美国输入以及向美国输出的任何物品,均“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3)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自由停泊,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而且,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遇到“危难”时,可开入中国未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中国还须对它采取“友好之待遇及协助”,这个表面上标榜“友好”、“互惠”、“平等”的条约,实际上把中国所有的主权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从政治到经济,都拍卖给了美国。因此,《中美商约》的签订,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被称之为“新二十一条”,把11月4日定为“国耻日”。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郑重声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单独签订的一切对外条款,一切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

《中美商约》订立后,美蒋又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中美救济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协定》、《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协定,这些协定实际是《中美商约》的具体化和扩大化。通过这些条约,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运权、海关权、商业权等一系列特权,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美国利用取得的特权,加紧对中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将大批美国商品运到中国,使美货泛滥于中国市场上。大到飞机、汽车,小到香烟、食品、日用杂品,都从美国运来,致使“美祸(货)成灾”。在资本输出方面,战后美国在华投资约占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总数的80%。美国通过这些政治性投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继续攫取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以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

国统区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

随着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加上驻华美军在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以反美反蒋为中心内容的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展开,标志着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这一时期国统区的群众斗争主要有:

1946年11月底的上海摊贩斗争。这些摊贩主要是城市失业的工人、职员、仅上海一地约有10万人。由于国民党上海当局以“有碍市容”为借口,一再禁止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营业,并逮捕殴打继续营业的摊贩近千人,激起摊贩们的愤怒和反抗。11月30日,3000余名摊贩游行请愿,包围了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商贩,结果被警察开枪打死7人,伤多人。第二天,摊贩们继续斗争,又遭到军警镇压,伤亡增加,更激起了摊贩和广大群众的反抗,形成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迫使上海市政府收回取缔摊贩的命令,并撤换黄浦区警察局长。

1946年12月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驻华美军在中国的暴行,从1945年8月至

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5市就发生3800多起,中国人受害死伤达3300人。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东单发生了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的暴行。消息传开,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运动。在北京,12月27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各系级代表和社团代表大会,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30日,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学生50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许多学生、工人、市民也参加游行队伍。他们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国佬滚回去!”发表演说,控诉美军暴行,要求严惩暴徒。在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杭州、苏州、广州、昆明、台北等数十座大中城市,都相继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参加的学生有50多万。这一斗争迅速得到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工人举行集会,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上海职工提出“挽救工商危机,反对美货倾销”的口号,其中百货职工成立“爱用国货,抑制美货筹备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表宣言,积极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致公党等都发表声明,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北京各高校著名教授许德珩、吴晗、朱自清等纷纷谴责美军暴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新加坡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也通电声援学生的爱国壮举。这次抗暴斗争促进了国统区人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1947年2月的台湾“二二八”起义。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同年10月17日国民党政府派兵接管台湾,并实行政治、军事独裁统治,经济统制,颁布《人民团体组织临时办法》,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迫害进步人士。美帝国主义更是肆意霸占台湾海军基地,进行经济渗透和掠夺。美蒋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政府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殴打女烟贩,并枪杀市民1人,激起台北人民的义愤。28日,市民罢市游行,遭到镇压,群众被迫起义。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全省,并控制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起义。随后,国民党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前往镇压,对台湾人民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起义被镇压下去。“二二八”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推动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7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接连被粉碎和蒋介石大演国民党政府改组闹剧的时候,学生界继“抗暴”运动之后,又发动了影响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这次斗争以上海学生为起点。5月4日,上海学生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上街进行反内战宣传,喊出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5月15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酝酿举行全国性大示威。国民党政府为了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于5月18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但是广大学生并没有被吓倒。19日,上海学生7000多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喊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20日,宁、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6000余人汇集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残酷镇压,100多人受伤,20多人被捕,500多人遭毒打,这就是震惊

全国的“五二〇惨案”。同日,北平大、中学生共 7000 余人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运动,也被镇压下去。席卷南昌、天津、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福州、沈阳等 60 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持续一个多月,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避免过大的牺牲,6 月 3 日,中共中央指出,要注意改变斗争策略,要求可能实现的条件,积蓄力量,择机再战,从而保证了国统区学生运动深入、持久、稳妥地进行下去。

在全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国统区的工农运动也持续开展起来。1947 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工业城市,有 120 万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军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农村,国民党为扩大内战,继续实行征兵征粮的残暴政策。于是农民广泛组织起来,掀起了抗租、抗税、抗粮、反对抓丁、惩办汉奸、清算恶霸的斗争,甚至拿起武器,开展规模巨大的民变运动。从 1946 年秋到 1947 年 1 月,民变运动发展到南方各省 300 多个县,参加的群众已达 80 多万人,其中以四川、西康两省的规模最大。同时,由于粮价暴涨、饥民遍野,城镇居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遍及全国 9 个省 38 个城市。这些斗争充分暴露和加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促进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

总之,国统区以学生为主体的,包括社会各阶层民众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它的形成,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迅速扩大,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国民党的经济危机

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全面垄断和疯狂掠夺,由于美国垄断资本的严密控制和经济侵略,由于浩瀚的内战经费以及反革命内战的破坏,使得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主要表现为:

第一,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军费开支浩大,财政严重赤字。以 1946 年为例,蒋介石政府的全年预算支出为 2.5 万亿元,实际支出为 7 万亿元,实际收入为 2.2 万亿元,财政赤字为 4.8 万亿元。1946 年的军费开支为 6 万亿元,占实际支出总数的 86%。为了弥补巨大赤字,其主要途径就是滥发钞票。国民党法币发行额,在抗战前只有 14 亿元,抗战结束时约为 5000 - 6000 亿元,到 1947 年 4 月即猛增至 16 万亿元以上。当时的中国,可谓百业萧条,唯有印钞票最为兴隆。钞票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以抗战前为标准,到抗战胜利时止,物价上涨了 1800 倍,到 1947 年 7 月,则上涨了 6 万倍。1937 年,100 元法币可买 2 头牛,到 1947 年只能买 1/3 盒火柴了。

第二,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由于物价猛涨,捐税繁重,美货大量倾销,加之美国垄断资本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对市场、原料和资金的野蛮垄断,民族工商业遭到更大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1946 年下半年的五个月中,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 20 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和商店就有 2.7 万多家。上海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

原有工厂 4500 家,到 1946 年底,倒闭了 3160 家;1947 年的开工率,仅为平时的 20%。

第三,农村经济极度凋敝。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宣布 1946 年免征田赋一年,但到这年的 6 月,就宣布恢复田赋征实,并且所征赋税成倍增加。战前每亩田赋连同各种附税在内,折合当时米价,为 1.5 至 2 斗,现在每亩增至 6 斗、甚至 9.5 斗。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实行强制性征兵制度,1946 年征兵 50 万,1947 年增至 150 万,强征民工更是无法计算,这使得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和大批逃跑。农村的自然灾害也严重。由于以上原因,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据统计,1947 年农产品总产量为抗战前的 60% 多。

第四,劳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国统区工农业凋敝,物价猛涨,使得劳动群众和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恶化。城市失业人员大增,1946 年冬,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业和无业人员 260 万人。加之通货膨胀,币值下跌,物价猛涨,更给各阶层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广大公教人员和学生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态。农村情况更为悲惨,沉重的地租、捐税和多如牛毛的摊派,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加之自然灾害的袭击,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1946 年饿死的达 1000 万人;1947 年各地饥民达 1 亿以上。

上述这一切,是蒋介石执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它迫使国统区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在战争第一年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地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方向是中原大别山区,并据此对解放军作战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三军配合:首先以晋冀鲁豫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于 1947 年 6 月 30 日夜在鲁西南地区横渡黄河,进行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分路从鲁西南地区南下,跨陇海路,穿过黄泛区,渡过淮河上游各支流,于 8 月 27 日全部进抵大别山。接着迅速实行战略展开,在大别山地区数十县内,横扫敌人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到 11 月下旬,即建立了三十三个县的民主政权,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站住了脚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插进了一把尖刀。其次是以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于 8 月 22 日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实行战略展开;以陈毅、粟裕率领华东解放军主力于 8 月挥师鲁西南,9 月南下豫皖苏,在淮北平原上实行战略展开。以上三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机动作战,完全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两翼牵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北上,从而掩护陈谢兵团挺进豫西的行动;以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地区发动攻势,钳制和吸引山东敌人,从而掩护我军主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

在此前后,东北、华北、西北各个战场上,纷纷发起强大攻势,与中原作战相配合。这样就构成了在全国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向蒋军发动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

《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巩固解放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向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的转变。

《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强调要坚定地支持广大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的正义要求。《五四指示》发布后,各解放区立即在紧张的自卫战争环境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夏,各解放区大体都约有 $\frac{2}{3}$ 的地区贯彻了《五四指示》,进行了土地改革,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为适应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1947年7-9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比较完备的一部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明确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了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的方针,规定了乡村各级农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从而有利于在运动中树立贫雇农的优势,从政治上彻底打垮乡村中的封建宗法势力。各地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出现了平分土地的热潮,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到1948年9月,解放区已有1亿多人口的地区彻底消灭了封建势力,完成了土地改革。与此同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规定,各解放区在深入土改过程中还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整党运动。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彻底地消灭了解放区农村封建剥削制度,改变了农村阶级关系,翻身农民真正作了解放区的主人。这就从政治上极大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解放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了解放战争的后方,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土改运动的胜利,解放了被封建剥削制度束缚的农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能从物质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物质基础。第三,土改运动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千百万翻身农民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从人力上直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总之,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标志,是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十二月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国内形势迅速朝着更加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面发展,中国革命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了这一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并全面地阐明了处在伟大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夺取全国胜利在各方面所应采取的纲领和政策,明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行动纲领。这主要包括:

第一,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丰富经验和解放战争以来作战的新鲜经验,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明确地规定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方法,以及作战形式、战斗作风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伟大法宝。

第二,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着重地分析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一般资本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共产党对他们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报告批判了共产党内曾经出现过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为此,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第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政治纲领,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但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革命不可能胜利。”

此外,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以及毛泽东的报告,还讨论了解放区群众运动中,主要是土改运动中的倾向问题,着重地研究并提出了纠正土改运动中所发生的“左”的偏向问题。强调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这样,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的关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一系列政策上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 土地改革总路线

为了使全党能自觉地正确执行党的政策,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辽沈战役

东北九省(当时东北划分为黑龙江、兴安、吉林、松江、合江、嫩江、辽宁、安东、辽北九省)和热河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地区。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到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获解放。东北解放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已完成了土地改革,肃清了土匪和封建势力,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民主政权,工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军工生产发展很快,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共制造各种迫击炮弹127万余发,手榴弹157万余枚,子弹657万余发,制造八一、八二迫击炮52门,六〇炮2700余门,以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不仅满足了东北作战需要,而且支援了关内解放军。

经过1945年10月至1948年8月两年另10个月的作战,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军事形势,东北人民解放军从数量上、质量上、装备上,已经全面超过东北国民党军。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解放军由进入东北时的11万人发展到103万人,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为55万人,从战略态势上看,东北解放军已牢牢控制了东北战场的战略主动权。野战军主力位于长春、沈阳之间,对长、沈形成包围态势,一部位于建昌营、北镇地区,对锦州和北宁路造成威胁。而东北国民党军已完全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其通向华北的联系亦被切断,战略态势极其不利。从战斗力看,东北解放军于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进行了近半年的大休整,广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以“大兵团、攻坚战、正规化”为指导方针的群众性军事大练兵运动,东北野战军首长在总结这次大休整时指出:“冬季攻势后数月来,经过军事政治整训,战斗力已大大提高。故此次战力之强大,为空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东北国民党军也加紧进行整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一面请求美国军事顾问团向沈阳空运粮食、弹药,一面整训部队,补充兵员,但其情况正如南京国防部所说:“虽经整补半载,军心战力均未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认为,东北野战军“壮得厉害”,完全有力量全歼东北国民党军。为适应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决战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48年8月13日发布命令,

决定将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的领导机构、指挥机关分开，指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钟赤兵等抓紧筹划辽沈战役事宜，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由此拉开了战幕。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攻势如潮，连战皆捷，势如破竹，至10月1日攻克义切，切断了北宁路，使锦州之地陷于孤立。

东北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局的关键”，“努力争取于十天内外打下该城”的指示，于10月初确定了攻锦打援的整个部署。

10月9日，发起锦州外围作战。至13日，扫清外围据点。14日10时，对锦州城垣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先后从北、南、东三面打开10个突破口，迅速进入市区，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15日拂晓前，各路部队先后在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地区会师，守军大部被歼。残敌约万人固守老城，第7纵队及第2纵队一部随即发起攻击，至18时，全歼残敌。经31小时激战，攻克锦州，俘范汉杰以下近9万人。至此，完全截断了北宁路，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

锦州攻克后，长春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感于形势危殆，在人民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拒绝蒋介石的突围命令，于10月17日率部起义。19日，新7军也谈判投降。21日，郑洞国率直属队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给了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的打击。10月15日、18日，蒋介石两飞沈阳，部署“总退却”。他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归复锦州，打通北宁路，由陆上向关内撤退。另以一部抢占营口，以备西撤受阻时改由营口从海路撤退。同时，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直接指挥这次撤退行动。

据此，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歼灭廖兵团。26日，各路部队在黑山、大虎山以东，饶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大约120平方公里区域内，对廖兵团展开大规模围歼战。激战至28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部队共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6军，俘虏廖耀湘及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辽西围歼战，创人民解放军边分割边围歼敌军重兵集团的范例。

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总攻。2日，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共歼敌13万余人，俘周福成。缴获各种炮1658门，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对营口发起总攻，分三路突入市区，歼敌1.4万余人，解放营口。守军第52军军部及第25师约万余人乘船逃走。至此，辽沈战役遂告结束。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人民解放军伤亡6.9万人。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东北解放区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

淮海战役

1948 年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进攻,连续取得了辽沈、济南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 100 万余人,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总兵力已下降至 290 万,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至 300 万人。11 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为避免徐州地区刘峙集团重蹈东北卫立煌集团全军覆没的命运,决定以白崇禧部 2 个兵团及 4 个绥靖区的部队,共 23 万人,防御平汉铁路南段及长江中游地区,钳制中原野战军主力;将刘峙集团所属的 4 个兵团,4 个绥靖区以及位于平汉路南段的第 12 兵团等部共 29 个军,70 个师,共约 70 万人,分别置于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采取攻势防御,以确保该段交通,拱卫南京、上海,并准备必要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抗击华东野战军的进攻。据此,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顾祝同于 11 月 4 日亲赴徐州,与刘峙研究确定了部署。

这时,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 60 余万,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相比,在数量上虽稍居劣势,但在战略上较为有利。且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加之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支援战争的力量大为增强。在中原和华东战场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统一组织指挥两大野战军和军区部队协同作战,中央军委于 11 月 16 日决定由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组成党的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

11 月 6 日,国民党军开始按预定部署向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收缩兵力。当晚华东、中原野战军乘国民党军收缩之机,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两支野战军密切配合,连续予敌重创,战至 22 日黄昏,全歼国民党军第 7 兵团,击毙其兵团司令黄伯韬。

随后两支野战军乘胜扩大战果,给第 2、第 8、第 13、第 16 等 4 个兵团以沉重打击,控制了战略要地宿县,隔断了徐蚌间的联系,孤立了徐州,并使孤军冒进的第 12 兵团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12 月 13 日,在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猛烈攻击下,国民党军第 12 兵团已被压缩于双堆集、大小马庄、杨庄等东西不足 3 华里的狭长地区内,14 日晚,解放军发起最后攻击,至 15 日 24 时,全歼国民党军第 12 兵团,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由蚌埠北援之国民党军第 6、第 8 兵团,在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的顽强阻击下,连攻 10 余日,虽接近双堆集,但终未能与第 12 兵团靠拢。16 日,在获悉第 12 兵团被歼后,星夜撤至淮河以南。当国民党军第 12 兵团即将被歼时,杜聿明集团 2 个兵团 8 个军被华东野战军重重包围于以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已面临绝境。此时,平津战役已胜利展开,为不使平津地区国民党军迅速决策南逃,中央军委指示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在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据此,华东野战军自 16 日起,一面围困杜聿明集团,一面进行休整,并对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被围之杜聿明集团,在连日雨雪交加、气温骤降、空运时断时续、粮弹不继的情况下,大

批士兵冻饿而死,为求生存,成排、成连、甚至成营的官兵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至解放军发起总攻前,已达 1.4 万余人。

1949 年 1 月初,在平津国民党军退路已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 2、第 3 兵团等部切断以后,华东野战军为最后全歼杜聿明集团,决定采取先歼包围圈东部第 13 兵团,再歼西部之第 2 兵团的方针,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6 日 16 时,华东野战军 3 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两小时激战,歼灭国民党军第 13 兵团万余人,攻占村落据点 13 个。7 日,国民党军第 13 兵团残部仓皇逃入第 2 兵团防区。人民解放军乘势猛攻,又攻克村落 23 处。9 日,国民党军残部在 20 余架飞机掩护下施放毒气,分路突围,均被击退。黄昏,解放军各突击集团全线出击,多路插入国民党军阵地,大胆分割围歼,至 10 日下午 4 时,全歼杜聿明集团,俘杜聿明,击毙第 2 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两月有余,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共歼国民党军 55.5 万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淮海战役期间,华北、华东、中原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给予解放军以巨大支援,出动民工 500 余万人(包括随军、二线及在后方的民工),人力车 41 万辆,畜力车 3000 余辆,汽车 250 余辆,运送粮食 5.7 亿余斤,保障了解放军作战的物资需要,对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平津战役

华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斗争,至 1948 年秋,将华北国民党军孤立于北宁路的山海关、天津和平绥路的北平、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以及承德、保定、太原等不连贯的点线上,使其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地位。华北解放军已发展到 3 个兵团、11 个纵队、32 个旅(含 2 个炮兵旅),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 46 万人。

1948 年 11 月 2 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华北战场局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野战军已成为一支全国性的战略机动力量,可随时入关会同华北部队联合作战,将对傅作义集团形成绝对优势,东北解放区已成为战略总后方,且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的力量空前强大,华北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的震慑下,已处于撤守不定、战和难决的“麻痹状态”。

为统一战场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东北、华北部队统归东北野战军(公开称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指挥;1949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决定,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唐等地的一切工作。

从 11 月 23 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 11 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告别了白山黑水,分三路经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向关内挺进。入关部队与华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将华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唐沽五个据点。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后,按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部署,决定先取新

保安、塘沽两点。

新保安作战于12月21日发起,在扫清外围据点后,于22日7时发起总攻,第4纵队首先从东面突入城内,第3、第8纵队也相继从西面和西北面突入城内。经10小时激战,全歼第35军2个师共1.6万余人,军长郭景云毙命,副军长王雷震被生俘。

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守军于23日拂晓向北仓皇突围,企图逃向归绥。围城部队当即实行围追堵截。至24日晨,将逃敌压缩在张家口以北西甸子至乌拉哈达不足1公里宽、10公里长的山沟内。至16时,除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带少数骑兵逃脱外,其余5.4万余人全部被歼,张家口重获解放。

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被歼后,北平守军向西突围已无可能,但会合天津、塘沽守军从海上或沿津浦路、平汉路从陆上南逃的可能性却增大了。因此,中央军委先后令东北第4纵队和华北第2、第3兵团东进,加强对北平的包围。

中央军委原定计划东北野战军先打塘沽,后打天津。由于塘沽地形不利,且打塘沽时平津守军有可能乘机突围。因此,毛泽东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不打塘沽,攻打天津。

天津是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人口200万,面积150平方公里,市区面积35平方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夺取天津。

14日10时,天津前线指挥所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各突击集团在炮兵、工兵和坦克的协同配合下,迅速通过护城河。11时,从东、西、南三面9个突破口突入市区。采用穿墙越顶战术,绕过守军坚固据点,向纵深猛插。15日5时,东、西突击集团会师于海河金汤桥,完成了拦腰斩断任务。随即向南、北两面进攻,守军陷入一片混乱。至15时,全歼天津国民党军,俘虏敌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仅经29小时激战,就攻克天津这座具有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

1月17日,据守塘沽的国民党军5万余人乘船南逃,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追歼其后尾约3000人,解放塘沽。

天津解放后,北平守军25万人,完全陷入绝境。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已做好一切攻城准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北平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古城,为保护其免遭战火,决定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一旦和谈不成即以战斗方式解决之。

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感于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北平各界人民群众的和平压力,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并派其副总司令邓宝珊到平津前线司令部洽谈。21日,双方正式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日起,北平国民党军陆续开往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按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31日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从西直门开入城区接防,北平城头飘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遂告结束。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至北

平。

平津战役历时 64 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 1 个“剿总”总部、1 个警备司令部、3 个兵团部、13 个军部、50 个整师,共 52 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 3.9 万人。基本解放了华北地区。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平津战役中产生的用战斗方法解决敌人的“天津方式”,用和平方法解决敌人的“北平方式”,和后来形成的用划界驻守方法解决敌人的“绥远方式”,向尚存的 100 万国民党军残余军队指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顽抗就是灭亡,和平才有生路。这对于全国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胜利进军,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 3 月 5 - 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并向会议作了《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全会主要讨论了毛泽东这一报告并决定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提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标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这主要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根据三大战役后的形势,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战斗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实行和平改编;绥远方式,暂时保存国民党军队于局部地区,待条件成熟后再和平改编。同时,为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决定要准备把 210 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方针。

第二,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明确指出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第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际上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共产党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是:在政治方面,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应使这种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对私人资本主

义经济必须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同时,必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有这些,也就是提出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在外交方面,提出了“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

第四,会议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进攻。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在于 它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 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重要准备。

和平阴谋和南京政权的覆灭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美国 and 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到已经不能单纯用军事斗争的方法来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了,这时,他们再次策划了一场和平阴谋。还在 1948 年初,美国帝国主义者鉴于蒋介石集团的腐朽统治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日益恶化,就开始酝酿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中途换马,实行换马谋和,以图挽救败局。1948 年 4 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桂系首领李宗仁竞选成功,成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随后,美国报刊就不断制造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出面谋和的舆论。1948 年 12 月 13 日,由杜鲁门派来中国活动的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在上海曾公开声明说:“如果自由分子和党派在联合政府中有普遍的代表”,“美国可能援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20 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孙科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通过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往访孙科,明确告诉孙科说:“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以此对蒋施加压力。这些表明,美国政府这时已把蒋介石视为障碍,决心采用“换马谋和”策略,推进“和平运动”,以维护美国在华势力。1948 年 12 月,桂系首领白崇禧从武汉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蒋迅速作出“和谈部署”。这实际上是逼蒋下台。蒋介石在军事上溃败,经济上破产,政治上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得不于 1949 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正式提出求和要求。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这种和谈的烟幕下,获得喘息之机,以便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美国这时还竭力对某些既同国民党和美国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进行拉拢和煽动工作,企图由这些人出面鼓吹“和平”,或由这些人在革命阵营中组织所谓反对派,以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面临着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样尖锐的问题。1949 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新年献词》(即《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代表中国共产党庄严地号召全国人民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将革

命进行到底》一文深刻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妄图以“和平”手段阻止革命发展、保存反动势力的反革命策略,告诫人们决不要上美蒋反动派和平阴谋的当。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深刻地剖析了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告诫人们绝不能怜惜恶人,对美蒋反动派也绝不能抱任何幻想,号召人们应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和平欺骗,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还尖锐地批判了某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鼓吹无原则的妥协,散布怜惜敌人,劝告中国人民接受反动派的虚伪和平等错误主张和某些人妄图在革命阵营中组织反对派的危险企图,号召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要为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一致奋斗。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郑重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方面指出蒋介石关于和平谈判的建议的虚伪性,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就给了蒋介石的和平阴谋以粉碎性的一击。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而将其总统职务交由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宣布愿以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从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愿望出发,决定与南京李宗仁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代表,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指定的由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由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所组成的代表团,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15日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和磋商,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秉承蒋介石意旨,拒绝了这个协定。这就最终揭下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虚伪面貌。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1000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随着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全国性的革命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在北平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领导进行建国的准备工作。

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回答人们所关心的新中国的性质,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国家的内外政策及前途等。

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阐明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和政策。文章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要强化国家机器,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此文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爱国华侨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共662人。会议集中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行使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60条。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即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份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政策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全体国民的公德,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等方面政策。《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准则,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新中国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并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等机构的地位、任务都作了具体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其后也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民主协商国家大事,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

会议选举了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

平,改北平为北京,通过了国旗、国徽、国歌,还通过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至此,建立新中国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同时,会议发表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点,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国歌、礼炮和群众欢呼声中,毛泽东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结束了100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史,使中国变成了真正独立、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劳动人民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它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使世界殖民体系遭到严重打击,推动了世界人民斗争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实践表明,只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走符合本国革命实际的道路,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经济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样,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经验是:必须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建立一个由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参加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